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

中國反左防左運動的歷史根源

（上冊）

謝幼田 著

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上冊）

作者：謝幼田

出版：集成圖書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

電話：2388-6172　傳真：2388-6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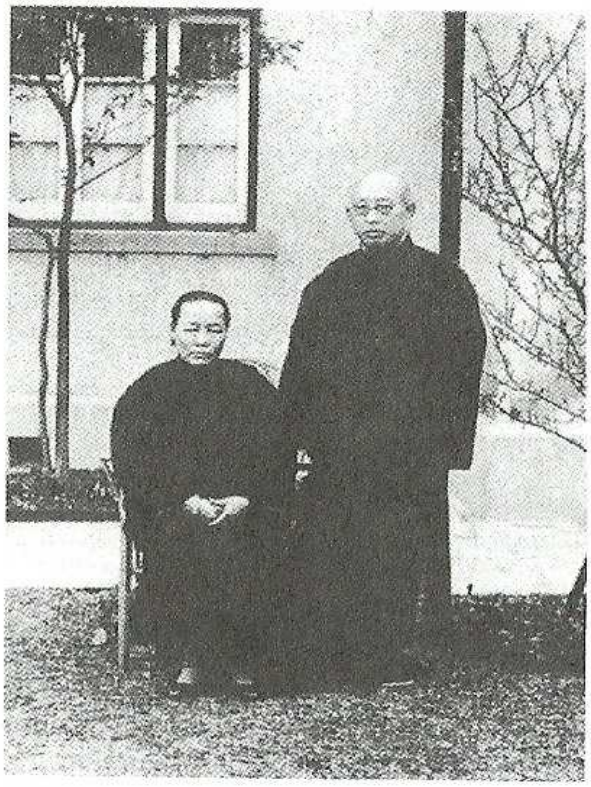
印刷：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西環德輔道西香港工業大廈 1 樓 D 座

電話：2819-5112　傳真：2855-1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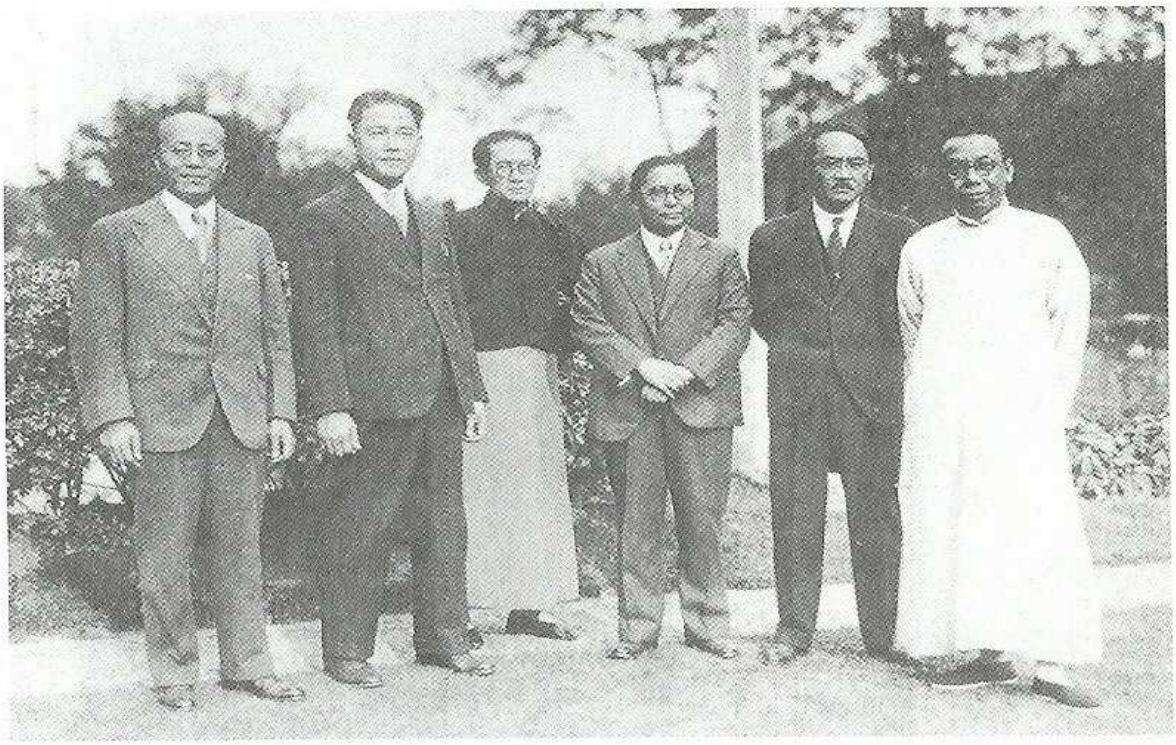
2001 年香港・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62-86043-6-8



謝持與其妻鍾慧齡合影

鄒魯先生畫蘭



由左至右：伍朝樞、汪精衛、李文範、孫科、陳友仁、鄒魯。

1951（民國四十年）攝於國慶閱兵台上。左起：黃朝琴議長、陳誠院長、藍欽大使、居正、鄒魯、于右任院長、朱家驊院長。

目録

唐德剛序……3
居灝初序……16
鄒達序……17
自序……22
一、中共成立的背景……1
二、孫中山先生的困境……19
三、莫斯科伸出的手……34
四、越飛與鮑羅廷……52
五、開始同床異夢……69
六、蘇俄陰謀初露……85
七、國民黨「一大」的内在矛盾……103
八、國民黨人最初的抗拒……120
九、彈劾共産黨案……137
十、孫中山最後的日子……153
十一、對抗與調和……175

十二、危機加深……198
十三、「廖案」引發的政變……216
十四、反共思潮興起……241
十五、西山會議的準備……260
十六、預備會議中的紛擾……276
十七、幾個主要文件……288
十八、與廣州中央交鋒……301
十九、廣州中央顯示力量……322
二十、主義與利益的選擇……346
二十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363
二十二、左右開弓者……381
二十三、信念的力量……401
二十四、上海的槍聲……419
二十五、團結的障礙……437
二十六、滬寧統一運動……455
二十七、特別委員會始末……468
二十八、餘波蕩漾……498
二十九、結語：歷史價值……515

唐德剛序

記得那還是五十年代之末，雷震先生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的時期，那時身任該刊發行人的胡適之先生，要我們一批美國留學生，替《自由中國》「寫寫稿」作爲精神支援，三句不離本行，我也就應命在《自由中國》上，寫了幾篇史論文章，其中一篇就叫做〈論西山會議派〉。該篇也在當時，我們在海外自辦的，並與《自由中國》結爲「姐妹刊」的《海外論壇》上，同時刊登的。

「西山會議派」，這個中國國民黨中最古老的一個派系，我在孩提時代就耳熟能詳了。慚愧的是，我還跟着過一些是我父執長輩的青少年們，喊過「打倒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派」的口號呢。西山會議派是甚麼個東西？我們又爲甚麼要「打倒」它？當時的我當然一無所知。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之中，是個應該打倒的壞東西，我則未嘗懷疑也。一直等到抗戰中期，我在重慶上大學，讀了歷史系之後，才恍然大悟。因此在五十年代，爲支援《自由中國》，我才對這個，有疑處不疑的口號，在胡適老師，不疑處有疑的感召之下，十分感慨地，寫出那篇〈論西山會議派〉的短文，把那個「歷史反革命」的國民黨元老集團，稍事平反。

最有趣的，我記得還是在六十年代之初，我在紐約第一次遇到從台灣來美國訪問的夏濟安教授(夏志清教授的長兄)。夏教授說，他對我眞是「久仰，久仰」了，因爲他是我的「忠實的讀者」，「五體投地」，云云。原來他在《自由中國》上讀過我這篇論西山會議派的文章。他幼年在蘇州時，和我一樣，也喊過不知多少遍，「打倒反革命的西山會議派」。可是就不知道「西山會議派」是甚麼個壞東

西。一直等到他在《自由中國》上，讀到我的「大作」，才「恍然大悟，恍然大悟」的。

其實同夏教授和我一樣，我們從革命口號中長大的這一代的老青年，當然包括我自己，在讀過《自由中國》上的拙文，而「恍然大悟」的，還不知有多少人呢。他們之中，有許多也都和夏教授一樣，向我說過「恍然大悟」一類的話。我自己事實上，也就是爲着追求這個「恍然大悟」，才執筆的。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胡適老師所說的，不疑處有疑，原是我們搞歷史這一行中，扳搖不動的信條。君不見，最近數十年來，數千萬人頭落地，屍骨堆山，血流成河的現象，不都是有疑處不疑的瞎口號，瞎信仰和瞎指揮，所聯合造成的最可怕的後果。胡適說，「辯冤白謗」原是讀書人，尤其是歷史家所最應該做的事，其作用正在此。

辯冤白謗，談何容易

可是把不疑處有疑的各種冤案，都能辯冤白謗，搞到「恍然大悟」的程度，可不是一樁容易的事體呢。筆者所寫的那篇，使夏濟安教授和我自己都「恍然大悟」的拙作，我這個作者對我自己的拙文，有時還在不斷的不疑處有疑呢。原因是，筆者小可算老幾？我怎敢說，我那篇〈論西山會議派〉的急就章小文，就能把「西山會議派」這個歷史上的大題目下了「定論」呢？不用說我沒這個主觀的資格；客觀的原始史料，和客觀的、徹底的歷史研討(所謂 exhaustive research)的學術環境，都還沒有出現呢。筆者不學，那能就根據一些不全的史料，和不徹底的歷史研究，就遽下「定論」呢？因此筆者那篇小文，也只能算是一篇「大膽的假設」，和拋磚引玉的一點小嘗試，它的是否有當，還有待於今後繼續出現的史料和更徹底的史著，來加以「小心求證」，然後才能肯定，或否定呢。當然不論肯定或否定，都不是言之無物，說空話所能決定的，它總是要在 Exhaustive Research 之後，才可以大致作其結論，而這項結

論，縱遲至目前，也還嫌條件不夠呢。但是這個時代，卻一天天地迫人而來，問題遲早是會解決的。爲期不遠也。這也就是筆者不揣淺薄，常時提到的所謂「文化轉型」，和學術自由的問題了。文化轉型，總歸有個終結的時期；學術自由的到來，也是個歷史的必然，遲早而已。

諸子蜂起的現代版

我國近百餘年來，文化轉型最顯明的趨勢，也是任何人和事所不能逆轉的趨勢，那便是學術研究，要從「一言堂」的鐵框框之內再度衝出來，從證明一家眞理的歷史研究，轉向尋找百家說理的道路上來……根據近年來海峽兩岸三地，學術研究的大風向來觀察，一個嶄新的學術運動，正迫人而來，不特自然科學在中國要大放異彩，文史哲和一般社會科學和行爲科學，都要大放光芒，爲過去兩千年之所未有。其多彩多姿，將遠超過二十世紀初期那個「五四運動」。因爲五四運動從學術觀點來看，只能算是個「啓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在西學東漸的衝激之下，運動量至大，而內容(所謂科學，民主，所謂新文藝，新思想，包括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卻十分膚淺的啓蒙運動，介紹運動而已。

今後這個勢必到來的，新的學術運動，則是五四後，經過百餘年的醞釀與融和，由東西兩大文明的長期交配，而滋長出來的一個新的文化轉型運動，一個眞正的中國式的「文藝復興」(a real Chinese Renaissance)。胡適之先生曾把五四前後所發生的「新文化運動」，說成「中國文藝復興」，那是虛張聲勢，言過其實。一個眞正的「中國文藝復興」，看趨勢，應該發生在本世紀，二十一世紀中葉。現年未逾半百的幸運朋友們，當能躬逢其勝也。它的必然到來，不是任何主觀客觀的人與事，所可逆轉的。它之駕臨吾土，是個「歷史的必然」。信不信，且待即將到來的歷史事實，來加以證明嘛。

但是這個新的文化運動之到來，它不會像在「五四運動」時代，那樣幼稚的搖旗吶喊。它會像曾國藩所說的：「得富貴如登高山，不知身之自高也。」那樣「不知身之自高也」的慢慢發展到最高潮的。朋友們，相信嗎？這個不知身之自高也的文化爬山運動，現在正在起步，正在起步。它要再爬四五十年，猛然回頭一看，才覺得宇宙之廣闊，自身之高聳，而心懷大暢……朋友，您要瞭解這一意境，不妨去問問，高段職業爬山客(professional mountaineers)，他們就會告訴您，他們何以愛上了「爬山」。我國文明中最光彩的「百家爭鳴，諸子蜂起」那一段，歷時數百年。它是從那個搖旗吶喊的「愛國運動」搞起的呢？它是得富貴如登高山，不知身之自高也，慢慢地爬向高峰的。我們這個眼看即將到來的另一個文化運動，便是兩千年前諸子蜂起的現代版。這也是筆者個人所經常說的，「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反映在文化上的現象是也。這是個歷史的必然，任誰也不能逆轉也。

歷史考驗，論定標準

在這個即將到來的文化高潮裏，歷史學必然是「百花」之一，其艷逐群芳，今日已可略見端倪了。在這一新的史學潮流裏，「西山會議派」這個史學題目，必然也是將來「博士生」，選擇的重要對象之一，是無可置疑的。在一本有功力的博士論文裏，則「西山會議派」是否是個「反革命集團」，參加「西山會議」的國民黨諸元老，是否就是「歷史反革命」，就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第一，就要「靠證據說話」了。證據確鑿，則誰也無法替他們平反，證據不足，則任誰也不能胡亂污衊。第二，則是「革命」一辭定義的問題，甚麼叫做革命？甚麼又叫做反革命？第三，縱使把革命的定義說清了，那末「反革命」，究竟又算是甚麼個罪惡呢？最近海峽兩岸，不是都把「反革命」這條罪狀，從刑法上廢除了嗎？那末寫歷史的人，又怎能不「重行估定一切價值」，把不疑處有疑的歷史，來重行改寫呢？

我國傳統歷史家臧否人物，有所謂「蓋棺論定」。一個善變的歷史人物，像汪精衛那樣，他一旦死了，不能再變了，就可以對他的功過下結論了。可是也有歷史家認爲，蓋棺還不能論定，因爲歷史人物，生前難免都有其恩怨的，像兩蔣一毛，像劉少奇，林彪，和鄧小平，生前都恩怨太大。他們身雖死亡，而恩怨未盡，感其恩者，就要大造其紀念堂，不時謁陵瞻拜，感恩泣血，怨大者，則咬牙切齒，恨不得把紀念堂改爲公共廁所，及早鞭屍。所以一個歷史人物，恩怨未斷，又豈能論定哉？

其實上述兩項，都只是屬於一種，人事恩怨的主觀思想，在政治上說，不足爲訓。在哲學上說，也不值得重視。因此以社會科學法則治史的現代史家，對一個歷史人物，乃至一樁歷史事件(像「西安事變」)的評價，則要看該人物的思想行爲，和該事件的影響，是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就以毛澤東主席爲例吧，他老人家生前被叫成「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叫翻了天了。但是在毛公漸漸向歷史的海洋下沉的時候，歷史家再回頭看看，毛氏這四條生謚，和他一生的所作所爲，符合不符合呢？這就叫做「論定」了。如此，則毛氏不特蓋棺不能論定，恩怨盡時，也還是不能論定的，只有在歷史發展的長期的考驗之下，才能慢慢地，顯現出比較公平合理的「定論」來。

歷史人物如此，歷史事件亦然。例如「西安事變」這樁歷史事件，由於當事人的恩怨未盡，論者至今還是兩極化。但是這樁歷史事件，不特改寫了中國現代史，也改寫了世界現代史，因此歷史家對它的評價，就不能單從兩人的功過，乃至兩黨的恩怨立論了。要說明其所以然，就要從宏觀史學的方面，來加以透視，且看它在事前事後的歷史發展上，究竟發生了甚麼樣的作用，再來加以詮釋了。因此，只有時間和歷史的考驗，才是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作「定論」的，最可靠的依據呢。時候未到，言之過早，就難免於歪曲了。

反左防左的老祖宗

西安事變如此，西山會議亦然也。因此筆者當年對「西山會議派」，作「恍然大悟」的追求，只是一種對此一歷史事件的「眞象」的追求。但是作這種追求的「眞象史學」(Factual History)只能算是整個歷史研究中的起步，小兒科而已。因爲你把歷史的眞象弄清楚了，又意欲何爲呢？證明些甚麼呢？(What do you want to prove?)所以更重要的還是第二步，這眞象在歷史的演變上，說明了些甚麼？和證明了些甚麼？要知道這「眞象」說明了些甚麼，證明了些甚麼？那就不能單看它，立竿見影的，「立刻後果」(immediate reault)了，它需要有數十年，甚或更長時間的考驗與觀察，才能見其歷史眞義，和功過是非之所在也。

且看西山派，他們這批「總理的老朋友」，中山最原始的追隨者，他們是從反對孫中山「向左轉」，和「以俄爲師」的國民黨新政策，新方向開始的。中山個性倔強，因此中山在世時，他們只有暗中搖頭，不願明目張膽的「反左」。中山也有知人之明，他知道這些老同志有「反左」傾向，對他們也就尊而不親，敬而提防了。此後他對這些老同志，雖然一個個都還依舊「圈」入改組後的中央委員會，但是新黨章卻規定「總理有最後決定權」，這樣就把黨魁獨裁化了。獨裁者再以個人權力，另組革命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等一類的小組織，來代行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如此一來，中央委員會就變成個空殼子了。身爲中央執行委員的元老們，也就一個個被架空，一個個被迫靠邊站了。以至國民黨在二十年代初期改組之後，就變成個「左派」當權的，另一種革命黨了。

可是中山一旦物故，黨內再無第二個享有最後決定權的獨裁總理，這夥原在中央委員會裏佔絕對多數的「老同志」，立刻就圖謀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權力，黨內就難免發生了左右之爭。但是經過中山

生前刻意栽培，以汪蔣爲首，以中生代跨黨分子爲骨幹的「左派」，這時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內，已根深蒂固。這個以俄國顧問鮑羅廷爲後盾的左派，因此也就時時刻刻存有「清黨」之心，要把這批元老，乾脆清除出黨，以免他們在繼續向左的革命道途上，絆手絆腳。就在這個劍拔弩張的關口，左派重要領袖之一的廖仲凱，突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被刺身死。

這宗所謂「廖案」的兇手，雖至今尚不知是誰，但是廖案卻變成個天大的口實，讓以汪蔣爲首的左派，把反左派，元老派，和一般他們心目中的所謂右派，一舉加以清除，其清除之徹底，連德高望重的胡代帥，也在所不免。胡漢民原是中山北上時，欽點的「代理大元帥」。可是中山逝世後，設在廣州的大元帥府卻被改組爲「國民政府」，那以「革命的向左來」爲號召的汪精衛，也就乘機篡奪了胡代帥的寶座，當上了國府主席，胡漢民也就被迫下崗，靠邊站了。迨「廖案」發生之後，胡氏之黨，頗受嫌疑，以故胡氏被迫，在廣州也無存身之所了。此時連胡漢民在廣州都不能見容，則謝持、鄒魯、張繼、林森等元老，就更無立錐之地了。因此在汪派控制之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裏，就由少數派當權，與蘇共、中共相表裏，國民黨政權，就變成個全左的天下了。

這時黨內的多數派不服，他們在廣州既然不能立足，乃成群結隊的趕往軍閥治下的北平西山，總理停靈之所，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下旬，召開其「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目的則是糾偏，反左，和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應有的權力，這就是所謂「西山會議」了。當然他們的人數也有十餘人，約佔合法中央委員的半數，但其中搖擺不定者，也大有人在。可是西山會議雖不能算是中央委員會，但是與會者都是極有影響力的建黨元老，自有其高度的代表性，因此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以反左、反共相號召的黨內反對派，這就是所謂「西山會議派」了。

自此以後，中國國民黨，乃至全中國之內的革命運動、政治運動、群衆運動、社會運動，以及一般

文化運動(包括新思想、新文學、新藝術)，也就壁壘森嚴的分爲左右兩派，而兩派的鬥爭，至今綿延未息，血流成河，屍骨堆山之餘，最後竟至十二億同胞，簡直無一人可以置身事外，其爲禍之烈，眞是罄竹難書，朋友，這結果毋待細述吧。

但是千禧年後，新世紀中的歷史家，如把近七十年來的民族慘史，從頭到尾的，心平氣和的，清理一下，在萬惡之源的左右派鬥爭之中，我們如果拿血淋淋的人頭，來分別統計一番，則左派爲禍之烈，實遠非右派可以望其項背吧。朋友，這也不算是對左派的栽贓吧？直至目前，縱在大陸，防左反左，仍是當國者的中心任務。這也不算是危言聳聽吧。而當年國民黨裏的「西山會議派」，無意之中，歪打正着，卻變成這項，反左防左運動的「史太君」、「老祖宗」，可笑吧。

七十年來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今日的歷史家再把「西山會議派」拖出來，再論、三論一番，史實眞象之外，該有另一種的歷史意義吧。所以筆者才敢斗膽的說，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蓋棺不能論定；恩怨盡時，也不能論定。評論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要經過長期的歷史考驗，才能下個大致不差的結論，「西山會議派」的歷史，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這項愚者一得，不能算太錯吧。

有善足陳、無惡可隱

西山會議派既然是我國現代革命史上，最早的防左反左的派系，它一開始便是國共兩黨當權派杯葛的對象。國民黨在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之後，對西山派裏的部份「老同志」，謝持、鄒魯、居正、林森、張繼等等，雖然是恢復了尊而不親的老傳統，林森竟然在汪蔣的對峙中，被踢上層樓，當了國家元首，但是西山會議派，算個沒有派系的派系的歷史，還是碰不得的。西山元老，儘管都是一些有爲、有守、有相當學問的老知識分子的老革命家，差不多每個人，也都有其自述、年

譜、日記一類的著作。但是在他們有生之年，他們自己，和他們有些很不平凡的第二代，寄居兩岸三地，甚至遠在歐美，對黨爭往事，也還是欲言又止的。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當事人都死在蔣毛二公之前，西山會議的前因後果，牽涉的恩怨太多，在蔣毛治下，就未便多言了。

再者，國民黨聯俄容共的政策，原是孫中山所親自制訂和領導的。歷史性的反左反共，難免就牽涉到孫公。而孫國父在北伐之後，已經被神化了。西山諸公原是黨國元老，如今雖靠邊站，究竟不失尊崇，對那段不愉快的往事，能忘記，也就忘記了。所幸時間是最公正的，歷史也是永遠毀滅不了的。蔣毛的時代一旦落幕，而西山會議本身也已逐漸和葵丘之盟，鴻門之宴，等等歷史名詞，同其遙遠，恩怨已斷。加以在毛治時代，全民呻吟於極左派「封建加法西斯」的淫威之下，刀山油鍋，皮開肉綻，如今痛定思痛，想起當年反革命的西山派，生姜還是老的辣，實在是頗具遠見，和政治智慧。好事的歷史家，和若干不甘祖宗委屈的當事者的後裔，冷飯熱炒，「西山會議派」就變成一宗純學術性的歷史研究的熱門專題了。

前不久，我曾聽到，前西山主將之一，鄒魯先生的研究，已被選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的專題。鄒魯縱在抗戰末期，仍是國民黨中常會中以反蘇反左反共出名的極右派。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蘇條約」擬訂時，鄒魯也是唯一公開反對的元老。鄒氏今日居然也是大陸上史學博士生，專題研究的對象，則今日在大陸上的博士生，還有甚麼史學專題，不能突破呢？

筆者個人在學術著作中，是最看重所謂「博士論文」的，因爲一所在國際馳名研究機構的博士論文，往往都是，該專題底最嚴肅，最認眞的 Exhaustive Research。其博士論文大都不會自砸其招牌的。我相信該所的學術標準。吾正引領以待這本鄒氏研究新著之面世也。

更可喜的則是我近日又曾熟讀了一部，與另一西山主將謝持先生有關的原始作品：謝幼田撰，《聯

俄容共與西山會議》長篇巨著的原稿，謝君的大著雖非博士論文，但是在新史料的運用上(如新近解密的蘇共檔案，和久被國共兩黨所疾視的謝持等諸元老的日記等，私家文獻)，所下的功夫，也是十分可觀的。如果像這樣的學術著作，一部部的寫下去，則久爲史學禁區的西山會議派的歷史，很快的，就會眞相大白於天下了。

當然我們史學界同行的評論家，可能會說，謝君之作，也不脫當事人後裔著書，爲祖先辯冤白謗，難免於隱惡而揚善，因爲作者是謝持先生的孫子。著書揚祖，怎能不有所偏呢？然余細讀全稿，倒覺得問題不大，作者有時雖然也筆端常帶感情，但是隱惡揚善，實無足重輕。因爲這些老革命，當年爲着救國救民，而拋頭顱，灑熱血，都是一些在革命烽火中倖存的仁人志士，未得與其他先烈，埋骨於黃花岡上者，幾希？重要的是，在國民黨奪得政權之後，他們又始終只是一批靠邊站的元老，未嘗當權也。歷史家如細查他們各個人生平事跡，每人除在青少年期，難免也有若干英雄好色的青年病之外，也只是一種有善足陳、無惡可作的人物。他們的子孫，縱有志欲爲祖先，隱惡而揚善，實在也只是一種小兒科，問題不大也。質諸史界同文，是耶？非耶？

世界革命，義始利終

因此，謝君之作，終究不失爲西山會議派傳統的反俄反左的一家之言，尤其是作者掌握了近年來，由於蘇聯解體，才隨之解密的，一二手俄共新史料。據此而得的新觀點，舊結論，雖與老西山派一脈相承，但是所提出的「證據」，則豐富多矣。原來，在西山派元老謝持、鄒魯等生前，作防左反左運動最力之時，他們總把第三國際，和蘇聯政府的代表，在華所從事的地下活動，和公開宣傳，一概說成是，赤色帝國主義，在中國搞顛覆和侵略活動的新陰謀，其實質與其他白色帝國主義，並無兩樣，這些話在

當時，不特那些有強烈殉道精神的左翼革命家，不能接受，一般公平的歷史家和政論家，對之也有極大的保留。

列寧說，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潮。我們受盡帝國主義之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中的受害人，對列寧這句教導，原是刻骨銘心的。所以在十月革命之後，莫斯科立刻就變成世界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反殖民主義革命的中心和聖地了，一時全世界的革命志士，前往朝拜，受教，參加革命的，眞是風起雲湧，多如過江之鯽，歷史家怎能把這種革命高潮，與傳統的西方帝國主義等量齊觀呢？

可是，從俄國十月革命完成之後，八十年來的世界革命史，卻又毫無疑問的證明了，赤色帝國主義，或社會帝國主義，爲禍之烈，實在是有甚於傳統的白色帝國主義，至少二者是一丘之貉，不相上下，不特謝君之書上，有舉不完的鐵證如山，我們試看二戰期中，蘇聯與德國的瓜分波蘭，滅人小國；和二戰末期之謀我滿蒙新疆，強「租」我旅大，奪我中東和中長鐵路，把中國逼回義和團時代之種種惡行，眞是罄竹難書。解放後北京和莫斯科，蜜月未幾，蘇聯的帝國主義的嘴臉，又畢露無遺。人民中國被迫對蘇備戰，和銜恨之深，固有甚於前朝。「社會帝國主義」這個新名詞，便是從北京叫出來的。一個革命聖地，社會主義的祖國，忽然有自我作賤，又變成了，另一種更壞的帝國主義，這又是甚麼回事呢？

其實，朋友，沒啥深文大義也。這只是基本人性中，最自私、最可恥的一面而已，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這是在沒有私利影響之下，才會出現的公德心。一但私利大於公德，則人類就既無惻隱之心，更無羞惡之心了。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爲着私利，而失去了「惻隱之心」，他就會變成最殘酷、最兇狠的野獸了。在相同情況之下，他如失去了「羞惡之心」，那他就會變成世界上最無恥、最不要臉的流氓、惡棍和強盜了。白色帝國主義如此，赤色帝國主

義亦然也。資本帝國主義如此，社會帝國主義亦然也。只是資本帝國主義，夫子自道，從不隱瞞，它是爲自私、攘利而來，是個「眞小人」。社會帝國主義，則善於唱高調，口口聲聲，爲的是解放弱小民族，爲的是解放被壓迫階級，其結果卻變成，口是心非，以義始、而以利終的「僞君子」而已，這原是最自私的人性中，最醜惡的一面，也不能獨怪於社會帝國主義。

孟子告訴梁惠王說：「王何必曰利，唯有仁義而已矣。」可是口口聲聲的唯利是圖的「眞小人」，還不失其爲誠實，那些滿口仁義道德，一肚皮男盜女娼的「僞君子」，其腐蝕人性，和爲害社會之大，就遠甚於誠實的小人了。俄國人當年主導世界革命運動，終於變成了社會帝國主義，而最後弄出蘇聯解體的下場，實是人類歷史上一出最大的滑稽鬧劇。毛澤東主席在中國當政時代，那種「完全爲人，毫不爲己」的天大牛皮，至今仍然言猶在耳，餘音繞樑，誰知老毛一死，老婆立刻被捕，所謂毛澤東思想，和共產主義，也就被鄧小平裝入了垃圾膠袋，一去不返了呢？這也不是五千年中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鬧劇，醜劇和滑稽劇哉？胡爲乎而然呢？朋友，說穿了，不就是這個「以義始，而以利終」的人性弱點，過分發展的可悲下場？

西山會議派裏，當年那些老頭子們的反左運動，和現在的歷史相印證，豈不是歪打正着？因此，謝君近作，正是衝着這一極有教育意味的歷史事實，根據最新的史料，而作出個極有條理的嶄新的紀錄。我輩讀史、治史的史學老兵，撫今思昔，能不感慨萬千？

極左極右，萬惡之源

記得去歲初夏，筆者正在北京參加一項學術會議，事有巧合，正逢十萬北京學生，爲着美機錯炸駐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而走向街頭，大搞其抗美援南運動。筆者本在街頭旁觀，卻被一偶然機緣，捲入

此一怒潮，而觀禮到底，事後北大師大裏的朋友們，問我對此事的觀感，我則認爲「天下無不是之學運」。我對任何一種學生的愛國運動，都是愛護到底的。因爲青年人的群衆運動，其動機都是善良的，可愛的，但是群衆運動過火了，往往都會走向極端，不是像當年蘇俄和毛公的極左，便是像德意納粹和法西斯的極右。兩者都會出大毛病的，我國社會發展，今日尚在脆弱的「轉型」中期，左右搖擺不定，美國今日，由於最基本人性的弱點，由嫉華、恐華諸多社會心理所釀成的，反華最劇烈的極右派，也正在乘機起哄。中國由於毛主席的幽靈未滅，一個極左的潛力，也時時要死灰復燃，中國的極左如果和美國的極右，配合起來攜手鬧事，恢復冷戰，則這個地球村就永無寧日，我華族要想轉型翻身，恐怕也就遙遙無期了，極左極右，都是萬惡之源，此吾之所以憂心忡忡也。所幸此一左右攜手的局面，終於半途而廢，天相中國，是我祖宗之有積德也。今細讀謝子新著，思往事，感流年，大江東去水涓涓，吾能不感慨繫之也？

二〇〇〇年七月四日 NJUSA

居瀛初序

從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同盟會起，成爲同盟會的核心人物，始終是三民主義忠實信徒的幾位黨國元老，都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也都有建立民主中國的理想。在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結束帝制，成立中華民國的過程中，他們都是積極活動分子。但當孫先生在四面楚歌的時際採納聯俄容共政策，他們表示反對。一旦孫先生逝世，廣州當局面目全非，乃有召開西山會議之舉。西山會議發出文告，大聲疾呼蘇俄援助是帝國主義面具，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格格不相入，階級鬥爭將陷民衆於人間地獄。這是國民黨員忠心耿耿憂國憂民之呼聲。奈何他們有先知先覺，但無勢力。接着日軍侵犯鞏固了軍人領袖地位，中日之戰溶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戰八年，繼以內戰。在毛澤東統治之下，中國人民的多災多難，恰似西山會議的警告。

但是，聯俄容共的底細及汪、蔣的奪權經過，向來諱莫如深，是個歷史之謎。如今謝持先生之令孫謝幼田有志解謎，鑽研最近解密的蘇共中央、中共檔案及西山會議文存，完成此書。將前人所未見的歷史資料分析，公諸於世，其貢獻不可忽視。對歷史的定論，讀者各有己見，但想像西山會議諸公額手含笑於泉下。

居瀛初　一九九九年，美國北卡

鄒達序

謝幼田世兄將其所著《聯俄容共與西山會議》原稿寄來，拜讀之餘，我覺得他引用大量新舊史料，將這段近代史上爲國共兩黨有意誤導的史實重新呈現在世人之前，可稱爲勘誤求是之力作。

發生在二十年代的「聯俄容共」，是中國近代史上關鍵的一幕。正因爲有這一事件，才會有後來的「西山會議」、「中山艦事件」和「誓師北伐」。進而由「寧漢滬分裂」、「反共清黨」、「五次圍剿」，演變成中共的「兩萬五千里長征」、張學良主導的「西安事變」以及「第二次國共合作」。抗日勝利後又有蔣介石與毛澤東的「重慶談判」。歷史一幕幕地推展，其間變化之快，讓人應接不暇。其影響所及，波瀾壯闊，餘波蕩漾，致使國喪元氣，內外交困。七十五年後，今日海峽兩岸，劍拔弩張，舞台愈演愈大：由廣州而中國，而太平洋，這台歷史劇至今尚未演完。正因爲「聯俄容共」的歷史關鍵性，可以說幼田世兄的大作爲我們提供了一把開啓中國現代史的鎖鑰。

其實所謂的「聯俄容共」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被聯的「俄」，被容的「共」以及國民黨各有自己的盤算，同床異夢，其破局自是注定。但是主導並主演這幕歷史劇的孫中山低估共產黨的實力，也高估自己的能力，欲制人反爲人制，實應負主要責任。筆者想就「聯俄容共」這件事的背景，孫中山在此過程中思想變化，作一剖析，作幼田世兄大作的小序。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建黨伊始，他們沒有想到短期內奪取政權的問題，更沒有要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想法。他們曾討論與中國民主革命勢力建立聯合戰線的問題，而國民黨則是他們的理想

對象。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時局主張》①，邀請國民黨等革命民主派召開聯席會議，建立聯合戰線，即友黨合作關係。孫中山告訴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只許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領導，但堅決反對與中共建立平行的聯合戰線②。八月初，中共舉行「西湖會議」，由於第三國際代表馬林對中共施壓，中共黨員終於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③。若干中共黨員擔憂加入國民黨後，將會失去黨的本質。第三國際則要中共利用參加國民黨的機會，以壯大共產黨的組織和實力。孫中山只想擴大國民黨的組織，卻沒有嚴肅地考慮到黨員思想問題，及不同思想所能產生的矛盾和後果。

孫中山多年以來不斷試圖向英、美、德、日諸國爭取援助，都沒有結果。被陳炯明逐出廣州以後，他處境困難。正試探向中國發展的蘇聯與第三國際在此時與他合作，並給予實質援助，正是他迫切需要的。孫以爲中共黨員參加國民黨後，若能受其領導，可免中共獨立發展，藉助蘇俄支助，壯大後與國民黨競爭。這是孫中山的如意算盤。不料中共黨員人數雖少(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時，中共黨員是一百二十三人)④，但立場鮮明，鬥志高昂，一旦進入國民黨，就向基層工農發展，將偌大的國民黨分化瓦解。孫中山在戰術上完全失控。歷史告訴我們，國共在一黨之內短兵相接的鬥爭，較之兩黨之公開競爭更爲激烈。

聯俄容共當初只是孫中山爲爭取俄援的策略運作，但孫中山個人的思想逐漸開始變化。以下是發展的脈絡：

㈠一九二二年五月，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來到中國，向國民黨提出民主革命派聯合戰線政策，但孫中山堅持要中共黨員及共青團員加入國民黨，服從國民黨領導。

㈡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與越飛發表「孫、越宣言」，宣示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

引用於中國，態度明確⑤。

㈢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日，鮑羅廷到廣州，孫中山聘之爲國民黨顧問。鮑諳英語，能與孫中山溝通，說服力很強，因此他參加了國民黨大會的籌備工作，有力地影響了大會宣言。孫中山思想受其影響，開始左轉。鮑羅廷的另一重要任務是利用他的地位，指導中共黨員替國民黨製造左右派，以行分化操縱之術⑥。

㈣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改組，舉行代表大會，這是國民黨劃時代的大事。會上很多同志責難容共政策，國民黨開始分化，右派出局。經黨部改組，共產黨控制了最重要之組織、工人、農民三部，國民黨的鄒魯長青年部，戴季陶長宣傳⑦。當時鄒和戴是被視爲中派的。從此共產黨員逐步操縱了國民黨的運作。

㈤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提出「彈劾共產黨案」，指出其言行不忠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妨害本黨之生存發展，希予嚴重處分⑧。但孫中山僅希望共產黨員覺悟，未加深究。

㈥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孫中山親函指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革命委員會當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胡)漢民、(汪)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應加入，於事乃爲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而漢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⑨

此信寫於孫中山十一月十三日離粵北上開「國是會議」前夕，收信人是得孫信任的蔣介石，所以非常重要。信中「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成了孫晚年最重要的指導思想，也是一句

影響後世深遠的名言。胡漢民、汪精衛是他平日之左右手，亦是黨的核心分子；今竟連胡、汪都欲排去，黨的分化何以一至於此。從達林建議到以俄爲師，時間相距僅二年五個月，孫中山的思想已急劇轉變。

孫中山逝世於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去世後，第三國際派在廣州的鮑羅廷，托庇於聯俄容共的政策，操縱着政局。他選易於利用的汪精衛爲國民政府主席，以排除代帥胡漢民。不久，廖仲愷被刺，案發後中央成立特別委員會查辦此事。第二天，鮑羅廷認爲這是陷害異己的絕好機會，交出一張名單，拿辦鄒魯、胡漢民、鄧澤如、謝持等。特別委員會問：「毫無證據，怎樣拿辦。」鮑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⑩在這種沒有是非的環境下，一批國民黨黨員被迫離開了黨的根據地廣州，並相約散處各地中央執行委員及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總理靈前舉行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世稱「西山會議」。他們爲黨國的前途籌劃，沒有軍隊和財源，更沒有根據地。爲了信仰，反對階級鬥爭，追求的是中國的富強，表現的是中國國士不屈強權的浩然之氣。孫中山若地下有靈，不知作何感想。

主導聯俄容共的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導者之一，致力革命凡四十年。其一生事跡之評鑒不屬本文範圍，唯聯俄容共之失算，以俄爲師之誤導，餘波及於今日海峽兩岸。及孫中山逝世，爲政治理由，國民黨尊之爲國父，共產黨敬之爲革命先行者，尊美集於一身。毀譽迥異，功過是非皆史家之職責也。

鄒　達　二〇〇〇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釋：

①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六大以前》一六至二三頁。

②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見《禍國史料彙編》四二七至四四二頁。

③張國燾《我的回憶》二四二至二四五頁。

④同③，二三七頁。

⑤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一四〇八至一四一三頁。

⑥周佛海《逃出武漢赤都之報告》民一六，廣西省黨部《清黨叢書》。

⑦鄒魯《回顧錄》一六〇至一六一頁。

⑧《革命文獻》第九輯，七二至八〇頁。

⑨黨史委員會編訂《國父全集》九六二頁。

⑩同⑦，一六八至一七五頁。

自序

本世紀是中國歷史的亂世。前半世紀，充滿着戰亂、欺詐和百姓的流離失所；後半世紀，雖然中共一統大陸，但是在毛澤東統治之下，餓死、整死、殺死的無辜以千萬計；現在，大陸的改革雖然露出曙光，台灣的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是海峽兩岸仍然在磨刀霍霍，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問題並沒有眞正解決。

亂世也！

辛亥革命雖然是一次民族運動，但是還來不及復甦民族的精神層次；然後是淺薄的「新文化運動」造成的思想眞空，給以階級鬥爭爲核心的共產主義價值觀傳播創造了條件。

孫中山先生在世之時，結合中西文化的三民主義既有理想，又有具體任務，似乎有統一平亂，導引中國走入升平盛世的氣概。那時候，北洋政府雖然執掌着中國的大權，得到了世界各國的承認，但是已經逐漸失去整個社會的認同。孫中山最後北上時在津京所受到的百姓的自發歡迎，更說明三民主義開始深入人心，社會上下已經有了初步的是非觀。

孫中山先生在世時，不得已有聯俄容共之舉，剛剛引狼入室就去世，社會頓失重心，中國共產黨在鮑羅廷的指揮下，乘機不擇手段地從中國國民黨的內部進行奪取權力，由此而把中國帶入眞正的亂世。共產主義的赤色火燄，隨北伐而燃遍全國。助紂爲虐的，主要是汪兆銘，還有蔣介石。只要看看汪在孫中山先生死後的數年期間，在根本的政治問題上反覆和顚倒的次數，就說明自命的領袖的道德是如何的

墮落，說明國民革命在權力的面前已經喪失高瞻遠矚的理想色彩，說明社會各界的是非判斷能力在逐漸喪失，說明中國墮入了多麼可怕的亂世之中。

這時候，在極爲困難的條件下，在中國高舉起反對共產主義的大旗和反對蘇俄紅色帝國主義控制中國的，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屆第四次全體會議。因爲這次會議在北京西山召開，所以被稱爲「西山會議」。由此有一系列批判共產主義的文件。歷史家已經指出，國民黨以後的一切反共活動，都是西山會議在政治上的延續。而且，西山會議元老集團和俄國第三國際的鬥爭，也正是講究和諧的中國文化和蘇俄鬥爭文化的一場大衝突，這衝突持續到現在。

由於蘇聯帝國瓦解以後，許多檔案解密，一些歷史疑團得以解開，而可以從新的高度來認識。例如在「五四」以後，蘇聯通過加拉罕連續發表了兩次對華政策的聲明，宣佈放棄沙皇俄國強迫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造成了劃時代的影響，博得中國社會的普遍好感，使一部份知識分子走向了共產主義道路，也成爲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的基礎，「孫文越飛宣言」的第二條，就是蘇方對此的再度確認。但是現在公佈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顯示，在該宣言發表以前，已經被廢除了，並且通知了越飛。越飛一方面擔心中國人會因此把蘇聯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一樣看待，一方面又成功地欺騙了孫先生，將其做爲聯俄容共的基礎。從新的文件進行研究可以發現，過去認爲是國共兩黨的若干衝突，實際是中國和俄國的國家利益的衝突，因爲二十年代的中共，從戰略到政策，都只是蘇俄黨的決定的執行者，是爲蘇聯的國家利益服務的。

但是在組織上，西山會議的諸位元老卻經歷了失敗。因爲在廖仲愷被暗殺以後，中共、汪兆銘、蔣中正聯合利用這一次事件奪取了權力，這三者互相依靠而興起。雖然蔣介石不久以後走上了反共道路，在思想上繼承了西山會議的道路，但是在組織方面，對西山會議始終打擊。這其中的許多史實，從來是

諱莫如深的；最講究現實政治利益的中共，往往將歷史作爲一種宣傳手段，更增加了這段重要歷史的盲點。

中共成立後迅猛的發展在二十年代中期，中共動搖整個中國社會根基的農民運動也在此時具雛形，中國文化與蘇俄文化最初的激蕩排拒，以及蘇俄通過中共最初征服中國的失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正面抗爭的第一個回合，也在二十年代，這段歷史的關鍵在西山會議。其中包括着許許多多的可歌可泣的人物和事跡，都被淹沒在官家出版的含混的歷史之中。

故本書首要在於弄清事實，之後才加以論述。

立足於中華民族的福祉而斷是非，環顧於世界歷史的大潮流而有褒貶，「述往事，思來者」(司馬遷語)。希望這裏提供的，是一面小小的歷史鏡子，稍微能夠照出已經蒙塵的一小段歷史；希望能夠略略弄明有些歷史的是非；更期望與史家們一道，鑒照過去的歷史，而能夠有利於中華民族從亂世走向治世。

本書之能夠完成，得到了居覺生先生的愛女居瀛初、居載春的大力支持；得到鄒海濱先生的兩位哲嗣鄒永、鄒達的堅定支持；得到謝慧生先生嫡孫謝體先、謝繼先，和嫡孫女謝念先、謝令修、謝懿珣、謝令珊、謝靜珊、謝螢叔的熱情鼓勵和指導，使得本書溶進了他們的智慧和價值追求。

本書之能夠完成，還得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的長期幫助，特別是胡宇鏡先生、戴天禾女士、胡英英女士的關切，在此深表感謝。

台北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任所長陳三井先生，也對本書一再鼓勵支持，在此也致以謝忱。

一、中共成立的背景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有兩方面：其一是，在五四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思潮中，部份急功近利的中國知識分子急於用俄國傳來的馬列主義來填補文化的真空；其二是，蘇俄爲了繼承沙皇俄國在遠東的擴張，採取了披着意識形態外衣的形式。

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送過來了馬列主義。可是爲甚麼俄國的這場革命在中國社會引起的巨大的反響，遠遠超過其它國家？這只能夠從中國本身的文化，從具體的國情中去尋找。

一方面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古老中國進行侵略瓜分的國際環境；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薰陶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總是以天下事爲己任，爲了挽救國家危亡，他們之中的部份人沒有任何深謀遠慮，甚至對從外國來的「救國之道」並不瞭解，就急速地作出了選擇。

十九世紀末的從事洋務運動的精英們，只是對西方的形而下的器用之道有興趣，對於儒家的生命的價值意義的解釋和一整套的道德價值系統，仍然肯定不疑；雖然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來自西方，但是辛亥革命基本上仍然是一場民族革命，而且孫先生在晚期的三民主義的演講之中，從來沒有否定傳統文化，而恰恰聲稱他繼承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道統。

但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們不一樣，他們的理論體系一開始就建立在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否定上面。以《新青年》爲代表的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思潮，已經在中國傳播多時。這否定思潮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土壤溫床；有了民族自信心的喪失，有了因爲否定傳統而帶來的思想真空，才有俄國思潮填補的可

能。

早在辛亥革命發生以前，中國的知識界就存在着否定中國文化傳統的人：「由章士釗、陳獨秀等人創辦的《國民日報》(一九〇三年)，內中批判傳統文化的文章頗多，而且相當激烈。例如在《箴奴隸》一文中說，當時的中國人不只爲奴隸。理由是『感受了三千年奴隸之歷史，薰染數千載奴隸之風俗，祗領無數輩奴隸之教育，揣摩數千載奴隸之學派，子復生子，孫復生孫，謬種流傳，演成根性。』甚至指責中國三千年來的歷史是『獨夫民賊』的專制。風俗是『綱常主義』，『崇拜偶像』。教育上是使人『無廉恥無感情無競爭心』。……最後特別攻擊儒家，說是『鄙夫鄉願學究』，『僞孔子之名以招搖於天下』，而爲『獨夫民賊』所收買利用，故此『孔子遂爲養育和種奴隸之乳姬』。另《道統辨》一文最後歸結說：『孔子之道乃封建時代之道』，『不適用於今世者』。可見以上的反傳統言論，其見解與激烈程度，有不下於五四時代的地方。」①五四前後吳虞、魯迅等反對傳統文化的幹將，都是在早期就參加了對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的行列。

但是，陳獨秀等在辛亥革命以前的破壞舊有文化的主張在社會上沒有甚麼回應。那時的社會潮流是從政治制度上救中國，改變中國，辛亥革命是那時候的社會主流。可是由於民國初年袁世凱、張勳復辟等一系列政治混亂，和西方列强各自支持爲自己服務的勢力人物，以便於繼續控制和掠奪，從而使得孫先生從政治制度改變中國的努力陷入了困境。在這樣新的民族危機之下，使得重新思考中國出路的思潮，成爲中國社會精英文化的主題。這就是現在的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辛亥年以前的那幾個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幹將，這時才如魚得水般地發揮影響力，成爲了新文化運動的主將。

陳獨秀等要改變整個所謂的舊倫理、舊習慣，層出不窮地宣佈傳統文化的罪狀，盡其所能地攻擊傳統的一切文化價值觀；魯迅甚至把中國的全部歷史都說成是一部吃人史。經過這樣的徹底否定以後，他

們打算在黃皮膚、說中國話、用中國字的軀殼內部，換一個西方靈魂；他們打算用連他們自己都不懂的科學與民主，來代替被他們否定掉的思想文化真空。

除此之外，同時還有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胡適，他成功地提倡白話文，還從美國搬來了實用主義的方法。

林毓生對於這時的中國思潮的走向作出了說明：「當一個社會產生了社會與政治危機，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產生了文化危機的時候，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候。傳統中國社會，其政治秩序與文化、道德秩序是有機地整合着的。呈現着普遍王權的中國傳統朝代之治的崩潰，也帶來了本與它整合在一起的文化、道德秩序的解體。所以，軍閥混戰的五四時期，沒有政治秩序，也沒有社會與文化秩序。人們處於政治、社會與文化的三重危機之中，此時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識形態來應付他們的危機。許多『五四』人物在提倡他們所瞭解的科學與民主的時候，認爲這些西方的觀念及作法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思想完全不能相容。因此，在意識形態上，主張非全盤而徹底地把中國傳統打倒不可。這個全盤反傳統主義直接引發了在他們的思想脈絡中完全合乎形式邏輯的『全盤西化論』。」②這樣的「意識形態」是帶着宗教的無所不包特點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恰恰適應了這需要。

在《新青年》徹底否定傳統文化的同時，受到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的影響，社會達爾文主義很流行，陳獨秀在《新青年》的創刊號中說：「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羅萬象，無日不在演進之途，萬無保守現狀之理。」他們根據《天演論》中的「物競天擇」是宇宙進化的絶對淘汰法則，把整個中國的傳統文化當做早就應該淘汰的對象。李大釗則結合唯物主義來否定中國文化，把一切傳統的東西都稱爲「封建的」，認爲會隨着社會的進步和物質的變動而絶對地變動，這個動力就是生產力；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强調階級鬥爭，認爲只有階級鬥爭才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經濟學、科學社會

主義三個組成部份結合起來，推動社會的進步。

否定以後，他們提出填補的內容，就是他們心目中的科學與民主。陳獨秀在《新青年》的創刊號上「敬告青年」說：「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若舟車之有兩輪焉。今且日新月異，舉凡一日之興，一物之細，罔不訴之科學法則，以定其得失從違；其效將使人間之思想云爲，一遵理性，而迷信斬焉，而無知妄作之風息焉。」陳獨秀並且在《新青年》中響亮地宣佈，只有科學與民主可以救中國：「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陳獨秀雖然主張科學，但是並不瞭解其真正的含義。陳獨秀心目中的科學，就是反對迷信鬼神，就是一種絕對的、無所不在的自然秩序，是一種物質決定論。他連科學所必須有的懷疑精神都沒有提倡，恰恰相反，而是建立一種新的物質迷信，一種一元的價值獨斷；而且他們所否定的，是一整套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這文化核心怎麼可能被西方文化核心所申延出的外在層次代替呢？邏輯實證也並不能解決人生的意義，不能解決精神超越和價值之源的問題；並且邏輯理性，與中國傳統的整體、系統的認識方法，應當各有千秋。

他們對於民主問題的理解也是同樣的膚淺，既不瞭解民主是一套程序問題，與法制息息相關，也不瞭解民主對於文化傳統和社會心理的關係。

陳獨秀在《新青年罪案答辯書》中，把他反對傳統文化與贊成科學與民主作爲因果聯繫起來：「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但是根據英國人李約瑟在

《中國科技史》巨著中的研究敘述，中國在十四世紀以前，曾經在科技上領先全世界一千年，這是儒道互補文化的結果；而歐洲的一系列改變世界的大科學家，如加里略、笛卡爾、萊布尼茨、牛頓，都並不出現在民主社會；牛頓、愛因斯坦等科學巨人都相信宗教；現代電子計算機的二進位制的基本原理，卻根源於中國兩三千年前的《易經》；從上世紀末的普魯士到法西斯德國，以及十月革命後發展起來的超級大國蘇聯，科學都是在不民主的環境中發展起來的。陳獨秀所列舉的因果聯繫，根本不能成立，雖然民主的提出有着極大的意義。

另外一個旗手胡適所倡導的白話運動成功了，但是胡適以反中國文化爲名，主要進行的是加强中國文化的工作。

陳獨秀所鼓吹的以改變中國的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爲基本志業的文化運動，幾乎在甚麼都沒有改變的情形下，就轉化爲一場政治運動：從《新青年》第六期起，喧囂一時的所謂文化啓蒙停止了，文化運動的主角轉入了共産主義運動。衆所周知，主張專政和階級鬥爭的共産主義運動，是和民主背道而馳的，這場運動恰恰嚴重阻礙了二十世紀中國已經開始的民主進程，把中國社會從此引入了血流成河的歧途。陳獨秀直到去世之前才懊悔他所倡導的共産主義道路，指出如果没有民主制度作爲基礎，蘇聯社會與法西斯社會差别不大。

中國走上歧路的標誌，是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産黨在上海正式成立。《新青年》的主將，成了中國共産黨的黨魁。

另一方面，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是蘇聯在遠東擴張的結果，包括蘇俄在思想上的重大影響和組織上的幫助。

十月革命以後，列寧領導的新的政權在空前的困難之中：國内有舊政權分子的反抗和嚴重的經濟困

難，國外有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和直接的干涉，列寧感到只有一場世界性的革命局勢才能挽救俄國的新政權。列寧說：「若從全世界歷史範圍內來看，那就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我國的革命始終是孤立的革命，如果其它各國不發生革命運動，則我國革命的最終勝利是沒有希望的。」這就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成立第三共產國際的原因。從此，列寧依靠各國的共產主義者，領導了一系列的武裝戰爭，不過都失敗了：德國慕尼黑的暴動在一九一九年四月失敗；匈牙利的蘇維埃政權只存在了五個月就崩潰；一九二〇年八月一日蘇聯對波蘭開戰，紅軍强渡布格河(River Bug)，妄圖佔領華沙，進一步影響動盪中的德國，但遭慘敗。失敗的蘇俄領袖，被迫將其擴張的企圖轉向東方。

欲挽救中國危亡的中國部份知識分子，是狂熱和無知的混合體。共產主義的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體系，加上蘇俄願意放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誘惑，在對傳統文化信心喪失的背景下，正好適應這一部份知識分子的內在需要。他們不自覺地成爲了蘇俄的民族擴張的工具。

早在一九一六年八月列寧就說：「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與次殖民地的國家進行民族戰爭，非僅可能，且係不可避免之事。這些國家(中國、土耳其、波斯)幾乎有十億人口，也就是說超過全世界人口的半數。這些國家爭取民族自由的運動，或已强烈進行，或已發展成熟。」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不要忘記東方》的著名文章中說：「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爲他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打破東方各個被壓迫民族成百年的沉睡，以解放的革命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掀起他們來和帝國主義作鬥爭……不這樣作，就休想社會主義底最終勝利，休想對於帝國主義的完全勝利。」一九二〇年列寧在他所起草的《巴庫宣言》中說：「只有八億的亞洲人民和我們攜手的時候，只有全世界無數人民準備接受共產主義的時候，才能燃起世界大火……到歐洲之路是通過亞洲(中國和印度)，北京是去巴黎的大門。」④

在現實利益方面，蘇俄重視中國，是爲了對付日本。《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一書寫道：「蘇俄政府這時在它的中國政策中主要想追求甚麼目標呢？說到底就是牽制日本。它挖空心思地在西伯利亞地區成立一個所謂遠東共和國，不失時機進駐外蒙古，千方百計地要求繼承沙皇俄國投資建設的滿洲中東鐵路的特權，歸根到底都是爲了對付俄國在亞洲的宿敵日本。因爲，還在一九〇四年，日本就曾經讓俄國軍隊威風掃地，它不僅迫使俄國讓出了苦心經營的南滿，丟掉了俄國好不容易爭得的太平洋上的出海口，而且一直虎視眈眈地盯着北滿、蒙古和俄國的遠東地區。」⑤

這時期的蘇俄的擴張有兩個與以往相比不同的特點：

第一、過去沙皇俄國笑臉的侵略擴張和英國等老牌帝國主義的殖民戰爭，都從沒有過冠冕堂皇的口實。如今的蘇聯政權因爲向西的擴張而受着西方的壓迫，所以表現出强烈的反對帝國主義色彩。這色彩用列寧的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最後階段的意識形態語言編織起來，所有列寧和斯大林的關於東方的話都是以幫助東方各國人民的藉口進行的。

第二、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們已經狂熱地預言「世界共產主義的春天就要到來了」，「整個文明世界不久就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了」。(第三國際第一任主席季若維也夫語)⑥列寧在一九一九年三月的第三國際成立大會的閉幕詞中也聲稱：「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是有保證的。國際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已經爲期不遠了。」這種浪漫情調對中國知識分子是有感染的，還以爲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的天堂般的社會真正的就要降臨，以爲社會主義已經從空想變成了科學。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蘇聯外長在第五屆蘇維埃代表會議上提出了對華政策的主要內容：「蘇俄同意放棄俄人在中國、蒙古、波斯一切的土地權，並準備放棄一切賠款，……如若獲得中國之協議，蘇俄擬放棄中東鐵路之特權，並將南滿支線售予日本。」⑦這動聽的言詞是蘇俄駐北京大使事後發表新的對

華政策的著名宣言的張本。

一九一九年，日本企圖通過凡爾賽和約，取代德國在山東的利益，直接造成群情激憤的五四運動。蘇俄以爲有機可乘，發表了《致中國國民及北方與南方政府宣言》(即第一次加拉罕宣言)，聲稱放棄從前沙皇在中國搶奪的一切特權，無償地交還「中國東部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金業及他種產業」，並且放棄一九〇〇年的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而索取的庚子賠款，這是一份歷史性的文件，全文如下：

中國國民、西南政府及北京政府：那反對革命的專制魔王柯爾察克(KOLTCHAK)，以前倚恃武力和外資而鞏固他的地位，現在已經爲勞農政府所消滅。勞農政府的軍隊，已經一直到西伯利亞，和西伯利亞的革命軍隊攜手了。現在勞農政府人民委員會拿親愛的話對中國國民說：勞農政府的俄國和紅旗軍經兩年底戰爭，耗無量精力，越過烏拉爾進至遠東，以表現其勝利的精神。在西伯利亞的人民，都曉得我們的眞意所在。我們的眞意，是在拯救人民，脫離武力主義和外國金錢的束縛，得着自由，使其不因受外國金錢壓迫，流爲外人的奴隸。在東方人民當中，中國人民，實在是站一個重要位置。

所以我們不單是援助俄國工人，並且要援助中國人民。我們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所繼續不斷以告中國人民的，常常被歐、美、日本等國的人，隱秘起來，不給中國人民曉得，所以現在希望中國人民，格外注意我們的說話。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勞農政府就取得大權，用俄國人民的名義通告各國，表示願訂永久和平的意思。並且說，這種和平底基礎，應由各國，彼此歸還從前所有侵略底土地和賠款，不問國的大小。以及說各國對內，應該自主；各國對工人、農人，不得以勢力來壓制，

使他們不能上進，並且聲明凡從前與日本、中國及協約國所訂之密約，一律取消，因爲這種密約，僅僅供給從前沙皇和協約國政府壓制剝削其人民，尤其是壓制剝削中國人民，僅僅是他們資本家和俄國軍閥的私人利益的緣故。

勞農政府，曾經向中國提議磋商廢止一八九六年的中俄密約，一九〇一年北京和約(即辛丑條約)，以及一六〇六年、一九〇七年和日本所訂的協約，把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所取於中國的，以及取於中國又轉讓與日本協約國的，一概送還中國。我們所磋商的一直等到一九一八年五月，協約國就脅迫中國政府，和重賄中國的官吏和報紙，使中國政府和勞農政府斷絕往來。而日本和協約國當這個機會，非特不將俄國的滿洲鐵路交還給中國，反因利乘便，據爲己有，並且強迫中國軍隊，援助他們強姦的行爲。因此，中國的工人農人對於歐、美、日各國的軍隊攻入西伯利亞，不但不知道他們所依據的理由，並且不知道是不是事實。

我們到了現在，特地將這個通告，送給中國人民，使大家可以放開眼睛看看，免得再受他們的蒙蔽。凡從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在中國滿洲以及別處，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在那塊土地上的人民願意成哪樣的國，哪種的政權，一任人民的自由選擇。勞農政府把中東礦產、林業等權利，及其他由俄羅斯帝國政府、克倫斯基(KERENSKY)政府、土匪霍爾瓦特(HORVATH)、謝米諾夫(SEMENOF)和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的特權，都返還給中國，不受任何報酬。勞農政府並拋棄庚子賠款，我們對於這一層，所以不惜再三提議的，因爲聽說這一項賠款，我們已經聲言放棄，而中國政府反拿來供養從前俄羅斯帝國駐在北京的公使，和駐在中國各地方的俄羅斯領事。現在任命這種公使和領事的政府，早就消滅，而從前被任命的公使和領事，居然得日本和協約國的援助，反安居在中國，天天在那裏欺騙中國人

民；中國人民應該明白這件事，驅逐這班欺詐的人出境。

凡俄國從前所獲取的各個特權，以及俄國商人在中國內地所設的工廠，與夫俄國官員、或牧師、或委員等，所有不受中國法庭的審判等的特權，都一律放棄。除勞農政府的全權大使，與中國人民往來，因而發生的特別情況外，以後在中國地方一切法律和權力，純粹爲中國人民的法律和權力，絕對沒有第二者的法律和權力混雜在裏面。

凡其他各種問題，向來日本、俄羅斯帝國政府，對於中國所施的暴亂而且不合正義的行爲，都應該從此芟除。

勞農政府現在曉得日本與協約國，以我們的軍隊天天向西伯利亞前進，援救西伯利亞的農民工人脫離土匪柯爾察克及其黨徒和日本的壓制，他們深恐中國人民聽到這種消息，所以他們百計設法，務必使我們的話，傳不到中國人民的耳朵裏。如果中國人民因爲我們的提議，願意做一種自由人民而免除巴黎和約所陷中國於朝鮮和印度第二的惡運，深望中國人民和俄羅斯農民、工人及紅旗軍相提攜，爲自由而戰！

現在勞農政府向中國國民提議，正式恢復兩國人民的友誼，並且請就派代表到俄國軍隊來。

署名者　勞農政府外交代表　加拉罕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⑧

自從一八四〇年中國的大門被西方的大炮轟開以後，西方帝國主義佔領中國的土地，榨取中國的白銀，西方人在中國的土地上不受中國法律管轄等等。如今竟然有國家願意放棄一切，真正以平等待我，真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一九二〇年九月，加拉罕再次發表對華宣言：「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認爲，因深惜兩國接近的延

擱，雙方政治上商務上之重要利益不能實現，故極願贊助及促成兩民族之友好，特行聲明蘇俄必確守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宣言所定之各項原則，且將根據之以締結中俄友好條約。」宣言的第一條說：「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宣言，所有俄國如前政府與中國所締約皆屬無效，放棄侵略所得之中國領土與中國境內之俄國租界，並將俄皇政府及俄國資產階級掠自中國者，皆無報酬地永久歸還中國。」第四條說：「凡居住中國之俄國居民，皆服從中國境內現行之各種法律及條例不得享有任何治外法權。」重申放棄庚子賠款。但是比較第一次宣言，關於中東鐵路已經不是無償交還，而是「允訂專約，將來訂此專約時，除中俄外，遠東共和國亦得加入。」這微妙的變化，透露出蘇俄的甜言蜜語掩蓋下的野心。後來從未兑現的一紙空文，卻使得中國的不少知識分子感激涕零了。

按照宣言的內容，將開啓國與國之間，特別是受欺壓的中國與蘇俄之間的空前友好的嶄新時代；但是實際開始的，是一場欺騙，一場中國人遭到空前浩劫的悲劇時代。可以說，這兩次宣言，拉開了後來聯俄容共政策的序幕。

這兩次宣言產生的劃時代的影響，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回憶道：「當時蘇俄政府對中國的宣言發生了甚大的影響，也是促成馬克思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蘇俄政府的對華宣言，內容是廢除帝俄時代對華特權，取消庚子賠款，和歸還中東鐵路等，這宣言約在一九二〇年初才在報紙上發表出來。北京學生界和文化團體首先表示歡迎，在上海的全國各界聯合會和各派人物也都爲之興奮，共同發表讚許的文件，我也是參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來，日本和其它列强都在欺負中國，只有蘇聯是例外。」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上選登了上海、北京等地各界團體和報章、雜誌對蘇俄宣言的一片讚美之聲：在上海的「全國報界聯合會」致電蘇俄：「希望中俄兩國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底正義下面，以美好的友誼，致力於芟除國際的壓迫，及國家的、種

族的、階級的差別。」「全國學生聯合會」致電俄國政府道：「你們這一次的大舉動，足爲世界革命史開一新紀元。」天津《益世報》指出：「此實爲世界人類從未有之義舉。」上海的《星期評論》說：「的確是自有人類以來空前的美舉。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偉大的事業。」溢美之詞舉不勝舉。

俄羅斯從近三百年以來，一直是一個擴張的國家。與英國人不同的是，英國人的擴張是爲了大英帝國的商業利益，爲了經濟上的剝削和壓榨，是赤裸裸的搶劫；俄國的擴張卻很少爲了直接的商業利益，幾乎是一種民族性的表現。比如那時候，烏拉爾山以東是不毛之地，貝加爾湖以東的中國土地也是冰天雪地，俄國人卻以巨大代價修建了西伯利亞大鐵路；沙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則常常以調停的面目出現，連騙帶哄加威脅，利用滿清政府的無能和困境，幾乎不費多少槍彈，就得到了比任何西方强盜更多的土地和其它利益：一八五八年英法聯軍進攻天津時，俄國就趁火打劫，脅迫滿清政府訂立瑷琿條約，毫不費勁的就將黑龍江以北的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讓，烏蘇里江以東由中俄共管；一個月以後，再以調停戰爭爲名訂立天津條約，不費吹灰之力得到了在中國的各種特權；剛剛過了兩年，又誘迫滿清政府訂立北京條約，將烏蘇里江以東的四十四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讓給俄國，將中亞細亞巴爾喀什湖以東的土地强行佔去，而且開始插手外蒙古；一八八一年，强迫滿清政府訂立伊犁條約，不僅割讓土地，還要賠償軍費九百萬盧布。俄國的狡詐勝過任何西方强權。

如今，革命以後的蘇俄，竟然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兩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要無條件歸還中國，這真如中國的報紙所說的，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壯舉」。許多中國人於是在强盜如麻的世界，以爲找到了忠誠的朋友。進一步，則有人追隨其道路，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達的回憶，與張國燾的回憶相輔相成，他說：「因爲蘇聯政府第一次對中國的宣言(即廢棄帝俄政府與中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剛才傳

到中國，中國很多的社會團體，都表示過熱烈的歡迎，所以一聽到蘇聯人來到了北京，大家對他感到特別高興。……由於多次的交談，一些當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更加明白了蘇聯和聯共的情況，得到了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⑩

蘇俄在思想方面的宣傳，無疑是成功的。

蘇俄擴張的另外一面，是直接派人到中國建立共產黨的組織，使該組織直接成爲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成爲蘇俄在中國利益的代言人。一九一九年冬至一九二〇年春，蘇聯派遣魏金斯基(Voitinsky)來中國，進行最早的組織活動。中共的創始者之一的包惠僧在一九五七年的《新觀察》雜誌發表長文記述道：「魏金斯基最初化名吳廷康，中等身材，態度沉默，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由鮑立維的介紹會見了李大釗同志，還會見了一些與五四運動有關的其他同志。經過李大釗同志的介紹，他又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魏金斯基與陳獨秀同志一見如故，又由陳獨秀介紹會見了上海《星期評論》的主編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和《時事新報》負責人張東蓀。……魏金斯基和他們會談過好幾次，他們曾有過這樣的打算：把《新青年》、《星期評論》、《時事新報》結合起來，建立一個中國革命同盟，並由這幾個刊物的主持人聯合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或是中國社會黨。……當時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等一致主張成立中國共產黨。後來又有李達、俞秀松、施存統加入，於是他們完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草案，成立了中共臨時中央於上海，推陳獨秀爲總書記。」這段回憶說明，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的活動，就是在蘇聯的直接鼓動和操縱之下。

剛剛解密的蘇共中央檔案的另一份文件中，東亞書記處臨時委員會主席威廉斯基報告說，中國共產黨即將在他們的幫助下成立，蘇共還擬定了在有些重要城市的工作計劃。這份報告中所透露的蘇共中央的企圖，讀起來有點觸目驚心：「一九一九年八月，我曾經向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提交了一份在東亞民族

中進行共產主義工作的提綱，政治局批准了這份提綱，並以其爲基礎爲我擬定了在遠東實際工作的指令。我遂以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的身份赴任。指令的內容有如下幾項：

一、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立足於讓日本、美國和中國發生武裝衝突，即利用各種手段激化他們的衝突。

……

四、必須積極幫助朝鮮和中國游擊隊的建立。……

中國支部工作計劃：

一、通過學生團體和中國沿海工業城市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支部的途徑，組織中國黨的建設。

二、在中國軍隊中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三、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

四、組織中國的出版事業。

中國支部的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各支部依靠工人和學生組織，爲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漢口、南京和其它地區共產主義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近期內就應該進行第一次代表大會。⑪

按照莫斯科的指令，並且派出人員參加下，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其黨綱清楚地說明中共的靈魂是俄國的。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黨綱有兩種，一種是「一大」參加者陳公博一九二四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寫的碩士論文《共產運動在中國》的附件，在一九六〇年被該校教授 C.Martin Wilbur 發現；另一種翻譯

自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的俄文原件，由中共中央檔案館在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出版。經過對比，發現兩種版本的綱目相同，各個條文的含義也完全相同，只是文字的表述有些差別。可以判斷，這是因爲從中文翻譯成俄文，再從俄文翻譯成中文所致。這證明陳公博的原件是真實的。但是，北京的翻譯的措詞更符合中共長期流行的意識形態語言。現在以陳公博的原件爲準⑫。第一條兩種版本一字不差：「本黨定名爲中國共產黨。」兩種版本的第二條開始也一樣是「本黨黨綱如下」，共分四款。

第一款是：「用無產階級的革命群衆推翻資產階級，以勞工階級重建國家，直至階級的區別消滅爲止。」這頭兩句是馬克思在巴黎公社以後，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表露的、被列寧所重複發展的階級暴力革命主張，最後一句是共產主義烏托邦宗教的天堂境界。這一切，完全是歐洲的現實和文化的歪曲反射，卻被中共作爲綱領的根本。

第二款是：「爲了完全中止階級鬥爭……廢除各階級，採用無產階級專政。」這正是以遙不可及的「明天」爲藉口，把現實中的人變成專政下的奴隸。中國傳統的儒家講究發揮人所固有的善性，將宇宙、人類社會和人之所思，都建立在「誠」之上。孟子主張發揮人所固有的仁義禮智四端，而將這運用在治理國家上，就是仁政；法國和美國的民主制度，則從保護每一個人的個人權力出發。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精神，與中國政治文化傳統和西方近代的民主精華也格格不入。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反覆强調的專政概念，成爲了中共的黨綱的一部份。而且中國人精神的最高境界是在天地人之間追求和諧，與共產黨人處處講階級鬥爭根本不同。歷史證明，階級鬥爭與階級專政，是本世紀所有中國人的不幸之源，是孫先生倡導和開創的民主道路的大倒退。從中共引進俄國文化的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理論上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款：「推翻私有資本，没收一切生產手段諸如機器、土地、建築物、半製造物品等。並將其歸

社會公有。」奧地利著名學者哈耶克在一九四〇年代初期就指出，廢除私有制正是政治專政的基礎，由於財產的國家控制，因此國家可以對每一個人無所不控制(見《通向奴役的道路》)。中共後來執政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一切共產黨人都偷換概念，將公有制偷換成國有制，共產國家的財產都是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或領袖的獨佔，百姓無權過問，公有制只能是地地道道的騙局。而中國自秦朝以下，土地的私有日漸普遍，到了明朝，有「一條鞭法」將土地私有制固定，中國古代一再出現的文化繁榮，與此大有關係。蘇俄主張的公有制，實際上是歐洲中世紀的農奴制度的翻版，如今寫入黨綱，即表示要用暴力手段，將此强加在中國百姓的頭上。

第四款：「聯合第三國際。」衆所周知，第三國際是爲了蘇聯的利益，直接由蘇共中央領導的一個掛名的國際組織，中共很快成爲了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這說明了中共在一開頭就有着鮮明的俄國背景。

在組織方面，蘇聯人直接操縱了中共的成立：

張國燾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的主席，但一切由俄國人說了算數，據參加會議者陳公博的回憶：「因爲張國燾去過短期俄國的關係，故推他做大會主席，國燾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燾在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惟俄國代表馬林和吳廷斯基(按：又譯成魏金斯基和吳廷康)的馬首是瞻。」⑬另一位參加者包惠僧的記述，也證明會議完全是俄國人操縱：「第一天的會各地的代表及馬林和李克若斯基都出席了，主席是張國燾。第一項議程就是馬林的報告。馬林大概四十歲上下的年紀，高大身材，看起來像個德國人(據說是猶太人)，頗有政治家的風度。他用英語報告，由劉仁靜翻譯，報告時間很長。接着李克若斯基報告赤色職工國際的工作及其任務。他好像是一個工人出身，說話很慢，聲音很低。」⑭馬林的傳記記述馬林在會上作了長達幾個小時的報告，並且說道：「一九二一年七月，有十二位中國同志

和二名外國人——斯內夫斯特(按：即馬林)、尼科爾斯基參加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在上海舉行。張國燾主持。會上討論了黨綱、黨章、黨的奮鬥目標和工作方針。當時共產國際二大的文件沒有譯成中文。斯內夫斯特根據他自己在印尼的經驗和對國際二大的體會，介紹了第三國際和列寧關於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論述。」⑮大會向在蘇俄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發了電報，從此成爲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並且接受蘇俄的金錢援助。

這是中國第一個直接由外國人操縱成立的政黨。從此以後，各方就不得不與這個披着中國皮，包藏俄國心，並且爲俄國利益服務的政黨打交道。

註釋：

①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陳萬雄著，三聯香港有限公司印，一九九二年，香港。
② 《五四多元文化的反思》，林毓生等著，三聯香港有限公司印，一九八九年，香港。
③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二卷，一九四九年，莫斯科出版。
④ 《列寧斯大林論中國》，解放社，一九五一年，北京。
⑤ 《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一九二〇至一九六〇)第二十頁，楊奎松著。
⑥ 轉引自《中共黨史暨文件選粹》第一部，司馬璐編著，自聯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香港。
⑦ 轉引自《中蘇外交的序幕》，王聿均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民國五十二年，台北。
⑧ 轉引自《中共興亡史》上第四七五至四七七頁，鄭學稼著，中華雜誌社出版，民國五十九年，台北。
⑨ 《我的回憶》，張國燾著，《明報週刊》，一九七三年，香港。
⑩ 同註釋⑥。

⑪《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十七至十八頁，李玉貞譯，東大圖書公司，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台北。

⑫轉引自《中共史論》第一部，郭華倫著，中華民國國際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台北。

⑬《寒風集》，陳公博著，上海地方行政社發行，一九四〇年，十月。

⑭《中共史論》第一部，郭華倫著，中華民國國際研究所編印，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台北。

⑮《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四二〇頁，李玉貞、杜魏華著，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近代史研究所，一九八九年，北京。

二、孫中山先生的困境

孫先生的困境是多方面的，即出於內，也出於外。

一、始終面對軍人當道，軍人以勢力支配着中國的政治

辛亥革命推翻了異族的專制，是空前的歷史成就。但是，只是滿清王朝名號的消失，國家機器的支柱——軍隊卻原封不動由原來的指揮官控制。滿清軍隊的統帥和將領，憑着他們手中的勢力，以「共和」、「議會」作爲掩護，成爲了中國十多年的實際統治者，他們就是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手無寸鐵的孫先生，用盡最後十幾年的一切精力，始終沒有能夠結束軍閥的統治。

當中華民國成立第十年的時候，北洋軍閥政府仍然得到各國承認，在北京行使國家的權力；而中華民國的創立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軍政府，才剛剛回到廣州，連立足點都沒有。這年的元月一日，孫中山先生作演講，主張建立正式政府：「建立正式政府，實刻不容緩。且北京政府前雖以正式政府自命，今徐世昌已公然下令，以舊國會選舉法選舉新總統，即使宣佈彼之總統實爲非法選出，亦即公然不敢自命爲正式政府。此即吾人掃除污穢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設良好乾淨之正式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基礎，削平叛亂之時，……但建設正式政府之權，全在國會；希望國會議員建議，仿南京臨時政府法，在廣東設立一正式政府，以爲對內對外之總機關。」①

袁世凱剛剛死去時，許多的革命黨人，都以爲中國的議會政治可以進入正軌，主要的國民黨人都聚

集北京，做着議會政治的美夢，其代表人物是宋教仁。但是，國家的實際大權仍然在袁世凱的部下——北洋系軍人的手中。當國會有礙於當政者時，黎元洪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將國會解散；過了十幾天，七月一日，張勳的辮子兵復辟，使得表面的共和制也不能存在！於是在海軍的支持下，國會議員紛紛南下廣州召開非常國會，在九月一日選舉孫中山先生爲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後來，在以岑春萱爲首的政學系、桂系勢力人物陸榮廷和雲南的唐繼堯的聯合排擠下，孫中山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四日被迫辭去大元帥職，在上海過着讀書寫作的生活，宣揚他的治國主張，次年有《孫文學說》出版；一九一九年將中華革命黨改組爲中國國民黨，加强黨務，以圖進一步反對南北軍閥的革命工作；一九二〇年，爲了擺脱政學系和桂系的壓迫，孫中山先生欲將政府搬遷四川重慶，但是在昔日同盟會員熊克武和北洋軍劉存厚的夾擊下，已經到達重慶的國會議員又紛紛返回廣州。所以在中華民國成立十周年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和國會、政府，連立足點都沒有。

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粵軍終於攻克廣州，十一月一日，陳炯明被任命爲廣東省省長兼粵軍總司令；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國會非常會議參衆兩院聯合會議在廣州舉行，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爲非常大總統。在政府的各部之中，陳炯明任陸軍部長兼任內政部長，可謂權責重大。一九二二年，北伐軍集中在韶關，開始北伐軍事行動的時候，陳炯明的叛變行跡更加明顯。孫中山先生只好返回廣州，但是不能阻止陳炯明在六月十六日武裝圍攻總統府。孫中山先生脱險抵達海珠海軍司令部，極爲堅强地開始了新的奮鬥。

從推翻滿清到陳炯明叛變，中國都是武人當道，由軍人支配國家的政治生活。雖然不時有議會，但是在議會妨礙了軍人的爲所欲爲的時候，議會就被解散，袁世凱甚至逮捕和屠殺反對他的國會議員；孫先生在廣州擔任軍政府大元帥時，也是被桂系軍人排擠出走；没有軍隊，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就没有

發言的權力。

有鑒於此，孫先生試圖建立自己的軍隊，一九一七年，廣東省長朱慶瀾將原有的巡防軍二十營交給孫先生，由陳炯明加以統帥。經過艱難的工作，粵軍終於得到發展，並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十六日誓師。在陳炯明、許崇智、鄧鏗的指揮下，於十月二十九日攻克廣州。有了軍隊的支持，國會在廣州重新召開非常會議，孫中山先生在民國十年四月七日當選爲非常大總統。正當將大本營設立桂林，各路大軍準備北伐的時候，陳炯明叛變了。

孫先生身邊的主要助手，大多數是文人。在僅有的幾個軍人之中，如今忠誠的鄧鏗被暗殺了，有勢力的陳炯明叛變了，熊克武與北洋軍閥有聯繫，忠於孫先生的許崇智常常打敗仗，地位稍次的蔣介石個人意氣重，動不動就離開軍事崗位。孫先生的困境可想而知。

二、與社會的普遍要求脫節

當興中會一八九四年在澳門創立的時候，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者，僅僅有陳少白、陸皓東等四人，對於今後的道路也模糊不清。所以孫中山在北京知道李鴻章有復興中國之意以後，就上書長篇闡述救國之道。甲午戰敗，才使得孫中山先生明確了以革命手段推翻滿清的主張。但是，當興中會在檀香山舉行第一次會議的時候，信服孫中山的主義者，仍然寥寥。鄒魯在《中國國民黨史稿》中記述如下：「總理欲糾集海外華僑，以收臂助。然在檀鼓吹數月，應者寥寥，僅得鄧蔭南與其胞兄德彰二人，願傾家相助，及其他數十人的贊同而已。」在海外只是得到有反清復明思想的會黨的擁護。

一九〇五年八月，孫中山先生抵達日本的橫濱，前去歡迎的學生代表有一百餘人，正式的歡迎會竟然有一千三百多人。孫中山先生在會上發表演講：「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

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有一日千里之勢，充佈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從事於民族主義爲諸君所歡迎，此誠爲我國賀也。」②中國同盟會也就在留日學生的民族主義浪潮之中成立了。通過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會綱。其中「平均地權」超出了民族主義的界限，曾經引起爭議，經過解釋才通過。那時，中國社會的知識分子，逐漸認識到滿清的異族統治，是中國受西方列强的壓迫之源，是社會的腐朽落後之源。在短短數年之中，這一共識迅速波及到城市的民衆之中，這就成爲辛亥革命迅速成功的社會基礎。不過在革命黨人的較上層的知識分子之中，認識更深一層，進一步主張以共和代替專制，同盟會所辦的《民報》就鼓吹三民主義，「發刊詞」的第二條，就是「建立共和政體」。

可是辛亥革命把滿清王朝推翻以後，異族的統治結束了，似乎共和代替了專制，對於廣大的以會黨爲標誌的市民群衆來說，十六字綱要中的十二個字實現了，另外四字「平均地權」則遙不可及，革命將中國人團結起來的紐帶立即沒有了。一種認爲理想已經實現的樂觀情緒籠罩着社會上下，連孫中山也說：「帝王思想，不謀而絶跡於天下，意見雖偶有參差，而無不同向於共和。」③同盟會的重要人物章太炎則鼓吹「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盲目的樂觀情緒遍及廣大的社會。

另外一方面，既然革命的基本任務已經完成，章太炎和武昌起義的功臣孫武等，就從同盟會分裂出去另成小組織；作爲同盟會的較上層知識分子群體，則走上了議會政治的道路，以爲這是「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的第一要務。爲了在議會中競爭，同盟會與四個小黨合併，在一九一二年建立了適應議會政治的國民黨。

正式建立國民黨，是鞏固共和制的自然轉變。國民黨從事議會政治的重要人物宋教仁說：「以前，我們是革命黨；現在，我們是革命的政黨。以前，是秘密的組織；現在，是公開的組織。以前，是舊的

破壞時期；現在，是新的建設時期。以前，對於敵人，是拿出鐵血精神，同他們奮鬥；現在，對於政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鬥。」④孫中山先生出席了國民黨的成立大會並發表演說，成立大會的宣言道：「天相中國，帝制殄滅。既改國體爲共和，變政體爲立憲，然而共和立憲之國，其政治之中心勢力，則不可不匯之於政黨。今夫國家之所以成立，蓋不外乎國民之合成心力。其統治國家之權力，與夫左右此統治權力之人，亦常存乎國民心力之主宰而綱維之。……在共和立憲國，其直接發動其合成心力之作用，而實際左右其統治權力者，亦常在優秀特出之少數國民。在法律上，則由此少數優秀特出者，組織爲議會與政府，以代表全部之國民。在事實上，則由此少數優秀特出者集合爲政黨，以領導全部之國民。……是故政黨在共和立憲國，實可謂爲直接發動其合成心力之主體，亦可謂爲實際左右其統治權力之機關。」⑤孫先生在這裏的主張，完全是現代議會政黨政治的理論，合乎了世界之潮流。但是，轟轟烈烈的辛亥年的市民革命，轉移到了議會中少數議員的競爭，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便與社會日漸地脫離了。國民黨成立以後，爲了進行議會政治而制訂的黨綱一共有五條：

一、保持政治統一。

二、發展地方自治。

三、勵行種族同化。

四、採用民生政策。

五、維持國際和平。⑥

這樣的黨綱，和民衆有多大的直接關係呢？鄒魯批評道：「宣言、黨綱、人員，將革命主義與精神，幾全失去，而着眼復不出參議院之內。與總理入京，沿途皆闡發三民主義，而尤以民生主義爲最注重者，實有二致。」⑦

在西方，每一個議員，在選舉前和當選後的長時期內，從來都和選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議員需要選民的支持，沒有這支持，議員就沒有政治生命；選民需要議員來代表自己的利益和政治訴求，議會和民衆用制度聯繫起來。

但是在中國，民衆完全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在長期的歷史中，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是天的兒子，百姓的意志通過神秘的天來表現；皇帝只要愛民如子，就符合了天意，天就不會加以懲罰。所謂「民本思想」，是要皇帝善待百姓之意，與西方的「民主」概念毫不相干。至於老百姓，從小就在家庭之中過着按身份服從的生活，知識分子如果沒有當官(安天下)的機會，一般就在家中過着修身養性的生活。廣大的農民，則「挫井而飲，耕田而食」，自給自足，遠離政治。沒有過西方黑暗的中世紀的壓迫，從上到下都沒有人去爭取西方式的個人權力。

如今辛亥革命把皇帝一下子推翻了，社會仍然不會有個人自由的起碼覺醒，沒有權力要求的放聲吶喊，傳統的文化心理仍然如故。這時搞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就失去了辛亥革命時期的城市革命的全面激蕩的局面。一旦民主議會政治遇到袁世凱和北洋軍閥一類的野心家，推行民主政治的先行者們就會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

合併幾個小黨成立國民黨，完成了從革命時代到和平時代的議會政治的轉變，使得國民黨在國會兩院的議席佔絕對多數，即在衆議院有二百六十九人，參議院一百二十三人，加起來三百九十二人，若把其它各個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起來，也不足國民黨議席的三分之二。國民黨似乎可以大展宏圖了，中國的民主政治似乎有希望了。

議會政治和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妨礙了滿腦袋帝王思想的袁世凱的大權獨攬，於是，國民黨的議會黨團領袖宋教仁被刺於上海車站，袁世凱以武裝民團包圍國會，撤銷國民黨的各個省的都督職務，進而

收繳國民黨員的議員證書，宣佈解散國民黨，解散憲法起草委員會，解散議會，甚至逮捕議員，謝持就是被逮捕的第一個參議員。中國的第一次議會政治的美夢就此破滅。

袁世凱的倒行逆施，竟然沒有引起中國社會大的反響和波動，正說明了外來的議會政治，與中國城市市民社會的脫離(農民更不在話下)；說明了國民黨成立以後失去群衆的孤立狀態。昔日革命的中國同盟會在反對異族時一呼衆響，辛亥年武昌的槍聲一響，滿清王朝的政權在全國不推自倒。如今國民黨被袁世凱如此摧殘，議會政治被慘遭蹂躪，微弱的軍事反抗無濟於事，正是共和制度在中國缺乏社會基礎的體現。

至於袁世凱稱帝導致他馬上失敗，是因爲從辛亥革命起，中國社會上下對帝王專制制度已經有了否定的共識，袁世凱恢復帝制恰恰觸及到了這一點。就連袁世凱屬下的軍人們，因爲已經有自己的地盤，不願意再交給任何人，包括袁本人，如今也以共和的口號反對袁世凱。在五位將軍馮國璋、李純、張勳等逼迫下，袁世凱被迫退位。繼承袁世凱的北洋軍閥們從中學習到了教訓，即無論用如何卑劣的手段奪取和控制權力，總要用「議會」作爲他們非法權力的遮羞布。

袁世凱雖然死了，孫中山雖然歸國，中國從南到北仍然被大小的軍閥統治着。

在西方國家，法制得到所有公民的認同。無論誰，只要破壞了法制，所有的公民，包括軍人，會使得破壞者立即一敗塗地。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的崇高理想，孫中山引導中國走向政治經濟全面現代化的偉大事業，孫中山繼承中國文化道統的大義凜然的精神，卻與埋頭生活、少問前路的中國最廣大老百姓的需求是脫節的。他在晚年深感中國百姓是一盤散沙，自由、民主都不足以喚起百姓，只有「發財主義」行得通。他的深刻教訓和認識，凝聚在他的各種著作裏。

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之最後終於重新贏得全中國知識青年的擁護，那是在北洋政治一片黑暗，孫中山先生的人格、主義獨放光明的最後兩三年。

三、國民黨的渙散

同盟會的總章之中，「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作爲基本宗旨，每一個人入盟的誓詞也以這十六字爲基本。這抓住了那時代的基本要求，成爲了同盟會盟員的精神支柱，團結了從知識分子的城市的會黨的廣大群衆，掀起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滿政治運動。但是對於剛剛在探索中國前途的知識分子群體，自然就不可能簡單地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這十六個字上。同盟會的其它人物的不同方向的探索，加上探索者的個性和個人追求等因素，就可能造成同盟會中不同的派別和主張。章太炎、張繼等人，在接受無政府主義以後，在同盟會的高層結合陶成章、劉師培等，一再造謠攻擊孫中山，造成了同盟會的第一次分裂，以致於孫中山先生不得不將革命活動中心轉移南洋。鄒魯在《中國國民黨史稿》中說：「昔同盟會國民黨之組織，徒以主義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性。故當時黨員雖衆，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步驟凌亂，既無團結自治之精神，復無奉令承教之美德。至黨魁有似於傀儡，黨員有類於散沙，迨乎外侮之來，立見摧敗；患難之際，形同路人。」⑧作爲凝聚整個社會力量的政黨本身如此像散沙，革命當然受損。

在中華革命黨時期，因爲蓋手印打指模問題造成孫中山與黃興出現分歧時，陳其美致書黃興談到：「辛亥以後，一變而爲國民政黨，自形式上言之，範圍日漸擴張，勢力日漸膨脹；而自精神上言之，面目全非，分子複雜，薰蕕同器，良莠不齊。腐敗官僚，既朝秦暮楚，齷齪敗類，更翻雲而覆雨，發言盈庭，誰執其咎？操戈同室，人則何尤？」⑨這樣渙散而不能擔當大任的國民黨，只有改組。可是改組成

立的中華革命黨，卻由此更脫離群衆，甚至原來同盟會和國民黨的部份精英，也不願加入：「一九一八年五月孫中山辭退廣東軍政府大元帥職務時，他的事業正處於低潮。中華革命黨已是名存實亡，而所謂的護法運動亦未獲得軍人政客的同情。對群衆而言，他更沒有號召力。在上海隱退時，只有一些隨從仍然支持他，這些人的忠心是由於個人交情，而不是因爲意識形態的認同。總之，孫中山在政治上是失敗了，所遺留下來的只是一些令人懷念的往事。」⑩

但是孫中山並非只是「留下令人懷念的往事」，而是越挫越奮，在失敗中站起來；而且他的追隨者不僅僅是朋友，也是孫先生的主義的信奉者。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將《孫文學說》出版，系統地總結了辛亥革命以來的教訓；六月，指派戴季陶、沈定一在《民國日報》創辦副刊《星期評論》，以便影響中國的思想界；八月一日，創辦《建設》雜誌，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說：「以鼓吹建設之思想，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建設爲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爲益行之事功。由是萬衆一心以赴之。」⑪孫先生採取加强宣傳的做法，是爲了取得廣大群衆的支持，這是他的擺脫困境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則是加强組織。孫先生說：「且默察來年國內嬗變之跡，知武人官僚斷不可與爲治，欲圖根本救國，仍非集合吾黨純潔堅貞之士，共任艱巨，徹底澄清不爲功。」⑫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改組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任命居正、謝持、廖仲愷爲總務、黨務、財務主任。

就在孫中山先生在宣傳和組織方面加强的時候，由於老同盟會員的反叛，而受到了新的挫折。原本在政學系岑春萱聯合桂系的壓迫下，孫中山被迫離開了廣州以後，非常國會隨着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立足點。最初想把國會遷移到偏僻的昆明，最後確定爲四川省重慶。孫中山先生任命楊庶堪爲四川省長，熊克武爲四川督軍。在李烈軍、謝持率領大批國會議員到達重慶以後，熊克武聯合北洋的川督劉存厚，南北夾擊成都，使得楊庶堪等倉皇逃離四川，重慶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破滅。問題的嚴重性在於：在孫先生

意識到不能依靠官僚政客，而要「集合吾黨純潔之士」，並且改組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的時候，卻失敗於掌握軍權的老同盟會員的反叛。

過後不久，孫中山先生最爲倚重的陳炯明，也在最關鍵的時候發動了武裝叛變，孫先生後來說：「文帥同志爲民國而奮鬥垂年，中間出生入死，失敗之數不可僂指，顧失敗之殘酷未有甚於此役者。蓋歷次失敗雖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則爲失敗於敵人。此役則敵人已爲我屈，所代敵人而興者，乃爲十餘年卵翼之陳炯明，且其陰毒兇狠，凡敵人所不忍者，皆爲之無恤，此不但國人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憂也。」⑬不僅如此，在中國國民黨內，蔡元培、吳敬恒、李石曾等在陳反叛的最初的時候，竟然站在陳炯明一邊，甚至發電反對孫中山。這時候，真正追隨孫先生的老黨人已經不多。

陳和熊的叛變，都起自中國國民黨的內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就顯得更加的困難重重。

四、外交方面的孤立

儘管孫中山先生嚴厲批判閉關鎖國的愚昧政策，他的三民主義深受西方思想影響；儘管他從本世紀初就開始主張學習歐洲文明，向西方開放；儘管他一再向美國等西方國家示好，向日本宣傳「大亞洲主義」；……但是，西方國家的當權者的回應，總是非善意的；向西方學習到了殖民者掠奪本領的日本也是一樣。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唯一所關心的，是他們欺詐殖民地的具體利益。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爲了他們在華的既得利益，扶持和支持北洋軍閥對抗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日本是奉系張作霖和皖系段祺瑞的後台，孫中山曾經在一九二二年夏天在《民國日報》著文指出，「日本軍閥已經想出了征服中國的成案，就是用中國的軍閥來征服中國。於是製造了兩個軍閥頭子來：在北京的軍閥頭子是段祺瑞，另外又做出一個軍閥頭子在奉天，這個奉天軍閥頭子就是張作霖。」英國則支持直系軍閥。這兩個國家都

不遺餘力地阻擾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國民革命。

日本在明治維新成功以後迅速强大起來。由於歷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政治因素，以及當政者的利慾薰心和目光短淺，日本的部份知識分子也鼓吹「脫亞入歐」，日本走上了侵略之路，在一八九四年打敗了中國，繼而又戰勝了俄國，這勝利曾使日本想獨吞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乘西方列强不能東顧的時候，向袁世凱提出二十一條，企圖滅亡中國；戰後居於戰勝國，卻損害另一個戰勝國中國的利益，强要獲得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孫中山先生在《物質建設》中叙述日本已經變得侵略成性：「彼日本之武力派，尚以戰爭爲民族進取之利器，彼參謀本部，當時計劃十年作一戰爭，一八九四年，以一短期的中日戰爭，獲最豐之報酬，於是因之而長其慾；一九〇四年的日俄之役，獲大勝利，所得利益亦非輕小；最後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戰爭，復加入聯軍以拒德國，而日本用出力最微，費財至少，竟獲一領土大如大戰前之羅馬尼亞，人口衆如我國之山東。由此觀之，近三十年間，日本每於一戰爭之結局，即獲最厚之報酬，無怪乎日本之軍閥，以戰爭爲最有力之事業也。」⑭孫中山在同一篇著作中，形容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少弟與强盜爲伍，以劫其兄長之家」。並且，孫中山先生根據當時的現實，揭露日本政府支持中國的軍閥，是中國內部的動亂之源。上海七月九日《民國日報》登載孫中山致函日本陸相說：「近代日本對於東亞之政策，以武力的、資本的侵略爲骨幹，信如世人所指：而對於中國，爲達日本之目的，恒以扶植守舊的反對的勢力，壓抑革新運動爲事。」這樣下去，「則國人之惡感更深，積怨所發，其禍將不止於排日貨。」因爲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得到日本民間志士的多方援助，並且孫中山先生始終有亞洲人是一家的思想，所以他總是在强烈批判日本武人政治的時候，呼籲中日友好，鼓吹「大亞細亞主義」。孫中山最後的兩次演講是在日本的東京，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孫中山在東京的演講中指出：「歐洲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亞洲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我們現在屬於這

個新世界，要造成我們大亞洲主義，應該用甚麼做基礎呢？就應該用我們固有的文化做基礎，要講道德，說仁義。仁義道德就是我們大亞洲主義的基礎。我們有了這樣好的基礎，另外還要學習歐洲的科學，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不過我們振興工業，改良武器來學歐洲，並不是學歐洲人來消滅別的國家，壓迫別的民族。我們是學來自衛的。」⑮宮崎等大量的民間人士和犬養毅等日本政治家一直和孫中山先生保持友好，但是近代的日本是狂熱的好戰分子日漸掌權，並且把日本推向戰爭。日本的武人們不是政治家，他們只知道爲了日本的眼下利益去支持中國的軍閥，孫中山先生想要得到的日本的外交援助因此始終不可能。孫先生的大亞細亞主義，自然得不到當權者的回應；孫先生最後到日本，日本官方給予冷遇。

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在美國的丹佛，他並不急於歸國，就是爲了去向西方各國政府進行游說，要求各國支持中華民國政府，故先後到了華盛頓、倫敦、巴黎，拜訪這三國政要。在英國會見了外交大臣，在法國與首相克理孟梭進行了會談。孫中山最初對英國對中華民國的支持曾寄以厚望。當時英國和日本在中國正在進行激烈爭奪，孫中山指出，如果英國支持中國，則日本將不敢「爲患」，他甚至把英國的支持作爲「成敗存亡」的關鍵。爲了商業利益，英國卻只是在中國進行掠奪的急先鋒；辛亥革命以後，英國在中國的一切活動，仍然以維持殖民主義利益的角度出發。英國乘着辛亥革命之後的政局不穩的時刻，就是借錢給袁世凱的「六國」的要角(即「善後借款」)。又抓緊單獨併吞西藏，一九一四年七月，英國完全違反起碼的國際準則，與西藏地方當局單獨簽訂「西姆拉條約」，「並以秘密換文的方式，擅行劃出『麥克馬洪線』，作爲中印之間東段的邊界，把原屬中國西藏地區的九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併入英國殖民統治下的印度。」⑯號稱民主共和的英國政府，一切都爲了殖民利益，沒有任何和平正義的原則可言，自始至終都與孫先生爲敵，哪怕孫中山的許多政治理念都受到西方影響，

並且一再呼籲西方的幫助。

爲了具體利益驅使的西方國家，在中國的政策是支持北方的軍閥政府。例如：總統黎元洪在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三日解散國會，並且有宣統復辟的醜劇，所以國會議員雲集廣州開展護法活動，而有護法軍政府的產生；一九二一年，軍政府取消，孫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總統。但是，西方國家對南方的革命政府從來不予以承認，各國使節仍然只是駐北京；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會不接納南方政府代表，一九二二年有關中國的華盛頓會議仍然只是接納北方政府的代表。孫中山曾經爲華盛頓會議發表英文的聲明，指出北京政府爲非法，無權代表中華民國，只有廣州護法政府能夠代表，但是西方國家仍然置若罔聞；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二年與美國《華盛頓郵報》記者談話說：「推原北庭之所以能存在者，良由列强各國之承認，倘各國否認之，中國即能統一於合法政府之下，然後解散無用之軍隊，整理財政，禁止賄賂，則國庫充裕，外債即可清償，故列强承認北庭一日，即多重中國人民一日，亦即中國真正民治之政府，不能早實現一日。」⑰一直到孫中山先生去世，雖然加强了對西方國家的批評，但他仍然寄托西方國家對中國革命的支持，期望西方國家承認南方的革命政府。甚至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孫越宣言》發表的時候，也並未觸及西方列强的利益。到了一九二三年下半年，英國甚至直接參與顛覆孫中山革命政府的行動。

孫先生直到逝世前不久，反對西方帝國主義的色彩才比較强烈起來。

孫中山的思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他認爲世界上將要發生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大戰，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發表的《告世界弱小民族書》中有所表述：「帝國主義之英、美、法、意，各皆堅心毅力，與中國少部份著名的封建督軍、破產的官僚、投機的政客，此三種人形成中國之軍閥政客，買賣中國矣。彼等又助力反革命派完成地方封建政治矣。彼等又將把持革命政府所應有之關係，束縛革

命政府手足，使不能爲人民謀利益，反抗軍閥而鬥爭矣。彼等又以前所以壓迫汝等之方法，壓迫中國革命矣。彼等又接濟殺工人、殺代表、封報館及不利民衆之事，無所不爲之北京政府，以金錢槍械延長中國之內訌之生命矣。彼等又口頭和平，實則暗地裏挑戰矣。彼等又將親善之假面具，打得粉碎矣。彼等又伸出野心之手矣。彼等又掠奪矣。」⑱這裏描述的帝國主義面目，已經不是昔日需要求助的文明國家的形象，是中國政治的一切壞事之源。

不過，孫中山先生要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力量從何而來？他既沒有民衆，也沒有軍隊。他只有已經開始獲得中國知識分子精英認同的三民主義，只有在艱難時期忠心耿耿的少數追隨者。

在孫中山先生內外交困的時候，向他伸出援手的，是包藏禍心的蘇俄，和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孫中山先生在沒有其它選擇的情況下作出了選擇，他說：「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這時候飄來俄國這根稻草，因爲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國和英國在岸上大喊，千萬不要抓住那根稻草。」⑲

抓住的真是一根救命稻草嗎？

註釋：

① 《國父年譜》下冊，第七六二頁，編輯者：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台北。

② 《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三三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北京。

③ 《中國國民黨史稿》上，第三四頁，鄒魯著，民智書局出版，民國二十七年，廣州。

④ 《宋教仁集》下冊，第四五六頁，中華書局出版，一九八二年。

⑤《中國國民黨史稿》上，第一三二頁。
⑥《中國國民黨史稿》上，第一三六頁。
⑦《中國國民黨史稿》上，第一四三頁。
⑧《中國國民黨史稿》上，第二九六頁。
⑨《中國國民黨史稿》上，第三〇三頁。
⑩《中國現代史論集》第十輯，張玉法主編，經聯出版事業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一年，台北。
⑪《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一一九三頁，陳錫祺主編，中華書局。
⑫《孫中山全集》第五卷，第一〇六頁。
⑬《國共合作史》，林家有等編著，重慶出版社，一九八七年，重慶。
⑭《國父全集》
⑮民國十三年十二月五日上海《民國日報》。
⑯《近代中國外交關係史》下冊，第三四八頁，劉培華著，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⑰一九二二年五月七日上海《民國日報》。
⑱北京《晨報》一九二四年一月八日。
⑲《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三、莫斯科伸出的手

蘇俄在中國的擴張分爲三方面：加强共産主義宣傳和建立共産主義的組織，使得中國共産黨成爲其民族利益服務的直接工具；直接或者通過中共的領袖，扶植軍閥吳佩孚和陳炯明，企圖讓這些有勢力的軍人成爲蘇俄的代理人；支持孫先生，讓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改變國民黨的性質，以國民黨的名義建立親蘇的紅色政權。

第一方面：莫斯科的手伸向中國的共産主義知識分子。

直接受蘇共中央領導的第三共産國際，最早派到中國來的重要人物是魏金斯基，他在國外的化名有幾個，也有三個中國名字，還有兩個中國筆名。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他是俄共(布)遠東局的負責人和派駐中國的代表，一九二三年任共産國際遠東局長。他訪問中國的任務，在他一九二〇年六月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清楚：「目前，我們從事的主要工作是把各革命小組聯合爲一個集中的組織。『聯合出版委員會』就是一個中心，可以把這些小組團結起來。中國革命運動最薄弱的地方乃是其活動的分散。爲協調和集中工作，正開始籌備一次華北的社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代表會議。當地有一位教授陳獨秀，聲望甚高，影響很大，他正在給各城市的革命者發信，以確定代表會議討論的議題，以及會議地點和時間。」①這表明受蘇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共産國際，正在引導中國的信仰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建立政黨。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在莫斯科的扶植下，就這樣建立了。

魏金斯基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七日在上海給上司的報告中說：「這一段時間以來，我在此地的工作

總結如下：在上海建立一個五人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其中四個是中國革命者，加上我)，委員會有三個處：一、出版處；二、情報鼓動處；三、組織處。」②這份文件(第二號)還顯示，影響很大的共產主義綱領性的文件《共產黨宣言》，是由蘇俄遠東局送來，再由陳望道翻譯成中文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是由魏金斯基策劃，在一九二二年夏天成立的。

後來共產國際把荷蘭共產主義者馬林派去，他雖然早在進入中國以前就一直被荷蘭、英國的情報機關監視，還在維也納被逮捕，但是他在上海主持了中共的成立大會這樣重要的事情，卻逃過了西方情報機關的監視。正是在這個外國人的操控之下，中國共產黨得以成立。現在中共的浩如煙海的黨史著作中，卻隱瞞受到俄國直接操縱的史事，而套上各種炫目的光環。

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陳公博回憶道：「因爲張國濤去過俄國的關係，故推他做大會的主席，國濤那時不免趾高氣揚；然而國濤那時是沒有主見的，一切都唯俄國代表馬令和吳庭斯基的馬首是瞻，當時有一件案子竟把我氣得差不多退席：那是禁止共人員參加政治，甚至乎不許當校長案。我爭辯着，共產黨是應該鬥爭的，爲甚麼連校長都不可幹？國濤硬要通過，而多數居然贊成。可是到了第二天開會，國濤提出取消昨夜的決議，我質問爲甚麼大會通過的案可以取消？他說是俄國代表的意思。」俄國人的權力是至上的。

另一位代表周佛海的回憶，也說明成立中國共產黨，完全是俄國人的直接指令：「有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里二號，去訪仲甫。當時有第三國際遠東代表俄人吳庭斯基在座。吳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爲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

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經了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③在中共成立的開幕式上，作超過兩個半小時長篇報告的是馬林，再加上魏金斯基的報告，這兩個外國人是中共成立大會的主角。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在上海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十二人，代表黨員一百九十五人。第一部份議決「邀集中國的被壓迫群衆，也來保衛蘇維埃俄羅斯，因爲蘇維埃俄羅斯是解放被壓迫民族的先鋒」。第三部份的名稱是「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認定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發表民主聯合戰線的主張，是能夠應付時勢之急迫的要求的，今後並應擴大此主張。」但是也指出：「無產階級加入此種戰爭，不是爲了民主派的利益，做他們的犧牲，乃是爲了無產階級自己眼前所必須的自由而加入此種戰爭，所以無產階級在戰爭中，不可要忘了自己階級的獨立組織。」第四部份是「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第二次全國大會議決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爲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④

但是這所謂「合作」難以實現，因爲孫中山已經兩次拒絕了和這個一百餘人的小黨聯合。這時，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帶着莫斯科的指令回到中國，再一次在西湖召開特別會議。

在會議上，馬林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竟然推翻了中共中央剛剛通過的建立聯合戰線的決議，要求中共黨員以個人的身份加入國民黨，這招致了選出的五個中央委員的一致反對。一九二九年，已經被開除出黨的陳獨秀在《告全黨同志書》中回顧道：「大會散會不久，共產國際即派馬林來中國，要求中共中央全體委員在西湖開會，提議加入國民黨的組織，力言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而是各階級的聯合黨，無產階級應當加入去改進這一黨以推動革命。當時中共中央共五個中央委員李守常、張特立(國燾)、蔡和森、高語罕(尚德)及我，都一致反對此提議，其主要理由是，黨內聯合乃混淆了階級組織

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國際代表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否服從國際議決議案爲言，於是中共中央爲了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張國燾、陳獨秀、蔡和森都堅決反對，只贊同黨外的聯合，李大釗也反對，只是時而調和。事實上，共產國際的命令是不能抗拒的。

中國共產黨剛剛制訂的黨章規定，它只是作爲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並且《共產國際章程》的第一條說：「共產國際是各國共產黨的聯合，是統一的世界共產黨。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運動的領袖和組織者，是共產主義的原則和目的的負擔者。」該章程的第十二條規定：「共產國際兩次世界大會之間的指導機關是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給各國支部以指令並監督的行動。」這就決定了中共除了執行命令以外，不可能有其它的選擇。

其次，中共的經費完全依賴共產國際。中共「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第五章是「經費」，「第二十六條：本黨的經費的收入如左各項：㈠黨費　黨員月薪在五十元以內者，月繳黨費一元；在五十元以外者，月繳黨費按月薪十分之一計算；無月薪者及月薪不滿二十元之工人，每月繳費二角；失業工人及在獄黨員均免繳黨費。㈡黨內派捐。㈢黨外協助。」⑤這好像是獨立自給的政黨，其實不然。這時候，中共有黨員一百三十人，以每個人平均收入爲上等的五十元計算，每個月能夠上繳黨費總數二百元就算不錯。但是，記載中共的經費來源有兩處，一處是在前面所引用的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正式說明：「黨費，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元；收入計國際協款一萬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這只是正式的機關開支，完全依賴於共產國際；由中共中央黨校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有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由陳獨秀在會上做的報告，關於黨的經費問題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黨員繳納的黨費很少，今年(按：講話的時候是上半年)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

約有一萬五千，其中有一千六百用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沒有共產國際給錢，中共連代表大會都開不成。另外一處記載是陳獨秀的副委員長周佛海在《逃出了赤都武漢》的記述，即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卻用去蘇聯提供的經費二十幾萬元：「馬林說，一年以來，第三國際在中國用了二十餘萬，而成績如此，中國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這二十餘萬用於政治上有多少呢？我們以稍前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的用度做一比較：《國父年譜》記載：「所恃者僅海外華僑捐款，爲數亦微。各職員自部長、秘書，以至書記、事務員，平均每人月入只二十元。然各同志感於先生奮鬥之精神，皆艱苦支持，無少退沮。」跟孫中山幹革命是很苦的，不像中國共產黨有國際背景，成立的第一年就用去蘇聯二十幾萬。不過，這就使得中共一開頭就受到蘇聯的嚴密控制，失去獨立性。例如，陳獨秀那時是中國共產黨的黨魁，是教父，他在第一年中兩次反對馬林，兩次都以陳獨秀的屈服告終。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馬林越權，沒有通過總書記陳獨秀，就派遣張太雷去東京，觸怒了總書記，陳拒絕在上海見馬林。緊接着陳獨秀被捕，馬林以伍萬大洋保釋他出獄，陳只好屈服；另一次是加入國民黨的根本大問題上，以陳爲首的全部反對，但是，全部中央委員必須要接受馬林的命令，陳又一次屈服了。應當知道，蘇俄的新經濟政策剛剛取得一點點效果，蘇俄的經濟仍然非常困難，竟然一年就在中國花費二十萬，說明在中國的擴張，對於蘇俄的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實在是非同小可。

張國燾到蘇聯去參加會議，目睹了蘇聯的普遍困境：「當時最引人注意的也是大家經常談論的問題，便是俄國的饑荒。俄國糧食的配給制度，是每一士兵每天配給兩磅黑麵包；工廠與鐵路工人每天一磅半；機關工作人員每天一磅；共產黨員每天四分之三磅。麵包的質地很壞，通常所含的麵粉不過五六成，有時低到兩成。有家屬的機關工作人員每人每半月可領取麥子十五磅，馬鈴薯十五磅，有時有少許茶葉；可是那些麥子和馬鈴薯多數都有點腐爛。在這種情形下，人人都在叫餓。……全俄有二千多萬人

在挨餓，有幾百萬人可能要餓死。因此，民怨沸騰，慘狀橫生。」⑥以此對照花在中國的錢，是何等的慷慨，簡直是窮漢的賭注！

無論從思想、組織、經濟哪個方面看，中國共產黨都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只能是莫斯科的政治工具，是俄羅斯國家利益的工具。

從此，莫斯科伸向中國的手，通過中國共產黨而延長，伸展到中國的各地，深入到中國社會的各個細胞，而危害到中國社會已經開始的民主和現代化的進程，帶來了數不盡的災難。

第二方面：莫斯科的手伸向中國的軍閥。

在東北，蘇俄派的是優林(Ignatius L. Yurin)。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司馬璐，敘述蘇俄聯絡張作霖道：「優林曾訪問張作霖多次，張以外蒙前車之鑒，對蘇俄始終存有戒心。」⑦所謂的「前車之鑒」，是指剛剛奪得政權，還未站穩的蘇俄，立即派紅軍侵佔中國外蒙的庫倫(今之烏蘭巴托)，聲明「這一個國家中的一切權力屬於蒙古國，任何外國人都沒有干涉蒙古內政的權力」，在中國的土地上，蘇聯有甚麼資格來說東道西而圈地爲國呢？實際從此把蒙古納入了俄國的實力範圍，這是沙皇俄國一直想要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列寧的蘇俄政府卻立即出兵做了，還堂堂皇皇聲稱幫助中國。優林第一次拜見張作霖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當日訪問張作霖，作霖詢其來意，答稱，奉赤塔政府命令，以全權代表身份來華，商議通商及中東鐵路、蒙古三大問題。並聲明決不侵佔中國土地，損害中國主權。張氏即嚴詞詰責，赤軍出兵庫倫，是否知會中國政府同意？從前帝俄時代，尚無對我國自由出兵之舉，何以新黨(按：即列寧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居然自由出兵，並事前乏通告？」優林無以應答。優林從北京歸來以後，在八月二日第二次拜訪張作霖，仍然繼續碰壁：「優林再抵瀋陽，會晤張作霖，談判交還庫倫辦法，詭詞推委責任，張氏極表憤慨，態度强硬，雙方感情愈加强硬。……此時赤塔一帶華僑被虐待的情

事，層出不窮，各地商會向政府請命之函電如雪片飛來；且在中國境內，過激主義潛萌暗滋，使北京政府深懷戒懼。」⑧蘇俄的橫行霸道事實，使得說客優林無功而返；過了半個月，八月二十七日，優林第三度來華，在北京與外長劉式訓談判中東鐵路問題；後來又再次來華，均無所成就。

蘇俄政府尋求與吳佩孚的合作，最初卻很順利。一九二〇年十月九日的官方報紙《消息報》就說：「吳佩孚已在中國諸事變中懸掛他的旗幟，十分明白的，在該旗幟下，新的中國內閣一定採取有利於蘇維埃俄羅斯的方向。」⑨中共從來的宣傳都說，蘇俄如何無私地幫助中國，但是這份蘇俄內部文件中說的是，首先「有利於蘇維埃俄羅斯」。

因此很自然，蘇俄在中國最初找的是最有勢力的軍閥合作。大陸的研究者最近也指出這點：「爲了蘇俄政府對華外交的需要，共產國際伊爾庫茨克局(即遠東局)和蘇俄遠東共和國於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間，在中國接近吳佩孚的政策。」據馬林回憶，當時共產國際遠東局認爲：「爲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他們認爲「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所以，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一九二〇年四月，共產國際代表魏金斯基來華，也是「決定聯合吳佩孚，發動民主運動」。……爲了利用吳佩孚，打倒交通系在京漢鐵路的勢力，中國共產黨也決定暫時聯絡吳佩孚。一九二一年李大釗曾以孫丹林(北洋政府的內務總長，吳佩孚的親信)、高洪恩(北洋政府交通總長)、白堅武(吳佩孚的參謀長)的私交關係，曾到洛陽與吳佩孚商談。在李大釗游說之後，吳佩孚發表一個《勞動立法》和保護勞工的通電。一九二二年中國共產黨又派安體誠、張昆弟、何孟雄、陳爲人和包惠僧到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⑩以下進一步以事實說明蘇俄和中共如何具體地幫助北洋軍閥政府：

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後，李大釗從日本返國，但是他並不和孫先生領導的國民黨一起奮鬥，而是立

即投入北洋軍閥的懷抱。他最初擔任進步黨領袖之一的湯化龍的秘書，後來又和曾任段祺瑞司法總長的章士釗合辦《甲寅雜誌》，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長之職就是由章士釗推薦。近年出版的《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引用了許多吳佩孚的參謀長白堅武的日記，透露出中共早期與北洋軍閥的深切關係。從李大釗在一九一六年五月與白堅武的第一次會見起，八個月以內，與白堅武相見三十五次，他們一起遊覽、宴客、訪友、觀劇、閱讀，甚至同沐浴；一九二二年，中國的最早的這位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就是由白堅武推薦，擔任了大軍閥吳佩孚的顧問，爲吳以武力統一中國服務，這「武力統一」的對象就是南方的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政府。五月十一日白堅武的日記如下：「晨到保定，寓督署光園，沐於德潤池。寄函詢家中有無擾亂。並函申江友人告以吳公決心恢復法統。請吳子玉將軍聘李大釗……諸君爲顧問，贊助進行統一問題。」五月二十二日，經李大釗的推薦，白堅武介紹俄國人彼得羅夫見吳佩孚；過了一個月，李大釗親自去到保定，上門爲吳服務，六月七日白堅武記載道：「李守常來接談兩日，爲吳公贊助。」

中共聯絡軍閥吳佩孚的作爲，也記載於一些中共當年的文件或後來的回憶錄中，可以互相佐證。一九二二年，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其中有「我們固然承認吳佩孚好過張作霖，……我們固然承認吳佩孚是反對親日派的人」等語，在大會正式的宣言中又說：「美國並不願意吳佩孚——是一個較進步的軍閥——製造一個統一的政府，因爲吳佩孚所主張廢督裁軍如果實現的統一，是與中國資產階級以巨大的利益而易於發展，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進行是極不利的。」⑪數年後中共領導人之一的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說，中共「對於吳佩孚有很大的幻想」，他說：「經過守常同志向吳佩孚御用交通總長建議每路派一密察員，得其允許，於是京漢、京奉、京綏、隴海、正太、津浦六條鐵路都有一個密察員。」中共的創始人之一周佛海的回憶，與鄧中夏

的回憶很相合：「共產黨因爲要和吳佩孚勾結，所以開頭送他一個『開明的軍閥』的尊稱，當時孫洪伊和吳佩孚接近，而李大釗卻和孫洪伊關係密切。他們利用這種關係，就和吳佩孚私通起來，李大釗赴洛陽數次，似乎當時報紙也有記載。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總稽查，都由吳佩孚電令高洪恩委共產黨充任，京漢線稽查爲包惠僧、津浦線似乎就是李明治。」(同註釋⑩)在一九八九年，由中共中央檔案館編輯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中(第一六九頁)，第一次發表了總書記陳獨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其中透露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與吳佩孚勾結的事實，那是在中共與吳的聯合破裂以後約四個月，陳說：「我們始終是反對軍閥的。有個時期，我們忙於組織京漢鐵路員工，要與『交通系』作鬥爭，而吳佩孚也反對『交通系』，那時我們沒有反對吳佩孚。但是從罷工時起，我們就猛烈地反對了吳佩孚。然而，中央委員會與吳佩孚有過往來，這是不當的。」以中央委員會的名義往來甚麼，已經不可考。

最新公佈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第三國際有關中國的檔案資料表明，聯絡吳佩孚的，不是一個孤立的李大釗，而是有第三國際的直接命令；而且第三國際極力向孫中山施加壓力，要他同吳佩孚聯合，甚至以此作爲援助的條件：

在蘇聯領導人心目中，吳佩孚是最有勢力的人物，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一封致列寧的標有「絕密」二字的信中說：「直系的戰略地位最爲有利，它統治着整個華中和長江流域，這裏的人口最稠密，在經濟上舉足輕重。與戰爭中的各派相比，直系勢力最大。而吳佩孚元帥作爲一個軍事領導人連戰皆捷，也爲自己進一步擴展和鞏固勢力創造了非常好的外部環境。」基於這點，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五日，越飛致信孫中山說：「據我對中國政局的分析，我也感覺到，對中國來說，上策乃是閣下同吳佩孚攜手共同建立中國的中央政府。」三天以後，正與日本人談判的越飛在長春致信馬林，馬林剛剛主持完在杭

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對於我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是讓孫吳聯合組成政府並與張作霖和解，至少也要讓張承認並支持孫中山——吳佩孚聯合政府。」緊接着，由馬林擔任記錄，從吳佩孚處來的俄國將軍昂格爾與孫中山直接談話，要孫與吳合作。俄國的企圖在越飛給蘇俄外交負責人契切林的電報中(標名「絕密」)進一步暴露出來，即企圖在中國動亂中漁利：「我們必須去利用中國軍閥，縱橫捭闔，但不讓任何一方特別得到加强。……我告訴他(按：指孫中山)，指出他政策中的缺點。第一、在當前形勢下削弱吳佩孚就是削弱全中國範圍內的鬥爭，自然最終也會削弱他孫本人。第二、支持張作霖就是支持我們的敵人，給蘇中友誼造成障礙。」在蘇俄出兵佔領外蒙古以後，因爲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張作霖拒絕蘇俄的要求而受到蘇俄的很大的壓力。所以孫先生聯絡張來對付北伐的主要障礙吳佩孚。這封電報顯示，蘇俄插手中國內戰，支持吳佩孚，壓迫孫中山，要他和張作霖分手。孫中山在十一月二日致信越飛，拒絕了其要求：「文難與同吳共事，因他有恃無恐：一旦與張作霖或與我開釁，他均可得到蘇聯援助。」⑫孫中山要越飛將此信寄給列寧、托洛茨基。可見孫中山後來終於同意的聯俄，其原因之一是爲了斷絕蘇俄對中國軍閥的支持。

過去談到中國的軍閥混戰，只提到英國、日本等國在背後操縱；如今的史料顯示，由於蘇俄大力支持中國軍閥，也是中國內政動盪的根源之一。

近年，從荷蘭馬林檔案中翻譯過來的馬林的筆記中寫道：「自九月(按：一九二二年)以來，在北京這裏多次討論了聯合吳佩孚的方針。……陳炯明的態度越來越壞，他向香港的英國人乞求貸款。」⑬這也是蘇俄支持中國軍閥的鐵證。

後來蘇俄——中共與吳佩孚的決裂並非出於中共，主要原因有兩條：第一，由於吳佩孚與英美的關係更深，英國的支持更重要，所以在一九二二年，吳佩孚正式派代表參加了在美國召開的華盛頓會議，

表明了吳佩孚在國際問題上對於蘇聯不賣賬，使得蘇俄碰壁，引起了蘇聯的警覺。第二、中共派到京漢等鐵路的稽查員無所不爲，妨礙了吳的利益，使吳佩孚極爲惱怒，因此結束了這次政治聯姻。這使得蘇俄在中國的政治力量中，最後不得不選擇了孫中山。

李大釗這樣一方面做北洋政府的紅人，一面高唱社會的最新思潮，是所謂共產主義思想的先驅(李接受共產主義早於陳獨秀)，這恰恰合乎蘇俄的兩面需要。他在一九二〇年春天接待了共產國際遠東局魏金斯基(化名吳廷康)，並且介紹他到上海會見了陳獨秀，李和陳同時成爲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參與聯絡軍閥的工作；同年的十月，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李大釗的辦公室成立；一九二一年六月，蘇共再派馬林來直接領導成立中共，也是先到北京會見李大釗商討籌建事宜。

在對外方面，李大釗和陳獨秀也是一面高唱愛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高入雲霄，一面處處聽命於蘇俄，出賣民族的利益。例如，北京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有陳獨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的報告，題爲《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第二部份「將來計劃」的「政治宣傳」部份的第四條，原文如下：「聯絡各革新黨派，作承認蒙古獨立及承認蘇維埃俄羅斯的運動。」當時蘇聯出兵佔領蒙古，連張作霖、吳佩孚、段祺瑞都堅決反對，並且在北京與蘇俄的外交談判中毫不讓步。但是，在陳獨秀的報告中，卻正式要開展「承認蒙古獨立」的宣傳運動，這應當是中國的政黨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做出的出賣中國的政治承諾。

中共的兩大領袖「南陳北李」，「北李」的任務是聯絡吳佩孚，「南陳」則聯絡陳炯明。

陳獨秀一九〇〇年就到日本短期留學，歸國以後，雖然參加過愛國運動，但是從來不接近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多與章士釗等爲伍。就是在袁世凱復辟期間東渡日本，他也只與章士釗辦《甲寅雜誌》，或參加「歐事研究會」的活動。陳和李都從來別有所圖，在國民革命的主流之外。

據陳炯明的《年譜》記載，早在一九二〇年四月，一位俄國將軍就訪問過陳炯明，並且帶去列寧的親筆信函。同年，魏金斯基也去拜見過陳：「據魏金斯基回憶，他是和陳獨秀一起去見陳炯明的。他說，陳炯明給他的印象是『意志堅强，遇事非常鎮定。從他的談話內容和態度看，他是個清教徒類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談論着孫逸仙，但認爲孫是個理想家，而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同註釋⑪)

蘇俄派到中國的代表馬林，在陳獨秀的導引下，十一月在廣州先和陳炯明充分接觸，到十二月二十四日然後才去桂林見孫中山。這是孫中山先生第一次見蘇俄的代表，結果是一無所獲而散。鄧家彥是當事人，他記載陳炯明與馬林過從甚密：「每欲利用炯明權勢以陷國民黨，其詭謀與炯明正合，故馬丁(林)之來，獨秀認爲臭味相投，不讓其偏向國民黨。同時且譏議國民黨如何腐化，而孫公如何空虛無力。以此聳恿馬丁(林)接近陳炯明。詎意炯明頭腦頑固，與馬丁(林)言論意志相乖迕。馬丁(林)頗感失望，乃求護送赴桂，一識荊州爲快。」鄧家彥參加了第二次談話：「當時馬丁(林)宣佈第三國際意旨，力促國民黨與之聯盟，可謂語重心長。總理環顧黨人曰：諸同志亦有說乎？衆默然。總理於是鄭重答覆馬丁(林)曰：蘇聯革命甫四載，其事跡罕能言者，文獻闕然，莫由聞知焉。吾儕革命黨人也，詎不同情革命？顧革命之主義各國不同，甲能行者，乙扞格而不通，故共產之在蘇俄行之，而在中國則斷乎不能。……總理之爲是言，與其後對越飛互簽宣言，反對共產主義，詞嚴義正，天下莫不聞之，當時馬丁(林)欲辯未能，欲求不得。」⑭馬林雖然在孫中山處碰壁，但中共和陳炯明的合作卻熱烈起來。據鄧中夏的回憶，早在中共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時候，陳公博就明確提出「聯陳(炯明)倒孫(中山)」。

馬林在桂林訪問孫中山雖然沒有成果，到廣州拜訪陳炯明卻很成功。中國大陸的近代史專家最近也提到了這些史實：馬林「從交談中得出印象，陳炯明完全站在俄國革命方面。……他要求派一個代表到蘇俄去，並宣稱並不反對在廣州設立共產國際辦事處。他希望在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下，改組軍隊。事

實上，不僅馬林對陳炯明有好感，而且直到陳炯明叛變孫先生時，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都一再稱讚陳炯明『堅信共產主義，不僅是一位革命的將軍，而且是具有優秀的組織能力，並受到群衆擁戴的人物。』」⑮蘇聯官方的評價實在很高，僅僅是「堅信共產主義」這一條，完全應當以同志相稱了。研究中共黨史的司馬璐說：「當日的陳炯明，一是國民黨的實力派，二是他自稱社會主義者，三是他與蘇共早有交往，四是他先後任命共產黨人陳獨秀、彭湃擔任廣東教育界的要職(按：彭湃任海豐教育局長)。所以，在當時共產國際的心目中，陳炯明是革命派。其時莫斯科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刊物讚揚陳炯明堅信共產主義，不僅是一位革命的將軍，而且是具有優秀組織能力，並受到群衆擁戴。」⑯

在一九八八年廣州《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六集上，劉德喜以《蘇俄、共產國際與陳炯明》爲題，發表研究報告說：「一九二一年初魏金斯基返回莫斯科以後，斯托揚若維奇、別爾林以及廣東共產主義小組就一直執行着擁護陳炯明和反對孫中山的政策。直到一九二二年四月底，共產國際代表達林根據蘇俄政府和共產國際的新指示，來到廣州準備同孫中山建立聯繫時，發現斯托揚若維奇、廣州共產主義小組仍然堅持擁護陳炯明和反對孫中山的政策。」

於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號人物陳獨秀正式接到邀請，到廣州去當了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委員長。周佛海在《逃出了赤都武漢》中記載：「共產黨見棄於吳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姘識，……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給陳公博辦《群報》。」陳獨秀和陳炯明之間的親密無間到了甚麼地步？那時的中共領導人之一的陳公博記載，當陳炯明叛變的前一個月，陳炯明已經被孫中山免去廣東省長和粵軍總司令兩個要職，與孫中山的關係極爲緊張。陳獨秀偕陳公博去到陳炯明的老巢惠州，竟然是一片備戰景象，陳獨秀已經知道有變：「仲甫先生又由滬來粵了，他說是來粵視察黨務的。我們開了幾次會，討論今後黨的工作問題，仲甫又找着陳炯明的秘書黃居素先生，說要往惠州和陳炯明相晤。我以爲仲甫先生是慰問

陳炯明之意，人是有感情的，仲甫既由陳炯明請來，現在陳炯明下野，一去存問，也是人之常理，所以我並不加以勸阻，仲甫先生又要我同行。」「仲甫告訴我，陳炯明不像下野的樣子，室內排滿了軍用地圖，桌上架滿了軍用電話，恐怕廣州不免有事。」⑰這些屬於軍事機密的東西都讓陳獨秀看了，可見彼此之密切。而陳獨秀呢？則在這次惠州談話中，奉勸陳炯明加入中國共產黨。可以想像，如果實力人物一旦加入了中共，中共就會立即由一隻小老鼠，變成一隻猛虎，中國的江山自然就在手中了，真是好了不起的如意算盤！可是陳炯明不買賬，這也是中共後來轉向反對陳炯明的原因之一。研究中共的史家沈雲龍記述道：「據海隅孤客的解放別錄說：那一次惠州談話，陳獨秀力勸陳炯明加入中共，領導華南發展，謂要幹不能全靠軍隊，必須以廣大群衆爲基礎。陳炯明則表示反對，認爲不能拿勞工做政治本錢，這惡風一開，往後將不可收拾，他們同意的只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那一套，因此雙方談得無結果，陳獨秀才怏怏而退，這是後來中共不堅持聯陳而聯孫的最大原因。」⑱中共那時毫無力量，黨員只有一百人左右，陳炯明當然瞧不起，至於群衆運動，又是空頭支票，陳炯明不會上當。如果這一次已經被孫先生免職、正在磨刀霍霍的陳炯明真的加入了中共，那會是甚麼局面?!

《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六集上，劉德喜的研究報告又有一發現，即在陳炯明叛變的國際背景除列舉出英國以外，還有俄國：「陳炯明的叛變不僅受到英美等帝國主義的支持，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得到蘇俄和共產國際的肯定。《消息報》發表文章將陳炯明叛變看作是促成南北瞭解和日趨接近的一大步驟。同時，蘇俄外交人民委員會積極主張通過陳炯明和吳佩孚來統一中國。魏金斯基在《真理報》發表的文章稱讚陳炯明是『革命的督軍』，本省的愛國者和外國帝國主義的仇敵。」關於陳和蘇俄的破裂，劉德喜說：「陳炯明並沒有像蘇俄、共產國際所希望的那樣，他除了對社會主義和俄國革命提出了一些熱烈的讚美之外，卻不願採取任何實際步驟以促進雙方的關係。對於蘇俄，他只是做了一些沽名釣譽的

表示，實際上並非真正同情俄國革命。他不願爲中俄合作以及與之相聯繫的中國統一大業做出任何犧牲，一切要從個人的利害得失來考慮。一九二〇年以來，他從來未採取措施來促進同蘇俄、共產國際的關係，而只醉心於爭奪權力的鬥爭。」

在陳炯明叛變以後，中共與之關係已經被迫中斷，與陳炯明關係密切而又不願割斷聯繫的譚平山被調離，陳公博受到懲處。蔡和森後來曾經著文爲聯陳政策辯護，聲稱這是「極光明磊落的行爲」。

第三方面：莫斯科的手伸向了孫先生。

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少年共產國際的代表達林到達廣州，再一次正面向孫中山先生提出建立中國與蘇聯的聯盟問題，被孫中山先生拒絕。可是，蘇聯共產黨爲了在東方擴張和建立突破口，在對國民黨的態度上，早已經有了一個根本的轉變。

一九二〇年七月，在共產國際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提出了《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指示共產黨與幫助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還要和這些民主派結成「聯盟」，這就奠定了所謂「合作」的理論基礎。本來在中共成立的第一次成立大會上，按照以往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將孫中山與徐世昌等同看待而引起爭論。一九二二年一月在克里姆林宮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上，列寧和共產國際主席季若維也夫等，又希望蘇俄與國民黨並肩反對帝國主義，並且批評了孫中山的親美政策。這成了中共政策轉變的直接動力。

馬林不僅直接推動和操縱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他又是推動中共的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的最主要的人。當孫中山在桂林拒絕了他的國共兩黨以平等身份聯合的意見以後，他雖然和陳炯明進行了接觸，認定陳堅定地站在蘇聯方面，並且促成了陳獨秀等到陳炯明的手下工作，但是，以他的銳敏接觸和觀察，他發覺以孫中山爲首的中國國民黨才是在中國的未來擔當大任的政黨。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

回到了莫斯科，在十一日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匯報了中國之行的意見，認爲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有三項原則：「反對外國統治，爭取民主，爭取公民的人的生活。」最後一條接近社會主義，並且只有南方沒有在受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的統治之下。所以馬林建議共產國際支持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並且中共黨員應當以個人身份加入到國民黨中去工作。八月初，共產國際執委會完全同意了馬林的建議，做出了支持孫中山的四項決定⑲。

馬林立即從莫斯科返回中國，和他同行的，有蘇聯駐中國全權大使越飛。八月二十五日，馬林在上海拜見了從廣州剛剛返回上海的孫中山先生。

陳炯明的叛變，對孫先生的打擊很大。從同盟會到陳叛變，孫中山與陳炯明相處十餘年，孫中山將第一支軍隊交給他，甚至讓他身兼四職，委託的重任超過任何人，但是陳炯明一旦實力增强，羽毛豐滿，立即背叛，甚至要將孫中山先生置於死地，使剛剛開始的北伐失敗。所以孫中山在《就陳炯明叛變事件致海內外同志書》中，歷數陳的奸狡的爲人和給革命帶來的損失，也透露出極度的痛心。

如今馬林把共產國際的支持的決定告訴他，把中共剛剛結束的西湖會議的決定告訴他，使得孫中山受到了安慰和鼓舞，立即做出了加强與蘇俄關係的決定。數天以後，孫先生會見了李大釗，這位吳佩孚的顧問，竟然由孫先生主盟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李大釗的《獄中自述》回憶如下：「於是，決心投入國民黨，……釗曾親赴上海與孫中山先生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之問題。曾憶有一次中山先生與我等暢談此問題恒數小時，當即由先生主盟，介紹加入國民黨。」⑳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和越飛發表聯合宣言，奠定了聯俄容共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從此寄生在中國國民黨內，吸吮着國民黨的脂膏迅猛成長；中國共產黨成爲後半世紀的中國統治者，起點也就在這裏。

註釋：

①《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五)第一卷第二十四頁，李玉貞譯，東大圖書公司印行，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台北。

②《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十頁。

③《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第三四頁、第一一二頁，躍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中華民國七七年，台北。

④《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第六五至六七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

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九八頁。

⑥《我的回憶》第一八三至一八四頁，張國燾著，《明報》出版社，一九七一年，香港。

⑦《中共黨史暨文件選粹》第一部，第二七五頁，司馬璐編著，自聯出版社，一九七三年，香港。

⑧《中蘇外交的序幕》第一九三頁、一九七頁，王聿均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民國五十一年，台北。

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冊，第四十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

⑩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漢》，轉引自《中共史論》第六四頁，郭華倫著，中華民國國際研究所編印，民國五十八年，台北。

⑪《國共合作史》第三三頁。林家有等著，重慶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

⑫《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

⑬《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八四頁，李玉貞、杜魏華編，光明日報出版，一九八九年，北京。

⑭鄧家彥的回憶，轉引自《中共黨史暨文件選粹》第二部，第一八二頁。

⑮《國共合作史》第三十至三一頁，林家有等著，重慶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

⑯《中共黨史暨文件選粹》第二部，第一七九頁。

⑰《中共黨史暨文件選粹》第二部，第一八四頁。

⑱《中國共產黨的來源》，沈雲龍著。

⑲《中共史論》第一冊。

⑳《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第一八五頁，張靜如等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四、越飛與鮑羅廷

越飛(Adolf A. joffe)和鮑羅廷(Micheal Markowich Bosrodin)，是執行蘇共中央東方政策的最重要的兩個人，對於一九二〇年代的中國歷史都發生過重要影響。

當蘇聯在西面的波蘭、德國、土耳其的擴張失敗以後，轉向東方。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第三國際關於中國問題作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要求所謂國共合作，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國民黨是現時中國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組織，他以自由民主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份學生和工人爲依據。……因爲解決民族革命問題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而現實工人階級又尚未充分化成爲完全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委認爲：年輕的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合作是必要的。」「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只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但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併，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捲起自己的旗幟。」①作出這決議以後數天，蘇聯政府就派出了很能幹的使者到中國執行這重要的使命。

這就是有名的外交家、陰謀家越飛。

越飛一九一七年才加入蘇聯共產黨，但是他早期曾經與托洛茨基一起編輯過《真理報》和《前進報》，當過法學教授，並且在外交事務方面表現出特殊的才能，所以蘇聯新政府立即加以重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作爲蘇聯政府的全權代表，率領代表團主持和簽訂了對德和約，使剛剛成立的蘇維埃政府

獲得喘息的機會；一九一九年任駐德國大使，德國共產黨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剛剛在柏林領導過類似俄國十月革命的武裝暴動，暴動主持人李朴克內西在次年一月被處死。越飛以外交大使身份參與赤色宣傳活動，所以被德國政府驅逐出境；一九二一年三月，擔任蘇聯駐拉脫維亞大使，並負責與波蘭簽訂商約。越飛以卓越的外交技巧和雄辯的口才稱譽外交界，他特別擅長於履行代表國家的外交官和共產黨陰謀煽動者的雙重角色。蘇俄把這樣一位重要人物派到中國，正是急於在東方打開出路的表現。

十月革命以後，內有白俄舊勢力的武裝反抗，外部在東西兩邊受到的干涉，使共產黨處境非常困難。研究中蘇早期外交關係的專家梁肇庭指出，這困難處境是蘇聯政府通過加拉罕兩次發表對華聲明的背景。這兩次聲明並沒有在中國官方的外交政策上引起甚麼反應，而是征服了急躁而幼稚的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後來蘇聯通過建立遠東共和國來成功地緩和了日本(蘇聯在遠東的主要競爭對手)的干涉，利用中國軍閥的矛盾而出兵蒙古，開始鞏固了蘇俄在中國的地位，這是優林使華氣盛的原因；越飛使華，借助於蘇俄在遠東已經全面穩定，所以越飛在中國的外交始終强硬，而同時又乘機試探與孫中山接觸，在中國的狂熱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中巧妙地輸出革命②。

越飛對北京政府的外交完全失敗，但是其它的任務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

雖然北洋軍閥自私腐朽，但是他們在某些時候，不管是吳佩孚或張作霖，仍然有一定的民族主義的意識；並且他們知道外交複雜難爲，所以大都交給專門的外交人才去辦理。這些外交人才，如顧維鈞、王正廷等，則憑着這獨立性，時常盡可能地維護了國家民族的利益。

雖然越飛非常能幹，顧維鈞還是讓他在外交上一事無成。那時候，蘇聯與西方國家沒有外交關係，越飛卻想要立即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以便打開缺口。他不經過中方的同意，在沒有外交承認的情況下，一定要遞交國書，這被顧維鈞一再地拒絕。顧的前提是，蘇俄必須首先自外蒙古撤兵。研究中

蘇外交關係的王聿均寫道：「觀顧、越首次談話，越飛機詐百出，擅於辭令，處處先發制人，難以應付。尤其是傳遞國書一項，或允或拒，尤感棘手。……顧氏堅持立場，不爲所動，以時機未到爲藉口，婉拒到底。」③

越飛眼見會談沒有成就，就在九月二日離開北京赴長春，在中國的土地上與日本會談滿洲問題，妄圖以蘇日會談來挾持中國，又以中日會談來逼迫日本讓步，以便坐收漁人之利。這使得中方頗爲緊張。但因爲在庫頁島問題上，兩個强盜互不退讓，蘇日談判一事無成。於是越飛回到北京再開會談，仍然妄圖從談判桌上把侵略的各種贓品以文字固定起來。

中方抓住蘇日會談失敗，企圖進取，要蘇聯從外蒙古撤兵；蘇方則因爲在遠東的困境已經過去，也摸清了直系、奉系不和的現狀，在談判時則百般狡賴。越飛甚至不顧加拉罕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兩次聲明，就中國從一九二三年一月起，不欲繼續交付庚子賠款事，向中國政府提出一再的抗議。

中俄雙方爭執的焦點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古的撤兵問題，越飛不遺餘力地維護沙皇俄國在中國所取得的利益，還進一步爲沙皇沒有能夠霸佔而爲蘇聯所奪去的蒙古交涉。甚至在越飛的交涉過程中，蘇聯突然與他所扶植的外蒙古傀儡政權簽訂商約，完全無視中國的主權。外蒙古後來終於從中國領土分裂出去，其中越飛有極其重大的作用。

十月革命後，蘇聯無力量管理中東鐵路，現在遠東開始穩定，越飛則捲土重來，完全不承認加拉罕的聲明，在談判時絲毫不讓。中方很害怕蘇俄將中東鐵路的利益出賣給日本，所以不敢太强硬；而且直系和奉系爲了私家利益彼此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動武，外蒙古也就沒有真正的力量作爲外交談判的籌碼，這點越飛很清楚，所以更加肆無忌憚。王聿均寫道：「越飛此種反覆巧詐的態度，事實上即是蘇俄政策的反應。因爲加拉罕兩次宣言，完全是爲了誘惑中國傾向蘇俄，也是爲着應付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

的特殊情勢所採取的一種手段。如今時遷勢異，霍爾瓦特在中東路區的勢力，早已瓦解，東部西伯利亞日軍亦於本年十一月一日，完全撤退，蘇俄在遠東的地位早已大爲鞏固，不必再有所顧及，遂揭開其僞善的面幕，向中國咄咄進逼。」④但是，這都只是從越飛的狡詐中作出的推測，誰也不知蘇俄政府的真實面目。

蘇聯在一九九〇年崩潰分裂以後，相當部份的國家檔案解密，我們從中知道，蘇聯政治局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第二十四次會議中對駐北京全權代表越飛正式作出指示，要求他根本不承認加拉罕作出的兩次有名的聲明，該電報說：「中央委員會認爲不得從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間的一般宣言中作出同中國談判的直接指令，因中國政府沒有及時做出相應回答。您提出的所有問題都應成爲共同討論的內容，並且只能採取與中國共同簽署條約的形式得到解決。至於說蒙古，關於國家的法律地位，關於蒙古的撤軍問題，應該由俄國、中國、蒙古協商解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不得把蒙古排除在外。這與我們承認中國對蒙古的主權沒有矛盾。在中東鐵路問題上，必須預先規定一系列保證和有利我們的條件，……」這封電報由「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大林」親自簽署，出席政治局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還有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李可夫、托沐斯基、季若維也夫、加李寧(候補委員)，以及中央委員會委員古比雪夫、拉狄克。蘇共中央在對華的政策上並不一致，但是在繼承沙皇俄國的侵略中國的成果方面，毫無異議。

這封電報對於弄清史實非常重要。一九一九年在巴黎和會上簽訂的凡爾賽條約，因爲青島問題掀起了中國的軒然大波，使得整個中國的許多知識精英走上了反西方的道路。正在此時，加拉罕發表了兩次對華聲明，宣佈廢除過去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這造成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對蘇聯政府感激涕零，覺得只有蘇聯以平等待我，有的人因此成爲了共產黨員。現在解密的檔案告訴我們，蘇共中央早在一九二二年八月的政治局會議上，就已經完全推翻了，命令不得以那兩次宣言作爲談判的「直接指令」。唯一

的理由是「中國政府沒有及時做出相應的回答」。查第二次聲明的時間是一九二〇年九月十七日，與蘇聯政治局做出推翻此宣言的決議不到兩年。而蘇俄代表優林在北京的談判之所以沒有進展，是因爲以顏惠慶爲主要談判代表的中方，爲抗議蘇聯對外蒙古的武裝侵佔，而中止了談判。

事實上，蘇俄和中國方面的北京政府、孫中山以及中國知識界的一切接觸，都是以這兩次聲明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爲基礎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使得越飛在中國的工作變得非常的困難。所以越飛在九月十七日致信蘇共中央政治局各成員道：「我不明白，不能從我們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〇年的宣言做出直接指令指的是甚麼……當然，如果要要一點『靈活手腕』，可以把這些宣言化爲烏有。但是我認爲，這將是我們對華政策的失敗，而最終成爲我們全面失敗的開始，因爲在對外政策中，一旦我們以最普通的帝國主義的面貌出現，我們就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革命堡壘的作用，這個損失要比在對內政策上做出重大的經濟上的讓步要嚴重得多。」(出處同前註釋)長期在外交第一線的越飛知道，蘇聯只有戴上假面具，才能夠和昔日的沙皇俄國的侵略面孔區別開來，如果在這裏撕下來，哪怕是以最普通的帝國主義的面孔出現，都將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越飛後來與孫中山先生發表的很有名的聲明，就重申要履行這點，使其成爲整個聯俄容共的基礎，實際上是越飛所謂的「靈活手腕」的運用。這不僅僅是欺騙孫中山先生，也是對所有中國人的長期欺騙，而且欺騙了幾十年。這假面具在七十幾年以後的今天才被撕下來，這應當是歷史上的最大騙局之一。

越飛在進行狡詐外交的同時，又在宣傳和輸出革命，即從意識形態，從共產主義的教義去籠絡同道者，又從反西方這一立場大罵帝國主義，來取得中國知識分子的好感。至於中國的領土外蒙古問題，和俄國繼續霸佔中東鐵路問題，則避重就輕，用幾句話帶過。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李大釗，在十月革命五週年的越飛舉行的招待會上說：「略謂三年前，俄國界致牒中國政府，表示種種讓步，開外交上之新紀

元。吾人值此革命五週年紀念日，應表示絕大謝忱。所應謝者並非其物質，乃其精神。故應暫致蒙古及中東鐵路於不顧，首先承認蘇維埃俄國云云。」（《京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李大釗竟然以俄國送來了「精神」換取外蒙古和中東鐵路，不顧重大的民族利益。在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中，國家和民族利益從來都小於所謂「無產階級利益」，蘇俄就利用這點來獲取國家利益。事實證明，從一開始，這些共產黨人的民族氣節，連張作霖、吳佩孚都不如。

澳大利亞的梁肇庭研究這段時期的中蘇關係指出，越飛在北京大大玩弄外交手腕時，蘇俄暗地裏支持吳佩孚，甚至在靠近中俄邊界集結兵力，打算與吳佩孚配合，準備南北夾擊奉張：「蘇俄與吳佩孚結盟對雙方都有利，因此在蘇俄看來與吳佩孚結盟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對莫斯科來說，吳佩孚不僅勇敢反日，而且他也是唯一能與張作霖抗衡的力量。這樣也就能抑制躲在幕後的日本勢力的擴張。對吳佩孚來說，他知道，張作霖只要守住他的滿洲老家，那麼，他雖然可以擊敗張，但無法消滅張。蘇俄能夠威脅張作霖的後方，因而舉足輕重。這正是吳佩孚所想到的，大約在直奉戰爭期間，維連斯基到洛陽訪問吳，吳告訴他，『只要他能在張的後方有像蘇俄這樣的盟友，那末張對他就構不成甚麼危險』。」⑤中共職工運動領袖鄧中夏在一九三〇年的回憶錄中也記載，李大釗在京漢鐵路中安置的那些中共黨員的稽查，也就是幫助吳佩孚在一九二二年直奉戰爭爆發後清除交通系分子，因爲交通系的頭目梁士貽爲張作霖所支持。這也證明蘇俄在中國的種種作爲，比沙皇過之。

善於玩兩面手法的越飛，一面與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談判施壓，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越飛又致信吳佩孚，開始兩段如下：「從莫斯科來華途中我收到了一個電報，知您致托洛茨基的電報已經遞交，並且對莫斯科產生了異常好的印象。俄國人民密切注意中國人民從政治和經濟上擺脫帝國主義的桎梏，而進行的全民族的鬥爭，我們大家則懷着特別的關切與友好之情注意您本人的一切，因爲您既是思

想深邃、精明睿智，又是卓有經驗十分幹練的政治家和天才軍事家。……我本想榮幸地與您會面，以便一則就近結識中國這位最偉大的政治和軍事活動家，二則和您討論我們兩國人民彼此都感興趣的問題。」⑥三天以後，即八月二十二日，越飛致孫中山的信中又說：「如果閣下與吳佩孚攜手，閣下與國民黨的勢力定會大增，我不明白，爲甚麼中國政府特別是外交部推行的，是根本不符合國民黨的黨綱，也不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越飛致加拉罕的信中寫道：「孫中山是中國的精神領袖，吳佩孚——軍事領袖，兩人攜起手來可建立統一的中國。現在他們正在進行談判，希望能達成一致意見：由孫中山當民國總統，吳本人——任軍事部長兼總司令。」許多這樣的證據表明，李大釗等人不過是執行蘇聯的命令而已。

八月十二日，越飛和馬林同時抵達北京。越飛在北京周旋時，將見過孫先生的馬林派往南方。馬林在杭州主持了中共中央的會議，命令中共執行聯合國民黨的政策以後，親自到上海拉攏孫先生。

八月十四日，由於陳炯明叛變而失敗的孫中山抵達上海；八月二十五日，馬林代表越飛到上海去看望孫中山，中共的領袖們也去看望：「八月十四日孫中山到了上海，中國共產黨人陳獨秀、李大釗、林伯渠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多次訪問了孫中山，對孫中山長期反對陳炯明的鬥爭表示堅決支持，並一同討論『振興國民黨以振興中國』的『種種問題』，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孫中山深深體會到，在他畢生的革命生涯裏，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他患難與共的真正朋友。」⑥因爲孫中山的特殊艱難處境，剛剛抵達上海才十餘天，這些看望和談話，對孫中山很有影響。馬林在這裏將第三國際命令中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告訴孫中山，對孫中山表示完全的支持，表示共產黨員要爲國民黨的主義而奮鬥；孫中山則向馬林表示了建立中俄聯盟的願望。這是越飛這個陰謀家在中國活動的重大進展。

於是，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的工作立即開始。九月四日，孫中山在上海召開改進國民黨的會議，

張繼等五十三人參加；九月六日，指定覃振、茅祖權等九人爲規劃國民黨改進方略起草委員；十一月五日，派遣張繼赴北京與越飛會談，張繼帶了孫中山致越飛的親筆信；十一月十五日，孫中山再召集改組會議，審查已經起草修訂的國民黨黨章，並推舉胡漢民等爲修改黨章和宣言的起草委員；十二月十六日，召集各省國民黨員討論宣言，次日交孫中山先生最後酌定；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並且宣佈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建國綱領；一月二日，在上海召集國民黨改進大會，通過了黨綱和總章。

終於，孫中山和越飛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了著名的聯合宣言，從而開創了「聯俄容共」的時代，全文如下：

越飛君此次在滬，曾與孫逸仙博士會談數次，關於中俄關係各重要事件，竟見一致，而以下列數端尤著：

一、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主義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實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且以爲中國最重要急迫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逸仙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誠摯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

二、爲明瞭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行確定此原則，並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政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索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中，包括關於中東鐵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於適當之中俄會談，始克圓滿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爲就目的實際情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兩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中眞實權利及特別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爲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向孫逸仙博士切實宣稱(孫逸仙博士對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思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爲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爲中國實際需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敵對行爲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爲嚴重的局面。

越飛與孫逸仙博士以最誠摯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重來中國南方訪問，然後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孫逸仙、越飛(簽字)。

第一條是獲得蘇聯的保證，不能夠把蘇聯的共產主義輸入到中國來，這就打消了國民黨內部高層的顧慮。由於蘇俄的困境，開始實行包括若干資本主義因素的新經濟政策，就使得孫中山對蘇俄的警惕性有所緩和，相信了越飛的保證。但是，在蘇俄的經濟剛剛復甦以後，其國內外政策又立即恢復到殘酷的階級鬥爭軌道。

在那時候，越飛與北京政府的談判中一再出爾反爾，對於蘇聯政府過去對華的兩次聲明不承認，所以第二條的內容，是孫中山要求蘇聯政府遵守承諾。以這兩條看，似乎是孫中山的勝利，但是不管是加拉罕的聲明或是這次聯合聲明，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是一紙空文。越飛早已接到蘇共中央政治局不承認加拉罕聲明的電報，要繼續維護沙皇時代的利益。這裏對孫中山做出承諾，只是欺騙而已。聯俄容共

一開始就建立在蘇俄對中國國民黨的欺騙上面。

第三條卻是蘇俄的具體利益，即十月革命後因爲蘇俄國內政治局勢的混亂而失去的中東鐵路，得到了暫時控制的許可，雖然在南方的孫中山對此也是空話，但是可以給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整個聲明就有這一層意思。

在第四條中，雖然蘇聯承認外蒙古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達到了孫中山在主權問題上的要求，但是蘇聯剛剛武裝佔據的外蒙古，在這裏得到同意可以暫時不撤兵，拖下來最後終於造成了所謂獨立的既成事實。

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他與越飛討論了這一聲明，他評論道：「蘇俄的外交政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與現存的政府辦外交，另一方面又支持要推翻現政府的革命勢力。越飛身當其衝，便把這種雙管齊下的外交政策在中國具體表現出來。以後的事實證明，越飛在中國的具體收穫，也就在與孫中山先生建立外交關係這一點上。」⑦孫中山先生的君子之腹，難以度量蘇俄之心。蘇聯的空頭保證，卻解除了孫中山對共產主義的警惕，使得共產黨員終於可以按照第三國際的指示加入國民黨，從而開始了一場空前的奪取政權的活動，並且利用孫中山的崇高威望，給予北京政府以打擊。

越飛以空文打開了東方的大門，開啓了聯俄容共的新的時代。

但是在當時的俄國，這聲明幾乎沒有甚麼影響，《消息報》在很久以後才登載了摘要，並且把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一段刪除了。可是正因爲有了這一前提，才有孫先生的聯俄容共的政策。可見對蘇俄政府來說，這聲明只是越飛的一種正常的外交權術的運用。

一九二三年秋天，蘇俄的另一個代表鮑羅廷來到了中國。這實際是一個間諜式的人物，他直接給中國帶來了災難。

越飛和鮑羅廷是很不相同的人。前者的一切活動都在台面上，基本是在外交官的範圍內要陰謀詭計，雖然他與孫中山的宣言超出了這點。他一旦遇到了像顧維鈞這樣能幹的對手，就可能一事無成。但是鮑羅廷完全是另一類的人。

接替越飛的加拉罕駐北京，是蘇聯政府的全權代表。全權代表告訴孫中山，蘇聯政府和蘇共派出另一位代表駐廣州，這位駐廣州代表受到加拉罕的極力的讚揚：「在廣州沒有一位全權代表我國政府的常駐代表，長期以來是我國政府所深感歉疚的事。現在我國政府已任命了鮑羅廷同志任此職，這是解決此種不正常現象的一個重要步驟。鮑羅廷同志是我黨最傑出的幹才之一，他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工作了許多年。請不要把鮑羅廷認爲只是我國政府的代表，因爲他同時也是我的代表，你可以和他無話不談，就像你對我的坦白態度一樣。他所說的每一句話，你可以當做是我親口對你說的一樣。他對中國當前的一切問題具有深厚知識，他在離北京南下之前曾和我作過一次長談，他將把我的意見與祝賀帶給你。」⑧這封信件的一開頭的「遺憾」就撒謊，因爲蘇聯最早選擇的聯絡對象是吳佩孚和陳炯明。這兩位勢力人物與蘇聯政府的破裂，主要都是由於勢力人物的主動，而不是蘇聯政府的主動。至於說他關於中國的知識「深厚」，也是騙人的，因爲共產國際後來的另一位重要代表羅易回憶，鮑羅廷在剛接任時說，他根本不知道烏拉爾以東所發生的情形。但是關於鮑的能力和經驗，那是真實的。

十月革命不久以後蘇俄的擴張，主要不是直接的軍事佔領，而是通過這些國家的代理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歷史觀，特別是階級鬥爭理論，在這些國家尋找問題，製造動亂。所以連越飛這樣的職業外交家在正常的外交活動以外，還要在北京會見李大釗等共產黨員，發表若干帶宣傳政治素材的與正常外交官身份不符合的演講，來完成他的影響中國社會內部的使命，這曾經引起了北京政府的不安。而鮑羅廷實際上類似一個傳統歐洲的宗教使者，他的真正任務是在中國掀起一場共產主義宗教革命，破

壞剛剛由孫中山先生領導開創的中國民主和現代化的進程。

順便要指出的是，歐洲經歷了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宗教改革，經歷了從思想上結束歐洲中世紀的文藝復興運動，有了「人」的覺醒，爲現代工業社會的出現作了準備。但是西歐的這場文藝復興並沒有在盛行東正教的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以後建立的蘇維埃制度，如果透過娓娓動聽的意識形態語言，就發現不過是一個現代工業化時代的中世紀社會：傳統農村的小公園變成了集體農莊，東正教變成了共產黨，教士變成了黨員……。所以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活動，從國與國關係和民族利益上講，只是俄羅斯民族的新的擴張，把俄羅斯傳統的中世紀社會運用種種手段加之於中國；如果從中國社會的發展看，不過是將孫中山先生開創的中國國民黨領導的中國社會的民主和現代化進程，重新往後面拉。後來毛澤東所創立的、以整人害人爲特點的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過是歐洲中世紀的糟粕(通過俄羅斯)和中國文化的糟粕的大混雜。

從中國內部利用中國人來進行煽動破壞，實現蘇俄進一步的侵略企圖，擔當這重任的，就是鮑羅廷。

根據新的史料，鮑羅廷是由蘇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開會決定，由中央書記處書記斯大林予以任命，可見鮑羅廷的來頭和蘇俄對中國的重視：《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第二十一次會議記錄》(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莫斯科)「……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通過電話徵詢政治局委員們的意見。斯大林同志關於任命鮑羅廷爲孫中山政治顧問的建議。

一、任命鮑羅廷爲孫中山政治顧問，建議他於星期四與加拉罕同志一起動身赴任。

二、指示鮑羅廷同志，與孫中山共事時遵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利益，而不要熱中於在中國推行共產主義。

三、鮑羅廷同志應同蘇聯駐北京全權代表協調工作，通過後者同莫斯科通信。

四、鮑羅廷同志應定期向莫斯科匯報工作。

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大林。

這決議顯示蘇共對中國問題是多麼地慎重，是先交換意見，然後才提出任命。作爲孫中山的顧問，在權力的核心部門可以直接影響孫中山，影響中國的命運，對蘇俄是多麼的重要。第二點證實了孫中山堅持了在聯俄容共期間，不在中國搞共產主義的原則，也證明了蘇共和鮑不守信用，特別在孫中山先生去世後變本加厲地與中共在湖南、湖北、江西大搞蘇維埃式的農民運動。

鮑羅廷誕生在一八八四年，猶太人，從小遭受歧視和做苦工，這養成他對社會的反抗。早在他十六歲的一九〇三年，他參加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因爲支持列寧的多數派，就成爲布爾什維克黨員，一九〇四年起被派往瑞士、瑞典、英國的俄僑中從事革命活動，常常直接在列寧的領導下工作，由於秘密工作的需要，他開始使用不同的化名。一九〇六年召開的社會民主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和他並排就坐的是斯大林。會後不久被逮捕，被放逐國外。一九〇七年至美國，在那裏的學校讀書和從事一些政治活動，改名叫鮑格(Berg)，在芝加哥爲俄僑創立、並擔任「進步預備學校」的校長，擔任「援助俄國政治犯委員會」的主席。他在美國參加了美國社會黨，很年輕就成爲共產國際的活動家，直到一九一八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後他才返回俄國。然後被派遣到歐洲各國進行秘密活動。一九二二年在英國格拉斯哥被捕的時候，警察才發現他有十幾個化名。這所有的國際活動都不是正式的外交官的活動，而是間諜式的陰謀活動。一九二三年二月出獄返回俄國不久，立即得到被派遣去中國的任命。加拉罕給孫中山的推薦書中稱讚他是「我黨最傑出的幹才之一」，絕非虛誇。

過去在歐洲的秘密活動，鮑羅廷曾經留下一些神奇的傳說；如今進入中國以後，僅僅從去到廣州的

方式，仍然完全充滿間諜式的神秘。大概這對於鮑來說，是習以爲常的。

歷史學家已經難以知道鮑羅廷確切地到達中國的日期，因爲像他的前任維金斯基和馬林一樣，行動總是秘密的。鮑和推薦他赴中國的加拉罕幾乎同時到達中國的哈爾濱，但是他們在中國不能同行，更顯示鮑此行與他過去的所有出國活動一樣，都是共產國際搞的陰謀活動。加拉罕是正式的外交官，中國的報紙記載他八月十三日到達哈爾濱，八月十八日到達瀋陽。最近鮑的傳記作者記述道：「八月下旬鮑羅廷終於踏上了這塊在檔案資料中記載的中國土地。鮑羅廷的秘密來華之行竟然躲過了敏感的記者眼睛，……加拉罕離開瀋陽時，鮑羅廷還躲在交通銀行寓所裏。一方面他在到達目的地廣州之前，必須躲避容易暴露自己的熱鬧的公共場所，……鮑羅廷以後悄悄出現在北京車站上，隨後驅車去加拉罕等人的駐地。」⑨

在北京，這位以輸出俄國革命爲名，爲俄國的帝國主義擴張服務的鮑，在蘇聯大使館秘密會見了李大釗、張國燾等中共黨員，演講了兩個多小時，並且徵詢對於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意見；在上海會見了中共領袖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從上海到廣州，鮑竟然坐的是裝牲口的船，在路上與二百多頭綿羊相伴，在台灣海峽的風暴中幾乎遭受滅頂之災；鮑雖然在上海派出了先行者，他最初到達廣州仍然以新聞記者身份出現，到達以後十幾天，在報紙上才有消息披露，真可謂神秘透頂。

鮑羅廷給加拉罕的信件說明鮑是十月六日到達廣州，並且受到孫中山的熱情接見：「孫中山非常熱情地歡迎我，讓我和他坐在一起，並且目不轉睛地凝視着我達數秒鐘之久。我轉達了莫斯科以及政治代表加拉罕同志對於他的問候和祝願。……他表示了這樣的意見，如果他能在中國中部和蒙古駐足，他就可以相當自由地和帝國主義打交道。關於中國中部的局勢，一切問題都取決於他的軍隊進行北伐的成功。他還期待着他派赴莫斯科的代表所進行談判的結果。很明顯，他期待着在莫斯科的這些談判能夠取

得豐碩成果。……但目前，他認爲，控制廣東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的軍隊需要擴編和加强。要做到這一點，他需要幫助，但他設想的，這種援助可以通過海參崴提供給他，不必在香港靠岸。從海參崴至廣州的直達輪船航線，可以用來爲此服務。……這就是孫中山最迫切需要開闢的線路。換言之，就是俄國(蘇聯)的直接聯繫。由於封鎖而不能受到、同時又是非得到不可的軍事物資，可以從海參崴來。」在場的另一位俄國人回憶道：「鮑羅廷在向孫中山講述紅軍的情況時，使他注意到軍隊中政治工作的重要意義。在鮑羅廷詳細告知蘇聯軍隊的組織和戰鬥生活之後，孫中山表示：『我的軍隊中缺少這個，我們必須把所有這一切建立起來。』」⑩俄國被勢力人物吳佩孚和陳炯明扔下以後，就苦苦纏住孫中山；孫中山與蘇俄的關係，一直是俄國主動，雖然被孫中山一再拒絕。在這裏的記載表明，孫中山一直是需求援助者，俄國則是慷慨供應者，俄國的禍心深藏不露。這與孫中山苦苦向西方求助，而總是被拒絕成爲對比。

可能這對於孫中山大有影響。國民黨元老古應芬記錄了鮑羅廷到了廣州以後不久，陪同孫中山視察虎門前線時，對鮑相當器重。在十二月一日的孫中山演說中，已經可以看出鮑對孫中山的影響：「從前何以不從事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因爲未有模範、未有先例之故。現在一位好朋友鮑君，是從俄國來的，……蓋俄國革命之成功，全由於黨員之奮鬥。……故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學俄國的方法、組織及訓練，方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請鮑君做吾黨的訓練員，伴之訓練吾黨同志，鮑君辦黨極有經驗，望各同志犧牲自己成見，誠意去學習他的方法。……鮑君對我說，如能假以六個月時間，可以將廣州市變成吾黨最鞏固之地盤。」⑪孫中山先生這裏講的全是國民黨會得到的東西，他沒有想到他所可能付出的東西。二十幾年以後所付出的，是江山，是中國的現代化、民主化的進程，是幾千年中國文化的幾乎被斬斷，是中國百姓的普遍的奴隸般的生活。

歷史學家崔書琴指出：「自後來的發展觀看，鮑羅廷似乎有一套計劃，這個計劃有三個要點。第一是參酌俄共的經驗來幫助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第二是使國共發生組織上的關係，即促成國民黨容共。第三是鼓勵國民黨從事『反帝』的鬥爭，也就是企圖把國民黨引到『世界革命』的路上去。」⑫還有一點是：趁此自下而上開展階級鬥爭，特別在農村，以便確立中共的力量基礎，爲奪取全國政權創造條件。

這位不能見陽光的外國使者，自從在廣州介入了中國的政治生活以後，就翻開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另外一頁。不過這一頁是污穢、邪惡和血腥的。

註釋：

①《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第七六至七七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北京。

②廣州《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六集第六九頁。

③《中蘇外交序幕》第三二七頁，王聿均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民國五十二年，台北。

④同上書第三九五頁。

⑤《孫中山研究論叢》第六集第一七七頁，梁肇庭文：《越飛使華及蘇俄與孫中山關係的由來》，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廣州。

⑥《國共合作史》第四三頁。

⑦《我的回憶》第二五五頁，張國燾著。

⑧轉引自司馬璐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三部第八五頁：《文獻與重要參考資料》，自聯出版社，一

九七五年，香港。

⑨《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第三一至三二頁，丁言模著，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銀川。

⑩《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一六九九至一七〇〇頁，陳錫祺主編，中華書局，北京。

⑪轉引自崔書琴著《孫中山與共產主義》第二七頁，亞洲出版社，中華民國四十三年，香港。

⑫《孫中山年譜長篇》下冊。

五、開始同床異夢

聯俄容共，即所謂的國共合作，是沒有甚麼基礎的，只有蘇俄—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國民黨的不同需求的相互利用。

在作出證明以前，有必要澄清幾個概念。

第一、嚴格講，一九二〇年代的歷史以國共並稱是不合乎事實的，並不存在一部所謂「國共合作」史。因爲北伐前後的中共，從組織上講，只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任何重大的決策必須通過第三國際的許可，從中共一九二一年的成立大會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五次黨代會，都在共產國際代表的參與和監督之下，只是執行共產國際的決議而已，並不能夠算作一個真正的獨立的中國政黨。就是和孫中山—國民黨的所謂合作，中共早期的領袖們大多數都反對，是經過了第三國際的三申五令以後才執行的。並且中共的黨綱黨章，中共的所有理論體系的架構，即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精神，剩餘價值學說作基石的經濟思想，或社會主義的空想都是從蘇俄來的；何況所謂的「合作」開始的時候，國民黨已經有悠久的歷史，有聲名赫赫的領袖，有奮鬥已久三十多萬黨員，有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可是據總書記陳獨秀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共只有黨員四百二十人。孫中山和俄國互相利用的合作是有的，這合作通過俄國的顧問，通過俄國在中國的政治代理(中國共產黨)進行，故只有「聯俄容共」之說，不存在單獨的「國共合作」的問題。但是爲了習以爲常的敘述方式，並不排除有時採用「國共合作」的提法。

第二、必須透過意識形態的語言，找出蘇聯繼承沙皇俄國的企圖和行動。早在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就聲稱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徘徊，資本主義必然要滅亡和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公開主張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因此列寧和斯大林的任何一次俄國的國家擴張，都會輕易找出意識形態的根據，可以把俄羅斯民族的一切擴張行爲都說成是全世界無產階級(按：根本不存在)的需要。這種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混合的狂熱，使得蘇聯共產黨在剛剛取得政權的極其困難的時候，竟敢在歐洲許多地方發動暴力革命。俄共幫助匈牙利共產黨在布達佩斯和德國共產黨在巴伐利亞都建立過短暫的「無產階級政權」，並且乘着第一次大戰剛剛結束時歐洲社會的貧苦和混亂，在歐洲各國都企圖掀起暴力革命，最後以全面失敗告終。

第三，既然運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語言，就很方便地利用共產主義的國際組織，爲蘇俄的侵略蒙上一層很有欺騙性質的遮羞布。蘇聯共產黨所以總是打着第三國際的旗號，因爲共產國際在表面上總是一個國際共產黨人的獨立組織。可是從現在解密的蘇共檔案看，共產國際在實際上，「處於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嚴密的思想、政治、組織和財務的控制之下。共產國際所有最重大的政治舉措和幹部的任用，都須先在政治局討論過並且經過政治局批准，政治局還要協調共產國際和外交人民委員部的活動。……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和代理人，均於蘇聯駐北京代表團密切聯繫並『兼辦』它們的任務，而外交官則多方協調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①這雙管齊下的措施，大大增强了蘇俄的成功。正是俄羅斯民族傳統的侵略擴張結合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蘇聯政府的骯髒作爲被第三國際巧妙地加以掩蓋，形成了一陣强有力的赤色暴風雨，首先席捲東方，進而在下半世紀席捲着全世界。因此在表述時，提到第三國際，就意味着繼承沙皇衣缽的蘇聯政府，提到無產階級的需要，就意味着彼得大帝式的民族

擴張性格。

第四，前面引述的蘇共政治局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的會議記錄，命令越飛不承認加拉罕的兩次對華聲明，使得「革命的」蘇俄政府繼續享受着沙皇俄國時代的在華利益，越飛因此擔心蘇俄將會以「最最普通的帝國主義者的面貌出現，我們就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去世界革命堡壘的作用」，越飛道出了蘇俄在華的本質是帝國主義，而不是「革命堡壘」，雖然這個電報內容在七十多年以後才公佈；再加上以後蘇俄顧問在中國的胡作非爲，更證明了蘇俄始終是沙皇俄國帝國主義的繼承者。因此，蘇俄在一九二〇年代在中國與日本、英國的衝突，是帝國主義間的利益爭奪的繼續，中共只是紅色帝國主義的工具而已。第三國際、蘇俄政府一切幫助中國、中國國民黨和孫中山的動聽話語，都是騙人的，都不能作爲研究問題的出發點。

這是必須在闡明所謂「國共合作」的時候，要首先加以闡明的四個概念。

聯俄容共是一種利益的結合，是不同目的的追求和暫時對付共同敵人的結合，是騙子和受蒙蔽者的結合，而不是同道者的結盟。

中共爲了利用孫中山先生的崇高威望，利用三民主義在中國社會所得到的認同，幾十年來都有所謂「共產黨幫助國民黨」之說，並且還捏造史實，甚至有時候把孫中山先生說成甘心讓蘇俄和中共來滅亡國民黨的人。這樣做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把反對蘇俄和中共奪取最高權力的純粹國民黨人，說成是對孫中山先生的背叛，說成是反對三民主義，而把蘇俄和中共打扮成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的維護者。

那時候，抹煞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根本差別的人，不承認兩黨的利害關係而只說共同點的人，大多數是別有用心的中共黨徒，或者像汪兆銘式的利用這種混亂的合作奪取權力的野心家。在孫中山先生去世以後瘋狂追求權力，並且得到蘇俄大力支持的汪兆銘，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對華僑的解釋就是如此：

「我們只要問孫先生爲甚麼聯俄呢？因爲俄國已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蘇俄自革命以來，便已決定對中國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直到民國十三年，便派加拉罕到中國，締結中俄協定，把所有以前俄皇時代與中國所訂不平等條約一概廢除。他既以平等待我，我爲甚麼不和他攜手呢？……我們須知道國際之間，必須先要平等，可以說親愛。主人之於奴隸，只言恩惠，不言親愛，就是因爲彼此不平等，兄弟夫婦所以能說親愛，就因爲彼此平等。他們列强既不以平等待我，更有何親善之可言。俄國既以平等待我，我又爲甚麼不可以和他親善，這都是很淺明的道理。」②汪兆銘作這番講話的時候，反對蘇俄和中共陰謀的西山會議已經召開，蘇俄的侵略陰謀已經被世人廣泛所知道，汪只是談「反帝」是聯俄的主題，憑藉的是蘇聯從來都沒有承認過的取消不平等條約的空文，對於種種蘇俄的倒行逆施隻字不提，完全是因爲他當時正在依靠蘇俄支持獲取權力。

至於中共的利用國民黨，表現在其具體策略考慮，在中共的三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按照共產黨的理論：「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爲中心工作，……宜有一個勢力集中黨爲國民革命的大本營，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同時依社會各階級的現狀，很難再找一個更大更革命的黨，即能造成，也有使國民革命勢力不統一不集中的結果。」「工人運動，尚未能强大起來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勢力。」「工人階級尚未强大起來，自然不能發生一個强大的共產黨——一個大群衆的黨，以應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必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決議，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③往往一般大會的決議，總是使用冠冕堂皇的語言，可是這決議卻不得不表示，相當弱小的中共，不可能擔當大任，只有加入國民黨，依附於國民黨而發展，這是共產國際決定的，是本身的利益需要，這白紙黑字，哪裏是幫助國民黨呢？這也是國共之間只有各自以利害爲基礎的說明。陳獨秀在闡述第三國際的意

圖時說：「第一步，利用國民黨的招牌，發展共產黨勢力；因爲如果拿着共產黨的招牌去活動，一定到處碰釘子，因爲人家一看到『共產黨』三個字，就要望而卻步，拿國民黨的招牌，就可和各方面接近。拿國民黨的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第二，就是使國民黨共產黨化，因爲共產黨既取得國民黨的資格，就可在國民黨內掌握黨權，操縱黨務，製造黨論，煽動黨員，而使國民黨漸變成共產黨。」④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國國民黨兩位監察委員謝持和張繼質問鮑羅廷的著名的問答中，鮑就說：「今日兩者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唯兩者利用之結果國民黨得更多利益。」兩次所謂「合作」的結果，共產黨把江山都「合作」去了，當然是共產黨得利。鮑在這裏承認了國共是彼此利用的關係。

再從共產黨的本身看，也說明不存在合作的可能。《孫文越飛宣言》中的第一條是，孫中山認爲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都不適宜於中國，越飛也完全同意；蘇共中央政治局在對鮑羅廷的任命決定中，也要求鮑不要熱中於共產主義。可是叫共產黨不搞共產主義就不是共產黨。其實蘇共任命鮑羅廷到中國，要求不搞共產主義的本身，只是一個策略，也是爲了下一步在中國搞共產主義，後來鮑在武漢建立赤色政權，也仍然是在斯大林的指導下進行的就是證明。共產黨以推翻一切非共產主義制度爲其天職，和任何政府或政黨合作，都是爲了推翻和消滅該政府或政黨，國民黨兩度吃大虧；後來的抗戰結束以後，又有中國民主同盟等若干小黨與共產黨合作，聯合對付國民黨，在使用價值完了以後，仍然不能免於實際上被消滅的命運。因此，和共產黨合作常常是自掘墳墓，和共產黨不可能有稍長遠的合作，這是歷史經驗和教訓。孫中山的時代，是共產黨剛剛在俄國奪取政權，正在實行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新經濟政策，還不可能對共產黨有更清楚的認識；並且孫中山先生正在極度的困境之中，西方的援助又無望，才不得已有此一時的措施。

反西方帝國主義，是俄國、中共一再宣揚的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的基礎。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佔領中國土地最多的俄國，並且在一九二二年出兵佔領了外蒙古，竟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的是「反帝」角色；同樣是俄國紅色帝國主義代理人的中共，卻只是反對西方的帝國主義，而服務於紅色帝國主義。由此可知孫中山與蘇俄的合作是缺乏起碼的基礎的。

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蘇共中央的那個撤銷加拉罕兩次聲明的電報中，對蒙古問題定下了原則：「至於說蒙古，關於蒙古國家的法律地位，關於蒙古的撤軍問題，應該由俄國、中國、蒙古協商解決。在處理這些問題時，不能把蒙古排除在外。這與我們承認中國對蒙古的主權沒有矛盾。」⑤中國的一百五十五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被突然佔領，如果有意歸還，當然應該無條件撤兵。這裏卻要談判，特別指明要俄國所立的傀儡參加，這參加的本身，就是强迫中國承認蘇俄佔領的合法性，就是對中國的主權的否認。

《孫文越飛宣言》中提到蒙古問題，採用的模糊詞句，又是蘇俄的一個伎倆。首先由俄國承認中國的主權：「俄國現政府絕無亦從無意思與目的，在外蒙古實施帝國主義之政策。」這是孫中山的主權不妥協的立場的反映。但是在具體的撤兵上，卻「不立即」，用越飛的話說是「虛與委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八日越飛請蘇俄政府外交首腦轉交斯大林的絕密電報，詳細地敘述了蘇俄在外蒙古問題上的立場和策略：「孫中山聲明，他不反對我們的軍隊駐在庫倫，但堅決反對蒙古代表獨立參加蘇中會議，也反對蒙古獨立。……馬林補充自己的意見說，不能因爲蒙古那二百萬人而毀掉同中國國民黨人的關係，我正確地預見到孫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當然我們支持弱小民族反對大民族的暴力，可是如果蒙古人的鬥爭在全世界沒有甚麼反響，而中國人的鬥爭在全世界反響很大，那末僅僅爲着這二百萬在世界上沒有任何作用的蒙古人值得我們同四億舉足輕重的中國人的關係破裂殆盡嗎？在俄中會議期間解

決蒙古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虛與委蛇，把實際解決拖延到兩國局勢穩定和兩國關係牢固下來再議。這就是我再一次請求你們批准我的計劃和策略。」⑥這裏透露出蘇共中央在佔領外蒙古以後有不歸還的決定，才有越飛在這裏提出因此得罪全中國人民是否值得的問題；這電報也顯示，根本沒有甚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之類，無論對蒙古還是中國，都是具體的俄羅斯民族利益，哪裏存在「合作」的可能呢？

在蒙古問題上，張作霖、吳佩孚和孫中山，沒有一個在主權問題上有所含糊。前面提到張作霖在三次接見蘇俄代表時，都堅持蒙古撤兵是重修友好的前提；而吳佩孚，雖然像孫中山一樣同意了緩撤兵的意見，可是向蘇俄一再提出了一九二三年春天撤兵的時限：越飛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致加拉罕的信中提到，吳佩孚「準備了一個精銳的師，擬於一九二三年春季佔領蒙古」；十一月一日致外交首腦的電報中，又重複這信息；一九二三年越飛在致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等重要人物的電報中，再一次提到吳佩孚準備在外蒙古動武：「吳佩孚參加了反俄大合唱，他拍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電報，其潛在含義只可能解讀爲：吳佩孚極力想證明他在蒙古問題上沒有對俄國做出任何許諾。……如果你們還記得，吳佩孚本人一向說，我國軍隊只可以待到一九二三年春，也就是說他對張作霖的征討實行之時。」在中俄正式外交會談恢復的前夕，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吳佩孚致信越飛，關於蒙古問題和中東鐵路說得很堅定：「蒙古屬於中國，中國中央政府本身尊重蒙古人民的願望，沒有必要製造新的糾紛。況所謂的蒙古政府，也沒有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承認，此乃中國政府難以承認該外蒙古政府與俄國政府所簽約爲有效之故。因此，外交總長顧維鈞和我不能不對此建議表示抗議。」同一信中對中東鐵路說道：「使俄國的利益在不致受損以示友好的前提下，把該鐵路還給中國，這個原則是得到雙方承認的。」⑦從越飛電報的其它部份，能夠看到這是吳佩孚同蘇俄關係惡化的原因之一。蘇俄如此狡詐、頑固的帝國主義立場，怎麼能夠合作呢？吳佩孚和蘇俄短暫合作一場，有甚麼結果呢？

歷史事實是：在當時的政治人物之中，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最沒有民族觀念，大概是整個共產主義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之故。中國共產黨人與民族主義很强的中國國民黨人怎麼能夠真正合作呢？

張作霖與蘇俄代表討論承認蘇俄問題，每次都要以蘇俄從外蒙古撤兵爲前提；中共卻主張無條件承認蘇俄，正式提出對於外蒙古和中東鐵路不予計較。一九八四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中記載，李在出席十月革命五週年的越飛的招待會上，公開演說暫時放棄外蒙古和中東鐵路問題，以便作爲蘇俄送來馬克思主義的報答，李說：「略謂三年前，俄國政府致牒中國政府，表示種種讓步，開外交上之新紀元。吾人值此革命五週年紀念日，應表示絕大謝忱。所應謝者並非其物質，乃其精神。故應暫致蒙古及中東鐵路於不論，首先承認蘇維埃俄國云云。」（《京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這在當時可謂獨樹一幟。不過李是有依據的，早在該年的六月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就有正式的決議開展承認蘇俄運動，指示中共各區和各地方委員會，「亟宜聯合該地方一般團體向社會公開承認蘇俄的運動」（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第一七九頁）。同時在中共的理論刊物《嚮導》第四二期上，也有專文製造輿論，以便向正在與蘇俄談判的北京政府施加壓力。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的《「二大」和「三大」》記載，一九二二年十一月陳獨秀在莫斯科寫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目前實際問題之計劃》中，正式指示在外蒙古問題上：「我們不但應該消極的承認蒙古獨立，並且應該積極地幫助他們推倒王公及上級喇嘛之特權，創造他們經濟及文化的基礎，達到蒙古人民真正獨立客觀的可能。」

關於中東鐵路問題，加拉罕的第一次對華聲明最明確：「勞農政府願將中國中東鐵路及租讓之一切礦產、森林……與從前俄國軍官商人及資本家的侵佔得來者，一律無條件歸還中國，毫不索償。」注意其中的「無條件」和「毫不索償」的提法。過了一年，蘇俄已經稍稍站住腳跟，第二次聲明措詞就略有

變化：「關於勞農政府利用中東鐵路一事，中俄兩國允許另訂專約解決。」這裏就已經不是「無條件」了。一個政府的聲明反覆無常，真是形同兒戲。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日致越飛的信中，表現出他想不通，爲甚麼放棄沙皇的帝國主義政策，要放棄帝國主義掠奪去的所有權呢？他說：「剩下的就只有中東鐵路這一個十分敏感的問題。不管怎樣，反正至今我不明白，爲甚麼放棄帝國主義政策要以放棄我們的所有權爲前提。中東鐵路無疑曾經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但它也是我們在中國土地上的財產。況且如果鐵路轉入中國之手，它是一筆巨大的經濟文化財富。在這個意義上我完全不明白爲甚麼中國農民應當靠俄國農民的錢來擁有這條鐵路。……爲甚麼孫中山或者其他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就不能部份地逐步地補償我們爲中東鐵路投入的費用呢？中國人民不是要使用這條鐵路嗎？爲甚麼這就是帝國主義呢？」⑧顧維鈞在和越飛談判時，抱怨越飛狡猾，不履行加拉罕的聲明。現在的資料表明，越飛在中東鐵路和外蒙古問題上，都有報告要求放棄特權，以便換取中國的承認，打破蘇俄政府的孤立局面，但是蘇共中央委員會堅持帝國主義霸道政策，拒不歸還，使當談判代表的人棘手不堪。

蘇共中央如此堅持繼承沙皇俄國的掠奪成果，只有靠越飛以他的外交技巧來「虛與委蛇」，國共之間的「合作」，有甚麼真正的基礎呢？

至於反軍閥一層，也被有的史家列爲聯俄容共的基礎，根據現在解密的蘇聯共產黨的檔案揭示，蘇共與吳佩孚的關係相當深，若不是吳的代表參加西方主導的華盛頓會議，或者在外蒙古問題上堅持主權(哪怕爲了打張作霖)，自己在蘇俄與西方之間做出選擇，靠向西方；或因爲曹錕賄選失去人心，和直系內部馮玉祥的崛起，吳的力量變得軟弱，使蘇共不得不選中孫中山和國民黨。澳大利亞的梁肇庭對於蘇俄與吳佩孚關係的結束寫道：「然而，事過境遷，直系內部的派系紛爭解救了蘇俄，使她不再需要在孫中山與吳佩孚之間做出選擇。吳已從北京的政治舞台上撤下來了，他從主張和平統一政策轉向武力統

一。一九二三年，他全力經營南方，暫時置張作霖於不顧。曹錕與張作霖之間逐漸歸於和好。蘇俄本想與吳佩孚協作進行軍事行動，但這種計劃不能不束之高閣。吳佩孚從屬於曹錕，這意味着吳也不能與曹錕對學生和勞動運動的政策相左。一九二三年二月，吳佩孚槍殺京漢鐵路罷工工人，這樣，吳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合作宣告結束。」⑨是軍閥做出了選擇，是軍閥拋棄了蘇俄。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越飛請外交部門轉斯大林的電報，證明蘇俄政府在中國支持哪一個，不是憑甚麼馬列主義原則，而是自己的利益：「轉斯大林。現回答第九一號函件。我在這裏所做的全部工作都旨在利用吳佩孚、張作霖甚至孫中山的對抗情緒，雖然迄今爲止與吳佩孚和孫中山都有聯繫但還沒有向他們做出任何承諾。不過，同時還應該記住，在中國，似這樣的個人聯合一向是多變的。主要是吳佩孚與孫中山的接近，這很容易也有可能，可吳佩孚的影響是非常之大的。」⑩越飛的這句話非常重要，即「我在這裏做的全部工作都旨在利用……的對抗情緒」。根據現在公佈的檔案，足以使中國大陸的近現代史作一番極爲重大的改動，即中國軍閥的混戰，不僅僅有英國、日本作爲背景，還有蘇俄帝國主義插手。直系、奉系、廣州孫中山政府之間的錯綜複雜的三角關係老是不能解決，少得了蘇俄政府的插手嗎？蘇俄政府只顧保持昔日沙皇俄國的既得利益，讓中國的內戰沒完沒了，完全是一個新型的帝國主義。

並且，關於帝國主義的概念，孫中山與列寧根本不一樣，在觀念上的差別，除了極短暫的相互利用，很少有共同基礎。

蘇俄的反帝，是出於掃除擴張的障礙，是具體國家利益的需要；並且在列寧的理論體系中，列寧認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必然地要被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所代替，俄國革命是在帝國主義薄弱鏈條的突破，這是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之一；而孫中山先生只是就事論事，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已，

是基於民族主義。崔書琴說：「在比較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與俄共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提綱以後，我們可以發現二者有根本區別。中山先生根本不承認落後國家必定發生階級矛盾與不經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即可實現共產主義的說法。他自己的主張是，在中國實行階級協調，而可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去實現一個民生主義社會。」⑪民生主義的實現是通過協調，共產主義的實現是通過鬥爭，唯物主義認爲在宇宙中鬥爭是絕對的。只要稍稍比較一下，就可以發現二者根本不同。

並且，孫中山先生的反帝，是在晚年才出現的。之前，則一直尋求西方國家的支持。甚至在晚年開始明確反帝的時候，在臨去世之前不久，仍然沒有停止尋求西方的友誼。

辛亥年武昌起義成功的消息傳到美國時，孫中山並不急於回國，而是立即尋求西方在外交上的承認。他先後在華盛頓、倫敦、巴黎拜訪西方主要國家的政要，他認爲，太平天國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於外交的失敗。從此直到臨終前不久，他一直企圖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雖然他長期受到短見的西方政治領袖的冷遇。

孫中山三十年的政治活動，有將近十年在日本度過，並且他的革命生涯的開始，深受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日本的一些民間志士始終大力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是孫中山先生最好的朋友，所以和日本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但是日本的軍國主義在成長，官僚政客對待孫中山並不友善，辛亥革命以前就曾經和滿清政府勾結，强迫孫中山離開日本；後來支持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巴黎和會上又提出山東問題，侵犯中國的主權，引起全國的抗議，孫中山對日本也加以嚴厲批判；一九一八年，在廣州的護法軍政府排擠孫中山，孫中山被迫離開後，他繞道日本返上海，在日本，他受到外務省冷淡的接待，不批准他進入東京，因爲日本政府只承認北京政府。孫中山與日本政府的關係，是一部從希望到失望、到批判的過程。可是孫中山先生仍然對日本，作爲一個東方的文化實體，寄予很大

的期望。孫中山去世前不久，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神户發表了有名的《大亞細亞主義》的演講。他相信東方的「基於正義的道德文化」，一定能戰勝「西洋近世產生的以武備武力爲主的霸道文化」，中日之間「必須進而謀東亞民族的一大團結」。

孫中山對美國長期寄予希望，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孫中山致電美國總統威爾遜，希望美國不要承認北洋徐世昌，指出廣州的非常國會是合法的，但是被國務卿客氣地拒絕；孫中山並不因此灰心，仍然如以往，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持。就在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上海會見越飛的代表的當天，就與美國記者發表談話，希望能夠得到美國財團的支持，次日又致函聯絡美國駐華公使；因爲關餘問題與西方國家對立，在西方國家派出炮艇在珠江示威的時候，孫中山一方面表現不退讓，但是仍然對《字林西報》的記者表示，「列强若撤銷所予北京政府之助力，自不難挽回此舉」；由於關餘問題，西方各國派出十幾艘軍艦在廣州的珠江水面示威，以美國軍艦最多，形勢極爲緊張。孫先生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表致美國國民書，說他以美國爲榜樣的建立共和國之舉，曾熱切期望得到華盛頓和林肯的祖國的支持，而得到的是炮口對準廣州，孫先生在如此嚴峻的時刻，仍然沒有放棄對美國的期望；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孫先生同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談解決關餘問題，仍然對美國寄予期望，明確肯定要求美國干預中國事務，同中國人一道解決民族問題，使得在場的鮑羅廷得出結論，「國民黨至今還認爲，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非同列强合作不可，而恰恰是這些國家將中國置於半殖民地的地位，過去國民黨的知行觀中，就找不出一點認真地必須同帝國主義進行徹底鬥爭的表示，也看不到任何一次行動，表示國民黨把這一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甚至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將召開，聯俄容共的局面已經開始出現時，孫中山在一月十三日對美國記者談話時，把因爲關餘問題與西方國家的衝突說成是小事，對美國繼續寄予厚望，說「華人素信任美，如美國宣告將在上海或中立區標榜召開一和平會議，全國必響

之，各國必加入。」可是美國仍然使得孫先生大失所望。

就是對一直反對孫先生的英國，孫常常與之對抗，但是仍然稱讚英國的民主制度。在與越飛發表宣言以後不久，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派陳友仁、伍朝樞去拜會路過上海的英國駐華公使，以便能解除一些敵意。孫中山想以英國的力量，來抵銷日本的侵略，他曾說「倘英國佑我，則日本不能爲患矣」。

在孫中山先生的最後幾年，曾經兩度派密使去德國，試圖建立中、德、俄三國同盟。甚至在聯俄已經開始的時候，孫中山仍然繼續聯德，他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八日致函在德國的鄧家彥說：「中國以物資人力，德國以機器科學，共同合作發展中國之富源，改良中國之行政，整頓中國之武備。總而言之，即藉德國人才學問，以最速時間，致中國之富强。」⑫

蘇俄與英國等西方帝國主義，不僅僅有利害關係，在理論上，是絕對的、必然的鬥爭，資本主義一定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從來是勢不兩立的；孫中山只是受到英國、日本的現實壓迫，這壓迫隨時都在爭取解除，只要能夠解除立即是朋友。所以，孫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在設法與西方國家友好，爭取西方國家的支持，哪怕碰壁再碰壁。因爲孫中山先生除了少年時代以外，長期都接受歐洲式的教育，就是在革命的忙碌生涯中，他閱讀的主要書籍仍然是西方的，而不是俄國的。所以他說他的學說中的三個來源之一，是「規撫歐洲的學說事跡者」。

在反對西方帝國主義方面，蘇俄的確與孫中山之間有一點共同的需要，但是十分微弱。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反帝的調子的確高漲，這與鮑羅廷成功的權謀大有關係。

孫中山的聯俄，首先是爲了取得外援。沒有金錢，革命一刻也無法進行。孫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三月與美國人布羅克談話，强烈譴責西方國家對北洋政府的援助，他說：「如果沒有從外國政府那裏取得的支援，北京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一天，……對於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或其它强國的援助，我們已經絕望

了。……以某些跡象表示了幫助我們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國家，就是俄國的蘇維埃。」⑬就在這次談話不久的五月一日，越飛從日本致電孫先生表示：「我們準備向您的組織提供達二百萬金盧布的款項作爲統一中國和爭取民族獨立的工作之用。這筆援款應使用一年，分幾次付，每次付五萬金盧布。……我們還準備協助您用中國北方的或中國西部的省份組建一個很大的作戰單位。但遺憾的是我們的物質援助數額很小，最多只有八千支日本步槍、十五挺機槍、四門奧里薩卡炮和兩輛裝甲車。」西方反對孫中山，俄國支持孫中山，軍隊士兵每天要吃飯，國民革命急需要槍炮，能夠拒絕這援助嗎？

國民黨不可能按照俄國和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去反對西方，中共自己非常清楚。在一九二三年六月舉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馬林檔案中保存下來的原始記錄，張國燾在會上發言說：「將來，只有當英美帝國主義敗北，中國反對英美的國民運動才可望掀起。國民黨不可能同英美鬥爭，即使得不到英美援助，也是如此。如果國民黨開展反日運動，他們就能得到英美的支持，但將失去同盟者張作霖和段祺瑞。如果國民黨反對英國，他將成爲一個非法組織，這是國民黨不能接受的。」⑭張國燾還記述了孫中山先生不得不聯俄的行動：「孫先生在中國近代政局的演變中，始終是個失意者。列强對他的態度一直不夠友善。歐戰後，他曾草擬實業計劃，提出聘請西方技術人員並利用列强力量來開發中國資源的主張，遭受到列强當局的冷視。華盛頓會議時，列强也未接納他單獨派遣代表的建議。……尤其在內政方面，孫先生一直在與環繞他四周的政敵作軍事和非軍事的鬥爭，疊遭挫折。孫先生一直企圖獲得列强的諒解與支持，而外力卻總是支持他的敵對方面。他的親俄固由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爲事勢所逼成的。」⑮非常明顯，國民黨聯絡俄國，是逼迫出來的。就是他反對英美，也和蘇俄根本不一樣。

接受俄國的援助，是爲了得援助，沒有錢，沒有槍炮，反對北洋軍閥和統一中國的大業一刻也不能

進行，以三民主義爲指導的國民革命只有立即失敗。孫中山先生的聯俄，不可能泯滅他的理想與馬克思主義的差別。

中國國民黨黨史專家李雲漢，很透闢地分析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動機，最重要是「聯俄在於防患」：「所謂防患，即是防俄，亦即防共。分析言之，可有三方面的意義：一是防止中國疆土——外蒙古——被俄侵佔；二是防止蘇俄武力與北方軍閥的勾結入侵；三是防止由蘇俄移植中國之共產勢力的惡性發展。總之，中山先生之聯俄策略，不僅是制敵機先，抑且要彌禍未來；非但是絕敵奧援，直接是櫻其生路。」⑯李雲漢的證明很有力量，現在陸續發表的文獻，又進一步地證明了孫中山先生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和防範措施，故此不用重複贅述。

一九二三年三月八日，孫文越飛宣言發表後大約一個半月，蘇共中央委員會正式做出了援助孫中山的決定，有關條文如下：「關於中國……(c)認爲向孫中山提供約兩百萬墨西哥元的貨幣援助是可行的。(d)認爲必須經孫中山同意，向其派遣一批政治和軍事顧問。(f)指示越飛同志，政治局爲孫中山過分注重純軍事行動但忽略組織準備工作而非常擔心。……中央委員會書記斯大林。」⑰

蘇俄政治顧問來了，軍事顧問團來了，軍火只來了一船(因爲蘇俄在一九二四年與英國、日本的關係顯著改善，東方的地位開始下降，所以給廣州政府的軍火遲遲來了一船)。於是，直接由莫斯科主導，一場改變國民革命方向，篡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空前生死搏鬥，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始了。

這最初的三年，就是所謂的「聯俄容共」時期。

註釋：

①《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俄文版《編者前言》，第一卷，李玉貞譯，東大圖書有限公司發行，一

九九七年，台北。

②《汪精衛先生政治論述》(三)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頁，歡迎港僑之演說詞。

③《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一四六至一四七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

④《陳公博、周佛海回憶錄》第一二三至一二四頁，躍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中華民國七七年，台北。

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八四頁。

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一一六頁。

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一六七頁。

⑧《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一五九頁。

⑨《中山大學學報論叢》第六集，第七七頁。

⑩《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一一一頁。

⑪《孫中山與共產主義》第十九頁，崔書琴著，亞洲出版社，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初版，香港。

⑫《國父全集》第九二三至九二四頁。

⑬《孫中山年譜長編》第一六〇四頁。

⑭《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一七一頁，李玉貞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

⑮《我的回憶》第一六二三頁，張國燾著。

⑯《從容共到清黨》第一九二至一九三頁，李雲漢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民國五十五年，台北。

⑰《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一八二頁。

六、蘇俄陰謀初露

按照宣言，僅僅是加强宣傳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加强組織整頓，在黨內不會有任何風波。但是鮑羅廷到了孫中山身邊以後，在莫斯科的直接命令下，鮑羅廷不斷施行陰謀，企圖改變國民革命的性質，在孫先生危難時候搞蘇維埃，因此和孫先生以及忠貞的國民黨人之間，開始抗爭和衝突。

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發表改組宣言，宣佈時局主張，重申三民主義爲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爲制度之綱領，發表中國國民黨黨綱。次日，在上海召開改進大會，通過了黨綱和總章，成立中央幹部會議。孫中山先生在次日的上海國民黨人的改進大會上發表演講，談到了他的今後的宗旨，就是把黨務的改進，放到軍事、政治之上；黨務的改進，又以宣傳爲重點，他引用古話「得其民者，得其心也」來說明對宣傳的重視。他說：「現在的黨務進行，就是要恢復以前的革命黨的精神，發揮十幾年前吾黨先烈的精神，這樣做來，成功一定可靠。」「我們能夠宣傳，使中國四萬萬人的心都傾向我黨，那便是大成功了。」孫先生並指出俄國革命才幾年就成功了，就是因爲在宣傳上下了功夫。十幾年前的辛亥革命對於孫先生來說，是歷歷在目，爲甚麼那時就成功了，如今總是失敗呢？孫先生想通過讓全體同胞瞭解他的三民主義，來實現他的理想。

孫先生和中國國民黨的諸位領袖，哪裏想得到，同樣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國民黨發表宣言和黨章黨綱之時，第三國際的代表鮑羅廷和中共黨魁陳獨秀，已經給國民黨的改組擬訂了組織和財務方案，這實際是一個全面滅亡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方案。如果按照此方案做下去，蘇俄早就控制了全中國。這是

從存於荷蘭的馬林的檔案翻譯過來的：

檔案標題：《斯內夫利特(按：即馬林)與陳獨秀爲孫中山擬訂的中國國民黨改組計劃草案二件》

小標題：《中國國民黨改組計劃草案》

因爲太長，此處只是抄錄「國民黨的組織」部份第八、第九兩條，足以說明問題：「八、設立由黨的總理、組織部的三名部長和宣傳部的三名部長組成中央委員會處理日常事務。

九、組織部部長人選：張繼，廖(仲愷)

聯絡部部長人選：瞿(秋白)、陳(獨秀)、鄧(中夏)

情報部部長人選：S.T.劉

出版部部長人選：蔡(和森)

工人部部長人選：張國燾

農民部部長人選：于樹德

知識分子部部長人選：陳獨秀

軍事部部長人選：林伯渠

宣傳部部長人選：陳獨秀

通訊部部長人選：張太雷

上海支部部長人選：瞿 Tz.B(秋白)

廣州支部部長人選：譚平山①

這哪裏是國民黨的中央組織？全部的部長人選之中，只有兩個是國民黨員。這兩個中一個是爲中共大開方便之門的廖仲愷，一個是將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共分子介紹加入國民黨的張繼。才僅僅只有三百

多人的中共，妄想通過馬林這個計劃，一下就奪取國民黨領導權，如意算盤好不輕鬆！並且根據第八條，由總理和宣傳部、組織部的部長組成常務領導班子，中共黨員又是佔多數，從而又在蘇俄的控制之下。只是因爲馬林被鮑羅廷取代，才又是另一種計劃。

在鮑羅廷到來以前，在組織與宣傳上的改進已經在進行，只是因爲一九二三年的嚴峻形勢，進展緩慢。

陳炯明叛變以後，孫中山先生和中國國民黨總部都在上海的租界之中，改進的宣言也是在那裏發出，連立足點都沒有，可見處境的困難。在一九二二年的年底，孫先生與在上海的政學系的岑春萱達成了聯合反對陳炯明的協定。一月一日，滇、桂、粵軍的代表聯合發起了討伐陳炯明的戰爭，進展神速，勢如破竹，僅僅才半月，陳炯明宣佈下野，退居惠州，準備東山再起。廣州因此爲政學系的部隊沈鴻英所控制，政學系企圖進一步奪取政權。一月二十六日，沈鴻英發動「江防會議之變」，企圖槍殺胡漢民、鄒魯等。雖然未能得逞，廣州局勢出現新的動盪。孫中山不得不將返回廣州的日期延遲了將近一個月，即二月二十一日才抵達廣州。四月十六日，沈鴻英正式叛變，戰爭又起；五月，陳炯明再次起兵，與沈軍一起，分別從東江、北江進逼廣州。孫中山從八月二十三日離開廣州，進駐石龍，數度親臨前線，危險異常，中間只離開過四天，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回廣州主持大計。

這段時間，在爲政權的存亡的生死搏鬥中，改組仍然在進行。一方面是組織，一方面是宣傳。

孫中山先生任命居正、覃振、于右任、廖仲愷、戴傳賢、陳獨秀、張繼、謝持等二十人爲他的參議，做顧問諮詢之用。居正在《梅川譜偈》中記載如下：「任余等二十人爲參議，備總理諮詢、設計督導，爲上級幹部；而以事務責成中級幹部，任彭素民爲總務部長，陳樹人爲黨務部長，林煥庭爲財務部長，葉楚傖爲宣傳部長。」②原任的黨務部長居正、黨務部長謝持、宣傳部長張繼、總務部副部長陳樹

人、財務部副部長林業民則辭職；胡漢民、廖仲愷先後爲廣東省長；在孫中山先生抵達廣州以後數天，即三月二日，在廣州成立大本營，由譚延闓、鄧澤如等擔任各部部長；同月二十六日，委任謝持在上海代理國民黨本部總理，負責黨本部和總理辦公處；張繼爲中國國民黨北方支部部長。

國民黨的改組剛剛才開始，蘇俄的陰謀就開始暴露出來。

在一九二三年的夏天，在中共理論刊物《嚮導週刊》上，中共黨員張太雷、蔡和森等一再撰文，從中共的政治立場批評國民黨的不是，引起了孫中山的憤怒，揚言要開除陳獨秀，馬林記述道：「孫用漢語與廖仲愷談論一份關於錢的電報，但是他突然用英語說：像陳獨秀那樣在他的週報上批評國民黨的事再也不能發生。如果他的批評的語氣裏有支持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第三黨的語氣，我一定開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我就可以不接受財政援助。」③那時候，廣東的戰事正緊張，與陳炯明的勝負未定，身爲孫中山顧問(參議)的陳獨秀，如此在後面搧風點火，從而激怒了孫中山。孫中山顯然並非要真正開除陳獨秀，「突然用英語」，是要馬林帶信給中共，警告他們不要亂來。這件事情，也在蘇共遠東局兩個主要官員之間的通信中反映出來，這也可以看到是蘇共如何地朝三暮四，和已經開始的「合作」是多麼的脆弱：「當初霍多羅夫和馬林認定吳佩孚是個大好人，俄國應該與之聯合等等，他們就把黨拉着朝這個方向走，盡了一切努力，讓黨也唱這個調門。後來，現實生活拋棄了因吳佩孚而構築的這種海市蜃樓，黨又採取了另外的路線，開始抓緊孫中山的車輪。……明天說不定誰又喜歡上張作霖，認定要聯合他了。……事情發展到孫中山要把陳獨秀開除出國民黨的地步，就是因爲陳獨秀在《嚮導週報》開始批評國民黨的活動。」④雖然這寫信人和收信人都是蘇共中的聯合國民黨孫先生的反對派，但也說明蘇俄的確把聯合孫先生與其他軍閥等量齊觀，看上誰？聯絡誰？給誰援助？都是爲了自身，形同兒戲。

自從鮑羅廷在十月六日抵達廣州，他立即利用幾乎每天在孫中山身邊的機會，盡可能地巧妙地影響孫中山，並且大膽地趁改組重新加緊進行，實施他的陰謀，於是在廣州和上海兩次引起忠貞國民黨人的反抗；並且因爲前線軍事緊張的特殊環境，鮑羅廷企圖逼使孫中山立即實行蘇維埃政策，以便「拯救」國民革命，被孫中山先生巧妙地加以拒絕。

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先生委派胡漢民、鄧澤如、林森、廖仲愷、譚平山等九人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鮑羅廷爲顧問。起草宣言、黨綱、章程草案，同時辦理各分部的登記。臨時中央經常開會處理各種問題。鮑羅廷參加了制訂黨綱黨章等重要工作，在各個根本性的問題上去影響孫中山。國民黨的若干老黨人的政治警覺性和責任感，使他們仗義執言。

在鮑羅廷參加制訂的改組宣言發表前夕，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廣東支部長鄧澤如和林直勉等忠誠國民黨人十一人，向孫中山先生上書揭露鮑和陳獨秀的陰謀：「竊以本黨改組，其動機雖出自我總理之乾綱獨斷，惟組織法及黨章黨綱的草案，實多出自俄人鮑羅廷之指揮。然此表面文章，尚無大害。惟探聞俄人替我黨制訂之政綱政策，全爲陳獨秀之共產黨所議定。陳與蘇俄，本有密切之聯繫，其所組織之共產黨，爲蘇俄政府所給養。……不虞陳獨秀之共產黨，則利用此機會利用我黨矣。陳獨秀本爲陳逆炯明特別賞識之人，曾自言『寧死不加入國民黨』。並曾在學界倡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絕無學理的根據，指斥我黨爲落伍的政黨，總理爲過時的人物。今竟率其黨徒，群然來歸，……其大前提，則藉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其方略：(甲)則使我黨叢國際之仇惡，(乙)則使吾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乃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爲標語。……宣示世界，則我黨永無獲得國際上同情之一日，更我華僑黨人在海外無復立足之餘地……此次改組，陳獨秀欲藉俄人之力，聳動我總理，於有意無意之間，使我黨隱爲共產黨指揮，成則共產黨享其福，敗則吾黨受其禍。又黨章草案，定總理一

職爲選舉職，竊恐事實隨環境變遷，五年以後，將見陳獨秀被選爲總理矣。……思之實爲寒心！至蘇俄政府之協助我黨，與陳獨秀是否同一鼻孔出氣，黨員等未敢斷之，惟陳獨秀利用我黨改組，而實行陰謀，則凡黨員皆能共見矣。……要之奸人謀害吾黨，其計甚毒，不可不防。黨員第心所謂危，不得不揭發其詭計，密呈於鈞座之前，冒維陳詞。」⑤

鄧澤如是孫中山長期的朋友，南洋華僑，剛剛卸任的廣東省長，在任的國民黨廣東支部長。從來都是南洋華僑籌款的中心人物。護法運動中，經過鄧澤如的手發行的公債就達三萬多元。護法運動能夠支撐下來，在經濟上，主要靠南洋華僑的血汗捐贈；一九二一年秋，爲了支持北伐，著名華僑三十四人在廣州成立中央籌餉會，鄧澤如擔任收支幹事，起了重大的作用。鄧的作爲，代表了華僑的一片赤誠的心。現在，根據陳獨秀等長期以來的作爲，根據中共由蘇俄豢養的事實，以他們的銳敏眼光，向孫中山先生提出了意見。孫中山先生的批語雖然說明了陳獨秀並未參與起草的事實，但告訴鄧澤如，如果陳獨秀「不服從吾黨，我亦必棄之」。不過，孫中山並未回答鄧澤如等的幾個根本的問題，即：一、「藉國民黨的軀殼，注入共產黨的靈魂」。事實上，共產黨的主張在後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注入很多。二、將造成與各國關係的緊張，與國內實力人物關係的緊張，即外交上的孤立和國內聯合反對直系的政治關係解體。鮑羅廷當時正在變本加厲地進行，鄧澤如等言之有理。三、懷疑蘇俄政府與中共勾結。這本來是當然的事情，鮑羅廷在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致維金斯基的信中說，「我本人做任何一件事都一定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商量，我們配合默契」，可那時鮑羅廷才抵達廣州不久，還沒有抓住具體事實。鄧澤如等提出的這些問題，正是那以後國共發生摩擦的部份原因。這次上書因爲孫中山先生的出面而沒有造成進一步的政治影響，但是已經說明了國民黨領導階層最初的疑慮。

爲適應改組的需要，上海的總理辦公處和總理全權代表都在十月十一日一併裁撤，鮑羅廷和廖仲愷

偕同到上海。

居正在《清黨實錄・序》的記載，早在一九二三年冬廖仲愷自廣東到上海時，廖仲愷專門到鄉間楊行的住所向他解釋容共改組的必要，居正知道孫中山先生堅決，只好服從。但長期作爲孫中山先生的左右手之一的重要幹部，從此居住鄉間長達一年多，消極抵制容共之舉。李雲漢根據中央幹部會議的原始記錄記述，上海諸多孫中山的長期追隨者，此時也持異議：「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諸人，對於容共一事，亦多顧慮。……上海本部曾於十一月十八日及二十九日兩次開會討論此一重大問題。與會者在言辭間，對於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後之忠實性，多表懷疑。謝持乃擔任兩次會議之主席者，他主張『黨中不可有黨』，張繼主張『本部自應設上海，不宜移粵』，彭素民認爲『社會黨有社會黨之精神，未必可以完全服從於我』，張秋白擔心『若改組後隨處選舉，恐於黨原有之精神大相妨礙』……。中山先生爲對上海本部這些老同志說明改組及容共的本旨，乃令廖仲愷前赴上海解釋。」⑥這其中的張秋白是孫中山最初派往蘇聯參加會議，並且是國民黨人中唯一獲得列寧的接見者；彭素民是傑出的後起之秀，改組新上任的總務部部長；張繼是聯俄容共政策最初的積極推動者，與馬林、越飛開始的接觸都由他進行，中共的領袖們第一批加入國民黨都由他介紹；謝持是黨本部的主持人，孫中山的印信就由他掌握。他們全都提出異議，當然引起孫先生的重視。

戴傳賢是孫先生任命的負責改組的臨時中央委員，他拒不就職，而且給廖仲愷一再表示了反對意見。他認爲：「一黨有一黨之中心，亦有一黨之歷史地位，若失卻獨立之地位與組織之中心，必召他日無窮之紛擾，此乃集團之原則，絕不能違背者也。」戴在一九二五年底給蔣介石的信中，還透露這次改組的另外不大引人注目的動機：「而尤期期以爲不可者，則借款之一事，借款非不可，借小小之款，而事事時時受人之節制，絕非黨之福，他日必因此而大權旁落，不可挽回。故當日告仲愷以三點，一、決

不能借款作黨費，即借款亦須如舊日吾人借款之辦法，絕對自由不因借款而受牽制。二、共產黨加入，必須造成單純之黨籍，而不能存留兩個黨籍，以啓他日之糾紛。三、……蓋其時仲愷一心一意，欲圖黨之整理與改革，而爲財政所苦，故對於俄國財政援助之事，殊不敢毅然打消也。」

和廖仲愷同行的還有鮑羅廷，鮑羅廷的傳記作者寫道：「這時上海的國民黨改組工作的阻力很大，國共兩黨之間的關係也遠不如廣州的狀況。……因爲從十月起，『上海的一些國民黨員中出現了一股反對我們留在國民黨內的情緒。李守常同志還爲這件事去了一趟上海。看來，國民黨員中對我們加入國民黨產生了意見分歧，而且日趨尖銳』。這是指上海國民黨本部參議居正、謝持、張繼等人消極抵制的態度，他們頑固地堅持『黨中不可有黨』——反對接納共產黨員，堅持國民黨本部『仍設上海，不可移粵』。孫中山曾於十月十一日、十七日兩次致電上海本部，但居正等人仍然給上海地區的國民黨改組工作設置種種障礙。」⑦孫中山先生既寫信給上海的老同志，又由廖仲愷耐心加以解釋，大家都只好服從孫先生的乾綱獨斷。十二月九日，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舉行第十次會議，居正、張繼、戴傳賢、葉楚傖等出席了會議，由謝持主持，廖仲愷詳細說明改組的原因，並且選出汪兆銘、居正、張繼、葉楚傖、戴傳賢、胡漢民、謝持七人爲執行委員。

這裏不得不提到廖仲愷夫人何香凝等所謂老國民黨人，在中共統治下所發表的有關回憶，大多數是經不起推敲的宣傳，台灣最近的一本書中綜合這些回憶說道：「一次開會時，張繼反對改組，鬧得太厲害，孫中山要他的衛士馬湘把張繼帶出去軟禁一夜。參加國民黨一全大會的劉積學說，廖仲愷在上海召集各省在滬負責同志講解改組事，張繼反對最力，有一次張繼和田桐在孫中山跟前大哭大鬧，孫中山氣極了，以爲他們不可理喻，要拿手杖打他們，別人把張繼田桐拉走了。孫中山對謝持、鄒魯說：『你們不贊成與共產黨合作，你們可以不參加國民黨。』」等等。只要查一查文件就可以知道，廖仲愷到上

海傳達有關改組事宜，孫中山先生並沒有去，所謂張繼、田桐哭鬧完全是編造；所謂孫先生對謝持、鄒魯說的話，也同樣是編造的。因爲在改組以後謝持見孫先生只有三段時期，第一段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謝持是主席團成員之一，那時沒有國共的衝突；第二時期是彈劾共產黨案期間，謝持與張繼、鄧澤如提出彈劾案以後就生病住院，尤其在那時候，鄒魯在青年部長和廣東大學校長任內，對共產黨堅決抵制，但是從來沒有多言，孫先生不可能把他們二人叫在一起說這番話，他們二人那時也沒有任何政治上聯合反對中共的行動記錄；第三次見孫先生的面時，孫先生匆匆路過上海北上，鄒魯沒有隨行；孫先生最後的彌留時刻，記錄詳細，更不可能說那番話。大概是因爲西山會議的關係，鄒魯、謝持並列，所以中共編造宣傳材料時，不慎犯了以上錯誤。又例如：北京的近代史研究所宋慶齡、廖仲愷「研究」權威某某，在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第五版上，以近乎整版的篇幅發表「廖仲愷與國共合作」長文，其中說：「大會之後，右派仍然不斷掀起波瀾，孫中山採取果斷措施，將馮自由、馬素、謝持開除出黨，才遏止了這段鬥爭。」謝持在何時何地？在甚麼會議上被孫先生開除過？這兩位作者當然拿不出任何證據，所以沒有註釋材料來源。如果謝持真被開除了，怎麼可能與鄒魯、林森發起西山會議？這是常識。所以要將那些少數宣傳員，和許多嚴肅認真的史學工作者相區別開來，不然要上當。

一九二三年底，在陳炯明的部隊已經進逼到廣州附近，孫先生也一再到前線親自組織指揮軍事的危急時刻，鮑羅廷乘此提出蘇維埃化的措施來挽救危局，被孫先生巧妙拒絕。

十一月十二日，陳炯明的軍隊佔領石龍，孫先生從前線退回到了廣州，廣州城內一片慌亂。國民黨的臨時中央舉行第五次會議，在會議上，鮑提議立即召開各區黨部緊急會議，保衛廣州城。十三日的會議由廖仲愷主持，鮑羅廷發表講話，主張立即制訂法令，沒收地主土地並分配給農民。他說：「儘管國

民黨客觀上是有革命性的，但它至今仍然『懸在空中』，而沒有依靠某一階級或某些階級。主要由農民構成的廣東居民對待前線發生的鬥爭是消極的。最近在一些地方不時發生農民暴動。……你們是否考慮過，你們對中國未來偉大的信心是否足以使廣東的農民願意聽從你們？有一半農民在前所未聞的艱難條件下耕種極少的土地。他們不得不向地主們繳納很高的地租並向政府繳納重稅，以便進行對於農民來說完全莫名其妙的、在他們看來不需要的戰爭。直到現在你們還沒有做過任何一點幫助農民的事情，這樣，貴黨就失去了一個最重要的支柱。政府應當立即頒佈在廣東農民中分配土地的法令。我們現在不去詳細敘述這一法令的細節，但在法令中應當明確指出，地主的土地將予沒收，以利於實際耕種這些土地的農民；國家對這些土地的徵稅將考慮到發展農業經濟，而不是使之消滅。擺在諸位面前的任務是盡可能地召集數量衆多的黨員，騎自行車、開摩托車、划舢舨、乘汽車把這些法令帶到農民中去。」鮑還講到：「必須立即爲工人制訂社會法令……。」「必須馬上向小資產階級發出宣言式的法令，向他們明確指出將從這些法令中得到好處。這就將創造出一種條件，以致不是任何一個反動分子都敢於進攻廣東，因爲他們知道，他將遇到國民黨的三大支柱——農民、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的强有力回擊。」⑧

曾經在場聆聽鮑羅廷宣講此法令的一位華僑趙士覲，因爲持反對意見幾乎遭受迫害，他記載道：「是年(民國十三年)冬，鮑羅廷到粵，開第一次談話會於廣東財政廳頂樓，第二次會議國民黨粵支部。鮑主張立即宣佈耕地農有，士覲力持不可，面斥其非，甚爲劇烈。鮑羅廷大憤，謀諸親俄之某氏，向中山先生要求，將士覲槍斃，藉以箝制輿論。士覲復搜羅其種種陰謀，糾合國民黨粵支部職員及忠實同志，聯名密報中山先生，先生乃召士覲而密誡之曰：『汝與余從事革命工作十餘年，爲余之親信，余之外交策略如何，列强對余之態度如何，汝豈不知？處今日環境，汝其少安毋躁，俟其有軌外行動，余自有辦法制裁之也。』」⑨趙的「力持不可」，大概就是前面提到的不同意見之一，趙參加了緊接的以鄧

澤如爲首的上書行動。他所說的孫先生在等待時機予以制裁，透露出孫先生的警惕，孫先生的確拒絕了鮑的陰謀建議。但是爲甚麼仍然將鮑置於決策的核心部門呢？

鮑羅廷是第三國際的代表，他忠實地執行了一九二三年五月第三國際給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指示，即「全部政策的中心乃是農民問題」，「必須實行有利於貧苦農民的沒收土地政策」等等。根據這指示，中共「三大」的宣言指出：「鑒於中國社會各階級(工人農民工商家)之痛苦及要求，都急需一個國民革命；同時擁護工人農民在自身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疏忽的；對於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同時又有專門的「農民問題決議案」：「認爲有結合小農佃户及僱工以反抗宰制中國的帝國主義者，打倒軍閥及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紳，以保護農民之利益而促進國民革命運動之必要。」鮑羅廷提出的三點法令，其內容是蘇共指令的貫徹，但是在廣州政權最危險的時候提出，用的是暗渡陳倉的巧計；又恰恰是孫先生不在場，由廖仲愷主持會議和充當翻譯。廖自從在日本經過越飛的長期影響灌輸之後，已經失去了對三民主義的起碼理解，失去了任何對於蘇俄和共產主義的警惕性，所以當鮑提出這與國民革命格格不入的蘇維埃方針時，竟然沒有任何的批判駁斥，還聲稱將去請示孫先生，次日就會正式頒佈。

如果第二天真的頒佈了，廣州立即會成爲一九一七年的彼得堡或莫斯科，整個社會就會有翻天覆地的空前混亂……。

但是第二天，廖仲愷消失了；第三天，仍然不見人影，鮑派通訊員帶着信去孫先生的大本營，信中寫道：「各區黨部委員於十四日晚通知各區黨部，政府同意頒佈三項法令，會議等候政府做出最後決定已經是第二天了。雖然十一月十三日廖仲愷代表政府要宣佈法令，但他接連兩天都未出席會議。鑒於必須嚴肅對待國民黨正在廣州展開的這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我請求立即派您的代表前來以便繼續各區黨部

已經開始的會議。」又等了一陣，廖才來到等待頒佈法令的區黨部委員會，最關鍵的是，他並沒有帶來孫大元帥簽署的任何法令。會上也有人表示對「蘇維埃化」的擔心。廖含糊地說，鮑提出的三項法令並未付諸實施，只是一項活動的基礎。⑩

十一月十六日清晨七點鐘，孫先生召見鮑，孫先生談到法令時說：「我依然同意實行勞工法和關於改善小資產階級狀況的社會法令。至於土地法，我建議先與農民進行聯繫，弄清他們的需要……。」孫先生還說：「如果我支持該法令，就會得罪海外的和國內的擁護者，蘇維埃化的結局對這些人來說是非常現實的。但我準備接受鮑羅廷法令中的某些部份，即影響城市工人的部份。至於土地改革，我要在決定之前和農民商量。」⑪這番談話以後數日，孫先生親自帶領部隊與陳炯明部隊進行了激烈的血戰，擊潰了敵人。鮑羅廷立即實行蘇維埃革命暴動的政策，也就不了了之。

分析起來，孫先生在危急之時能夠拒絕鮑的誘惑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一定會拒絕。因爲孫先生的土地政策的構想，與蘇俄根本不一樣。

「耕者有其田」的明確提出來，是在去世前一年的民生主義的演講中：「照道理來講，農民應該是爲自己耕田，耕出來的農品，要歸自己所有。現在的農民，都不是耕自己的田，都是替地主來耕田，所生產的農品，大半是被地主奪去了。這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我們應該馬上用政治或法律來解決。」和共產黨人最大的不同，是在解決方法上，即如何實現「耕者有其田」？孫先生主張用「政治和法律來解決」。基本政策是國家用贖買的辦法取得土地，對少數不納稅的土地予以沒收，或將新開墾的土地發給農民。總之，由國家將土地「授」給無地的農民，進行和平土改。而蘇共和中共都是採用清算鬥爭，甚至從肉體上消滅地主的暴力土改。

鮑羅廷的那一套方法，是階級鬥爭的方法，以爲歷史的一切進步，都是由鬥爭得來，根據馬克思的

規定，不承認這點，就不是共產主義者。

而孫先生呢？一九二四年，他在民生主義的演講中，批判了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認爲階級鬥爭是歷史前進的動力，孫先生的學說正好相反，他說：「社會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所以要調和，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得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孫先生不是一個隨便起於草莽的人，是博通中外的大學者，有自成體系的三民主義學說；他洞悉馬克思主義的缺陷，根本反對階級鬥爭，他怎麼可能隨着陰謀家的指揮棒亂轉呢？

並且還有很大不同的一點是，孫先生搞的是精英政治。即依靠社會的先知先覺者，去訓導和啓迪後知後覺者，所以有《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的軍政、訓政、憲政幾個階級的構想。他非常深刻地認識到，中國歷史上的專制不能夠達到普通的人民，政府只管納糧，並不去理會普通百姓的生活，所以孫先生在《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的演講中指出，「大家都有自由，便是一盤散沙，要大家結合成一個堅固團體，便不能像一盤散沙」，他認爲歷史造成了普通百姓的奴隸性，「實在不易改變」。訓政，就是要由精英們去改變這種散沙似的狀態，去開啓民智，讓後知後覺者的認識提高。這顯然需要時間，需要一個歷史過程，所以孫先生總是走的所謂「上層路線」，通過上層對社會力量的縱橫裨闔，同時向下層宣

傳三民主義，逐漸聚集社會力量。

但是，蘇共和中共對待廣大百姓完全不同。在理論上，把百姓抬得很高，說勞動者或工人階級是歷史前進的先鋒、主力軍之類，共產黨則是這先鋒力量的體現。在實際做法上，特別對農民，就是用具體的物質(如土地)去利誘農民，煽動他們心目中的卑劣的貪婪的慾望，去用暴力搶奪地主的土地，造成傳統社會從根本上動搖，讓天下大亂，讓暴力成爲共產黨的基本能量來源。等到依靠勞動群衆把政權奪到手，再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運用軟硬兼施的政權力量，把農民的土地再奪取回來，蘇共和中共都是這樣做的。蘇共、第三國際、中共和他們的代表者鮑羅廷，正是千方百計促使孫先生這樣做。只是孫先生在這最根本的問題上沒有上當，雖然付出了非常慘重的代價。

現在根據蘇俄最近解密的檔案材料，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鮑羅廷是如何包藏禍心，去影響孫先生的決策，以及在土地問題上的真正企圖。

鮑羅廷在十二月十日關於他在華南工作的報告中透露，他剛剛與孫先生見面的時候，孫先生的問題側重於軍事，可是鮑的回答總是側重於政治；每週鮑都有機會與孫先生談幾次話，孫先生總是把話題引到軍事上去，鮑則敘述同樣的改組話題；鮑認爲，「孫中山和我們上面提到的那些國民黨人，因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理論與實踐脫節之苦，目前還不是、今後長時期內也不會是能夠領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唯一力量。我正式從這個觀點出發着手我的工作的。」這一段話非常重要，即鮑認爲孫中山和國民黨以外「另有高明」領導中國，當然就是中國共產黨，鮑自述他的工作的出發點就是爲中共作爲領導力量鋪路，以後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鮑緊接着說：「兩個月來我在這裏的全部工作就是說服他們，讓他們知道迄今爲止他們所用的鬥爭方法是不會有好處的，必須從根本上改變。當然，我做得很謹慎，盡可能地掌握分寸。」⑫鮑羅廷的主張國民黨改組的「苦口婆心」的做法，都是爲了「從根本上改變」國

民黨，以便讓「另外的力量」代替國民黨，但是做得「謹慎」和「掌握分寸」。多麼陰險狡詐！孫先生本人也在被欺騙之列。

如果再看一看在土地問題上，蘇俄駐中國全權代表加拉罕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給鮑羅廷的絕密的信件，就可以知道蘇俄試圖利用土地等法令以便毀滅國民革命，是何等的令人觸目驚心。這封長信有好幾千字，僅僅摘錄其中的一小段：「如果孫實行土地法令和其它旨在滿足工農要求的法令，那他肯定就行不通了。只消一個土地法令就夠了！土地法令在一定意義上就是廣東省內的一場革命，也不排除它會因此而導致內戰。如果沒有外來干涉，國民黨將會贏得這場鬥爭，這就意味着農民在奪取土地的鬥爭中獲得勝利，而這一場革命性的變革的勝利則肯定引起農民起義，將不僅波及廣東的相鄰省份，而且會擴展到印度支那，如果孫中山的影響再擴大時，起義還會波及英國領地。資產階級國家對這類事情的戒心總是非常之大的，遇有危及他們統治的任何危險，他們會連根鏟除。如果知道鮑羅廷在改組國民黨，那就等於說是鮑羅廷在炮製一個個法令，並且領導着廣州的『布爾什維克化』。」⑬蘇俄的陰險的代表顯然明白，只要實行土地法令，整個國民革命的性質就變成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中國國民黨也就變成了實質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大地上將立即開始一場階級戰爭，天下將大亂。最後各種政治力量將聯合起來，甚至加上英國等列强的武裝干涉而將國民革命撲滅。

何其危險！

孫先生雖然巧妙地拒絕了鮑的詭計，卻仍然將鮑羅廷留在身邊，繼續當他的顧問和國民黨的訓練員。孫先生不僅僅在等待俄國的武器援助——這是唯一可能得到的國際援助，還要將蘇共的黨的組織方法、軍隊的政治工作方法，以及國民革命怎樣和群衆的需要聯繫起來；還要將幹練的中共黨員們，納入國民革命的事業中。

孫先生看中了蘇俄的方法，想利用之；蘇俄爲了向東方擴展的需要，爲了打破西方國家封鎖的需要，想利用孫先生，首先要改變中國國民革命的性質和內容。另外一本當事人的回憶錄，記述了鮑羅廷自述如何利用孫先生：「要改組國民黨，沒有孫中山，我認爲也不行。應當利用他的左傾、他的聲望和他的建黨願望，並激勵國內真正革命分子，把他們集合在國民黨內確實存在的左派週圍。唯其如此，孫中山才有可能根除以往組織上的渙散，克服思想上的懈怠，全心全意依附於真正的革命運動。」⑭現在解密的蘇共檔案中，有鮑向蘇共中央的報告，內容基本相同，但是更包藏禍心，摘錄出來，可以證明上面引證的可靠，也可以看看鮑的十分可怕而又極爲卑劣的詭計：「我還認爲，黨的改組離不開孫中山。要利用他的左傾，利用他的威信，利用他的建黨願望，把國內的真正革命分子發動起來，把他們集結在國民黨的左派週圍。到那時，孫中山就應該同過去的組織混亂和思想渙散決裂，全心投入真正的國民運動，或者他垮台。到目前爲止，我對孫中山做的事，就是爲了加强國民黨左派，就是爲了國民革命運動而加强其左翼，盡可能挽救他……有時候，我就覺得，這個老謀深算的人，無論你怎樣幫助，他終究還是矚目於他的那些『自由民族』，等待他們來救中國。」⑮

俄國人心目中的「左傾」，大概就是孫先生在英國和日本的短視的、野心的政治家的逼迫下的反對英國、日本等帝國主義的立場，在經過鮑的影響以後，在最後一年才稍微明確起來；是孫先生反對軍閥的立場，蘇俄是利用前面提到的孫、吳、張的三角關係，而在外蒙古和中東鐵路問題上漁利；是孫先生對勞工和農民的同情，孫先生是力圖設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用調和的方法進行，但蘇俄是發動階級鬥爭，利用勞工，在混亂之中扶持中共，奪取權力。

利用孫先生的聲望，是讓實力弱小、毫無名聲的中共，處處以國民黨的名義做事，如鄧澤如等指出的，失敗就歸於國民黨，收利則共產黨，使得中共非常迅速地壯大成長。

利用孫先生的建黨願望，就是利用國民黨渙散和過分自由的毛病，按照蘇共的組織方法使其強大起來，但是乘此在每一個重要部門都安排中共黨員去擔任職務，使得中國國民黨完全被中共和第三國際所控制，即鮑所說的他的全部工作都是「爲了加強國民黨左派」。

鮑還在這裏透露其惡毒用心，即要不然孫先生按照他的安排，變成他心目中的「左派」，把國民黨變成實際的共產黨；要不然「垮台」，二者居其一。但是也從報告中顯示孫先生不爲其用的「老謀深算」。

鮑羅廷的確如此做了。

於是，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際，展開了新的一場角逐。

註釋：

①《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二〇〇頁，李玉貞等譯，《光明日報》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

②《清黨實錄》序，居正著，大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第三輯，沈雲龍主編。

③《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第二九四頁。

④《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二二〇頁，李玉貞譯，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民國八六年，台北。

⑤轉引自《國父年譜》第九七九至九八〇頁，中華民國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出版，中華民國五四年，台北。

⑥《鮑羅廷與中國革命》第九六頁，丁言模著。

⑦《從容共到清黨》第二二七頁，李雲漢著，中國學術獎助委員會出版，民國五五年，台北。

⑧《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第四〇至四三頁，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⑨《從容共到清黨》第二二二頁，李雲漢著。

⑩《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三一五頁。

⑪《孫中山集外集》第四一八頁。

⑫《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三〇二頁。

⑬《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三一五頁。

⑭《加侖在中國(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第二九至三〇頁，卡爾圖諾娃著，林蔭成、姚寶珠合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北京。

⑮《聯共、共產國際在中國》第三五二至三五三頁。

七、國民黨「一大」的內在矛盾

關係到中國前途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衆所週知，是在孫中山先生的直接領導下召開的。但是，這次代表大會也是在第三國際和鮑羅廷的陰影下進行，鮑强有力地影響了大會宣言，修改了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所以宣言的本身就是一個三民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奇怪的折中綜合物，包含了許多蘇俄的精神。蘇俄駐北京全權代表加拉罕向莫斯科報告大會的情況時，欣喜之情洋溢於表：「宣言、黨綱、黨章，都很新鮮，由三部份組成：第一部份——檢討過去的工作和批評中國各軍閥派系的混戰；第二部份——最重要的一個部份——國民黨三民主義的全貌。『民族主義』那一條很新奇：是按照共產國際宣言的精神措詞的，其中闡述了民族主義鬥爭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反對壓迫中國不讓中國民族獨立的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通過給中國境內少數民族以自決權，讓他們獲得解放，而且這一條還把上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十一月八日決議的相應段落加以發展。民權主義也來源於前述決議。至於『民生主義』它也是以那個決議爲基礎，但據中國情況做了一些改變。……至於黨章，它像我們黨的、共產主義政黨的章程。」從加拉罕的報告，可以證明這是蘇俄在中國的一次勝利。毛澤東也在一九四二年他的名著《論新民主主義》中稱讚道：「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所解釋的，是新的三民主義，在這以前是舊的三民主義。」現在新出的蘇俄檔案告訴我們，毛澤東恰恰稱讚的是鮑羅廷加進去的蘇俄意見。

在組織方面，鮑羅廷並沒有成功，主要的中央委員仍然是孫先生長期的追隨者，監察委員個個反

共，監視着中共黨員可能的越軌行動。這樣的中央委員會自然不可能去實行第三國際的主張，部份體現俄國精神的宣言只是一紙空文。

孫先生和鮑羅廷之間、國民黨和第三國際之間的彼此利用和鬥爭，彼此互有進退，體現着「一大」的內在矛盾。

現在簡要追溯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有關決議，再看一看鮑羅廷如何將此强行加入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之中；其次則看一看孫先生及其追隨者如何抵制、如何退讓，以及如何地折中妥協做成宣言；大會閉幕以前，通過了一個甚麼樣的中央委員會。

鮑羅廷給他的上司的報告中說，他在中國的工作，是按照第三國際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決議「相同的精神進行的」；《宣言》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份，是在蘇俄政府駐北京代表加拉罕的直接指令下，與孫先生等經過激烈爭論，强行把蘇共的意圖加入的。

一九二三年五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說：「我們應當堅持過去的立場，即『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國民革命』。……共產黨必須不斷地推動國民黨支持土地革命。在孫中山軍隊佔領的地區，必須採取有利於貧苦農民的沒收土地及其他一系列革命措施。……另一方面，我們應當在國民黨內部竭力反對孫中山與軍閥的軍事勾結。……爲了防止國民黨(特別是孫中山)發生類似的傾向，中國共產黨應當要求盡快地召開國民黨代表大會。」②

半年以後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又就此正式作出決議，就三民主義的每一主義，擅自作出解釋，鮑羅廷則將這共產國際的解釋塞入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之中。此決議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民黨依靠國內廣大的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各階層，爲反對世界帝國主義及其走

卒，爲爭取中國的獨立而鬥爭。……這個主義的另一方面應當是，中國民族運動同受中國帝國主義壓迫的各民族的革命運動進行合作。……國民黨應公開提出中國境內各民族自決的原則，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軍閥制度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後，這個原則就會體現在由以前的中華帝國各民族組成一個自由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國民黨在向群衆灌輸民權主義的原則和解釋其含意時，應使其有利於中國勞動群衆，即只有那些真正的反帝鬥爭綱領的分子和組織才能廣泛享有一切權力和自由，而決不讓中國那些幫助外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卒——(中國軍閥)的分子和組織享有這些自由。」「民生主義，如果解釋爲把外國工廠、企業、銀行、鐵路和水路交通收歸國有，那才會對群衆具有革命化的意義，才能在群衆中得到廣泛的反響。……必須向缺乏土地的廣大農民群衆說明，應當把土地直接交給耕種這塊土地的人，消滅不從事耕作的大土地佔有者和人數衆多中小土地佔有者的制度。」③鮑羅廷正是利用他參與修改宣言的機會，用一切方法將第三國際的意圖塞入宣言之中，按照蘇俄的意識形態理論來解釋三民主義。鮑羅廷的目的竟然基本達到了。

最後參與制訂宣言的有五個人：胡漢民、汪兆銘、鮑羅廷、瞿秋白、廖仲愷。孫先生爲了讓國民革命像俄國革命一樣迅速獲得成功，爲了讓中國國民黨像蘇共一樣有戰鬥力，竟然讓鮑來參加中國國民黨的「根本大法」的制訂，正好就給鮑以機會來影響國民革命的前進方向。根據蘇共中央檔案中鮑羅廷自己的筆記(見《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一一號文件，凡以下出自該材料的引文都不再標明出處)和《會議史料》上，在制訂《宣言》的過程中，基本以代表孫先生意圖的胡漢民、汪兆銘爲一方，代表蘇共的鮑羅廷爲一方，廖仲愷時常支持鮑的意見(鮑的筆記說「廖仲愷支持我」)，瞿秋白自然支持鮑，但是他主要充當翻譯。所以，在制訂過程中爭論很激烈。

《宣言》的第一部份是對辛亥革命以後的歷史的回顧，沒有引起甚麼爭論。這回顧把袁世凱死後中

國社會的混亂現象，歸之於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勾結：「凡爲軍閥者，莫不與列强之帝國主義發生關係。所謂民國政府，已爲軍閥所控制，軍閥即利用之，結歡於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資以大借款，充其軍費，使中國內亂糾紛不已以攫取政權。」（《宣言》原文都引自《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以下不再標明出處）這樣的現狀，使得鏟除帝國主義和軍閥成爲了國民革命的目標，也給蘇俄的東進帶來了機會。

《宣言》的第二部份是《國民黨之主義》，分別就三民主義的每一主義做出解釋，這是國民黨的整個精神所在，是爭論的中心。

「㈠民族主義。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第一方面，國民黨之民族主義，其目的在使中國民族得自由獨立於世界。……其所恃爲後盾，實爲多數之民衆，若知識階級、若農夫、若工人、若商人而已。蓋民族主義，對於任何階級，其意義皆不外免除帝國主義之侵略。」關於民族主義的含義引發了激烈爭論。

鮑羅廷認爲民族主義一定包括階級鬥爭，他在報告中記載：「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概念，即使國家擺脫帝國主義而獲得解放，同時還擺脫本國的剝削而獲得自身的解放。這是無可爭辯的。只要國民黨還不理解這一點，它就不可能成爲一個真正的國民革命的政黨。」即是說，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同時，必須在本國反對一切剝削者的蘇維埃革命，不然就不能夠算作鮑的民族主義政黨。所以在寫作討論《宣言》的過程中，鮑一定要在民族主義中加進階級鬥爭的政治和經濟內容，或者將「勞動界」作爲民族解放的主體力量；廖仲愷也加以附和，主張民族主義不僅要反對外國資本家和帝國主義，還進一步要反對本國資本家。這樣做，實際是利用民衆的力量，在中國掀起蘇維埃式的革命。

胡漢民和汪兆銘則主張用模糊的詞句，因爲國民黨是代表各個階級的。這一條最後用了胡漢民、汪

兆銘的意見，用含糊的「民衆」一辭，以代替階級：「故民族解放之鬥爭，對於多數民衆，其目標皆不外反對帝國主義而已。……蓋惟國民黨與民衆深切結合之後，中國民衆之真正自由獨立，始有可望也。」雖然排除了階級論，但是已經將反對帝國主義作爲民族主義的首要內容。這一方面是鮑的作用，可也是在關餘問題上，外國的十幾條兵艦成列廣州的珠江河面，除了挺身面對，別無選擇，蘇俄則正好加以利用。如此明確的反帝主張，在孫先生是第一次。但是在十幾天以前，孫先生剛剛與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做了既强硬又仍然抱着希望的談話，這談話，據鮑羅廷的筆記，是很不高興的。

民族主義的第二方面，鮑就把蘇俄的意圖，即列寧的所謂「民族自決」塞了進去，以便佔領和分裂中國的土地。在「一大」開幕前的大約兩個月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的建議》說：「國民黨應公開提出國內各民族自決的原則，以便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軍閥制度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後，這個原則能夠體現在以前的中華帝國各民族組成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上。」姑且不論其它，這個受蘇共中央直接領導的共產國際，爲了蘇俄的國家利益，竟然一再決定中國的治國原則和國體，本身就是一種侵犯中國主權的帝國主義行徑。他們不但做了決定，而且讓鮑羅廷貫徹了。蘇俄帝國主義有多猖狂呢？在上述決定後幾天(十二月四日)，蘇俄外交部長竟然以教訓的口氣寫信給孫先生：「國內各民族，如蒙古族、藏族以及中國西部各民族，需要清楚地知道國民黨是支持他們自決的。所以，你不許在這些地區動武。」④蘇俄和其代表鮑羅廷，通過中國共產黨，直接成功地插手中國的國民革命。中國在今後好幾十年的空前的民族苦難，都是和這裏分不開的。

宣言的第二方面說：「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所謂「民族自決權」，是針

對所謂殖民地、半殖民地而提出，主張一個民族不受外來干涉，決定本民族事務和命運的權力，實則爲大俄羅斯統治各個民族作掩護。例如蘇俄在一九二二年派兵侵佔外蒙古以後，原來蒙古的王公和一些上層喇嘛仍然擁護中國政府，他們之中的逃出來者，被迫在中國流浪。蘇俄以武力扶植了傀儡政權，卻以人民的名義要求民族自決，要求獨立，說原來的上層人士不能代表蒙古人民，實則使之成爲了蘇俄的新型殖民地，這已經被歷史所證實。蘇俄在這裏加上了「民族自決」的字眼，就是爲了讓外蒙古、西藏等從中國分裂出去製造理論根據。鮑羅廷主張把民族自決作爲一個聯邦共和國的原則，汪兆銘根據孫先生的意見，肯定將來首先是統一的共和國，西藏、蒙古都像各省一樣，是統一共和國的一部份，在此基礎上與各省一樣獲得平等的自治權，根本不是聯邦制的共和國。但是做了退讓，承認在統一以後實行自決。鮑對此並不滿足，他當着孫先生的面說，外蒙古人民因此對國民黨不滿意，怎樣才滿意呢？現在就自決，即讓蘇軍佔領下的蒙古獲得權力獨立：「眼下少數民族對國民黨的宣言持不信任態度並非沒有理由。到目前爲止，蒙古人民革命黨認真考察了國民黨的文獻、聲明，主要是國民黨的活動後，還不能對它持完全信任態度。……如果在本宣言的基礎上，成立一個真正得到廣大民衆信任的政府，那當然就完全另當別論了，到那時……蒙古人才有可能同這樣的政府商談共同行動的問題。我這番話當然是根據我掌握的關於蒙古革命運動的材料說的。」這邏輯是，只有同意「獨立」，才可以信任，才能夠談判；現在要先統一，就不能夠被信任，就只能夠先「獨立」，也就是無論如何都要脫離中國。在蘇軍佔領下的蒙古在次年真的宣佈「獨立」了。

鄒魯編撰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仍然是一部經典之作，其中的中國國民黨「宣傳」部份的「註釋九」，保留了孫先生和國共領袖們對「民族自決」的重要見解：「十二年時，共產黨陳獨秀等聯名函請總理用國民黨名義許外蒙獨立，總理指責之；十四年總理逝世後，俄大使加拉罕及鮑羅廷約國民黨員吳

稚暉、于右任、戴季陶、鄒魯等往俄大使署，與外蒙所謂執行委員、外交總長等會晤，座中尚有共產黨李大釗等。援引總理『民族自決』語，與共產黨陳獨秀等，一致請許外蒙獨立。鄒魯援總理民族主義演講：『民族自決起來，組織中華民國政府；非民族自決獨立起來，分割中國。會散，鄒魯引戴季陶私語曰：『蘇俄欲我承認外蒙獨立以附他，不可者。』戴曰：『總理在時，我曾主張許外蒙獨立，總理不許。今果見諸事實。』」

鮑羅廷的筆記之中，珍貴地保留了作爲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毛澤東的民族觀，他比其他的共產黨人走得更遠，認爲不僅僅是外蒙古，連帶新疆(他稱爲「中國的土耳其斯坦」)、西藏(因爲英國要攫取而稍緩)都應該獨立。在出席國民黨「一大」的中國共產黨黨團的內部會議上，毛澤東說：「關於第一條即少數民族問題，要提得更明確些。現在無論是當地資本家，還是美國或別的甚麼國家，都想把蒙古和其它地方攫取到手。因此，應當明確規定國民黨給他們哪些權力，不要再援用舊觀念說這些民族屬於中國。我並不懷疑對此問題總的提法，只懷疑某些細節。關於國民黨(原書的編者註釋：『原文如此，顯然指蒙古』)和中國土耳其斯坦(原書的編者註釋：『即新疆』)，現在我們當然認爲，他們享有自決權，因爲我們與俄國處於共同的戰線上。至於西藏，『自決』的口號可能爲英國人所用，因爲我們對西藏暫時還鞭長莫及。」(《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三七八頁)如果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蒙古、西藏、新疆都依附於蘇俄獨立出去，中國就不成其爲國了。不過毛澤東不會想到，他的發言在蘇共的檔案中保存下來了。

因此可以看到，「民族自決」的口號在當時是多麼時髦，以致於孫先生不得不讓步，聲稱在統一以後再自決，但這讓步並沒有改變或緩和蘇俄立即鯨吞外蒙古！「聯俄容共」一開始，就以中華民族受到巨大的損失拉開帷幕。

《宣言》「本黨之主義」部份，其次是「民權」：「㈡國民黨之民權主義，於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即爲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復決、罷官諸權也。民權運動之方式，規定於憲法，以孫先生所創立之五權分立的原則，即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分立是也。……近世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爲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殊科。而唯求所以適合於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唯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予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之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網民以效忠於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爲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權利。」

孫先生《三民主義》的演講中說：「中國的革命思潮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之學說也是從歐美來的。」孫先生根據歐美在實行中的問題，在民權主義中加以改進，即將權與能分開，根據中國政治制度傳統中的優秀部份，在西方的三權之外加上考試和監察兩部份。

法國盧梭(Jean Jaequos Rousseau)的「天賦人權」論在法國大革命中影響極大，進一步又影響美國的《獨立宣言》；中華民國元年的宣言，連一些措詞，都可以看到直接來自歐美。但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在鮑羅廷的參與下，首先就將其與「天賦人權」分開，失去了人人自由平等的源頭，而將階級論加入，聲稱「近世各國」民權已爲資產階級所專有，這就完全背離了法國和美國的民權精神；進一步，則主張「民國之民權」則只能給一部份人，這就像幾十年以後毛澤東在他的《論人民內部矛盾》中所說的一樣，只有「人民」才能享受民主，「人民的敵人」只有被專政，可是「人民」的定義由誰來下？

雖然如此讓步，鮑羅廷仍然在他向上級的報告中，對孫先生盡其辱罵、諷刺之能事，而孫先生是給

予他以信任和崇高的地位的人。鮑報告道：「民權主義，是國民黨人從美國那裏抄來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外加兩項權力，源自中國歷史。這樣從『先進國家』抄來，經過改頭換面的憲法，也說成是孫中山的發明，寫在國民黨的黨綱、宣言和演說之中。在英、美等國生活過的國民黨人，不會沒有看到現實與成文憲法之間的矛盾。但是，他們認爲造成這一矛盾的原因不是社會的不公，而是憲法自有缺陷。只要在『先進民主國家』憲法中，加進考試和監察之權，就可以在社會上『防止一切流弊』。……他們對『先進民主國家』情有獨鍾，認爲可以把這些國家的制度及其憲法移植到中國來。」鮑說得對的地方，是孫先生深受西方思想影響，「對『先進民主』國家，獨有情鍾」，這使得鮑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束手無策。

有幸的是，在大會閉幕以後一個多月，孫先生發表他的《國民政府建設大綱》，系統地拋棄了宣言中有關的俄國精神，此是後話。

民生主義部份分爲兩段，第一段是講原則和溫和地實行，基本是孫先生的學說和主張：「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爲少數人操縱。故當由國家規定土地法……於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爲私人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並且具體提出興辦農民銀行使農民得到貸款，爲失業工人發放救濟，等等。

孫先生曾經說過，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分別，是方法不同。因爲非常遙遠的理想境界，無論是宗教的或政黨的，描寫起來，總是美好。關鍵在實現的方法。共產黨的革命方法有兩個特徵，第一是階級鬥爭，第二是暴力革命和專政，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規定，要承認兩者，才能算作馬克思主義

者。毛澤東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全面貫徹這論點，那時批鬥人、整死人時被引用得最多的「毛主席語錄」是兩條：「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另外一條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毛顯然是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真諦。不管是蘇共還是中共，其理想天堂永遠虛無縹緲，而現實生活永遠是在極爲血腥的「實行方法」之中。

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卻着眼於現實生活的和諧，着眼於百姓的生存問題，社會有了毛病，就醫治，而不是加劇惡化。孫先生在《民生主義》的第一講中說：「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生存爲重心，那才是合理的。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所以在廣州被南北軍閥壓迫下的極爲艱難的日子中，孫先生並不因爲需要社會中各種力量的支持，就用動聽的許諾去拉攏和欺騙工農，讓他們流血，去主張階級鬥爭。而是在宣言中堅持他的民生的階級調和的理念。

但是在鮑羅廷的堅持下，宣言中「民生主義」的第二段加入了一些暗含階級革命的內容：「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蓋無可疑者。……蓋國民黨現正從事爲反帝國主義與軍閥，反抗不利於農夫工人之特殊階級，以謀農夫工人之解放；質言之，即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亦即農夫工人爲自身而奮鬥。」雖然如此，這有點模糊的提法，並不能夠改變民生主義的概念，也不能改變國民黨認爲是代表整個民族和所有階級的基本概念。

正因爲如此，蘇俄駐中國的正式代表，也是鮑的上司加拉罕，對於宣言中最不滿意的一段，就是民生主義這段。他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寫信給鮑時說：「我認爲代表大會的成績非常大，您立下了汗馬功勞。唯一令人不能滿意的是孫中山向國民黨的『地主派』做出讓步。我想，應該一如既往地堅持這一條，爭取讓孫中山最大限度用最激進的形式實施土地法令。」由此可見，堅持了民生主義的階級調和

做法，極大地挫敗了蘇俄推行階級鬥爭陰謀，但是詭計多端的鮑羅廷，還要「一如既往地做下去」。

《宣言》的第一部份回顧了過去，第二部份以三民主義奠定了未來的理論基礎，第三部份則是當今的具體任務，題爲《國民黨的政綱》。分「甲、對外政策」和「乙、對內政策」兩部份。

對外政策矛頭對準西方，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要西方國家放棄特權，等等，但是並未提到「帝國主義」和具體國家，顯然比較緩和。值得注意的是，鮑促成這反西方色彩，但是蘇俄在此時，在背後早已決定不廢除不平等條約，不放棄特權，並且派兵佔領了外蒙古，拒不撤兵，可是在表面上，仍然堅持加拉罕聲明的放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形象，欺騙孫先生和全體中國人，再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旦在這一年與英國和日本的關係改善，據鮑的筆記，就立即通過鮑羅廷在中國緩和反西方。蘇俄真是奸狡到極點，處處以損害中國利益來有利於蘇俄。不過在大會舉行期間，英國工黨政府上台，孫先生立即簽發賀電，期望英國新政府不要再支持中國軍閥，改變對華政策，這發生在致電蘇俄、悼唁列寧逝世的前一天。

對內政策部份也同樣比較緩和，對社會各個方面表示了關切和救濟的方法，沒有多少鮑的那套蘇維埃化的過激措施。

正因爲如此，引起了蘇俄方面的不滿，根據鮑羅廷自己的記錄，在《宣言》已經被大會通過以後，鮑接到加拉罕的指示，必須加上若干內容，如把階級鬥爭搞到軍隊去：「國民黨應該在士兵和下級軍官中，進行廣泛的宣傳鼓動工作，以解釋他們的自身利益，並將其轉化成爲人民利益而戰的革命軍隊。」於是鮑堅持加進去，要參與起草的委員支持，受到冷遇以後，又找到孫先生，聲稱得到了支持。不僅如此，還通過廖仲愷擅自在會後改動宣言，於是就出現了鄒魯在他的著作中兩次指出鮑私自修改宣言的情況：一次在《回顧錄》中，鄒魯指出，他和戴傳賢在校對時發現與通過的宣言兩樣，於是找到廖仲愷

（按：鮑不懂中文，任何修改離開了廖都不行），知道是鮑叫改的，於是改了回來；一次是在《中國國民黨史稿》的註解中，發生在閉會以後：「宣言第一次印五萬本，印後發出，發見㈢民生主義中之『中國爲農業國家……』一段，與大會決議之原文不符。監察委員吳稚暉等，特由上海用書面提出質問於廣州中央黨部，中央黨部乃詢之經手委員廖仲愷，廖云：此段鮑羅廷顧問以爲以其意不符，故改去。今已有質問，可照原文改回，但不如鮑之意妥矣，云云。」閉會以後，汪兆銘、劉盧隱、蔡世棻都發現了鮑私自修改宣言的另外段落，並且提出質問，這些質問有的登載在報紙上。鮑利用顧問的位置爲所欲爲到了甚麼地步！

對於這個染上一些蘇俄色彩的宣言，孫先生是很不滿意的。要不是鮑羅廷的堅持和他的語言技巧，以及孫先生在困難時刻想加强國民黨的組織，改變渙散的狀態，以便讓國民革命早日成功，這宣言根本就不會發表，世上就沒有甚麼「一大」宣言了。蘇俄剛剛公佈的檔案中，鮑羅廷記述其事：「一月二十三日那天白天，當委員會最後將宣言提交代表大會的時候，博士派人請我到大會去見他。他坐在秘書處等我。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最佳方案是否還是完全放棄宣言，而代之以他擬定的國民政府組織案。……孫中山的方案隻字不提中國現狀，也不提如何解決問題的出路，而是充滿了不着邊際的烏托邦。這個方案打算解決人民的四大需求——衣、食、住、行。由於它隻字不提甚麼是人民，不提通過甚麼途徑達到這個目的，應當創造何種條件來實現他的理想，所以國內的，特別是國外的小資產階級國民黨人，當然會樂意接受之，因爲海外那些資產階級國民黨人如坐針氈，唯恐出現反對帝國主義，因而就會累及他們被逐。……當孫中山問我，是否取消宣言，我當即給以駁回，這時候一個關係到國民黨近期命運的關鍵時刻出現了。當此緊急時刻孫中山應決定，是堅持他自己的方案從而站到右派一方，還是決定通過宣言，同左派一道前進。我不得不擺出種種理由，和他長時間談話，最後孫中山終於決定採納宣

言，同時也付印他的方案，備宣言參考。」鮑的記述除了反映出孫先生不喜歡這宣言，甚至想取消宣言這一從不爲人知的重大事情以外，還道出了鮑與孫先生的幾項重要的分歧：

甲、孫先生的「方案隻字不提中國現狀」。宣言的現狀就是第三部份「國民黨的政綱」，就是對所謂「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是第二部份對三民主義解釋的具體化。可見孫先生打算取而代之。

乙、鮑在若干給蘇俄政府的有關報告中不止一次地嘲笑三民主義是烏托邦，但是鮑嘲笑的內容是「打算解決人民的衣、食、住、行」，這恰恰是三民主義的長處，是主義的重要部份，不像共產黨的土地政策等等都只是利用人民，利用完了又將土地收回爲少數人擁有的國家控制。鮑的嘲笑正好說明三民主義的價值。

丙、鮑批評孫先生「隻字不提甚麼是人民，不提通過甚麼途徑達到這目的」，這是孫先生與鮑的根本的政治分歧。所有共產黨所說的「人民」都是階級的，孫先生則從來認爲自己是代表所有階級的；共產黨是通過物質利誘貧苦的「人民」掀起階級鬥爭的「途徑達到這目的」，孫先生是通過宣傳，讓所有中國人瞭解三民主義，通過階級協調達到喚起民衆，哪怕在廣州十分危急的時候也不搞階級鬥爭達到此目的。這是三民主義的極爲可貴的地方，也爲今後爲中國的前途而奮鬥者的難得的楷模。鮑的文字中所透露的與孫先生分歧的根本所在，正好是兩種學說的强烈對比，越顯出了三民主義的價值。

丁、從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人流浪海外、開發海外，構成了一部血跡斑斑的華僑歷史。他們倍受欺負和壓榨，使得他們更加懷念埋葬着世世代代祖先的家園，只有溫暖的故土恩蓋天高。當孫先生舉起了辛亥革命的旗幟，海外赤子們以自己的點滴血汗積累支援革命，還不斷有海外的中國人爲國捐軀；在護法期間，據《革命文獻》第五十一輯，從一九一八年起的九個月，海外華僑的捐款就達到二十八萬元，在這年，王昌在加拿大暗殺軍閥代表然後自殺，震動很大；在美國的華僑還曾購買飛機多架支援孫

先生領導的革命；雖然廖仲愷是華僑出身，但是以鄧澤如爲首的絕大多數華僑，在鮑羅廷在孫先生身邊剛剛出現的時候，立即警惕到俄國的陰謀，向孫先生敲起了警鐘。鮑羅廷按照他的階級鬥爭的思維原則，將反對他的所謂右派的社會基礎放在華僑身上，不惜一切謾罵攻擊。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鮑給中共的黨團開內部會議上說：「如何抗拒越來越禁錮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我們從這個運動中看出些甚麼具體問題，有哪方面值得注意呢？首先，我們認爲在這個運動中有一個派別，他們與真正的國民革命毫無共同之處，他們不僅對黨毫無補益，而且相反，他們就像腳鐐一樣把運動束縛起來越近地逼向深淵。可以說，這一派的骨幹是那一部份實際上中斷了同本國聯繫的中國人，他們僑居異鄉，生意上風平浪靜，與其在祖國的地位相比，他們簡直就是資本家。我指的是海外的『國民革命家』。」鮑在這裏說他們是「海外的那些資產階級化的國民黨人」。這與孫先生把華僑稱爲「中國革命之母」不同。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有着俄國色彩的宣言在鮑的堅持下還是經大會通過發表，同時把孫先生的方案（《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作爲附件。（不過在差不多在一個月以後才正式發表）。這是孫先生對鮑的退讓，也是對自己意見的堅持。孫先生非常急切地想要學習蘇俄的方法改造國民黨，再以强有力的黨去建設國家，這就給國民黨的「訓練員」鮑以特殊的地位，鮑則盡量利用這地位，加進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內容。這是孫先生和鮑互有進退，然而又不破裂的根本原因。這體現着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內在衝突。

在三十日通過的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的組成成員，所謂的左派和共產黨委員屈指可數，絕大多數是被鮑攻擊爲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員，他們正是國民革命的忠實成員。這一成果和宣言相比，是這次大會的內在衝突的另外一面。

中央執行委員二十四人：胡漢民、汪兆銘、張人傑、廖仲愷、李烈鈞、居正、戴傳賢、林森、柏文蔚、丁維汾、石英、鄒魯、譚延闓、覃政、譚平山、石青陽、熊克武、李大釗、恩克巴圖、王法勤、于右任、楊希閔、葉楚傖、于樹德。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十七人：邵元沖、鄧家彥、林祖涵、茅祖權、李宗黃、白雲梯、張知本、彭素民、毛澤東、傅汝霖、于方舟、張葦村、瞿秋白、韓麟符、張秋白、張國濤。

中央監察委員五人：鄧澤如、吳敬恒、李煜瀛、張繼、謝持。

候補中央監察委員五人：蔡元培、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楊庶堪。

大會選出的有表決權的二十四名中央委員中，中共黨員只有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三人，佔八分之一，完全不足以控制國民黨，與陳獨秀和馬林開初的一舉奪取領導權的計劃差別很大；中央候補委員，中共黨員佔七人；監察委員五人都有資深經歷，他們的實際任務是監視虎視眈眈的中共，孫先生沒有讓一個中共黨員進入；候補監察委員中也沒有中共黨員。

全部委員都是在孫先生的親自主持下通過的。

這樣的中央執監委員會不可能去執行宣言中的蘇俄色彩條文，更不可能去執行第三國際的路線方針。這不能不是孫先生的深切用意。

但是，在中央委員會所屬的六個部之中的一半，中共黨員通過擔任部長和秘書而掌握了實權。也許，孫先生想要改變國民黨過去的渙散狀態，想學習蘇俄在組織方面的長處，而讓中共黨員擔任了部長；爲了改變國民黨脫離社會基層群衆的孤立狀態，而讓工人部和農民部由中共黨員負責。廣州和上海的《民國日報》都登載了孫先生在三月九日致函全體黨員，解釋聯俄容共和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意義：「此次新黨章所訂之組織法，其意義即在從下層構造而上，使一黨之功用，自橫而言，黨員時時得

有團結的機會，人人得以分擔責任而奮鬥；自縱而言，各級機關完全建築在黨員之上，而不似往日之孔洞無物，全體黨員亦得依各級機關之指揮而集中實力，不似往日之一盤散沙。此種辦法，在能自由辦黨之地，固易獲效；即在不能自由辦黨之地，亦殊有活動之可能。本黨之決心改組以此。」孫先生接着談到俄國革命六年就成功，中國革命十三年了仍然是軍閥橫暴，所以要借鑒俄國的經驗。整個函件，都是談學習俄國的方法，從來沒有說學習俄國革命的內容。所以，在國民黨辦事的具體部門，大量使用中共黨員；而蘇俄——中共，則從來都想要改變國民革命的內容以便成爲蘇維埃式的革命，從來都想要使國民黨成爲其順服工具。以後的一切摩擦衝突都由此而引起。

爲了建立有力量的國民黨，關係國民黨組織命脈的組織部由中共黨員譚平山任部長。中國國民黨在一九一九年成立直到改組，這個位置都是謝持擔任。現在經過廖仲愷的推薦，交給了中共黨員譚平山，譚的秘書是共產黨員楊匏安。組織大權被中共掌握，是中共後來迅速在全國獲得大發展的重要原因。

工人部長是廖仲愷，廖的兼職太多，各種實權都由中共黨員秘書馮菊坡處理。馮不顧在廣州已經有的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工會組織，再成立與之相抗衡、形成了分裂的工會組織。

農民部長是中共黨員林祖涵(伯渠)，秘書是中共黨員彭湃，乘此掀起了農村的階級鬥爭。

只是在以鄒魯爲部長的青年部、戴傳賢爲部長的宣傳部、以林森爲部長的海外部，中共還一時無法打入。

顯然，各個部的構成和中央委員會相比，又體現着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內在矛盾。

孫先生想利用中共，蘇俄和中共也想利用孫先生和國民黨，這是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產生不倫不類的諸多矛盾現象的基本原因。

這僅僅是開始，僅僅是中國兩大政治力量、中國國民黨和蘇俄—中共在二十世紀較量的序幕。

註釋：

①《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三三七頁第一一一號文件。

②《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八七頁。

③同註釋①，第五八九至五九一頁。

④《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集》(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四)第二八八頁。

⑤同註釋①，第三四〇頁，第一一〇號文件。

⑥《中國國民黨史稿》第四四九頁。

八、國民黨人最初的抗拒

中共領袖李大釗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保證是非常有名的，打動了孫先生，打動了衆多的代表，而且至今的中共的史家們常常還作爲中共合作「誠意」的證據。但是從現在公佈的歷史文件看，不管是李大釗還是其他的領袖，不管是中共還是蘇共，全都是文質彬彬的騙子。

現在將李在大會上保證的最主要的段落抄錄如下，再對比於第三國際的決議、中共中央的決議，和在中共內部的會議上，李大釗和其他中共領袖們的完全相反的發言。有了這對比，孫先生對鮑羅廷不動聲色的抵制和國民黨人最早的疑慮就不奇怪了。

李大釗在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神聖殿堂上，對於加入國民黨做出了莊嚴的保證：「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强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列强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爲在這種國民革命中，不宜使國民革命的實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其進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黨；只有國民黨能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肩負解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我們覺得光是革命派的聯合陣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總理指揮之下，在本黨紀律整齊之下，以同一的步驟，爲國民革命的奮鬥。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爲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

斷乎不是爲巧取討便宜，藉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因爲在今日經濟落後淪爲帝國主義下半殖民地的中國，只有國民革命是我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國民革命的事業，便是我們的事業，本黨主義的勝利，即是我們的勝利。……有一部份同志疑惑因爲我們加入了本黨，本黨便成了共產黨，這是一種誤會。我們加入本黨是來接受本黨的政綱，不是强本黨接受共產黨的黨綱。……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因爲第三國際是一個國際組織，中國共產主義的團體，是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支部，所以我們可以一個一個的加入本黨，不能把一個世界組織納入一個國民的組織。中國國民黨只能容納我們這一班的個人，不能容納我們所曾加入的國際團體。我們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去從事於國民革命運動，但是我們不能加入中國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組織。……」「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守本黨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我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以參加，即不必對於我們發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①

李大釗的保證有幾點值得注意：

一、加入國民黨的動機。李說，要去除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壓迫，只有一個「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民革命運動」，只有將這力量統一於國民黨，所以加入國民黨是「以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爲取巧討便宜，藉國民黨的名義作共產主義的運動而來的」。

二、爲甚麼要跨黨？中共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不能夠因爲「加入了國民黨便脫離了國際組織」，所以只能夠「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所以中共黨員肩負有兩重責任：「一種是本黨黨員的普通責任；一種是爲本黨聯絡世界革命運動，以圖共進的責任。」（李一直以「本黨」稱國民黨，「我們」稱中共，以足見其「誠」。）

三、「遵守本黨章程和紀律」，不然願意受到懲戒。

可是我們從現在公開發表的中共的內部文件，對比李的發言，就能夠很輕易知道，與李完全相反，中共處處的決議和作爲，是爲了共產黨本身利益而分裂國民運動，不是如李所說，是爲了國民革命；中共從來在國民黨中秘密搞黨團活動，而不是如李所說的，只是一個一個加入，後來鮑羅廷和其他中共領袖也都承認的；中共處處在破壞國民黨的章程和紀律，從來無所顧及，而不是如李所說，遵守紀律和章程。

自從一九二〇年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指示「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義」以來，加速了在東方的擴展。馬林在中共組織起了的第二年的中共「二大」上，做出了與國民黨建立所謂「聯合陣線」的決定，這第一個決定所强調的，是做「獨立的階級運動」，而不是「國民運動」：「無產階級加入民主革命運動，並不是投降於代表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來做他們的附屬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勝利可以完全解放無產階級；乃因爲在事實上必須暫時聯合民主派才能夠打倒公共敵人——本國的封建軍閥及國際帝國主義——之壓迫，不如此無產階級便無法得着爲自己階級開始團結所必須的初步自由，所以在民主的戰爭期間，無產階級固然應該聯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只是聯合與援助，決不是投降附屬與合併，因爲民主派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爲無產階級利益而奮鬥的政黨；一方面應該集合在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旗幟之下，獨立做自己的階級運動。」②根據馬列主義，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共產黨，只能爲本階級服務，聯合是現實的暫時需要；一旦這暫時的需要過去，該決議一開頭就說，在與「封建階級的戰爭」以後，「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戰爭也是不能免的」。做出這決議的時候，「聯合」還沒有進行，所以措辭比較坦白，强調無產階級的利益與獨立性，而沒有「一切爲了資產階級領導的國民革命」的花言巧語。

由於馬林帶來了莫斯科的指示，中共立即在杭州召開「西湖會議」，做出了「聯合」國民黨的進一步決定。

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做出了《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指示中共的具體策略條文中，種種陰謀已經非常明顯：

「二、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且軟弱，由於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國民革命，以及由於這個國民革命問題的解決直接關係到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爲，國民黨和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互相配合行動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

「四、但是這不應該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爲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本身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機構。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特殊任務，應當是組織和教育工人群衆，建立工會，以便爲强大的群衆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在進行這一工作時，中國共產黨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下不依賴其他任何政治集團而獨立行動，但同時要避免同國民革命運動發生衝突。」③

這表明，與國民黨「配合」只是本身利益的需要，所以共產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機構」，與李大釗的一切是爲了「貢獻於國民革命的事業而來的」不同，也相反於「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入的」動聽保證。

按照第三國際的指示，中共在一九二三年六月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專門做出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其中關於加入國民黨一段，完全是露骨的陰謀活動決定：

「六、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

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嚴謹我們的紀律，以立强大共產黨之基礎。」這是一條組織路線的決議，即要在國民黨內保存組織，再乘國民黨搞工人運動之際，在工人之中發展中共黨員，再把所謂國民黨中的左派挖過去。用在國民黨內挖牆角的方法，「以立强大共產黨之基礎」。④

爲了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舉行了第三屆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做出了《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對於各種陰謀活動做出了進一步的規定。在「擴大其組織」部份規定，在「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同志們一並加入」，在沒有的地方，爲之「創設」；在「我們與國民黨關係」部份決定共三點：「(1)我們的同志在國民黨中爲一秘密組織，一切政治的言論行動，須受本黨之指揮；(2)我們須努力站在國民黨中心位置，但事實上不可能時，斷不宜强行之；(3)我們的同志倘正在國民黨中心位置，其經費受諸國民黨者，應公開的支配，其賬目只報告國民黨；受諸本黨者則對本黨負責。」⑤(以上引用的所有中共中央文件和第三國際的決議，都出自北京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

現在解密的蘇共檔案中，有鮑羅廷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夕在中共與共青團聯席會議上的報告：「(1)尚未參加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應立即加入國民黨。(2)各地共產黨員，只要有可能，都應幫助國民黨發展。(3)會議決定中共應在國民黨內部建立秘密支部。(4)會議指出，所有同志雖然應全力爭取國民黨內的領導權，但應自然而然地做，不可暴露自己的意圖。」⑥本來共產黨搞陰謀不足爲怪，但是對比李大釗是這一切活動的參與者，他竟然能夠臉不紅地以謊言打動了不少人，就仍然會使人感到驚奇。

以上中共中央文件的第一點，是要盡可能在國民黨內建立由中共直接指揮的秘密組織；第二點要「努力站在國民黨的中心位置」，即奪取權力；第三點最爲過分，即這一切損害國民革命的活動，明文

規定要由國民黨付錢，真是壞到了極點。鮑羅廷報告的第四點，要中共黨員在奪取權力時，「不可暴露自己的意圖」，他每時每刻在孫先生面前，就掩飾得極爲成功。

這些文件大都是在李的參與下制訂的，對比李在大會上的撒謊，蘇共卵翼下的中共所包藏的禍心已經昭然若揭。

對於這些倒行逆施，當然會引起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反抗，孫先生面對鮑羅廷將蘇維埃運動以種種藉口和形式强加，也當然會有所佈置。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剛剛結束，香港和上海的報紙立即登載了國民黨最高層分裂的傳聞，上海執行部和胡漢民曾分別闢謠，胡漢民抨擊報紙造謠說：「於是改變了口調，說『國民黨改組以後，元老派的胡、汪、廖、鄒加入共產黨，和甚麼派的謝持、居正對抗，國民黨已經分裂。』這是一個有心挑撥的話……如果他們稍微曉得我們在大會的態度，比方宣言政綱裏對於一個土地問題是當時討論得最認真的，而且不但我和謝先生、居先生的意見一樣無異，而且……。」其實報紙並非完全空穴來風，居正、謝持在會議舉行時的非公開的主張可能傳出去了。居正從改組一開始就消極抵制，突然從孫先生的左右助手的地位消失，在上海鄉間務農。他雖然出席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中央委員，卻公然在被選舉爲中央常務委員時堅辭不任，會議一結束就悄然返滬。居正的消極抵制可謂達到極點⑦；謝持雖然身爲大會的五人主席團成員之一，向大會作黨務審查報告，但是與一些反共華僑和國民黨員來往密切，與鄧澤如等參加了在廣州大沙頭某住宅的聚會，參加人之一的方瑞麟後來在大會上提出了反對跨黨的提案，使得李大釗不得不在會議上做出那有名的保證；在會議結束以後幾天離開，在香港才致書孫先生，書中不提改組，稱「無補於大局與黨務」⑧。一九一九年中國國民黨成立時，只有三個部長(也稱作主任)，如今三人中廖仲愷是與中共合作的中堅人物，另外兩人居正和謝持的政治立場則完全相反。雖然僅僅是消

極抵制，在那時仍然難免有國民黨分裂的傳說。

忠實的國民黨人反抗蘇俄的序幕，在一九二四年二月就正式拉開，那時距離第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才半個月。

據《孫中山集外集》(第八二六頁)，二月十五日，孫先生打算開除謝英伯等人黨籍，令秘書處發出通知，要他們來爲自己辯護：「提出下期會議。擬革除黨員四人：謝英伯、徐清和、馮自由、劉禺生。着秘書通信傳來會場，自行辯護。孫文。」當事人之一的馮自由後來在《革命逸史》中回憶道：「民國十三年二、三月間，鄧澤如、劉成禺、謝英伯、蕭佛成、徐清和、張秋白、王祺、凌毅、方瑞林、江偉藩、謝良牧、馮自由諸人對李大釗之開會警告。開會地點在廣州太平沙林宅，各省及華僑黨員參加者五十餘人，鄧澤如爲主席，通過《警告李大釗等不得利用跨黨機會以攘奪國民黨黨統案》。詎警告書尚未發出，而廖仲愷、李大釗及俄人鮑羅廷等已向總理指名控告劉成禺、謝英伯、徐清和、馮自由四人，謂爲不守黨員紀律及挑撥國共惡感。總理乃定期在士敏土廠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別會議，召劉、謝、徐、馮四人親自問訊，鮑亦在旁觀審。遂由劉等詳細答辯。」答辯結果，孫先生竟然表示滿意，保留他們的黨籍，還要他們今後有問題時，直接去找總理本人，「不要再起暗潮」。顯然，孫先生同意了他們對中共的控告內容，而不贊成他們的暗自結合的方式。在場一直監看的鮑羅廷當然大失所望，並由此得出結論，認爲孫先生支持右派和中派。

這件事引起鮑羅廷的擔心，認爲如果在廣州以外發生這種事情，就難以控制。鮑的這一段記述，反映了他對孫先生、對國民黨改組的不信任，有必要摘抄錄出來：「關於組織問題，即由誰來決定全黨命運及對黨進行實際改組的問題上，孫中山支持右派和中派，不過他也把左派吸收到中央委員會。我們認爲，一個黨員在綱領和組織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可分的。但是國民黨內卻是可能的，因爲孫中山和別的

領袖人物甚至左派領袖都不瞭解，如果把貫徹路線拿掉，交由身爲中執委或監委的國民黨右派手中，只能把黨的路線化爲烏有。孫中山不明白，通過一個好的綱領是一回事，而讓這些敗類貫徹之，則又是一回事。好在黨內還有相當多的左派，他們會利用這個基本綱領爲基礎以構築國民黨的未來。但是，左派同右派不會長時間共處，分裂遲早發生，不可避免。鬥爭序幕已經揭開，右派發難了。……二月十六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四個老國民黨員，指責他們圖謀在黨內組織派別，反對左派，主要是反對共產黨人。……他們都矢口否認，說決沒有在國民黨內結成任何『非組織』派別的組織。總之，企圖組織派別這一事實，他們無法推翻。沒有哪個右派膽敢在孫中山面前，說自己根本不同意國民黨的新政策。可是廣州以外的國民黨員膽子就大多了，他們必將反對左派，這一點毫不懷疑。」

鮑認爲：孫先生是右派的後台，也庇護左派；國民黨雖然通過了有若干蘇俄色彩的綱領，但是右派的中執委和監委「只能把黨的路線化爲烏有」；今後分裂難免。

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先生說得很清楚，即第一是改組國民黨，第二是用政黨的力量去改造國家。改組國民黨就是要學蘇俄的方法，使渙散的黨變得强有力；但是蘇俄卻有自己的打算，即通過中共，改變國民黨的性質，使之全面左轉；改變國民革命的內容，讓國民革命變成爲蘇維埃式的翻天覆地暴動，進而使中國變成蘇俄的附庸。面對蘇俄和其顧問的咄咄逼人，孫先生一般都是採用退讓求全的方法。比如對宣言，孫先生一再表示不滿，但是在鮑的堅持下，仍然同意了。因爲不如此，就可能使改組半途而廢，而且蘇俄的金錢武器也是唯一能夠得到的外援。孫先生對於黨內的反對聲浪，一般用撫平的辦法，例如對於鮑羅廷告謝英伯、馮自由等的狀，不理是不行的，理了以後不了了之。所以鮑羅廷看出來孫先生是右派的後台。不僅如此，在大會剛剛閉幕的時候，孫先生更是直接對抗蘇俄的企圖。

如果不是蘇共檔案解密，使得鮑的筆記和報告在近日問世，我們就不可能知道孫先生對宣言很不滿

意，一直想用另外的方案代替宣言，宣言是在鮑的一再堅持下才發表的。鮑對於宣言和孫先生的方案的區別看待得非常原則：「再重複一遍，當孫先生問我，是否最好取消宣言，我當即給以駁回，這時候一個關係國民黨近期命運的關鍵時刻出現了。當此緊急時刻孫中山決定，是堅持他自己方案從而站到右派一邊，還是通過宣言，同左派一道前進。」⑩

孫先生一點也不含糊：在大會還沒有結束時，就系統講解他的三民主義，將他的學說全面的表達，不動聲色地把宣言第二部份《國民黨的主義》中的俄國色彩予以拋棄。只要稍稍研讀三民主義的具體內容，再對比一下宣言的第二部份的支離破碎的主張，結論就會很清楚。而且在講解三民主義的時候，不止一次地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批判。在講解民生主義時，因爲批判得十分嚴厲，以至於下來以後，與鮑羅廷爭辯激烈，不歡而散⑪。

宣言的第三部份是《國民黨的政綱》，即如何實行宣言。鮑羅廷所謂的「孫中山的方案」，恰恰就是講解如何實行三民主義的，這個方案叫《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在四月十二日正式公佈。這個方案毫無疑問地代替了宣言的第三部份，是三民主義的具體化。

《建國大綱》沒有專門的對外政策部份，只在第四條的民族主義部份，簡單、一般地一筆帶過：「對於國外之侵略强權，政府當抵禦之；並同時修改各國條約，以恢復我國際平等。」而宣言的對外政策佔七條，大都是高昂的反帝口號。蘇俄一直欲利用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導致與西方關係惡化，就有着宣言中的言辭(雖然經胡漢民等在制訂過程中抵制，使得措辭變得溫和)。如果將宣言與孫先生在過去有關的演講和著作相比較，特別是在「一大」前後言行，如一九二三年一月的《改進宣言》、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演講《國民黨今後奮鬥的方針》，以及大會的開會辭、閉會辭，就可能發現和宣言的提法是大有區別的，恰恰和《建國大綱》的提法一致。

重點在對內，全面體現了孫先生的治國理念。孫先生用毛筆將《建國大綱》工整地書寫出來，更證明這是孫先生的寄託和重視。如果宣言的對內政策的十六條已經使得孫先生滿意了，就何必多此一舉呢？如今鮑羅廷的報告和筆記的公佈，更加證明了孫先生是以此《建國大綱》代替宣言的本意。

這是孫文主義的綱領性文件。

第一條至第四條，重申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本來建設中華民國；强調建設之首在民生，政府之首要在於解決人民的衣、食、住、行四大問題。順便比較的是，毛澤東治國之首在階級鬥爭，天天鬥、月月鬥、年年鬥；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鬥得生民塗炭，屍橫遍野，毛澤東卻說「其樂無窮」。

第五條也是綱，指明建設的先後順序：「建設之順序，分爲三期：一曰軍政時期，一曰訓政時期，一曰憲政時期。」這是孫先生結合中國悠久歷史傳統和社會文化心理，參考中外各種政治學說，並總結他成功和失敗經驗教訓的偉大創造。

從內容講，「訓政」是他的獨到發明。

辛亥革命推倒滿清，建立中華民國以後，反而是孫先生一生革命的最困難時期。他發現過去用民族主義號召天下，連滿清政府自己培養的軍隊都響應，所以成功了。後來的同樣是爲了百姓過好生活的「民權」、「民生」來號召，百姓卻反映冷淡，簡直是一盤散沙。於是軍閥乘機加以利用，曹錕也要用「國會」選舉爲總統；陳炯明叛變所依靠的軍隊，竟然是孫先生幫助建立起來的。孫先生深深感到自己的孤立。

孫先生回顧歷史，發現幾千年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生活方式，養成了百姓散漫的民性，是自由太多。因此要用「自由」來號召，響應者就會不多；幾千年來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心理，不能觸及其根本利益，百姓不會奮起。孫先生列舉了美國的

許多黑人，因爲不理解林肯的解放黑奴的主張，在南北戰爭以後，反而抱怨這解放，使得他們要爲生存而勞累。

因此，必須要有一個人民接受三民主義的歷史過程。孫先生在《訓政的解釋》中說：「中國奴制已經進行了數千年之久，所以民國雖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還不曉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們現在沒有別的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們來做主人，教他們練習練習。這就是我們訓政的意思。」他所著的《民權初步》，就是企圖教導人民行使政權的方法之一。

從來都只是利用百姓的蘇聯共產黨，通過鮑羅廷，在孫先生最困難的時候，誘使國民黨去搶奪地主的土地，以便獲得農民的支持；不成之後，在制訂宣言的時候，又一再想把這內容加進去。這種利用民衆，迅速獲得群衆支持的蘇維埃式的暴動和恐怖的做法，是孫先生從來不屑於採用的，這是孫先生的偉大之處。

孫先生認爲社會中的人，有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之分。國民黨人是先知先覺者，應當去幫助和訓導尚未理解三民主義的後知後覺者。訓政的重心在縣自治，首先由上面的政府派出經過考試合格的人，去幫助籌備縣的自治，人民應該享受的一切權力都必須首先在縣一級得到，縣一級在各方面都治理得井井有條以後(孫先生有若干規定)，才談得上憲政的實行。

這是對中國傳統社會和現代西方民主理論都具備深厚的素養的孫先生，貢獻給中國社會的寶貴財富之一。至於有利用中國傳統文化心理而行獨裁者出現的現象，絲毫不能說明訓政的學說的不足，恰恰證明中國急需要訓練民衆，提高和改變社會心理的艱巨歷史過程是不可缺少的。

除了公佈《建國大綱》以糾正宣言帶來的主義方面的混淆以外，孫先生還採取了組織措施，讓一些他素來信任的老黨人，重新回到他的身邊。

就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不到一個月的時候，他任命張繼、謝持、居正、茅祖權、張知本等七人爲大本營參議。在改組之前，國民黨的部長都是由最核心的人擔任的，除了謝持、居正分別長期擔任黨務、總務部長外，後來爲了傳播主義的需要，設立宣傳部，部長就是張繼。可是改組以後，這些昔日的左右助手，都不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務委員：居正是消極抵抗主動離開，謝持和張繼只任監察委員。張繼雖然在聯俄容共的初期積極活動，按照孫先生的意思，把李大釗、張國燾等一批共產黨要人都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但是他已經看出了蘇俄和中共的陰謀，在會議召開的前兩月，在上海執行部的會議上開始站在了反對的立場。如今，他們可以以顧問的身份，重新回到孫先生的身邊；兩個星期以後，另一位反共健將覃振，也被任命爲大本營參議；最令人吃驚者是，盛傳將被開除的反對聯俄容共最出力的馮自由、謝英伯、劉成禺也在幾個月後被任命爲大本營參議，成爲了孫先生的顧問。而且，在上海曾經表態對聯俄容共有戒心的彭素民，在四月十四日接替共產黨人譚平山和林祖涵，擔任中央常務委員和農民部長，這兩項職務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彭素民不久病故)。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孫先生的一系列措施，正是他不得已的聯俄容共時，又不得不防俄防共的一部份。

不管是孫先生的不着行跡的措施，居正等消極的反抗，還是馮自由、謝英伯等的上書和答辯，都是在內部進行。但是在四月間，謝持發表演講公開批評俄國和中共，這是國民黨高層領導人第一次在社會面前反抗蘇俄。

謝持的演講登載在上海《商報》，因爲條件關係，這演講的原文難以得到，只能夠從左派雜誌《政治生活》和中共的機關刊物《嚮導》上、從中共的指責上知道這演講的大意和意義。《政治生活》第十二期上，署名君宇，即高君宇，是北方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時爲北京中共的負責人之一，李大釗的主

要助手，他以《國民黨左右派的分化》爲題目說：「全國大會後謝持君於所謂反共產派之會議中明言『共產黨意在破壞國民黨之國際地位，失掉英美之同情，故要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此種論調見四月上海《商報》，可知謝持君又不反對帝國主義了。張繼君亦曾向人言：『國民黨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人將在何處安生？——外人還許我們在租界居住？』何世楨君說得更堅決：『國民黨做國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斷不可反對帝國主義！』」⑫當時負責中共宣傳工作，任《嚮導》編輯的彭述之，在該刊第八十二期上，以《國民黨右派反革命經濟背景》爲題目發表文章說：「我們且看反革命的右派之反革命言論：『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宣傳所謂打倒美英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係在破除國民黨在國際上之好感，一方面則注重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各實力派之合作，而期打消粵皖奉之三派討賊運動，其計劃係在消滅國民黨。……』(見《商報》八月九日)這種同樣的論調，在謝持四月的演講中，在他們的《護黨報》上，……隨處都碰得到。」⑬

也許，謝持這樣做，是對於孫先生的一系列防俄防共措施的心領神會。因爲孫先生明知他反對蘇俄與中共，不僅僅擔任監視中共的監察委員，還任命他和張繼、馮自由爲參議；並且孫先生發表的手書《國民政府建設大綱》，在反帝等等方面與《宣言》的基本精神並不一致；參加寫宣言的胡漢民等與謝持都是孫先生的左右助手，對於在寫作過程中鮑羅廷的種種鼓動國民黨與西方對抗的作爲不會不知道；改組以前謝持主持上海總理辦公處，對於蘇俄阻撓國民黨與皖、奉的聯絡也完全洞悉，他之所言是有所依據的。

並且，謝持在之後的一系列政治作爲，是否與孫先生有默契或交待，願作爲一個問題提出來，謹供史家參考批評。

因爲其他幾位受到信任的反共人士，孫先生對他們都有私下的指示。

一、對鄒魯的交待：鄒魯在國民革命中，貢獻良多。所以孫先生在最後一年多的時間裏，把黨的主義和青年都交給了他，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當選爲中央常務委員兼青年部長；爲培養文人，辦了廣東大學，鄒魯任校長；而且孫先生把演講三民主義後所有的校閱定稿工作交給鄒魯。鄒魯在《回顧錄》記載：「即以青年論，除其內部有組織外，復有新學生社多方引誘青年。當我就任青年部長後，對於青年該取甚麼態度，不能不有所決定。因此我請示總理，問明對共產黨，應持甚麼態度？總理說：『容共只是允許共產黨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實行本黨主義，斷不能讓他們在黨內做不合於本黨主義的活動。所以你辦黨和辦教育，應該堅決保持本黨的立場，如若共產黨有法外的活動，當加以嚴防。』」⑭

二、對趙士覲的交待：鮑羅廷抵達廣州不久，就極力要孫先生實行土地革命，趙就是極力反對者之一，並且搜羅鮑的種種陰謀行爲報告孫先生，孫先生秘密告訴他說：「汝與余從事革命工作十餘年，爲余之親信，余之外交策略如何，列强對余之態度如何，汝豈不知？處今日環境，汝且少安毋躁，俟其有軌外行動，余自有辦法制裁之也。」在改組剛剛開始時就激烈反對蘇俄的趙士覲，原爲大本營糧食管理處督辦，在反對改組時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被任命爲兩廣鹽運使，這是關係到廣州革命政府基本財源的重要職務；兩天以後，又加任爲大本營財政委員會委員。這任命證明了趙士覲仍然被孫先生信任。

三、對劉成禺的交待：劉成禺追隨孫先生，在聯俄容共開始以後，就一直以無私無慾的剛直，與馮自由等一起站在反對蘇俄陰謀的第一線，成爲了鮑羅廷的眼中釘，但仍然被孫先生委以重任。一九二三年五月，劉成禺被委任爲大本營宣傳委員，次年的六月，在他反對共產黨最出力的時候，被升任爲大本營參議；七月，武漢的國共雙方分別以覃振和林祖涵爲首，爭鬥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孫先生竟然派遣劉

成禺這個反共幹將去全權處理，臨走時孫先生和劉成禺的對話令人深省：

孫先生說：「汝以爲予相信共產黨乎？吾知汝與共產黨人水火，故派汝全權辦理湘鄂豫軍政大事，此後黨務，可不必過問。予自蒞粵設立政府以來，美英日三國無事不與我爲難；英尤甚！如沙面事件、派軍艦搶海灘事件，皆汝所親見，我可謂無與國矣。今幸蘇俄派人聯絡，並幫助一切重要物資，彼非厚於我，欲借國民黨以實現其在華政策耳！吾則以外交政策聯俄，以威脅英美日。英美日能與我改善外交，何必專在俄國？聯俄必先收容共產黨，共產黨雖全體加入國民黨，汝以爲真意乎？吾知共產黨必不然也！即如李大釗，前日在大會演說：『中國國民黨老前輩，當與人以爲善，今日共產黨全體自願拋棄共產主義，信仰三民主義，尚遭拒絕，未免示人以不廣。』汝以爲李大釗之言可代表共產黨全體意見乎？」

成禺曰：幣重而甘，誘我也！

中山先生曰：吾向以誠意待人，不問其誘不誘，只問我誠不誠。故吾謂三民主義，其中包括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不能代表三民主義；代表大會開會，言之甚詳。汝當竭其全力完成派汝之任務，黨事不必過問，我自有辦法。

成禺曰：此行尚有最後一言，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意在併吞消化國民黨，因國民黨黨內派別有裂痕，乘隙勾引而來。軍閥戰爭十餘年，人民能安居樂業，生產富庶，所以供應南北數十百萬之以戰爲業者，由農工商下層未波動，社會未倒轉紛亂耳，今共產黨政策，欲推翻中國原有農工商社會之安定，以行其全國恐怖計劃，侵入國民黨，……先生常言：豪傑有千秋萬世之名，若爲一時之衝動，收納共黨，使將來貽國家人民無窮之憂，願先生思之！

中山曰：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⑮

顯然，這些忠誠的國民黨員的反抗，背後都有孫先生的默許或諒解。孫先生不得不聯俄容共，也不得不抗俄抗共。

一九二三年三月，孫先生對美國友人布羅克曼講：「孫曰：……對於來自美國、英國、法國或者其它强國的援助，我們已經絕望了。……以某些跡象表示了幫助我們南方政府的唯一的國家，就是俄國的蘇維埃政府。布問曰：您認爲蘇維埃是民主的嗎？孫毫不猶豫地答曰：蘇維埃是甚麼，我並不介意，只要他們能夠幫助我反對北京，也就行了。」⑯在同一年，孫先生對記者還談到他聯俄的不得已：「中華民國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沉不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激流沖走，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河岸上嘲笑我們。這時候飄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爲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向我大喊，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甚麼都沒有好。」⑰

政治家很難有這樣充滿悲壯和無奈的談話。被迫實行的聯俄容共，也就只能夠在忠誠黨員和蘇俄中共的對抗中持續下去了。

註釋：

① 《革命文獻》第七至第九輯第三八至三九頁，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民國四十四年，台北。

②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第六五頁，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北京。

③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第五七九頁。

④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第一四七頁。

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第二〇〇至二〇一頁。
⑥《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卷第三五六頁。
⑦《梅川譜偈》，居正著。
⑧《謝慧生事跡紀傳》第一八四頁，謝幼田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八十年，台北。
⑨《革命逸史》第三集第二一六頁，馮自由著。
⑩《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卷第二六二頁。
⑪《回顧錄》，鄒魯著，獨立出版社，民國三十六年，南京。
⑫《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第一〇三頁，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北京出版社。
⑬《嚮導》週報第八十期。
⑭《回顧錄》，鄒魯著。
⑮《先總理舊德錄》劉成禺著，《國使館館刊》，民國三十六年，南京。
⑯《孫中山集外集》第二八九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⑰《孫中山集外集》第二九九頁。

九、彈劾共產黨案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正式向中央黨部提出「彈劾共產黨案」。

爲甚麼會提出來？國民黨與蘇俄——中共之間的衝突發展到了甚麼地步了？結果如何？

根據最近公佈的蘇共的檔案，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的下一個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東方委員會，做出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以下全文抄錄該決議的各條內容，看看蘇俄的具體部署：

(1)討論國民黨於今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該黨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與政綱，以及爭取該黨普通黨員群衆轉向左派的措施。

(2)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跨黨黨員所任國民黨出版工作的監督制度。

(3)加強工會工作，並盡快籌備京漢鐵路工會的恢復工作。

(4)加強對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尤其是對學生的宣傳工作。

(5)鑒於國民黨活動日益發展，應向該黨提出農民參加解放運動的具體問題，方法是：實行更激進的土地改革，把靠近前線地區的農民武裝起來並組建自衛隊。

(6)詳細討論以口頭方式和傳單、電影等方式向農民進行廣泛宣傳的方法。

(7)今後三個月內應開展擴大吸收黨員的運動，主要發展是共青團員和二十五歲以上的工

人。①

讓中共黨員譚平山擔任組織部長，是期望學習蘇俄的經驗，將國民黨建立成爲一個有戰鬥力的黨；但是這決議的第一條就是利用掌握組織大權之便，挖國民黨的牆基，「爭取該黨普通黨員群衆向左轉」。第二條是加强和監督宣傳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第三條是控制最大的京漢鐵路的工會，第四條是對青年學生和工人加强宣傳，第五、六兩條是進行被孫先生否定了的蘇維埃式的土地改革，並且用通俗易懂的宣傳方式，第七條是大力在青年中發展中共的組織。

這完全是乘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宣言和一些決議，利用中共掌握的權力，在中國全面開展蘇維埃革命的全面準備工作。

在過去就常常指責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說他會將共產黨消化在國民黨中，而從來主張要在國民黨中爭取領導權，對國民黨進行分化瓦解的威金斯基，帶着莫斯科的指示，到上海指導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張國燾回憶道：「陳獨秀先生邀我一同會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表示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針，重點是在本身組織的發展和獨立領導職工運動等工作。對於國共合作問題，他特別强調中共黨員之在國民黨工作者，應該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這樣，才可以達到推進國民黨革命化的目的。」會議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舉行，爲期三天。

中共中央的擴大會議做出了幾個決議，在《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決議案》說：「照現在的狀況看來，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的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因此所謂國民黨左右派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假使現在我們因爲鞏固擴大國民黨起見而取調和左右派的政策，那就是一種錯誤。」②鮑羅廷一開始就製造國民黨的左右派，使其互相鬥爭，以便從中漁利。但是在容共初期，國民黨內除了廖仲愷，沒有左派，在中共的文件裏，給廖等定性爲小資產

階級，真正的左派是中共黨員；胡漢民、汪兆銘都是協助孫先生，實行調和政策，被稱爲中派。中共在這決議裏表露得非常的本質和非常的驚人，即所謂左右派的鬥爭實質是國共兩黨的鬥爭，所以對這鬥爭只能加劇，不能調和，在國民黨內部鬥下去，當然最後的結果只能把國民黨鬥垮。這距離李大釗在國民黨代表大會上的娓娓動聽的保證，相距才三個多月。這裏也說明仁慈善意的孫先生，如何受蘇俄—中共的巧妙欺騙。實際上，從加拉罕的兩次對華聲明，宣佈廢除不平等條約起，到李大釗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保證，到這次決議，全部都是欺騙，而且欺騙都基本成功，朦住了國民黨的多少善良好心的政治家的眼睛。

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怎樣達到「於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左翼」的目的，即有利於蘇俄—中共呢？該決議說：「共產黨的責任，就是依國民黨不斷的有規劃的宣傳《宣言》裏的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要求民權的原則。……我們如此的進行國民黨的工作，同時就是鞏固國民黨左翼和滅殺右翼勢力的最好方法。」根據同一決議，左翼就是共產黨的代名詞，右翼就是國民黨的代名詞，上面的「鞏固」和「滅殺」的對象，也就一目了然，這就是消滅國民黨的方法，哪裏是李大釗保證中的幫助？

會議做出了「工會運動問題的決議」，就是要排除國民黨對工人運動和工會的任何介入，由中共一手控制工會。決議說：「凡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不必幫助國民黨組織上滲入產業無產階級，不然，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不僅如此，還要派遣中共黨員打入國民黨的工人部，以便控制工人運動：「我們黨應當竭力介紹同志到國民黨的工人部裏去工作，以便經過國民黨的工人部影響到階級鬥爭的發展而築成統一的工人戰線。」國民黨的工人部長是廖仲愷，秘書就是中共黨員馮菊坡，廖兼職多，工人部實際由中共把持達到了中共的目的。於是，和純粹國民黨人馬超俊所領導的廣州機器工會，和反共黨員謝英伯領導的工人組織互助社之間，就爆發了衝突。凡是能夠損害國民黨的地方，中共是決不會放過的。

在大會的《中央局報告》中，系統地列出了欲整垮國民黨的政策和步驟：「我們在國民黨的關係，孫中山及其他目前少數左傾分子(國民黨中極其重要的人物)，尚有意聯絡我們，其餘大部份右傾即不主張和國際帝國主義反抗的分子，則極力明白的或暗地排擠我們；我們的政策是：『㈠向目前的左傾分子宣傳，使他們左傾觀念堅固不致動搖；㈡向國民黨員中工人學生宣傳，使之左化；㈢努力介紹革命分子進國民黨，以增加左派勢力；㈣在一般社會做反帝國主義之普遍宣傳，以迫令國民黨全體左傾，此層更是根本政策。』」③聲稱爲幫助國民黨而「個別」加入的中共，奉行的是滅亡國民黨的釜底抽薪政策。第一條是堅定國民黨內部的廖仲愷之流的「左傾觀念」；第二條是瓦解國民黨的群衆基礎，「使之左化」；第三條是打入國民黨內部，「以增加左派勢力」；第四條是加緊宣傳，造成社會失去理智而動盪，以環境「迫令國民黨全體左傾」，並且指出「此層更是根本政策」。中共的這四條策略，應當看成是滅亡國民黨的四個步驟，令人髮指。

與此同時，陳獨秀在四月二十三日的《嚮導》，以「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爲題，公開攻擊所謂國民黨右派：「左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忠誠的要貫徹國民黨主義，對於任何列强與軍閥，終以群衆的反抗爲目的，而不肯出於根本的妥協；右派的觀念與出發點，是急於黨的勝利，甚至於是急於自己個人地位的成功，主張在與列强或軍閥妥協之下，靠少數人的武力與權謀，獲得若干政權。這是將來國民黨左右派之真意義，照這個意義，左派乃是真的國民黨、真的國民主義者，右派乃是拋棄了國民主義，實際上可以說不算是國民黨了。」④根據中共中央在五月份通過的決議，已經定性：「所謂國民黨左右之爭，其實是我們和國民黨右派之爭。」所以這裏攻擊所謂的右派，實際上是攻擊整個中國國民黨，即把國民黨說成是與帝國主義、軍閥勾結妥協、拋棄了主義、「不算是國民黨」；而把後來蘇俄給錢、出主意，並爲蘇俄的國家民族利益效勞的中國共產黨，說成是「真的國民黨的國民主義者」。若不是今天中

共將這些中央文件解密，仍然會迷惑世人，顛倒了幾十年的是非，仍然要繼續顛倒。中共不同於歷史上的張獻忠、李自成，只知道蠻幹，中共從一開始就特別注重宣傳欺騙，不斷地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編造歷史。中共中央的決議明明是想方設法控制和瓦解國民黨，幾乎同時的陳獨秀的公開文章，卻口口聲聲表示爲了國民黨，好像爲了國民黨被右派破壞，而義憤填膺似的。

身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鄒魯，在《中國國民黨史稿》中，記載了中共已經控制了若干國民黨的要害部門的情況：組織部長由共產派之譚平山任之。如是一切黨之組織章程，悉歸其派。譚平山對於各地黨務之籌備員，有共產派者則派之，無共產派者竟不派。其派出人員，專收容共產派與接近共產派之人。工人部部長爲廖仲愷，秘書爲中共黨員馮菊坡，工人運動之事都被中共操縱。如辦工會，凡是共產派之工會，隨時准其成立，非共產派之工會，則多方阻礙。共產派之工會，則直接用共產黨訓練指揮之；非共產派之工會，則用工人部及政府迫挾之。農民部更被中共黨員秘書彭湃把持，試舉一例：農民部所辦的講習所，講員幾乎全是中共黨員，如毛澤東、周恩來、蕭楚女、惲代英、李立三、林伯渠、吳玉章、張太雷、鄧中夏等，他們用國民黨之名，宣傳蘇維埃式的農村暴力運動。

但是國民黨的忠貞黨員並沒有睡大覺，居正在《清黨實錄編輯大意》中，記載了這一反抗蘇俄——中共的最初過程：「改組以後，譚平山掌中央組織部，對於我純粹同志願赴各省區辦黨者，雖經總理允許，亦必多方吹求延擱。靳而不與其權；《嚮導》週報益肆挑撥離間之伎倆。既而上海北京純粹同志先後發覺《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及其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共產黨破壞本黨之陰謀昭然若揭。於是各地黨部群起要求開除共產派黨籍，計上海、北京、武漢、廣州、香港、澳門等處所提彈劾案都百餘件；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於十三年六月由滬赴粵，會同鄧澤如等，以中央監察委員名義提案彈劾；各地彈劾代表及同志復編發《護黨特刊》，同時廣州《民國日報》、《民權旬刊》、北京《民生週刊》亦摘

奸發覆，此第一次之清黨運動也。」⑤

居正以其在國民黨和清黨運動中的權威地位，將從改組開始到彈劾案的提出，歸結爲第一次清黨運動。他記載，當時各地向中央提出的彈劾案已經有上百件，這證明監察委員的彈劾是有相當的群衆基礎的，證明國民黨與蘇俄——中央的衝突，已經從上到下遍及整個國民黨。可惜由於在中央掌權者爲共產黨員等原因，這些文件已經不可得。

根據謝持的日記，早在四月二十一日就收到鄧澤如來函，要調查李大釗「不守黨義事」。之所以在上海，而不是在廣州，因爲「上海工於規避者也」。可見在中央所在地的廣州，蘇俄——中共勢力已經很大了。而謝持這時已經得到了若干關於中共內部的情況報告了⑥。謝持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份材料，是後來任中國青年黨主席的曾琦，通過謝持的女婿從巴黎帶回來的中共秘密文件，這文件成爲彈劾案的重要依據。曾琦記述其事：「予在法發覺共產黨之陰謀，載於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議決，予曾以語王寵惠、蔡元培、鄭毓秀等，囑其轉告中山，王等皆不以爲意。適謝持之婿曹任遠由德返國過法，予乃囑其轉告謝持。謝持聞之大憤，遂邀張繼赴粵告秘，不意反遭中山申斥。謝回滬，辦《護黨特刊》，對於容共，力持異議。及予歸國，乃約內外夾攻。予與中山晤面，亦由謝介紹也。」⑦

張繼的回憶錄記載：「余偕慧生赴廣州與鄧澤如檢舉本黨之共產分子。」抵達時間是六月九日。謝持、張繼抵達廣州當天，就進謁孫先生(據謝持日記)，並且立即開展政治活動。據「邵元沖日記」，張繼和謝持當天就與邵「談良久」；十日，在許崇智住宅與交談：「七時至汝爲寓，公寓溥泉、慧生、雪竹、澤汝、仲愷諸君，並略談黨事及共產黨對國民黨之態度。十時頃歸。季陶復自述其對共產黨之意見。」十二日在許崇智家一起吃晚飯的有「展堂、精衛、慧生、季陶、溥泉、介石、仲愷」⑧。其中除了蔣介石以外，都是國民黨的執監委、政治上的中樞人物。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九日，由鄧澤如、張繼、謝持具名的彈劾共產黨案正式提出。

《呈總理文》中，請求孫先生「督促中央執行委員會從速嚴重處分，以維根本，本黨幸甚」，並附彈劾書一件。

《致中央執行委員會書》全文如下：「中央執行委員會公鑒：現查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大會議決案及宣言》(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團刊第七號，即擴大執行委員會特號》(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一日刊行)，及其他印刷事實，經本委員會審查，認爲中國共產黨員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之加入本黨爲黨員者，實以共產黨黨團在本黨中活動，其言論行動皆不忠實於本黨，違反黨義，破壞黨德，確於本黨之生存發展，有重大妨害。本黨改組以來，首重紀律，今共產黨社會青年團加入本黨之諸黨員，如上述認定其違反紀律之處，尤爲嚴重，關係巨大，不敢忽視，特列舉事實。加具意見，提出貴會，希望從速嚴重處分，俾本黨根本不致動搖，不勝迫切企望之至。事實及意見條舉於後。此致。中央執行委員會。」並且附有中共內部文件數種(大約七千字)。最後提出五點意見：

㈠重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並且指出中共黨員的加入，「純係共產黨在本黨中之一種作用」，「完全不忠實於本黨」。

㈡揭露李大釗是「欺蒙總理，以求售其計劃，可謂陰險狠極」。

㈢中共因爲「加入本黨，彼等時欲以共產黨對於時局之主張，而强本黨辦理」。

㈣「彼等既爲本黨黨員」，在各種宣傳物中，又「妄加指擊或批評」，「黨團行於內，言論行於外，本黨根本未有不動搖者矣」。

㈤「此種行動，已摧破合作之界限，而妨害合作之精神。」

「本委員有上述意見，認爲關係重大，非速求根本解決，不足以維持本黨之存在及發展，故提出報

告書，希貴會從速處分，是爲公便。」⑨

彈劾案提出以後一星期，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在鮑羅廷的住所，謝持、張繼和鮑之間，展開一場關於國共關係和國民革命前途的有名的談話。談話當即公佈於廣州《民國日報》，影響很大。謝持和張繼一開始就指出問題的實質：中共「須受第三國際指揮，第三國際爲蘇俄所創造，又須受蘇俄指揮」，現在是否是國共兩黨「並進」？鮑的回答第一次承認國民黨內有左右派之分，承認組織黨團。這就違背了李大釗的保證。鮑還承認：「今日兩者本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唯兩相利用的結果，國民黨更多得利。」並且鮑堅持不取消在國民黨內的小組織，還要繼續分化瓦解被他稱作「已死」的國民黨。

七月三日，國民黨中央召開第四十次會議，正式討論彈劾案，做出三項決議：即發表宣言，表明態度，由汪兆銘、邵元沖兩位委員起草；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呈報總理。

參加連續幾次會議的一位中共委員，就數月以來的國共關係的緊張情況以及七月三日的部份會議記錄，向蘇共中央作了報告。此記錄報告保存在蘇共檔案中，近日得以公佈。該報告記載的國共關係短期內的發展，是保存得不多的原始記錄，表明國民黨內的反共領袖們已經成爲多數，以及彈劾案只是這一情況的表現，頗有參考價值：「他們在各地隱蔽起來以圖聯絡志同道合分子：北京的石瑛；漢口的劉成禺、覃振和詹大悲；上海的謝持、茅祖權、葉楚傖和張繼；廣東的鄧澤如、馮自由、蔡元培、孫科、方瑞麟、吳鐵成、熊克武和馬超俊。他們聯合起來，結爲一個以孫科爲首的集團，派遣他們的追隨者和死黨，秘密探聽跨黨共產黨員的情報，搜集反共材料，準備發起反共的總攻擊。幾個月來，謝持和他的朋友竊取共青團的小册子抄本，從中發現了一些使國民黨聽起來不大順耳的話。他們似乎認爲這就是反共的最好材料。當這些材料提交到第三十九次中央會議(按：即六月十九日的會議)的時候，張繼和謝持對

廖仲愷大肆叫罵，會議無結果且不歡而散。會後，張繼、謝持和孫科馬上就去見鮑羅廷顧問要論理一番，又不歡而散。一九二四年七月三日，在中央第四十次會議上，他們再度挑起此事。會議的出席者有十人：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邵元沖、林森、張繼、林祖涵、鄒魯、柏文蔚、譚平山和楊友棠（按：提案人之一的鄧澤如未出席這幾次會議，謝持在六月底已重病住醫院）。會議伊始，孫中山提議聘請鮑羅廷爲中央政治委員會顧問，張繼就起立反對。他先說了他同鮑羅廷談話的情形，並堅持認爲鮑羅廷決不可成爲我黨的顧問。因爲他說過，國民黨形同死亡。張做了長時間發言。譚平山則給以駁斥。」（以下張和譚的數千字的爭論記錄從略）最後的兩段可以反映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若干情況，抄錄如下：

「張、譚爭論持續了兩個小時，張未做回答。汪精衛後來說，張的廢話太多了；鮑羅廷同志對中國革命確實難能可貴，他忠心耿耿爲了革命；張說的關於鮑的話對後者很不公正。鮑羅廷是總理請來指導各種事務的，這比做政治委員會的顧問更重要。張繼爲甚麼認爲鮑羅廷不能做顧問呢？顧問是總理任命的，我們沒有甚麼好爭論的。至於兩黨之間的爭論，我們應當設法彌合。廖仲愷說，國民黨形同死亡，這個說法是對的。……張繼忿然起立，胡漢民制止，說廖方才的話是指另一個問題，要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專門會議研究。林森支持共產黨，說只要共產黨遵守國民黨宣言和三民主義，國民黨就不應分共。柏文蔚指出國共合作對國民黨，對加强國民黨政權有利，對目前同第三國際的聯繫有利。邵元沖提議召開專門會議，請求總理直接同第三國際聯繫。會議決定發表宣言解釋黨務，並於八月十日召集特別會議。」⑩（按：七月二十日出刊的《中國國民黨週刊》，發表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錄》，隻字未提會議的激烈爭論，寥寥數語帶過。可見研究這一段歷史的困難之一是，不能簡單地依據冠冕堂皇的公開聲明或文件。）張繼在孫先生仍然主張聯俄容共的時候，表現出來的剛直、銳敏和責任感，不是每一個委員都能夠達到。在聯俄容共初期曾經表示懷疑態度的汪兆銘，現在只是表現出一種媚

態。從來在國民黨中未擔任過行政重任的汪，從這時開始掌握權力。

現在發表的中共中央七月二十一日的內部文件(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第二三七至二三八頁)，可以見到中共在監察委員提出彈劾案期間的種種動向，打擊和分化國民黨的策略相當周詳，可惜包括孫先生在內的多數國民黨人，仍然處於被蒙蔽狀態：

「……自吾黨擴大執行會後，國民黨大部份黨員對我們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們激進分子，以和緩列强及軍閥對於國民黨的壓迫。此時國民黨只極少數領袖如孫中山、廖仲愷等尚未有和我們分離的決心，然亦決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㈠應由我們所指導的各團體或國民黨部，對於中央執行委員會表示不滿於右派的意見。右派重要的錯誤是：(A)不願反對帝國主義。(B)反對中俄協定，並根本反對蘇俄，說是國民黨之敵。……㈡我們同志應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提出左右派政見不同之討論。㈢今後凡是非表示左傾的分子，我們不應介紹他加入國民黨。㈣須努力獲得或維持『指揮工人農民學生市民各團體死黨實權』在我們手裏，以鞏固我們在國民黨左翼之力量，盡力排除右派勢力侵入這些團體。㈤各地急宜總之『國民對外協會』，一方面是建築反帝國主義的聯合戰線之中堅，一方面是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的新國民黨的結合……」孫先生處理彈劾案的前提是維護原來聯俄容共的局面，極力協調不同意見，但中共在這裏表現出的是繼續分化、打擊、瓦解國民黨，爲奪取政權做準備。這份文件由陳獨秀和毛澤東共同簽署。

四天以後，國民黨發表黨務宣言，主要內容有三點，重申「凡有革命勇決之心，及信仰三民主義者，不問其平日屬何派別，本黨無不推誠接納」；强調紀律的重要；靜待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顯然，這宣言面面俱到，是折中調和的產物，反映了孫先生和胡漢民、汪兆銘等人的態度。作爲起草人之一的邵元沖，非常不滿意這宣言被删改得不倫不類，他在日記中寫道：「晚七時至大本營，開中央執行

委員會，衆對於發表對共產黨問題之宣言，多方增減，成爲一不痛不癢之文字，而表示其欲言又不敢之態度，嗚呼！余信筆書唐人絶句：『含情欲説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二句，以解嘲。以此情形而言，亦幾有委而戀之意，特以當此鼠輩縱横之時，吾亦不得不忍辱負重，以漸收廓清之效耳。鼠黨譚平山，近愈見其陰鷙卑鄙，宜注意之也者。」⑪此會議由孫先生出席，邵元沖所引的唐人絶句中所言的「鸚鵡前頭不敢言」，即指張繼與譚平山激辯的時候，礙於當着孫先生的面，大都不便開口的情形。邵元沖把繼續的聯俄容共説成是「委而戀」，表現出無奈之情。

但是，在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以前，由於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而引發的衝突，仍然在加劇：八月一日，青年部秘書何世楨等二十二人上書孫先生説：「望我總理念本黨數十年締造之艱難，不容少數人破壞於一旦，毅然主持，命令該共產黨員全數退出本黨，並予傾向共產黨者以嚴重制裁。」二日，上海的喻育之教授等赴上海執行部，請求葉楚傖致電中央排除共產分子，並痛毆仍具共產黨黨籍之邵力子；十二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幹事代理委員長張德惠上書孫總理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控訴共產黨欺害勞工真相，監察委員則正式給予支持⑫。

引人注目的是，在七月十一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成立，雖然是中央委員會的下屬機構，但是平日輔佐孫先生籌劃政治方針。這個機構有成員七人：胡漢民、汪兆銘、廖仲愷、譚平山(數日後由瞿秋白取代)、伍朝樞、邵元沖，鮑羅廷爲高等顧問。其中的廖、譚自不必説，胡、汪是緊緊配合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伍、邵這時尚未表示反對之態，可以説，没有一個所謂的右派反對者。在這彈劾案已經提出，各地反共聲浪漸高之時，這暗示了孫先生的政治態度的變化。鮑羅廷傳記的作者就此寫道：「鮑羅廷在得到了孫中山等人各種支持的同時，也採取了一些有效措施。爲了集中力量解決黨内外重大的政治問題，鮑羅廷向孫中山建議成立一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作爲黨内政治指導機構，輔佐孫中

山制訂和籌劃政治方針。」⑬按照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的總章，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最高權力機關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十三條規定：「每星期至少開會一次」；第三十四條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互選常務委員三人，組織秘書處，執行日常事務。」章程上並沒有任何政治委員會的規定，所以這只是臨時的諮詢機構。但是，自從政治委員會成立以後，在顧問鮑羅廷的操縱下，就逐漸做出各種決定，然後再經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認可批准。在孫先生去世以後，鮑羅廷就變本加厲地將政治委員會置於中央委員會之上，甚至黨中的部長的任免問題都不經過中央執行委員會，使得鮑成爲中國國民黨的太上皇，所以鄒魯後來指責：「最近則黨權不在最高黨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權不在最高政治機構的國民政府，而完全集中於政治委員會，於是鮑羅廷就拿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資格，在裏面橫行操縱。」政治委員會的成立，對於以後的政治發展有重大影響，特此先在這裏說明。

爲了解決監察委員對共產分子的彈劾問題，八月十九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在廣州召開。張繼在會上發言提出七點理由，雖然繼續協同合作，但是以國共分立爲要。專程從上海趕來答辯的瞿秋白一改常態說：「既准跨黨，便不能沒有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然有一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行動。」並且說「共產黨之發展即係國民黨中一部份之發展」。瞿秋白根據共產國際繼續留在國民黨內的指示，在六月二十九日致鮑羅廷的信中，已經提出在國民黨內形成合法的派別，「就是在國民黨內形成左翼派別」（《瞿秋白文集》第二卷第六〇七頁）。蘇俄—共產國際命令中共繼續留在國民黨內，國民黨的繼續容共就正中下懷。經過激烈的爭辯，接受了政治委員會提出的兩項議案：《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和《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運動之聯絡問題》，即重申紀律，繼續容共；並且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來解決直接和第三國際等國際組織的聯絡問題。至於彈劾案中所列舉的中共黨員破壞國民黨的事實，並未解決，形成衝突的原因，依然如故。

現在解密的蘇共中央的檔案中，有鮑羅廷關於這次會議的報告。該報告表明，由於鮑羅廷和中共的恰當策略運用，最後中派(鮑羅廷將孫先生和同意他的政策的胡漢民等都稱爲「中派」)接受了左派(即鮑和中共)的意見，壓制了右派，孫先生在會議結束的時候忽然「左轉」。鮑的報告寫道：在開始的時候，中派和右派在反對共產黨的秘密黨團活動方面完全一致，並且中派「過去和現在一直都覺得，最好能把群衆掌握起來，並且安撫帝國主義。爲此，他們既需要右派，也需要共產派，不過他們要共產派聽從使喚。這樣看來，從中派說，就談不上甚麼開除共產派。剩下的便只有一個問題了：如何才能迫使共產黨就範，因爲共產黨是以一個獨立政黨領導下的小團體，在國民黨內開展活動的，國民黨就認爲，這意味着全體黨員也包括共產黨員實行領導的，就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派，後者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即第三國際的決議在領導國民黨。於是就應該提出一個問題：解散中國共產黨或者把共產派趕出國民黨。可是中派不能眼下也不想這樣提出問題，那就只好想出一個辦法，一方面刺探共產派『小團體』的秘密，另一方面還多少可以向右派多少打點馬虎眼。他們說，如果共產派(共產黨)把該黨關涉國民黨的決議或者共產國際的指示告訴他們，那爭論也就消彌了。……中派建議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設立一個聯絡委員會，由該聯絡委員會接受第三國際的所有指令，從而切斷共產派和共產國際的聯繫。……由此看來，共產黨人就要明白無疑地提出問題：要麼國民黨改變自己的政治綱領，孫中山收回說過的同意共產黨存在的話，這就意味着把共產黨從國民黨開除出去；要麼遵循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宣言和黨章，以之約束每個黨員，不管犯錯誤者或是別的甚麼身份，這就實際上意味着把右派開除出去。……決議剛剛通過，中派顯然就感覺到自欺欺人……。」⑭這當然是自欺欺人，因爲蘇俄—共產國際本身就是一個說好話的陰謀集團，中國本身是蘇俄的擴張侵略對象，國民黨本身是奪權的對象，是主義和歷史方面完全不同的組織，決不可能把種種詭計事先通知國民黨；鮑就是這個陰謀集團混入中國國民黨最高領

導層的間諜，極爲巧妙地影響孫先生的決策，千方百計地破壞國民革命，怎麼可能把第三國際給他的指示事先告訴所謂「聯絡委員會」呢？蘇俄和鮑的陰謀詭計，在如今公佈的蘇共中央檔案中層出不窮，令人髮指，我們也只能在現在，才看到蘇俄常常成功地欺騙了善良的孫先生和諸位國民黨的領袖。

所謂的「聯絡委員會」在鮑的報告中，既然只是一場欺騙所有國民黨人的「玩意」，這次二中全會就只剩下「繼續聯俄容共」幾個字。這是蘇俄—中共的又一次成功。

在國民黨內發生國共激烈衝突的危機時，廣州的市民因爲不堪忍受各種苛捐雜稅等長期壓迫而支持商團，商團則在英國的九艘炮艦支持下，也正開始舉行叛亂。這正好給鮑羅廷煽動孫先生「反帝」、支持共產黨控制的農工運動以藉口。這特殊的時刻，使孫先生不可能分共；並且正在此時，蘇俄的大批軍火運抵廣州，這些武器，立即被分配給黃埔軍校的學生，從而在十月中旬撲滅了商團的叛亂。這也是不可能立即分共的原因。孫先生一方面自信他可以完全控制局勢，但是他在特殊險惡的環境下，的確是左右爲難，最後不得不決定繼續容共。所以，鮑在他的秘密報告中說：「會議行將結束時，孫中山『忽然』在這個問題上左轉。」

不過，由於造成摩擦的原因並未解決，所以一切衝突照常發生，而且加劇。首要問題仍然在聯俄容共這一政策本身是否正確。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了以上的會議之前不久陳獨秀的感嘆和看法：「陳先生對這件事極其爲難，又異常激動。他說這都是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所引起的難題。他說中共如果遵照國民黨的意見，取消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這無異是將我們的組織溶化在國民黨內，沒有獨立性了，這是我們做不到的事。但是要默認中共在國民黨內有黨團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他認爲這是無法解決的。他感嘆地說，如果他是國民黨人，也要反對中共。胡漢民、謝持、汪精衛、張繼四人幾乎可以代表國民黨全體，除謝持一向反共外，其餘三人都不能說是右派，而是支持國民黨改組的。現在他們共

同提出這個問題，決不能等閒視之。」⑮

國民黨的理論家戴傳賢，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致蔣介石的信中，也提到在全國代表大會以後不久，他與譚平山的一段對話：「唯此兩種中心之不能相容，則爲本黨之根本問題，此根本問題不能定，則其他相爲因果之紛爭，將永無已時，蓋主義與思想爲一問題，而組織與人事，又爲一問題，此混雜不清之組織，雖有上智，亦無能爲力……。今日中國之需要，則爲一有力之國民黨，共產黨人亦既承認之矣，若於此時，共產黨之同志，能犧牲其黨籍，而完全做成一純粹之國民黨，使國民黨中，不致同時有兩個中心，然後一切糾紛，乃可解除，而組織工作，乃不至受此無形之障礙。……平三云，此事現在絕作不到，兩黨之合作，能至何時，在弟亦殊難逆料，將來總有分離之日，今日欲共產黨人拋棄其黨籍，則絕不可能。」⑯國民黨內怎麼能夠有兩個不同歷史、不同主義、不同組織、不同背景的中心？而且其中的一方正在有侵略傳統的外國的支持下，正在另一方的內部，想方設法瓦解對方，美其名曰「幫助發展」。能夠長久嗎？

陳獨秀、蔡和森等連形式上的約束，即組織國際聯絡委員會，也不願意接受，曾經報告共產國際，要求退出國民黨。但等到明白其中的奧妙以後，也就煙消雲散了。

蘇俄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這前後曾經舉行了一系列關於中國的會議：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日政治局第八十次會議，由契切林和季若維也夫報告，斯大林主持；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政治局第八十一次會議，由契切林、伏龍芝報告，斯大林主持；一九二四年七月二十四日政治局第二十四次會議，由斯大林主持；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一日政治局第二十二次會議，由中央委員會書記莫洛托夫主持。

在蘇俄的直接指揮下，利用孫先生的嚴重困境，蘇俄的傳統擴張以一種新的形式，加緊全面篡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

註釋：

①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三九三頁。
②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第九六頁，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③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第二三一頁至二三七頁。
④ 《嚮導》(影印)週刊第六二期，大安株式會社發行，一九六三年，東京。
⑤ 《清黨實錄編輯大意》，居正編。
⑥ 《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第一八六頁。
⑦ 同上第一八九頁。
⑧ 《邵元沖日記》第一七至一八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⑨ 《革命文獻》第九輯第七三至七九頁，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民國七三年，台北。
⑩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三九八頁至四〇二頁。
⑪ 《邵元沖日記》第二八頁。
⑫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至十二月)，中華民國史料中心印行，國民六十四年，台北。
⑬ 《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第一六七頁。
⑭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四二六至四二七頁。
⑮ 《我的回憶》第三三二頁，張國燾著。
⑯ 《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冊第九八〇至九八一頁，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出版，台北。

十、孫中山最後的日子

作爲一個政治領袖人物的孫中山先生，去世以前半年的最後日子十分地艱難：在國民黨內，由於聯俄容共的政策，使得最高層次對立的意見已經變得非常尖銳，孫先生不得不提出開除老資格的國民黨員馮自由以維持政策的繼續；作爲第三國際支部的中共，雖然在孫先生做出了很大讓步以後，仍然一面以聯合的姿態乘此控制各種要害部門，一面則利用所控制的刊物，發表一系列文章製造輿論，反對孫先生的每一樣重大決策，如平息商團的方式、聯絡勢力人物的任何措施、關係到國民革命成敗的北伐等等；北方軍閥段祺瑞在孫先生北上病重以後，反對召集國民會議，擅自召開軍閥分權的善後會議；雖然商團被平息，但是陳炯明和西南的軍閥仍然虎視眈眈，加上廣州市民厭倦駐軍長期的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再有香港的英國當局的威脅，使得唯一的廣州根據地岌岌可危。在這危難時刻，只有國民黨的老黨人們贊同他的每一樣重大決策(除了聯俄容共以外)，促使馮玉祥倒戈的「北方革命」也是由張繼等幾位北方黨人所促成，而老黨人則一面辦刊物與中共在宣傳上進行着激烈的筆戰。

但是，最令孫先生安慰的是，國民黨在全國的地位和影響，是任何其它的政治力量遠遠望塵莫及的；北方軍閥雖然有軍隊，可是完全沒有人心，馮玉祥的政變也是只有和國民革命結合，才能獲得廣泛的支持和影響。在孫先生彌留之際，鮑羅廷給上級的報告中談到了國民黨的地位：「在北京政變後，在全國群龍無首的混亂情形下，能夠挺身而出的只有一個黨，即國民黨，只有這個黨能或多或少對中國急待解決的問題做出明確的回答。只有國民黨知道應該做甚麼。」①問題就恰恰在這裏。這就使野心勃勃

的蘇俄—中共篡入國民黨內部，像水蛭一樣吸取養分，壯大自己。孫先生是明白的，在國際上太孤立的他，沒有其它得到援助的辦法。而一旦將蘇俄顧問置於身邊，作決策時，也就不可能不受影響。孫先生的聯俄容共立場正如他到達天津以後，通過汪兆銘等發表的聲明那樣，既要宣佈和蘇俄—中共的距離，也要表示忠於蘇俄的友誼。

孫先生最後的日子是悲壯的。

在國民黨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始時，陳獨秀寫信給共產國際東方部第一號負責人維金斯基，大加抱怨：「孫中山雖不致馬上放棄我們，但又毫無跡象顯示他想制止反動派對我們進攻。……至於國民黨內現狀，我們認爲，這個黨內只有反共分子，如果說一定有左派的話，那也是我們自己的同志。孫中山與幾位別的領導人是中派，不是左派(甚至戴季陶也不過是個左翼理論家而已)。由此，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能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爲他們掌握黨的全部機關。他們的對內政策有反對工人的傾向，而對外政策則有反俄傾向。如果援助照此因循下去(幫助反動派)勢必給遠東革命帶來很大影響。」會議結束後的九月七日，陳再次寫信給維金斯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結束了，該會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和其他人的態度表面上是中立的。他們不能同我們的同志爭論，也不敢得罪右派反動分子，然而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分子壓力和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迫使共產黨服從國民黨領導或者至少使共產黨對他們公開自己的一切。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絕對不能同意這樣做，並且認爲鮑羅廷同志中了孫中山和其他人的圈套。」於是，共產黨針對國民黨展開了一系列的批判，幾乎國民黨的每一次政治行動都會被批判。

但是，國民黨內的反共之士又如何？八月三十日的中央全會上的原始記錄，向我們展示張繼與孫先生之間爭辯的難以想像的激烈程度。孫先生在國共雙方都參加的會議上批評反共黨員不懂得「主義」，

並且點名批評馮自由：「『馮自由就是因爲自己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便掀起了反對共產派的運動。我相信，儘管這樣大規模的運動不是馮自由一個能夠煽動起來的，可是他畢竟是二十年黨齡的黨員，在同志們中間有一定的威信，這些人無意識地跟着他叫嚷。現在我以黨主席的身份宣佈開除馮自由。』……沉默了幾分鐘。孫中山博士環視四座。張繼忽然開口了：『開除馮自由，您有權這樣做，但是不理解民生主義者，黨內大有人在，再說，國外華僑也全都不理解。另外，我本人也和馮自由一樣的立場，所以請您也處罰我吧。』孫中山博士繼續說：『你張繼，只不過是不知道、不明白而已，你的立場和馮自由沒有任何共同之處。……』接着孫博士講了第一次革命的歷史，指出黃克强和宋教仁的妥協做法，說他們當時不堅定、不守紀律而阻礙了革命進行。說到這裏，張繼打斷了孫中山，說：『主席，您過去宣傳的思想可是——先統一中國，然後才是實行三民主義——現在我們反對民生主義恰恰也是根據這個思想。』博士回答說：『我們連黨都統一不了，還談甚麼國家！……』然後是孫先生帶着非常感情色彩的談話：『如果所有的國民黨員都這樣，我就拋棄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張繼打斷孫博士的話，說如果主席是共產派，那我們也都當共產派。『至於說開除馮自由，那麼可以命令中央委員會去執行。』」②當張繼出於衝動，要孫先生將他和馮自由一起開除的時候，孫先生立即表示張與馮不一樣，做出了妥協；後來孫先生激憤地說，要去參加共產黨時，張繼也立即妥協，要緊跟，而且同意開除馮自由。幾乎同樣的情況也在孫先生與謝持之間發生。在這之前一星期，謝持從醫院出來欲返上海，向孫先生辭行，一提起共產黨問題，孫先生就立即生氣說，「你們再反，我就把國民黨交給你們，我帶着小宋去蒙古重新再幹。」③但孫先生在激動以後，表示不會容許中共奪權，仍然和謝持談得很好。謝持回到上海以後，不再議論孫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的本身，而是和絕大多數老黨人一樣，一面和中共展開宣傳輿論的筆戰，一面在孫先生領導下，進行具體的、完全不同於中共所期望的國民革命的工作。

同盟會成立以前，在日本的第一個留學生革命組織「青年會」就是由馮自由和張繼發起，同盟會正式成立，馮自由擔任評議部的負責人，並且擔任港、粵、澳的主盟人，辛亥前馮自由在美洲華僑中宣傳活動，爲革命籌集到大量款項，中華革命黨成立，馮自由擔任黨務部副部長。一直到改組，馮自由都沒有一刻離開過孫先生的革命陣營。現在，既然因爲反對有蘇俄背景的中共的篡權野心而被宣佈開除出國民黨，張繼能夠不憤而起立辯護麼？並且這次彈劾案是由鄧澤如、張繼、謝持聯合提出，卻只是處理馮自由，聲稱反共風潮是由馮自由鼓動而起。僅僅全國的彈劾文件就有一百多件，馮自由能夠鼓動得起嗎？雖然孫先生爲了他的全局着想，要維持聯俄容共的局面，從張繼的立場，很難沒有意見，與剛剛進入中樞而只知道附和的汪兆銘之類當然不同。不過馮自由與大多數老黨人們也有區別，他沒有看到雖然聯俄容共政策在繼續，但是孫先生在各個具體問題上，如聯絡奉張、浙廬，團結西南諸將領、處理商團叛亂的最後政策，以及不顧中共的全力反對，仍然堅持北伐等問題上，根本和中共不同。忠於國民革命的馮自由，沒有能夠足夠地信任和期待孫先生，而有一時的分歧。

孫先生繼續容納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活動，並且讓中共黨員佔據要津；而又將老資格的忠貞反共黨人留在黨內擔任監察要職，完全容許老黨人們在上海辦各種雜誌反對中共，並且仍然由他們來進行各種上層的交涉。這些交涉一旦成功，就沒有蘇俄—中共的地位，因此一直是蘇俄—中共深惡痛絕的。所以兩黨之間仍然繼續摩擦。

中共則根據蘇俄的決議，繼續採取了全面地進取的方針，幾乎到孫先生去世以前，每一次國民黨人的重大決策，中共一定反對，並且指名道姓攻擊孫先生。非常巧妙的是，鮑羅廷一面影響孫先生，「利用他的左傾」(蘇共文件的原話)，一面又和主張與國民黨分裂的陳獨秀不同，在某些具體政策上附和孫先生的決定，使得聯俄容共得以維持，以便中共繼續利用國民黨在基層發展勢力，在高層繼續掌握若干

重要權力；而中共黨人則在宣傳方面，從外部對國民黨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批評攻擊。在其機關刊物《嚮導》等雜誌上，不斷地批評國民黨「右派」，甚至「中派」(即孫先生等國民黨人)。更利用蘇俄的金錢，控制國民黨辦的《民國日報》，使得上海《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完全變成中共喉舌，還幾乎控制整個報紙，把國民黨的負責人也排擠走；所使用的打擊國民黨人的宣傳武器就是高喊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處處鼓動農工運動。如果稍稍反對，就會被扣上不反帝和不支持農工的罪名。

在輿論宣傳方面，《嚮導》週刊對國民黨的全面批判，從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第八十期起，連篇累牘地發表批判國民黨的文章。其批判對象，不僅僅是所謂右派，連他們心目中的中派(即孫先生等人)也不放過。他們的內部文件已經規定得很清楚，左派就是共產黨人，所以他們的批判對象是以孫先生爲首的中國國民黨的全體。

本來，不同的政黨間的互相批評或揭短，是正常的政治現象，是一種彼此監督的形式。但是現在號稱「合作」，中共黨員已經加入了國民黨，並且控制了若干的要害部門，國民黨的長短應當就是自己的長短，可是中共卻又在自己單獨辦的機關刊物上指東道西，隨意謾罵，處處表現自己黨比國民黨更高明，這就潛藏着欲代替之的陰謀詭計，實際是爲蘇俄擴張而進行的宣傳舉動。

僅僅以八月下旬開始的兩個月內的幾期爲例。這些文章主要有三方面的主題：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走狗軍閥，以及不反對這二者的「右派」，甚至所謂「中派」。嚴格說，《嚮導》的質量不高，缺乏可讀性，像是陳獨秀個人的隨感錄。例如第七十九期一共有六篇署名文章，其中以「獨秀」署名者佔五篇；八月二十七日第八十期署名文章有四篇，獨秀佔兩篇，但是在罵人的雜文《寸鐵》專欄中，十段罵人的短文全是他一個人之作。還好，罵國民黨的只佔四段，這一期罵國民黨的文章是《國民黨左右派之爭》，並無新意。

但是第八十一期是專門組織的通過讚揚義和團，批判整個國民黨的文章。蘇共的檔案中有記載，知道孫先生等國民黨人瞧不起義和團，國民黨領袖們這一知識分子集團認爲，從理想到國民革命的實踐過程，都不是簡單排外的義和團可以比較。以「獨秀」的首篇文章的題目是《我們對義和團兩個錯誤的概念》，「第一個錯誤的觀念：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表示「與其憎惡當年排外之義和團之野蠻，我們寧憎惡現在媚外的軍閥官僚奸商大學教授新聞記者之文明」。「第二個錯誤概念：以爲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的少數人，保全了中華民族史上一部份榮譽」，陳在此已經不止對準所謂右派了。第二篇是彭述之的長文，認爲「義和團的價值決不下於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應該繼續義和團之廣大民族群衆革命運動的偉大精神」，核心還是貶低國民黨。蔡和森的《義和團與國民革命》寫得更直接，指出辛亥革命的意義「不如義和團之重大」，「現在具有這樣好的政綱之國民黨，若以義和團排斥外國帝國主義之真精神，國民黨也是可以領導國民革命至於成功的。」張太雷寫的《列寧與義和團》中，一方面指出「俄國得賠款獨多，並欲强佔東三省全土」，但又宣傳列寧廢除了這些不平等條約，更爲偉大。其實這些條約到本世紀末都沒有廢除。

如此極端的排外反帝主張出自甚麼呢？出自蘇俄駐北京大使加拉罕的指示。在監察委員的彈劾案提出以後，加拉罕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寫信給鮑羅廷，面對國民黨「右派」的進攻，巧妙的反擊策略就是高喊「反帝」，這樣「右派」將「不堪一擊」，加拉罕在信中說：「似乎要想個策略，即把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列入日程，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當然不是指南方政府要採取行動的問題，而是鼓動宣傳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右派不堪一擊，因爲他們不想認真進行，據此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組織左派發起進攻。」這指示發出後一個多月，即九月三日，以讚揚義和團的絕對排外主義爲名，拉開了別有用心的反帝大合唱的序幕。正式的宣傳運動，是下一期登載的《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第三次宣言》，即以江浙

戰爭和廣州商團事件爲中心，中共高喊反帝反軍閥爲口號，對孫先生爲首的中國國民黨展開了激烈的宣傳攻勢。

孫先生與蘇俄—中共的分歧在何處呢？仍然如聯俄容共一開始時的那樣：孫先生雖然抗擊帝國主義和軍閥，但是一有可能，就立即與之進行交涉，正面的武裝衝突總是放在下策，從來就不主張使社會大動盪的階級鬥爭；而蘇俄—中共永遠把自下而上，即總是將進行階級鬥爭的農工運動放在第一位，反對所謂純軍事鬥爭，更反對妥協調和。在這一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的根本分歧上，雙方從來都沒有退讓過。正因爲在這些根本問題上，在實際的國民革命的做法上，孫先生和蘇俄—中共總是對立，所以，雖然繼續容共，老黨人們仍然心悅誠服地擁護孫先生，並且出力，但是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與陳獨秀等展開論戰。

因此，在商團事件、江浙戰爭、北伐三個大問題上，以及國民黨聯合西南諸將領共同討伐直系方面，陳獨秀、蔡和森等中共黨人都對孫先生進行了正面批判。在《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第三次宣言》中，對浙江的盧永祥與反對曹錕的戰爭，按照中共從來的無限上綱的階級論，立即將這定性：「江浙戰爭，其戰爭之實際性質，是直系與反直系的軍閥間全部大戰爭之開始；同時，也是美英和日法兩派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爭鬥之開始。」「目前解救中國之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既得權利與勢力。」在《嚮導》上，高君宇、彭述之、蔡和森，特別是陳獨秀等人，都引申和發揮此觀點。

本來，自曹錕賄選上台，孫先生即與張作霖和盧永祥有約，共同抗擊直系。現在直系的齊燮元和孫傳芳聯合攻浙，江浙戰爭在九月一日爆發，盧永祥在四日來電，請求分道出師，共同討伐直系，所以孫先生立即在五日召集軍事會議，決定立即出師北伐，並於十二日移大本營於韶關。一貫反對所謂純軍事

行動的中共立即對孫先生的決定加以攻擊。

另外，在解決商團的開始，中共曾經拍手叫好。但是，因爲廣州市民長期不忍苛捐雜稅的攤派，使得商團的叛亂得到了市民的支持。所以在將商團彈壓以後，不得不妥協，發還部份槍支，撤銷對於陳伯廉的通緝，任命與商團有關係的李福林軍長負責市政，商團人物李朗如爲公安局長。這立即引起中共的批評。蔡和林連續在《嚮導》第八十二期、八十三期，點名孫先生進行批評，並且還在文中時而稱孫先生爲「老頭子」：「這種政策的內容：第一是中山先生離開廣州而赴韶關，以避免與英帝國主義的衝突；第二不僅發回扣械，而且以廣州市政交與反革命的商團(商團軍幹事李朗如已代理公安局長)；第三與陳炯明妥協，所謂以廣東還諸廣東人民，便是以廣東還諸英帝國主義走狗陳炯明及買辦階級。這就是北伐政策的背景。……我們現在更堅決主張：與其强顏交還廣東於英帝國主義的走狗而上甚麼北伐政策的鬼當，毋寧拋棄廣東而與英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決一死戰，以開始全國反帝國主義的真實工作！」陳獨秀則發表一萬多字的長文《我們的回答》，全面與國民黨展開論戰，主要回答謝持在上海創辦的《護黨特刊》，和《民權旬刊》、《共產黨破壞國民黨證據之一部》三種印刷品。在《嚮導》第八十五期，陳獨秀更以《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爲題，系統地對於國民黨的根本方針問題，進行了批判。陳獨秀的邏輯是，要有一個革命的黨(按：即共產黨)，才能夠有一個革命的軍隊，才能夠有革命政府。而廣州政府並非如此，所以全面地將孫先生領導的廣州政府完全否定：「實際上，這革命政府完全建立在反革命的軍隊、反革命的官僚、反革命的商人階級力量之上面，這反革命的軍隊、官僚與商人，不但是政府的支持力量，並且是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勢力之大本營。」這樣的政府，當然應該是革命的對象了。陳獨秀爲國民黨指出了一條路：「現在有一條雖較遠而可通的道路給我們走，就是只有全國工人農民士兵之聯合的大暴動，才可以破壞全軍閥階級的軍事勢力；才可以驚醒帝國主義者條約神聖的美夢，使他們

不得不放棄在華不法的權利；才可以擊碎商人紳士勾結帝國主義及軍閥的奸謀；才可以實現革命的軍事行動；才可以轟起全國革命的高潮及熱忱。」陳獨秀指出的這條路，就是蘇俄十月革命的翻版，如果照這樣走下去，孫先生就變成了列寧，國民黨變成了中共，中華民國就變成了蘇維埃共和國。陳只是蘇俄意見的執行者和利益的維護者，孫先生和國民黨怎麼可能按照這條道路走下去呢？蔡和森在這一期文章的醒目標題是《警告國民黨中派諸領袖》，對「中派」以八個字概括：「猶夷妥協，居中取巧」，警告他們要「懸崖勒馬」。這是警告孫先生。

《嚮導》的下一期是《雙十特刊》，系統地對辛亥革命加以貶低和否定，直到孫先生親自出面制止，方才減少這一類論調。不過，根據蘇俄的策略，這樣做，是「促使國民黨集體左轉」的一部份；瞿秋白在後來的著作《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中透露：「一九二四年九月廣州商團叛變時——正在買辦階級進攻中山政府的當口，中央局決定要猛攻中山一派的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等，不主張對他們稍稍讓步，以集中勢力攻擊買辦派。」可見他們的批判對象是整個國民黨。

中共有幾個刊物作輿論宣傳還不夠，又進一步染指國民黨辦的《民國日報》，該報最初由陳其美在一九一六年創辦，銷路頗好，影響很大。所以中共決定篡奪該報領導權，使其逐漸變成中共的宣傳機關。首先將副刊《覺悟》由中共黨員控制，然後將國民黨的筆桿子胡漢民、汪兆銘、于右任、邵元沖掛名，實際上由共產黨的筆桿子惲代英、施存統、毛澤東、鄧中夏掌握和寫文章，整個報紙則由國民黨人葉楚傖和共產黨人瞿秋白負責。但是，由蘇俄給報紙的經費是通過瞿給的，加之報紙中的中共黨員人數眾多，所以到後來一度逼走了葉楚傖，報紙左轉，葉不得不到廣州去向孫先生告狀。《民國日報》的變遷本身，就說明了蘇俄的擴張陰謀和所謂「國共合作」的實質。

《嚮導》週報的一再破壞國民黨聲譽的行爲，終於爲孫先生所批評。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常務委員

鄒魯就《嚮導》第八十五期上陳獨秀的文章《國民黨的一個根本問題》，指出該文「議論本黨，涉於攻擊污蔑，應如何對付案」？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致函《嚮導》週報，加以警告。」在十一月十日，朱和忠報告上海中共控制的《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的種種不軌言論，孫先生批示，要中央委員會嚴厲頒佈紀律，「禁止本黨各報之狂妄」，孫先生仍然從同一的黨內不宜有陳獨秀等的狂妄言論着眼。

《嚮導》的「狂妄」只是表面，如今公佈的中共中央文件中，揭示出這只是中共中央分化瓦解國民黨的一種策略運用。在一九二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和青年團中央聯合的一個通知中說：「㈢我們在民校工作之重點，爲宣傳左派政治主張(以《嚮導》之所指示爲準)，造成左派地位，對右派之反動行爲及言論，務必不懈地加以攻擊，此種工作不限於本地有無右派分子，即使本地民校工作完全在我們之手而無一右派分子，亦應當同樣積極的進行此種工作，因爲必如此才能造成真正左派。㈣左右派的分化要在行動與爭辯中才能看出，左派的地位也要在行動中才能造成與鞏固……。㈤要有左派傾向的分子才介紹加入民校……。㈥我們在民校中的地位爲左派，胡漢民等爲中派，孫科以致葉楚傖等爲右派。我們對於中派的態度，應以照《嚮導》之所指示而批評之……。」④仍然和過去的規定一樣，中共自己是左派，打擊所謂右派，利用和批評所謂中派。歷史已經證明，所謂的中派對蘇俄—中共抱有幻想，以爲俄國是反帝的，與其它西方國家不一樣的，而忘卻了俄羅斯民族數百年來傳統的擴張，面向東方，是因爲向西的擴張失敗以後，才在意識形態的包裝下伸出魔手。在蘇俄—中共的眼中，「中派」與所謂的右派一樣，都是左派(中共)的敵人，只是利用而已。

而中共中央不過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只是執行第三國際的指示而已。中共在孫先生去世前的「狂妄」，也是執行斯大林指示的結果。現在解密的蘇俄檔案的四個俄羅斯和三個德國編委在第五編的說明中指出：「二十年代中期，國際革命運動中出現了極爲複雜的形勢。資本主義世界治癒了第一次世

界大戰的毀滅性遺患而獲復甦。歐洲戰後革命高潮結束，共產國際只好推出世界革命持續發展階段正在到來的說法。……共產國際就在其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二年六至七月)召開前夕出現了明顯的左傾。……共產國際的上述方針不能不反映在關於中國問題的理論分析上。……魏金斯基的觀點如下述：中國資產階級正在背離革命，力圖組建有右派參加的政黨；國民黨正在變成群衆性的人民政黨；無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不是直接的，而是要通過國民黨。……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決議，已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⑤查中共開始加入國民黨的時候，的確並不像孫先生去世前那樣「狂妄」，這一切的轉變，都是來源於蘇俄整個的世界革命的策略轉變。仍然把蘇俄當做「以平等待我」者，將要付出代價了。

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合發動北京政變以後，孫先生準備應邀北上，召開國民大會，和平統一中國。這立即引來中共的攻擊。趙士炎在孫先生發表《北上宣言》的前後，兩次發表文章，點名批評孫先生，在《政治生活》第二十期上趙說：「我們所恐怕的是：中山先生這個電報只是國民黨右派之主張催促，或因有人歡迎而發。我們尤其恐怖的是，倘若中山先生完全爲妥協而來，拋棄了宣言與政綱，致於中國民族之墮落。」⑥中共中央在內部的通告中，對孫先生的北上和宣言做出了評價：「孫中山已到上海，日內即赴京津，其宣言已在各報上發表。此宣言純粹代表國民黨中派觀念，措辭含混，大有與各軍閥妥協之餘地，且語多抽象，並無代表人民利益的具體要求，彼此次北去受軍閥和國民黨右派兩面之包圍，結果恐甚危險。」⑦張國燾的《回憶錄》也記載了在孫先生北上的前夕，中共在北方的組織，如何反對孫先生，後來又如何改爲歡迎，這後面都是蘇俄作祟。

以上是在孫先生最後的日子，中共反對孫先生每一次革命活動的簡要事實。另外，被中共稱爲「右派」的老國民黨員們，在中共隨意的謾罵下，又做了甚麼呢？

從改組開始到彈劾共產黨的失敗，是孫先生爲最高領袖的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核心的最後大變化。在改組以前，幾乎從中國國民黨正式成立起，孫先生周圍的主要成員如下：總務部長是居正，即相當於今天的國民黨秘書長；黨務(組織)部長謝持，兼非常大總統府秘書長；財政部門由鄧澤如和廖仲愷負責；宣傳部長是張繼；總參議是胡漢民。改組以後，只有緊跟的胡漢民的位置未變，張繼、居正、謝持、鄧澤如都離開了權力中心，由汪兆銘、廖仲愷取代。汪過去只負責過對軍閥交涉，廖只負責過財務，如今他們二人代替了張繼、居正、謝持三人在國民黨的地位。至於國民黨的財源，已經不再依賴華僑，而主要依賴財力雄厚得多的蘇俄，鄧澤如從此少問政事，也就沒有大礙了。這一權力核心的變化，對以後中華民國史的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這幾人從此再也沒有進入過國民黨的權力核心。因爲孫先生不久之後去世，然後是蔣介石在鮑羅廷—中共支持下突然崛起。蔣的時代是另一朝「臣」了，雖然胡、汪都輔佐過，但都以悲劇收場。

彈劾案的失敗，使得張繼、謝持更遠離權力中心，居正更在楊行鄉間養蜂。張繼終於在十月十七日提出辭職書，請求解除中國國民黨的黨籍，《中華民國史實紀要》記述其事：「本年八月十九日舉行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國民黨內之共產派問題』，由監察委員首先說明其報告書，力主分共爲宜，但因孫總理顧及廣州四面皆敵，正宜集中力量，故不能遽行，張氏遂憤而離粵。至本日上書總理，請解除黨職，兼除黨籍，原呈有謂：『自八月大會以來，共產派背行無忌，繼恥與爲伍，請解除黨職黨籍。』其時，居正也退居楊行，不問黨務。居正自著《梅川譜偈》載：『余廈門返上海，蟄伏楊行鄉居，日以養蜂爲事，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余亦不去。』」恰好在同一天，謝持也上書，請求辭去中央監察委員，但沒有請求解除黨籍。這一行動不見於史料記載，只見於謝持的日記：「提辭職書，辭本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蓋因病曠職，而又惡共產派之橫恣也。」⑧謝持在孫先生任

非常大總統總統府秘書長之後，曾代理國民黨總理八個月。現在，謝持與張繼一起提出辭職，可以想像，對孫先生構成了多麼大的壓力。

不過，從事後的發展研究，謝持的辭職未獲准。究竟孫先生如何將他留下來，已經不可知，但是張繼的退黨和辭職卻獲准了。這獲准的時刻，正是老黨人王用賓在本年初提出的「首都革命之策」進入關鍵的時刻，即王在北方已經與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三位將軍約定在北京舉行政變，推翻直系軍閥對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然後到上海欲促成孫先生北上，孫先生曰「可」。北方的局面急需要人去主持。但是，孫先生身旁的重要人物大多數是廣東人，北方人中的第一號人物是張繼，張繼卻被孫先生同意退黨。謝持這時利用他手中掌握的孫先生的大印，利用孫先生給予他的可以以國民黨總理的名義行事的權力，矯命而任之，謝持的《天風海濤館六十自述》記載其事：「十二年，滇軍受命逐陳炯明，中山先生又還粵，舉爲大元帥。當其離上海也，以孫文印見畀曰：『凡黨中應由總理簽名處決者，悉以委託焉。』辭不敢受，遇大事仍請示而行之。……及國民軍起，黨人之在北方者，擬定數人，請組織軍事委員會。中山先生獨靳於某君不予委，然某君不可靳也，余遂矯命而委之。中山先生來滬，乃請罪焉。」⑨這孫先生專門命令不得委任的「某君」就是張繼。謝持在十月十九日以孫先生的名義下達委任令以後，在二十二日又將此委任令轉抄王用賓。《中華民國史實紀要》記載：「此項軍事委員之任命係發動『首都革命』者，未數日事即成，曹錕被幽。」同時，謝持聯合田桐、林業明致電孫先生和中央的各位黨人，指出孫先生在處理張繼問題上的失誤：「溥泉(按：這是張繼的號)誠潔戇直，入黨以來，忠黨忠先生，歷歷有據。此次電請辭職，請准出黨，實因愛黨、愛先生太過，激於上海黨事、《民國日報》事。然在先生應加優容，俾得共國事，今竟允其出黨，人將謂非溥泉離先生，是先生棄溥泉。且北方事變急，馮、胡勢成騎虎，孫岳有連帶關係。溥泉於北方所係最巨，轉移孫岳，非溥泉不能。當此圖北之

際，尤應同志團結一致，不宜齟齬。伏請先生收回成命，並加派溥泉爲軍事委員。諸兄於黨休戚與共，務請一致力請。」⑩老黨人們所促成的這場「首都革命」，在國民革命史上是一件大事，當然又遭到中共的批判，《嚮導》第八十九期上，陳獨秀的文章題目是《北京政變與中國人民》，蔡和森著文兩篇反對，題目是《北京政變之內幕及其結果》、《北京政變與國民黨》，彭述之的文章題目是《北京政變與投機無恥的公團之請求》。可笑的是，在同一期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著文，以「肅清內部」爲題，指名要孫先生開除張繼等一批國民黨員，實在荒唐，此不在話下。

孫先生不顧蘇俄—中共的反對，繼續聯絡西南各方勢力人物。《申報》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以《西南團結運動之進行》爲標題說：「西南運動各省運動之大團結，自川軍將領石青陽、但懋辛來粵疏通後，中山極端贊同，隨以西南聯軍一職畀唐繼堯……，擬改北伐聯軍爲建國軍，以示西南軍又進行之劃一。」陳獨秀卻在《嚮導》第八十四期上以《西南團結與國民革命》爲題批評說：「我們看透了所謂西南團結其力量乃建築在西南將領上面，這便是南方軍閥之團結，他們頂爭氣也不過與北方軍閥爭奪地盤到底。……我們曾指斥『西南團結』是和南方軍閥有關係的政客的投機運動，不是革命的方法，因爲西南將領不但沒有一個能走革命的路，而且多是反革命的人物。」聯絡西南勢力人物的工作主要由四川人的謝持來進行，他在日記中有多處記載。最有甚者，這工作還請出了久居田園、不聞黨事的居正出面，一起聯絡西南各方，謝持十一月十三日的日記記載：「今夜我與覺生(按：即居正)出名請西南各省代表」；十一月十五日記載：「與覺生作主人治酒宴西南代表」⑪。之所以團結西南各省勢力人物如此急迫，是因爲馮玉祥等人的政變成功以後，馮玉祥等立即擁護段祺瑞爲大元帥；段祺瑞則欲將西南的擁護國民革命的勢力人物統統拉過去，張繼因此在十一月六日北京致電孫先生，要求暫緩北上：「段派毫無誠意，採用釜底抽薪，使西南各省脫離先生。」(見《國父年譜》第二〇八三頁)謝持十一月四日的日記

記載：「電中山先生，促北上，促籌團結在粵各軍，團結西南各省之辦法。」在孫先生十一月十八日到達上海以後，上午見過孫先生以後的謝持，下午立即會議商討有關團結西南的事情(見謝持未刊日記)。所有這一切，都是得到孫先生的許可支持，是國民革命事業的一部份，從來沒有通過有中共黨員的廣州中央，中共始終無法插手上海這另外一個事實存在的政治中心的工作。就是孫先生最後經過上海，提出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在北上以後，也是委託居正、謝持向上海的實業團體、商界、教會的重要人物作解釋宣傳的。⑫

現在研究這一段民國史，往往只注意到孫先生如何聯俄容共，如何以蘇共爲模式改組國民黨，如何仿蘇俄建立黨軍，如何重用俄國顧問，如何疏遠老黨人，但是忽略了孫先生在具體的每一件國民革命的重要進程上，一如既往，只搞蘇俄—中共從來反對的軍事和聯絡上層的活動；進行這些活動的人都是國民黨的所謂「右派」，中心則在上海；當然不會去進行蘇維埃式的鬥地主分田地的暴力革命，也沒有和西方國家勢不兩立。蘇俄—中共的確對孫先生的一些「左傾」的談話抱着幻想，妄圖加以利用；孫先生卻因此得到了唯一得到的大量盧布、武器彈藥、軍事顧問等。但是與孫先生最親密的、忠實執行爲蘇俄—中共堅決反對的一系列政治活動者，仍然是昔日的國民黨的老黨人們。雖然老黨人們在聯俄容共問題上受到孫先生的批評，對整個國民革命事業的信念卻沒有動搖，而且深信與孫先生是一致的，孫先生給不止一個老黨人說過，他有辦法對付共產黨。

孫先生最後的日子，雖然打倒了勁敵直系軍閥，卻仍然面臨新的問題。馮玉祥等三位勢力軍人在政變成功以後，立即致電段祺瑞，聲稱「本軍大元帥一席，非公莫屬」，張作霖對此也擁護。這是要把國家權力由直系交給皖系。孫先生在北上宣言中，主張迅速召開有廣泛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實行民治；對外廢除不平等條約，達到國家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段祺瑞卻在孫先生到達天津病重之時，宣佈

召開善後會議，以便軍閥繼續壟斷政權，根本反對召集國民會議的主張。意見雖然對立，孫先生的親自北上，開啓了昔日的反直聯盟內部和平協商的大門。但是孫先生在這和平統一露出曙光的時候，突然去世了。

在國外方面，孫先生因爲長期受到西方帝國主義的敵視而被迫聯絡蘇俄，可是蘇俄又是同樣的野心勃勃。當時的國際聯盟是爲西方國家的利益服務的，而共產國際則受蘇共政治局支配，所以孫先生有民族國際的想法，想要聯合世界的被壓迫民族，但只是在設想階段。孫先生更期待中日友好，在日本的平生最後兩次演講，都是討論「大亞細亞主義」，主張日本幫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亞洲的種族團結起來，以東方的王道，去對抗西方的霸道。但是他在日本受到了政府的冷遇；從日本到達天津以後，法國又禁止孫先生駐進租界；並且面臨與日本有關係的段祺瑞掌權，孫先生只有表態擁護段執政，在全中國統一以前不會當總統，將只在北京停留短期，就會去走訪歐美。據戴傳賢透露，孫先生有民族國際的想法，想要聯合世界的被壓迫民族，在西方的國際聯盟和蘇俄的第三國際以外，建立自己的國際空間。可是在北京就突然去世了。

這真是令所有中國人悲涼的日子。

可是，孫先生從到達上海的時候起，無論在上海、天津、北京，都受到了上萬的廣大民衆的自發地盛大歡迎，甚至在日本也是如此。孫先生在最後的日子終於看到了他的學說、他的主張，已經被中國人普遍地接受和擁護，這是孫先生感到最欣慰的地方。

在現實的國內外的政治大局上，孫先生仍然面臨新的坎坷，但是顯然是深具信心的。

他的擔心，在於中國國民黨，在於國民黨內之共產黨。根據是甚麼呢？李雲漢先生在《從容共到清黨》中引用了孫先生的幾次談話，但是這方面的談話是非常含蓄的。當孫先生的親屬孫科、宋子文、孔

祥熙和秘書長汪兆銘請求孫先生留下遺囑時，孫先生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談話：「我如果留下說話給你們，是於你們有許多危險的。現在好多敵人都在圍困着你們，我死之後，他們更向你們進攻。如果你們强硬對他們，是危險很大的。我看還是不說的好，好叫你們對付環境容易一點，我要說出，你們便很難對付險惡的環境了。」⑬經過一再的請求，孫先生始終不說出這敵人是誰，其最後的回答是：「我已經著有許多書了。」如果這裏是指帝國主義和軍閥，孫先生早就直指了，卻要叫人去讀書尋找，讀甚麼書呢？在這次北上路過上海的時候，激烈的反共黨員何世楨，請求孫先生對於聯俄容共政策一定要再作解釋，孫先生要他去讀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一節。這就指出了「書」。查孫先生的三民主義演講，在民生主義中，正面批判的唯一學說只有馬克思主義，而並未批判其它任何學說，其立意相當明確了。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孫先生是從理論上對歷史唯物主義做根本地批判，再以歐洲的具體發展，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事實不符合。孫先生精闢地指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爲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求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以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又說：「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是倒果爲因，因爲馬克思的學說，顛倒因果，本源不清楚，所以從他的學說出世之後，各國社會上所發生的事實，便與他的學說不

合，有時候並且相反。」⑭孫先生曾經說過，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相同，只是在實現的方法上不同。共產黨的方法就是孫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批判的階級鬥爭，三民主義的方法就是協作、妥協。這就是孫先生一直拒絕搞農工暴力運動的原因。在這一根本問題上，孫先生沒有妥協過。知識豐富的孫先生，還以德國、英國、美國等的大量事實，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與事實不符合。這樣從理論到事實的批判，在那時候，是相當不容易的。鄒魯記載了孫先生演講這一段以後，下來與蘇俄顧問鮑羅廷進行激烈辯論，以至於不歡而散。

爲甚麼孫先生不可能公開與蘇俄—中共決裂呢？除了需要蘇俄的方法改組國民黨，建立黨軍進行北伐以外，經濟問題是重要的關鍵。根據蘇俄的檔案，那時候，僅僅黃埔軍校每月就要花費來自蘇俄的美元一萬五千到二萬，國民黨每月的經費也差不多；而且黨軍的武器全部來自蘇俄；在宣傳方面，甚至上海《民國日報》的印刷機器也是從蘇俄來(見《瞿秋白文集》第二集政治理論篇)，並且另外蘇俄早已經撥款五十萬盧布給廣州政府，上限是二百萬盧布；甚至有些省份的國民黨組織的經費也來自蘇俄(見陳獨秀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沒有蘇俄的盧布，廣州政府幾乎難以生存，不要說對抗强有力的北洋軍閥了。而蘇俄的顧問鮑羅廷，除了在根本問題上堅持蘇俄的方針以外，經常能夠去順應孫先生，做出相當的妥協，以致於陳獨秀要求撤換鮑。表面顯得溫和的鮑也就能夠不知不覺地在思想上給孫先生一定的影響。

對於孫先生這樣的複雜的歷史人物，不可以簡單的反共或親共解釋之。如果只是傾向一面，都有事實爲根據。但是無疑忽略了另外的同樣有事實根據的一面。

孫先生的確在理論指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背道而馳，他的民族主義中主張繼承中國的傳統道德，並且以繼承文武周公的道統自居，這些是於馬克思主義不相同的；民權主義中的西方民主色彩，與共產主

義的專政不同；他在民生主義中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相當深刻，這就把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完全區別開來。所以沒有任何一個中共的領袖把孫先生當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特別是他從來反對搞工農的暴力革命，非常注重調和，而不是鬥爭，甚至在陳炯明逼近廣州的危急時刻，斷然拒絕鮑羅廷武裝工農的建議，更說明了孫先生的政治立場和主義與馬列主義不同。孫先生的這方面，是他的主要的、基本的政治主張。所以中共領袖陳獨秀在一九二四年九月給第三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魏金斯基的信中，就提到他對孫先生的基本判斷：「孫中山和其他人的態度表面上是中立的。他們不能和我們的同志爭論，也不敢得罪右派和反動分子，然而實際上，他們利用反動分子壓力和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迫使共產黨服從國民黨領導或者至少使共產黨對他們公開自己的一切。」⑮

但是孫先生從國民黨改組開始，將昔日的左右助手居正、謝持等加以撤換，也確實壓制反共的國民黨員，把大權交給譚平山和汪兆銘一類的人，特別是讓鮑羅廷做他的高等顧問，成立政治委員會讓鮑羅廷操作，這就不能用「策略」和「被迫」所能夠解釋的了。在孫先生逝世以前的半年，也許由於外面的英國等帝國主義的壓迫更甚，或者由於國民革命遲遲沒有進展，或者由於他的身體狀況日下，孫先生在具體的左右助手和政治操作上，表現了新的傾向。在平息商團的叛亂時成立「革命委員會」，他連重調和的胡漢民也不感興趣了。國民黨中央黨史會在民國五十四年出版的《國父年譜》中，一筆帶過，只說「九日諭成立革命委員會」一句話，正是成立的記載，也不見孫先生的正式意見，但是註解的來源與這裏相同，即都來自毛思誠，顯然有難處。孫先生給蔣介石的信中，非常明顯的表現出他的這新的政治傾向：「革命委員會當要馬上成立，以對付種種非常之事，漢民、精衛不加入，未嘗不可。蓋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而漢民已失此信仰，當然不能加入，於事乃能有濟，若必加入，反多妨礙，而兩失其用，此固不容客氣也。精衛本亦非俄派之革命，不加入亦可，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爲師斷無成就，而漢

民、精衛恐皆不能降心相從，且二人性質俱長於調和現狀，不長於徹底解決。現在之不生不死局面，有此二人，當易於維持，若另開新局，非彼之長，故只好各用所長，則兩有裨益；若混合做之，必兩無成。……」⑯後來革命委員會的成員是許崇智、廖仲愷、汪兆銘、蔣介石、陳友仁六人，胡漢民沒有進入。這件事，可以看出孫先生去世前不久的政治傾向。究竟孫先生在這條實用的道路上會走多遠，難以預測，因爲他的主義和政治哲學又和這新的傾向十分矛盾，而中國共產黨在他的北伐、北上和正在進行的聯絡西南將領等等問題上，又是如此强烈反對他。

現在解密的蘇共檔案顯示，對於這種「新的傾向」，鮑羅廷一九二五年四月六日向莫斯科的書面報告已經反映出來，這就是所謂中派的「越來越向左轉」，而所謂左派已經包括所謂中派，而原來屬於所謂右派：「自一九二一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來，左派得勢，國民黨右派就在黨內掀起反對左派的運動，希望孫中山不忘舊情，會幫助他們把這些不受歡迎的分子攆出國民黨。但情況恰恰相反，孫中山堅信只有同左派共事才能有所作爲，所以越來越左轉，國民黨右派於是別無選擇，只能一走了之。……若說左派，必須指出，這裏面實際上起碼有兩部份人，一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一是國民黨中派。」⑰而原來的所謂左派，並不包括所謂中派。

歷史已經證明，孫先生對蘇俄的信任是上當受騙，失去了一個最重要的政治領袖的洞察力和警惕性。他所信任的「朋友」蘇俄，從來追求的是傳統的俄羅斯民族利益的攫取，是領土的擴張，是對通過中共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篡奪。

孫先生引進了一隻蘇俄狼，狼仔就是中國共產黨，這隻狼在孫先生去世以後拚命地吞食一切。以此爲起點，在二十多年以後，把中華民國也幾乎吞食下去了。

站在全中國人福祉的立場，或站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的立場看，孫先生應當對於中共最初的發

展承擔一定的歷史責任。

註釋：

①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四六七頁。
②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四一五頁，第四三三至四三四頁。
③ 《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
④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第二九七至二九八頁。
⑤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四四五至四四六頁。
⑥ 《第一次國共合作在北京》第一〇七至一〇八頁，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北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⑦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三〇一頁。
⑧ 《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第一九九頁。
⑨ 《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第二〇〇頁。
⑩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九日，第六二八頁。
⑪ 《謝慧生先生事跡紀傳》第二〇一頁。
⑫ 《孫中山年譜長編》第二〇八三頁。
⑬ 《從容共到清黨》第二五六至二五七頁。
⑭ 《三民主義》二三二至二三五頁，孫中山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民國七十七年，台北。
⑮ 《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四三四頁。

⑯《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二四三頁，毛思誠著，中國第二檔案館編，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

⑰《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四九一頁。

十一、對抗與調和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留下的是甚麼遺產？

留下的以三民主義爲中心的孫文主義，不僅爲國民黨，也爲全民族的政治生活和奮鬥指明了方向。這筆遺產在大半個世紀過後的今天，仍然有相當的價值。因爲半個世紀以來統治中國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其進取的任何方式是鬥爭，已經付出了幾千萬的生命，在全世界和全中國的實踐已經證明不適合人類生存，已經到了終結的時候。今天雖然中共仍然在統治，其理論和實踐已經少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更不可能將其原來的歷史唯物主義拿來指導中國的今後，而簡單地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行不通的。結合中西文化之長處的孫文主義，也許在中國今後的政治生活中，會繼續發揮其價值。

孫先生還留下了一個政治實體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內憂外患中，在全中國存在了二十多年；一九四九年以後在台灣以經濟上的成就著稱於世界。

在孫先生停止呼吸的時候，留下一個已經被蘇俄—中共奪取和控制了若干權力的國民黨，在最高領導層與中共一起掌握權力的，是所謂的中派。這其中的多數人都是忠於國民革命的事業，只是由於對於蘇俄—中共的野心缺少認識，或由於想採取調和折中路線，而繼續與蘇俄—中共爲伍，但是他們不久以後大多走上反對蘇俄—中共的道路，以胡漢民、戴傳賢爲代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中共機關刊物《嚮導》第九十八期上，周恩來以伍豪爲筆名，第一次把胡漢民和鄒魯劃爲「右派」），其中只有汪兆銘之流的極個別人在孫先生去世以後的歲月，爲了個人權力獻媚於蘇俄—中共而甘當左派（廖仲愷被暗殺以

前已經有轉變)，而終於導致國民黨分裂；國民黨內多數的領袖和黨員仍然不爲壓力和利誘所動，堅持反對蘇俄—中共，他們在孫先生在世的時候，已經只是做事而無權，其代表人物爲居正、鄒魯、張繼、林森、謝持等。孫先生去世之後，鮑羅廷—中共奪權肆無忌憚，而終於使得居於所謂中派的領袖轉向反共，形成了代表國民黨黨統的正宗力量。在中央委員中對大事總不明確表態而隨波逐流者，是很少數，如譚延闓、于右任等。中共史家所列舉的左派領袖人物除了汪、廖以外，還有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前兩位在孫先生在世時，只是家屬，後一位曾負責孫先生的警衛工作，他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後來把大多數孫中山時代的第一屆執監委員開除以後，被蘇俄—中共捧起來的。

所謂國民黨的分裂，是指整個正統的力量和蘇俄—中共，以及其附和者汪兆銘之間的分裂。

第三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以後，以斯大林爲首的左傾路線開始佔統治地位，並且派出了魏金斯基到中國主導了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中共黨員到國民黨內全面奪權的方針。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員群體構成的左派，加上追求權力的汪兆銘(原來被中共劃爲中派)等少數人，和主義、行爲完全不一樣的廣大國民黨員(即被中共稱作右派和中派的國民黨員)的衝突當然就難免，這就是中國國民黨大分裂的基本原因。

在孫先生病危期間，馮自由等已經對蘇俄—中共的行爲忍無可忍，拉開了反對蘇俄—中共的旗幟。但是因爲馮自由那時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位不高，不是中央執行委員，影響力有限，分裂不顯著。

在孫先生去世以後才五天北京召開的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法問題進行討論，所謂左右派已經爭吵得使會議開不下去，拉開了分裂的序幕。但是所謂右派的國民黨領袖們，顯然另有考慮，他們大多不出席在廣州續開的第三次執行委員會，讓所謂的中派主導，會議的重點是接受總理遺囑，並且讓中共得勢，開除了馮自由的國民黨黨籍。這使得蘇俄—中共最盼望的國民黨分

裂沒有出現。

下面拉開的就是這場分裂的序幕。

馮自由因爲反對蘇俄—中共，受到孫先生嚴厲批評以後，就離開廣州去上海，與國民黨的另一位著名的元老章炳麟，在上海南陽橋裕福里二號章宅，組織了反對聯俄容共政策的辛亥同志俱樂部，據馮自由回憶，參加的人還有「章太炎、田桐、居正、周正麟、馬君武、管鵬、但濤、焦子靜、謝良牧、茅祖權、劉成禺」，全部都是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全部都反對孫先生的政策，這是很有份量的聯合。但是這不是一個正式的政治團體，由章炳麟、居正簽名發表的《護黨救國公函》就很溫和，似乎是重溫同盟會舊情而已。(見馮自由《革命逸史》)居正在《梅川譜偈》中記載，辛亥同志俱樂部就在他的家裏成立的：「總理孫公喪殯事畢，召開執行委員會於北京翠花胡同。以意見不合，未終會而散。朱卓文約附夫人專車回上海。章太炎先生等約在余寓(漁陽里五號)發起辛亥同志俱樂部。」(乙丑，中華民國十四年)

與此同時，在上海還有謝持等人組織的護黨同志會，《護黨月刊》的矛頭只指向蘇俄—中共，而不抨擊聯俄容共的政策本身。

早在一九二二年秋天，鄒魯和謝持奉孫先生命，到北京出席國會時，就在從無國民黨組織的北京，發展大學生入黨。然後派遣盧釗向孫先生匯報。孫先生在十月二十三日致函黨務部長謝持：「慧生兄鑒：手函及盧生報告均悉。洛事所見極是，自當酌量辦理。北方黨務，極須注意，切望推廣黨務，俾固基礎。兄在京奮鬥，申張正氣不少，甚爲慰念。手此，順詢近佳。孫文，十月二十三日」①。於是鄒魯、謝持發展大批大學生入黨，鄒魯在《回顧錄》中記載了部份名單，其中有的成爲以後政界軍界的重要人物，如傅汝霖、王崑崙、鄒德高、孫元良、曾曠晴、陳銘德等。由於在北洋政府統治下，不便用國民黨的名義，而以「民治主義同志會」的名稱出現，核心是中社。這個組織後來就成爲北京的反共中

心，與李大釗領導的「北京青年國民俱樂部」針鋒相對。在國共衝突加劇的時候，部份成員建立了「國民黨護黨同志駐京辦事處」，成爲上海「護黨同盟」的分支機關。這個辦事處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十日在北京召開第七次委員會，並發表公告，一開始就是：「汪兆銘勾結共產黨加入本黨一年有餘，紊亂黨綱，蹂躪黨是，專擅已極。我黨外受敵黨挑撥，內起黨義爭執，遭遇難關，朝暮難保。……」②其提請全黨注意的八點，都是揭露性的。

馮自由這時反共已經毫無顧及。由他倡導，一月十三日在北京成立了「國民黨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提出推倒共產黨的七點辦法：「㈠在中央黨部及執行部共產黨一律撤職。㈡與共產黨有關的印刷所、新聞雜誌、學校、宣傳機關之津貼，一律停止。㈢現在一切有關政治問題，由總理指定無共產黨嫌疑之純粹黨員三人以上，負責辦理。㈣派至各省國民會議宣傳員，其有共產黨籍者，一律撤換。㈤最短期間在北京召開二全大會，共產黨員代表不得出席。各地黨員去年提出之彈劾共產黨案，由純粹黨員組織的特別裁判委員會裁判之。㈥本黨一切大小事權，以後不准外國人干預。」③這其中對付中共的主張，是比較溫和的，基本是撤銷共產黨控制的黨權，但是並沒有開除他們；最後一條是針對鮑羅廷的，沒有點名，僅僅是不准外國人干預黨的事情而已。

在孫先生彌留之際的三月八日，馮自由領導正式成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參加成立大會的人數竟然超過兩千，張繼、于右任這些名人也參加大會(數天後，因爲國民黨中央的追究，于右任宣佈與該組織斷絕關係，張繼則置之不理)。該會的宣言說：「共產黨欺蒙總理，佯稱歸順國民黨，實則利用本黨名義，自圖發展，爲禍本黨。彼等接受俄國運動經費，收買青年，欺騙勞工。彼等百計謀不利於黨，高唱放棄外蒙，作俄人走狗，阻礙黨務，罵本黨大多數同志爲反革命，非黨人，以赤化本黨，三民主義決不與共產主義同科。欲言救國，必先有國民革命運動；欲言國民革命運動，必須擁護三民主義；欲擁

護三民主義，則同志之意見疏通，實爲急務。本此旨趣，爰有同志俱樂部之組織，網羅同盟會、民國元年之國民黨、中華革命黨及民國九年以後之國民黨同志，準備數月，各地協議之結果，於三月八日在北京成立，出席者二千餘名，內部之機關亦組織就緒，特此宣告。」④這是反對蘇俄—中共的空前大聯合，其聲勢遠遠超過三月一日中共主導的、同樣在北京召開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三月十日國民黨中央爲此開會，大多是李大釗、于樹德的對馮自由的嚴厲批評，但也無可奈何。

馮自由和章炳麟肯定有過協商，因爲在三月八日的《申報》上有消息，標題是《辛亥同志俱樂部正式成立》：「章太炎、唐少川等組織辛亥同志俱樂部，籌備多時，業已正式宣告成立。」與北京的俱樂部剛好在同一天成立，不會是巧合。而在一月十二日謝持的日記上有如下記載：「無量約夜九時在滄白處談話，所議者黨事及俱樂部也。十二時始散，還卧已夜午一時矣。」(謝持未刊日記)討論俱樂部的楊庶堪、謝無量、謝持三個四川人經過三個小時的商量，都没有加入俱樂部。但是可以見到這個問題已經在高層進行商討。

另外一方面，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召開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第一號負責人魏金斯基主導了大會。大會《對於民族革命運動的議決案》中，第一次正式明確提出奪取領導權的問題：「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參加，並且取得領導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若要民族革命運動得到較徹底的勝利，固然需要最革命的無產階級，站在領導地位，同時這領導階級也需要能夠抓住被壓迫的各社會階級的力量，向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及其工具(國內軍閥及地主買辦階級)——作戰，才免得處在孤立地位，這是一個重要問題。」這是既要抓領導權，又要利用國民黨的理論依據。怎麼奪取政權呢？

關於工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唯一的指導者，要使工人階級取得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地

位，對於職工運動應當特別注意；必須工人階級有强固的群衆的獨立的階級組織，他在民族運動中才能成爲獨立的政治勢力，然後民族運動中的領導地位才有保障。……」

關於農民：「必須盡可能地系統地鼓動並組織各地農民逐漸從事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沒有這種努力，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關於青年：「青年運動是共産主義運動中一部份重要工作，因共産黨是這一般共産主義運動的總指揮，青年運動必須在共産黨領導之下。……」

關於國民黨：「國民黨的分子包含一切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及工人農民階級，在群衆中他們有造成階級調和觀念之危險，因此，我們在國民黨中工作，對於各種運動，須努力保存階級鬥爭的成份。……我們應當在思想上組織上尤其在民衆宣傳上，擴大國民黨左派，對於國民黨中派領袖及一切左右派間游移分子，應該在具體事實上，糾正其右傾政策之錯誤，使之離開右派，從事不妥協的鬥爭。……完全在我們同志指導之下的國民黨各級黨部應該努力宣傳黨員群衆，使他們有明確的左傾觀念，才算是整個左派結合。單憑感情的聯絡，或只黨部領袖是左派分子，那是不夠的。……」⑤這是兩個所謂的合作夥伴，有一方以幫助之名義，開始只是入室盜劫，但不許被盜者聲張，一聲張就通過宣傳，說成是背叛夥伴關係，進一步終於變成明火執仗地搶劫行爲，如中共以上的決議一樣。在這「合作」中，哪裏有國民黨去打入中共的各個領導機關，去打入和控制共産黨的各級黨部的任何決定和行爲呢？哪裏又有國民黨的報刊，去對中共的各種決定非議呢？作爲當年中共中央的各種決定，現在已經由他們自己公佈出來，可是歷史界仍然沒有一個稍微公正一點的是非判斷。

蘇俄—中共在這時候最重視的是在北方的軍隊問題，想要在南方北方都有蘇俄顧問幫助指揮的黨軍。據蘇共中央檔案，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九日，孫先生去世以後的一星期，以伏龍芝元帥爲首，包括莫

洛托伏、契切林等成立中國委員會，以便「全面督理援助國民黨及親國民黨團體的現行措施」。他們每月給中共的活動經費一千四百至二千二百五十美元(包括《嚮導》二百美元和中共各個支部每月的開銷，見三月二十日陳獨秀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第二號報告)；更投入了大量的錢財去拉攏馮玉祥部隊，據《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集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一九二五年半年給馮玉祥部隊撥款十四萬八千八百三十美元(第六八頁)，可見蘇俄在中國的野心和所下的政治賭注之大。邵元沖在一九二五年八月正好訪問馮玉祥部，在十四日的日記中也記載了蘇俄給馮部的武器問題。孫先生在三月十二日去世的第二天，蘇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做出決定，派遣兩個各爲三十至四十人的軍事教官團，在洛陽和張家口辦兩所軍校，通過伏龍芝元帥，一年內撥款一百萬盧布⑥。

蘇俄—中共向黨政軍全面地展開奪權活動，正在加速控制整個中國的一切，這是昔日沙皇俄國做夢都不可能想到的。在蘇俄—中共不停地進取時，國民黨內的任何反抗(從來沒有進取)都會被中共戴上不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右派帽子；而掌握國民黨權力的所謂中派，則力圖維持這一方向另一方奪取權力的局面，其基本壓抑的，是所謂右派。在孫先生去世前不久(二月十四日)，鮑羅廷給莫斯科報告他一手製造出來的國民黨的分裂現狀：「在這之前，我們把國民黨分爲左中右三派。現有的這幾派完全符合這一劃分法。左派主要是共產黨員，他們將把孫中山思想的主要遺產當做國民運動的指導原則百分之百地繼承下來。中派則是這一遺產的公開代言人，但他們還抱有幻想，只要右派真正理解孫中山的主義和方法，就將其拉到中派隊伍。其實，右派非常瞭解三民主義及其實施方法，唯其如此他們才力圖修正之。」鮑羅廷的這段匯報材料證明，國民黨內所謂左右派的鬥爭，是蘇俄—中共在不斷進攻奪權，和敢於防守的國民黨即所謂右派的鬥爭，掌權的中派想把所謂右派拉到中派，即阻止這場鬥爭的進行。在同一報告書中，鮑羅廷認爲國民黨的分裂對共產黨有利，從而提出了策略，即重點是拉攏所謂中派去對付

所謂右派：「不必過分害怕右派分裂，黨能夠從分裂中得到好處。關鍵是中派能否在反對右派的鬥爭中，更緊密地團結在孫文主義周圍。而這一點又取決於我們能否善於鬥爭……。我們現在做到了應付裕如。反對派的圈子日漸縮小，而極端不可救藥分子被迫處於守勢。我們的注意力應該是通過最具體、最明顯的例子來團結中派核心，因爲只有這個核心才應該繼承孫中山遺志。」不幸的是，蘇俄—中共正是按照鮑在這裏的打算，通過中共對於「右派」的鬥爭，使得「中派」堅決對「右派」鬥爭，從而得到「好處」，而且聲稱到了「應付裕如」的地步。不過，鮑羅廷高興得太早，兩年以後，不是所謂右派倒向所謂中派，而是所謂中派與所謂右派聯合成功地粉碎蘇俄—中共的奪取全中國的計劃。

當時最重要的所謂「中派」成員，是胡漢民、戴傳賢等人。胡漢民後來的《文集》收集他的各種文章相當的齊全，就是沒有收集從改組到廖仲愷被刺事件一段。非常明顯，因爲蘇俄—中共後來的一切已經不是陰謀，而是赤裸裸的陽謀，以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立場看，掌權者長時期輕信蘇俄—中共的甜言蜜語，對後來的損失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他們不可能將這段執政時期的各種文件收入。但是，戴傳賢的「文存」中，特別給他的密友蔣介石的信中，非常清楚地表述了他的所謂反對兩邊的「中派」立場。

在引戴傳賢的叙述以前，先揭開一直被史家忽略的兩次、兩地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情況，國民黨分裂的序幕從這裏拉開，各派在這裏各有表現。

孫先生剛剛逝世，就在北京召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國民黨黨史會編印的權威資料《革命文獻》中（《中國國民黨歷次中全會決議案匯編》）從不見記載，只記載在廣東續開的內容，據悉，沒有文件被保存下來。實際上，這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分道揚鑣和國民黨因爲這問題而大分裂的序幕。

參加北京會議的當事人留下了幾處記錄，包括居正、鄒魯、謝持和戴傳賢：

居正在《清黨實錄・編輯大意》中說：「至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開會於北京，委員間意見已不一致，遂未畢會。迨繼續開會於廣州，決議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法，竟爲共產黨操縱，而選舉法偏利於共產派。」在《清黨實錄序》中，居正又說：「十四年聞喪北上，參加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未終而中斷。」

鄒魯在《回顧錄》中記載：「在北京舉行的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議決將遺囑原件，由我帶回廣州，交中央執行委員會保存……我到了廣州，續開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

謝持的日記記載：「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全體會議於帥府園六號，扶病赴之。議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地點。甫開議，我即提出代表選舉法問題，指出中央執行委員會不規定選舉法之失職，及現在應體察黨情，以定選舉。說畢已十時矣。」

戴傳賢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給蔣介石信中記載：「確知今後欲救吾黨，唯有決定一根本方針，合全體同志之力以赴之，唯此乃可謀黨政之鞏固。此方針爲何？則以總理之思想與主張之全部，爲本黨不用之信仰是也。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弟之固執不易者即此。而所謂右派之同志，其愚誠不可及，以樹立此政策爲幫助共產黨人之舉，群起而反對之，會議以此破裂。然而共產黨方面，則有遠大之識見者，認爲樹立一思想爲中心，則今後國民黨將以一獨立之思想爲基礎，則不能爲共產主義之思想所同化，欲將此一主張消滅之。全體會重召集於廣東之日，共產黨之計劃，遂完全發露，經數日之爭論，而後乃勉强得一不左右傾之決議。」

根據現有的這一點點材料可以知道，在北京召開的這次全會，因爲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選舉法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沒有結果，不歡而散；在廣州續開時，除了一致接受「總理遺囑」以外，重申繼續容共，通過了開除馮自由黨籍的決定，以此警告國民黨內的反共黨員；還通過了被居正批評的

「有利於共產黨的」選舉法。在以上戴傳賢記載中，他罵反共的所謂國民黨右派「愚誠不可及」，所謂右派「群起而反對」他，他站在中共的一邊；在廣州續開的會議中，戴成了主角，《接受總理宣言》由他擬稿，確立了「思想中心」；他認爲有了這「思想中心」，中共就沒有辦法，所以又繼續容共。歷史證明，戴太書生氣息，他所建立的思想中心，對於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爲宗教信仰的中共，無傷毫毛；相反，蘇俄—中共利用繼續容共的政策，利用孫先生不在人世，按照第三國際的指示，加緊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

不過，孫先生在世的時候所建立的政治委員會，爲蘇俄—中共奪權創造了方便之門。那時，權力中心在孫先生，也在中央委員會，國民黨人是中央委員會的絕對多數；但是孫先生並沒有將中央常務委員會真正作爲權力的執行機關，而是按照鮑羅廷的意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下面，成立不見於黨章的諮詢機關政治委員會。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一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經鮑羅廷建議成立時，正是鄧澤如、張繼、謝持的彈劾共產黨案剛剛提出的時候，政治委員會的成員是胡漢民、汪兆銘、廖仲愷、譚平山、伍朝樞、邵元沖爲委員(譚平山後來由瞿秋白取代)，這裏邊沒有一個那時是聯俄容共政策的堅決反對者，順着孫先生的意見操作起來，是相當方便的。因此，許多重要決定竟然由這諮詢機關做出，由中央委員會再加以追認(這個機關有一點像共產黨的權力機關政治局了)。因爲這些決議都有孫先生參加，所以沒有成爲一個問題。但是由於孫先生突然去世，就留下了政治委員會的顧問鮑羅廷，將該會任意操作，甚至將其成爲權力中心，而根本拋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鮑羅廷—中共橫行一時的局面。孫先生不止一次地對親密的同志說過，他有辦法對付中共，但是他對權力的操作方式，恰恰爲他身後的鮑羅廷—中共，開啓了奪取權力的方便之門。這是後話。

本來一個黨中有不同的意見是很正常的現象，不同的意見經過研討或協商，使得一個黨的意見更加

成熟。但是這裏所謂的國民黨的派別，是共產國際將國民黨內的不同意見加以推波助瀾，以便從中漁利的一種策略的運用。國民黨的確是一個以孫先生爲首的、經過考驗的政治群體，只有意見的不同，而沒有利害衝突，沒有中、右派的派別之分(左派是中共自己)。所謂的中派，在後來反共比所謂右派更過之。但是，在孫先生去世以後，特別是隨着北伐的勝利，就有了權力之爭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那時才有了國民黨內的真正的派系之分。在孫先生時代大講左派、右派、中派的都是中共，因爲他們要以此分化瓦解國民黨。

但是意見既然有不同，是一些甚麼不同？且看戴傳賢的幾封信，都收集在《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册中(本節的戴傳賢的幾段引文都出自此書)。這寫信人和收信人，都是在以後踏上了比所謂右派更反共的歷史路程的。

戴傳賢對新思潮敏感，曾經是中共前身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成員，但他因爲忠於國民黨而在成立時沒有加入。他想要在所謂左右派的衝突中居中，他說道：「中山先生逝世後，見思想之複雜，與事實之糾紛，極力想從思想上建立一正途，以爲從組織上使國民黨成爲純正之三民主義的革命政黨的基礎。」(《國民黨中反動劇之一幕》)又說：「總理既逝，余感於十四年來，受知之深，受惠之厚，對於黨內左傾右傾之危機，與人事上分崩離析之難局，頗欲有所救濟之。」(《解除政治職責宣言》)他的「建立一正途」的「救濟」之道是甚麼呢？一方面在政治行動上，一方面在理論建樹上。在政治行動上，在「反動分子」(他在蔣介石公開反共以前稱反共國民黨員爲「反動分子」)和共產黨員之間走中間道路，造成兩面不討好，幾乎完全失敗，他一再感嘆「中庸不可能」；在理論建樹上，戴傳賢大有成果，他主觀上的中間道路的理論，使他成爲國民黨早期的傑出反共理論家。先看看他的政治行動：

在解決鄧澤如等三人提出彈劾案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戴傳賢的詳細主張現

在未公佈，但是戴自述他受到了反共的張繼的粗暴對待，而所謂左派廖仲愷則罵他「做人不可太聰明」，使得戴氣憤難忍，即都反對他：「弟主張召集一擴大委員會，全體同志於此會中，披肝瀝膽，以相研討，切實破除成見，爲根本生圖謀。總理完全允其所請，即日召集，而弟到粵之日，即逢溥泉等之橫逆相加，至是一念之望又絕。……其時仲愷曾謂我曰『作人不可太聰明，要笨一點才要得』。弟聞此言，怒至不可遏，而再四忍耐，蓋仲愷終不知我所慮者何在，所憂者何在。」從《邵元沖日記》得知，戴在這時的居中觀點具體是甚麼。在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八日的晚上十時以後，即在中央監察委員提出彈劾案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議以後，戴到邵元沖家談論他的觀點：「十時頃戴季陶來，談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異同，謂其中條件，多無所區別，故不宜有界限存於其間。其說甚辨談至十二時半始去。」這是戴的觀點的很真實的記錄，即認爲國共之間「多無所區別，不宜存有界限於其間」，所以他當然不同意彈劾中共，而有他記錄的張繼對他「橫逆相加」；而廖仲愷也罵他。根據邵元沖的日記知道，戴在次日就突然離開廣州：「七時半至中央執行委員會，討論政府對農民之宣言，又討論及共產黨員之在本黨有黨團之活動等舉動。由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等提出彈劾案，討論良久，各方間有爭辯，建議在下次再加討論，十二時後始散。抵寓已一時頃，知季陶於今日下午猝行，赴港歸滬，殊爲詫駭，棄置一切職務及學校課程而不顧……。」④戴是在左右都行不通以後狼狽而去。他的主觀內心，當然是爲了國民黨，而非爲私，但是他只是在理論上粗淺地接觸過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蘇俄—中共的野心缺乏認識。他忽略了中共後面的虎視眈眈的蘇俄，僅僅從理論上來認識中共，當然要上當。值得注意的是，戴在給蔣介石的信中有提到「總理完全允其所請」之句，故這也可以反映孫先生對蘇俄的野心和陰謀缺乏認識的狀況，也反映了那時候所謂「中派」的真實看法。由於受到兩邊的反對，戴離開了激烈的國共衝突現場，回到浙江的湖州，「索居寡歡無所爲者數月」，直到孫先生北上路過上海，戴作爲日文翻譯隨孫先

生去日本。當戴重新投入國共之間的政治衝突的時候，他仍然繼續他的調和路線。

在孫先生逝世以後立即在北京召集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戴再次調和失敗，他記述道：「確知今後欲救吾黨，唯有決定一根本方針，合全黨同志之力以赴之，唯此乃可謀黨之鞏固。此方針爲何，則以總理之思想全部，爲本黨不易之信仰是也。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弟之固執者即此。而所謂右派之同志，其愚誠不可及，以樹立此政策爲幫助共產黨人之舉，群起而反對之，會議以此破裂。然而共產黨方面，則有遠大之識見者，認爲樹立一思想之中心，則今後國民黨將以一獨立思想爲基礎，而不能爲共產主義之思想所同化，欲將此一主張消滅之。全體會重召集於廣東之日，共產黨之計劃，遂完全發露，經數日之爭論，而後乃勉强得一不左右傾之決議。」（《致蔣介石先生書》）在北京召開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根據戴的記錄，他反對所謂「右派」，以爲只要把孫先生的思想樹立起，中共就没有辦法。問題在於，在廣州續開中央第三次全會的時候，他已經看見「共產黨之計劃完全暴露」，仍然忽視政治上具體的反共，只是追求「不左右之決議」，甚至附和中共，主導把馮自由開除出國民黨，警告國民黨內的所有反共黨員，通過了有利於共產黨的選舉法。戴傳賢的所謂「不左右傾之決議」，實際是欺人之談。鮑羅廷的傳記作者寫道：「鮑羅廷雖未參加一屆三中全會，但會議通過的各種決議案和宣言宗旨仍然與鮑羅廷原先指導思想有關。例如在《接受總理遺訓之訓令》中指出，『以後本黨一切政治主張，不得與總理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宣言政綱和北伐、北上宣言主旨相違背；凡違背上述主旨之議案，無論何級黨部，概不得決議』。這就意味着肯定了鮑羅廷與孫中山已往合作的重要成績，繼續保持國民黨改組的成果，『使本黨依據民主集權制，建立一組織完成之革命黨』；繼續堅持反帝反軍閥的宗旨；繼續發揚『使武力與國民結合』、『使武力爲國民之武力』的思想；繼續奉行聯俄政策；……繼續實行以黨治軍的原則……。這些決議和宣言原則精

神是在孫中山逝世後第一次舉行中執委員會議上通過的，也是經過各種政治主張的激烈爭論和當面較量所產生的。因而這次會議的重要意義不應當被歷史學家所忽視，即使從國共合作史來看也是如此。這次會議對於鮑羅廷今後的工作建立了良好的開端和基礎，也爲即將正式成立的廣州革命政府奠定了總的方針的基調。」⑦在孫先生去世的時候，黨的大權相當的部份已經被鮑羅廷—中共掌握，一切維持不變的決議，只有有利於中共，特別在決議中又點了反共的馮自由、馬素和江惟藩的名字，就更清楚了重申紀律所要防範的是誰？對誰有利？所以參加會議的邵元沖在日記中記載：「午前十時至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討論宣言及訓令事，爭持良久。近來共產派益肆爲無忌，故余等不得不相結而抗之。彼輩刻意欲減少黨員及群衆對孫公之信仰，故對於文字中崇敬孫公之處皆欲削除以爲快，此吾人所不能忍者。」不滿之情也存於戴傳賢的記載中，稱在共產黨的反對下，決議作得「勉强」。邵元沖和戴傳賢堅持樹立孫先生的主義的地位，在三中全會中達到了這目的，挫敗了中共；但是，在開除馮自由等人，警告「右派」問題上，他們對中共又做出了讓步。不過，他們所取得的進展，反而被大大的利用，因爲正是這次會議，使得鮑羅廷—中共能夠利用繼承孫先生遺志爲藉口，利用繼續聯俄容共的政策，進一步奪權和擴張權力，事實俱在。

戴傳賢在政治上採取調和路線的時候，他在理論上卻在確立和解釋孫先生的思想，以爲這可以爲他的調和路線服務。使他大大意外的是，他的理論立即引起中共的全面批判和攻擊，把他作爲右派，作爲「五鬼」之一的危險敵人；也引起所謂右派將他的理論運用來反共。戴傳賢不自覺地成爲了一個傑出的反共理論家。數年以後，戴一九三二年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原稿題字道：「全文至今，尚無大不妥處。唯導言一篇，與其說是文章，毋寧說是炮火。蓋素持和平之我，至是已化爲衝鋒陷陣的先驅者而不自知，故其爲文，則劍拔弩張，而義則偏激也。」戴仍然以「持和平」自居，以致成爲反共的「衝

鋒陷陣的先驅者而不自知」，仍然不滿意文和義。

在理論上，戴寫了兩本著名的小册子。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間發表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中，非常明確地闡述了孫文主義才是繼承中國的正統文化。以爲儒家哲學的經典《中庸》的「誠」，演化出智、仁、勇，成爲民族精神的原動力，三民主義就建立在這上面，孫先生就繼承了這道統。至於國民革命，則是全民族的革命，而非階級的革命，並且批判了只爲一個階級革命的歷史唯物主義。戴傳賢激怒了中共，中共青年運動的負責人惲代英在八月的《中國青年》上撰文，題爲《讀〈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陳獨秀撰寫《給戴季陶的一封信》，以一萬多字的篇幅爲階級革命辯護，一開頭就把戴傳賢打入了「右派」行列：「自國民黨改組以後，排除共產派的運動，不曾一日停止過：這個運動的最初期代表人物，要算謝慧生先生和馮自由先生；其次便是馬素和鄧家彥兩位先生；最近便輪到你季陶先生了。」

緊接着出版的另外一本同樣重要的小册子《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從正面批判共產黨在國民黨中的胡作非爲，並且號召：「愛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員，三民主義的信徒團結起來。」指出了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的當然責任，給以喧囂一時的共產主義理論以很大的打擊，成爲了國民黨人反對共產主義的理論武器。中共又群起而攻之，瞿秋白的萬字長文分十部份，題目是《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瞿秋白說：「最近國民黨中央發現『戴季陶主義』的運動：理論上是所謂建立純粹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實際上是反對左派，反對階級鬥爭，反對C.P.的跨黨，甚至反對C.P.的存在之宣傳。……他們這種運動不僅是在思想上摧殘工人的階級鬥爭，實在還是削弱國民革命主力軍的工人階級，因此亦就是削弱中國的國民革命運動。」本來，共產主義就是一個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宗教體系，絕對容不得另一個成體系的思想提出來。戴季陶以中國文化和道統的高度理解孫文主義，將孫先生的思想綜合歸納起

來，成爲了對抗共產主義的有力武器。

可是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剛剛發表的時候，戴傳賢對於這本小册子竟然發揮反共的政治作用，非常傷心和氣憤，因爲這就違背了他的不左右的中道，他抱怨「右派」，罵利用這小册子的謝持爲「反動分子」。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寫信給劉盧隱道：「近日之事，尤令我傷心的是，則見數日來所見發表於報紙之文字，響應我所著《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而起者，其中有數種議論之荒唐、思想之妄謬、態度之粗暴，直將幼稚性發揮盡致。然此猶爲純正之學生青年，僅爲智識淺薄，其心固可佳也。其他真正之反革命者，欲利用我之理論，而達其目的者，亦已頗有所聞。鄧孟碩所發表之信，其中述及謝慧生先生語，全屬虛妄。當慧生在滬時，已有兩次當我面而任意變更我之意思，以供利用。即在元沖家會議之日，亦有一重大之有意誤說，兄當能憶之。此信所說，姑無論好意惡意，其非單屬孟碩之誤聽，或有宜然。如此，不顧大局，不明事理，不知時代之關係，不解革命之意義，更不聽我苦心孤詣之勸告，與痛哭流涕之批評，反欲藉我徹底的爲國民革命而發之理論，與實際政策，達其反革命之目的(慧生先生固無反革命之心，而其思想之反應，甚易招來反革命)……欲爲三民主義作一忠實的擁護者，其結果只爲反革命者供資料供談助，事之傷心寧有甚於此者乎？」(以上所有戴傳賢的引語都出自《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册)⑧甚至到了戴傳賢剛剛寫出兩本小册子的時候，八月份去主持浙江省黨部的會議，仍然想保持不偏不倚的方針，上海《民國日報》七月十日以《中國國民黨之浙江全體會議》爲標題報道：「第二道訓令：在證明中國國民黨正統思想之確立，以確立共同信仰者，制止左右傾。」更有甚者，當戴傳賢勇敢地參加西山會議，但是被不明真相的同志俱樂部成員痛毆以後，他才檢討他的中派立場行不通：「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非有極端右傾的卑劣的暗殺行爲，不能造出精衛之極端左傾政策，非有精衛之左傾宣言，不能造出此極端右傾之行動。欲固執一中庸正道，固執於兩者之間，使此有

數十年歷史之黨，不至完全化爲反革命，或化爲共產黨，以維持此過渡時代之中國，如我之所主張者，斯誠爲至愚，乃至愚不可及。」(一九二五年十二月致蔣介石信)雖然他檢討他的主張行不通，他還要固守他的中間道路，認爲左右派都是彼此激蕩出來的，左右派就是共產黨和反革命派，只有他正確。直到「四一二」清黨發生，蔣介石的武裝清共遠遠超過「反革命分子」的和平分共論，戴從此終生做了蔣介石的謀士，才再也聽不到他的娓娓動聽的「中派」論調了。戴傳賢在這時期在行爲上欲走中間道路，在理論上卻充當反共先鋒，代表了所謂中派的行不通的道路。

所謂中間道路爲甚麼行不通呢？關鍵在於戴傳賢忽略了中共的蘇俄國際背景。胡秋原說：「大程說，『凡物必有對』。我還想加一句，凡物應有對。一個時代，一個國家有不同的主張，甚至相反的思想相爭，是自然之事；而也不是壞事。唯其有相反的思想，才能保持一社會的平衡和進步。有時，相反的思想反而相成。或者，有時有利於更新的思想的出現近世西洋之進步，實多得利於相反思想之競爭。思想之有對，由哲學上之理性論與經濟論，到政治上之保守與維新，左與右，皆是如此。所患者，就是思想上之競爭訴之於武力，或使外力捲入其中。……而近代中國受害最深之處，就是我們走了相反的一條路：無對，以武力對，藉外力對。」⑨戴傳賢一再的企圖居中，不左右，只能是在無外力的「真空」中的正確主張。中共和所謂左派後面都有蘇俄的國力爲後盾，遠遠不是純粹的思想運動，而是國家的利益和政黨的利害在後面，早就不存在平衡問題强加貫徹，只能有利於蘇俄—中共，而壓制了國民黨的忠貞之士。最後自己也只能夠被逼到「右派」的行列中。戴傳賢後來參加西山會議，並且進而去幫助蔣介石屠殺共產黨，是他這一走不通的政治道路的自然結局。

由於戴傳賢的兩本小册子命中要害，中共對他的態度發生根本的轉變：從現在的蘇俄—中共的文件之中可以看到，開始的時候把戴冠之以「左翼理論家」的頭銜，如今立即被稱爲「五鬼」之一，與帝國

主義、軍閥、右派同等，成爲中共的眼中釘，並且立即受到中共宣傳機器的圍攻。甚至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擴大會議中，關於國民黨的決議案中，有一段專門針對戴傳賢：「一部份小資產階級分子(如戴季陶等)在國民黨內，假藉『真正三民主義』的招牌，提出資產階級妥協的口號來反對階級鬥爭——反對國民黨的左派及共產黨。這一派人形成國民黨的右派，一天天明顯出來，雖然他們竭力自別於買辦軍閥的國民黨俱樂部及辛亥俱樂部等類的分子，然而事實上他們既然反對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客觀上便同樣是幫助反革命和帝國主義者。」戴傳賢很快也就從不偏不倚的所謂中派轉到了所謂右派，並且在十月份就參加了西山會議的籌備工作，從此踏上了反共的不歸路。

從開始改組以來，在蘇俄的指使下，中共的態度已經由所謂「友好、幫助」，變成赤裸裸的陰謀奪權集團。戴傳賢這類敏感的政治家，爲甚麼長期堅持根本行不通的不偏不倚政策呢？這並不是戴傳賢一個人的問題。

胡漢民在孫先生去世以前，中共已經把他當做「右派」，孫先生給蔣介石的信中，在平定商團的革命委員會問題上，已經覺得胡漢民趨向保守，不適應新形勢下的工作。在孫先生去世以後，他擔任代理大元帥，就按照自己對國民革命的理解去做事，對鮑羅廷從來不像汪兆銘一樣俯首聽命。孫先生去世以後，胡漢民就不顧鮑羅廷和加侖將軍的反對，堅決主張討伐劉振寰和楊希閔；幾乎在同時，中共的機關報《嚮導》卻載文，批評胡漢民與滇、桂軍妥協，說他想留下私人軍隊，以便鞏固個人的權位：「至於胡漢民，原本與許崇智意見不合，與其他國民黨各有實力的意見，又未見得純然融洽，不無恐怕反動軍閥純然肅清後，×××提出改組大本營，難被推爲政府首領，因而想留一部份反動軍閥的力量，保存現有的地位的嫌疑。」(《嚮導》五月三十一日)這些陰謀根本影響不到胡漢民的決策。但是胡漢民並沒有一套稍稍系統的、具有遠見的對付蘇俄—中共的辦法，他甚至不能夠在這關鍵時刻，在這重要的位置

上去團結整個國民黨。在民國六十七年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印的《胡漢民先生文集》中，在「著述」部份，共收錄民國十三年到民國十四年八月的文章八篇，其中只有第一篇涉及聯俄容共的政策，其餘的都是有關外交的。在答覆屈維它(按：即瞿秋白)的長篇文章中，對中共加入國民黨的黨團作用，只有一點點警惕。但是在有關外交的所有六篇文章中，都是反對不平等條約，即針對西方帝國主義，但是從來沒有一點點針對蘇俄帝國主義；同時的十幾封函電，也是如此。胡漢民在蘇俄的許多演說是很親蘇俄的，那是因爲環境壓迫所致，可以理解(見《胡漢民先生在俄演講錄》，廣州民智書局出版，民國十五年；以及新近公佈的蘇共中央檔案《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中，有胡漢民在蘇俄的一些談話)。顯然，這段時期的胡漢民的大量所謂中派立場的文件和談話，沒有收入文集中，因爲後來分共政策實行，胡漢民作爲執掌大權的政治領袖，沒有針對蘇俄—中共奪權的長遠整體規劃，應當承擔歷史的責任的。在邵元沖的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三日的日記中，對此表示不滿：「午後接展堂來電，促速赴粵，以爲政治委員之責任，在改組後更爲重要云云。然彼等一方慮異類之侵入，一方又不以公恕待同儕，詎能盡全力之效？故擬覆一電謂頃草行政計劃，完稿即來云。」這電報表現出了胡漢民在孫先生去世數月後，對中共(即「異類」)侵入的擔心，但是胡漢民卻不能夠團結像邵元沖一樣的高層反共的國民黨員，更不能團結像許崇智一樣的掌握軍權的人物，使他們「盡全力之效」。而邵元沖呢？七月二十八日在南京的江畔，看見了因爲同志俱樂部的事情被開除出國民黨的馬素，竟然「彼此佯爲不識而過」(見邵元沖日記)。可見反共的國民黨員這時完全處於分散分裂狀態，胡漢民不能及時蓄積黨內的精英，因此國民黨在以後付出了更爲慘重的代價。

廖仲愷是那時候促進和執行聯俄容共政策的最積極、最重要的人物。以廖的歷史、品格和信仰而言，他主觀上決不會去損害國民黨，更不會去破壞國民革命。他爲甚麼做了蘇俄—中共的工具呢？在廖

案發生以後，他的妻子在追悼會上引用廖仲愷的話：「中國決不能共產，因爲中國產業落後，無大資本家、大地主，拿第一公園來共嗎？至謂農工階級和聯合弱小民族，便是共產黨更屬笑話。我們接受總理遺囑，欲達到自由平等目的，必須喚醒民衆。」⑩他竟然相信馬克思的空頭理論，而忽略現實的蘇俄—中共陰謀。

由戴傳賢、胡漢民、廖仲愷的心路歷程，可以看到這所謂的中派，由於處於執掌大權的地位，他們給國民革命，給中華民國帶來了一定的損失。以下的幾點，已經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

一、他們對蘇俄缺乏起碼的警惕和認識。廖仲愷以上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認識，實際出於《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宣言的第一條是「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爲中國最要最急的問題，乃在民國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到俄國國民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

按照馬克思的理論，共產主義革命只有在發達國家才能夠成功，也不適合俄國。那時的孫先生、廖仲愷等甚至因爲蘇俄實行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新經濟政策，就以爲蘇俄已經改邪歸正，不搞在理論上行不通的共產主義革命了。他們並不知道，理論上的不適合對俄國的革命者並不重要，因爲理論可以編造。列寧正是編造了可以在俄國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理論，而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稱呼；同樣，中共只是開頭受此限制。在斯大林主持之下，一九二四年命令中共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時候，這理論就已經被事實上否定。後來毛澤東就編造了所謂「新民主主義」，爲其農民暴動製造理論根據。這時候相信這理論的，是上當受騙的國民黨「中派」等幾個書生，哪裏想得到共產黨的理論，是可以由共產黨根據現實需要隨意編造呢？

二、一九一九年七月和一九二〇年九月，蘇俄兩次發表對華宣言，聲稱無條件放棄沙皇從中國獲取的一切特權，這成爲了孫先生聯俄容共政策的基礎。《孫文越飛宣言》的第二條就重申：「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此向孫逸仙博士重行宣言，即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俄時代『中俄條約』(連同中東鐵路等合同在內)之基礎。」因此，孫先生直到去世都把蘇俄當做最值得信任的國際友邦。雖然孫先生因爲不得不依賴俄援而有難言之處，但是鮑羅廷的太上皇地位和有些關鍵部門讓譚平山之流佔去，都不是用「被迫」二字所能夠解釋的。這就造成在鮑羅廷—中共肆意橫行的時候，所謂中派視而不見，甚至中共的奪權陰謀已經非常明顯的時候，孫先生已經去世，所謂中派反而開除馮自由、馬素、江惟藩的黨籍，繼續容共，實際上讓蘇俄—中共繼續危害中國國民黨。在今天，由於蘇俄的檔案的公佈，知道蘇共中央政治局在內部，早就做出了不承認那兩次對華聲明的決定，知道聯俄容共完全建立在對孫先生和國民黨的欺騙基礎上，令人氣憤和悲哀；但是，「中派」無視當時蘇俄—中共的行爲，而堅持相信空空的保證，也令人悲哀。

三、對於中共的本質缺乏起碼認識。戴傳賢對中共的認識，多是從理論上，以爲這只是一個見解不同的左翼派別，他簡單地以「中派」的立場，想將左右調和起來。他根本忘記了這是一個有蘇俄的擴張利益爲背景的黨，中共僅僅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而不是簡單的「意見」不同。中共的繼承沙皇侵略的蘇俄背景，使得調和不可能。幾十年以後蔣介石在台灣回首往事而吸取教訓，他說：「中國人爲人處世的道理是『隱惡揚善』，是不念舊惡。我們中國國民黨又以傳統的倫理觀念和民族意識爲其組織的基礎。民國十三年容共與二十六年收共受降之後，我們對於中共是如此，民國二十二年對俄復交之後，我們對蘇俄亦是如此。我們對共匪始終是重倫理、講信義，相信中國人總是愛中國的，因而一向誠心誠意企圖與同循民主的正軌，完成建國的事業。哪裏知道共黨終究是共黨，他對於國家社會，事事都是陰

謀，處處都有陷阱。只要我們組織不嚴密，戒備未周的處所，就是他們乘機構煽、伺隙施逞的機會。這也就是我們以民族意識和民主觀念做衡量共匪的尺度，使反共戰爭遭受挫折的重大因素。」⑪這是蔣介石失敗以後的深切體會，但是當年執政的「中派」並不瞭解「共黨始終是共黨，事事都有陰謀，處處都有陷阱」，反而極力壓制對中共已經有認識的「右派」。胡漢民、廖仲愷、戴傳賢等當然有責任於此。

國民黨中央的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時，因爲在對待共產黨的問題上，爭論得開不下去；但是在廣州繼續的時候，不僅僅居正、張繼、謝持未去(也許是顧及國民黨的分裂)，鮑羅廷、汪兆銘也未參加，所以能夠給戴傳賢爲主導機會，但是達致了所謂「不偏左右」，而實際有利於中共進一步控制權力的結論。

不過，胡漢民、戴傳賢在一九二五年的夏、秋改變了所謂中派的政治立場，堅定地站到了正統的國民黨人的隊伍。剛剛開始轉變的廖仲愷，則以他的鮮血，開啓了一場政變。

註釋：

①《國父全集》第三冊。

②《中國共產黨史稿》，王建民著，香港中文圖書出版社，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年。

③同上。

④《邵元沖日記》。

⑤《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一集第三五八至三六五頁。

⑥《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一卷，第四七〇至四七一頁。

⑦《鮑羅廷與中國革命》，丁言謨著。

⑧《戴季陶先生文存》第三冊。
⑨《民主潮》雜誌：《談國家主義與曾慕韓先生》，胡秋原著，民國五十九年，台北。
⑩《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二冊，第二五二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
⑪《蘇俄在中國》第二一七頁，蔣介石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台北。

十二、危機加深

在孫先生去世的時候，雖然廣州大元帥府僅僅統治着南方一角，甚至廣東靠近福建一帶仍然被陳炯明的勢力盤踞，廣州及其西面被有明顯異心的滇桂軍佔領。但是，孫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歷史潮流，已經在挫折中空前地贏得了人心，這是當時全國的任何政黨、政治領袖、軍事勢力人物所無法比擬的。中國國民黨將是未來的當然執政黨，這是稍有政治遠見的人都知道的。因此，孫先生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引起了空前的爭奪。

雲南的唐繼堯，雖然曾經在反對袁世凱和護法的初期，與孫先生有過聯合，但因爲一直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始終若即若離。孫先生爲了對付北洋政府，曾經聯絡西南軍人，並且在北上以前(九月十一日)，要唐擔任副元帥，希望唐繼堯能夠率領西南之軍出師湖北，與廣州的北伐軍聯合進軍北京，可是投機的唐繼堯不願意就任。如今孫先生才去世幾天，唐繼堯馬上宣佈就任副元帥，並且派兵東進，欲佔領廣州，奪取國民黨已有的半壁江山。

陳炯明被趕出廣州以後，在廣東福建交界一帶，仍然保存着他的主力部隊，他一直等待着東山再起的時機。孫先生剛剛北上，陳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就通電復職，在二十九日由汕頭再發出通電，以粵軍總司令名義聲稱：將「集合全省軍民，群策群力，協靖粵局」。①並且在一月七日在汕頭下動員令，在一月二十六日佔領廣州附近的虎門。

廣東根據地東西受敵。

這些來自外部的軍人，是比較容易解決的：打破唐繼堯的西進夢想幾乎沒有費甚麼力量；殲滅陳炯明的主力部隊，也費時不到兩月；解決劉振寰、楊希閔也意外地順利。(但是因爲在東征西討的戰爭中，只能夠由軍人指揮，就使得軍人的地位異乎尋常地提高，從而引起內部的變化。軍人干政向來是中國政治的傳統。而鮑羅廷—中共與國民黨的軍人之間，又是互相交錯利用的，使得這段歷史格外複雜。)

同樣來自外部的有蘇俄撐腰的中共。但是中共已經加入國民黨，變成了「內部」，問題就變得複雜得多。那時中共已經控制着國民黨內的相當的要害部門，第三國際命令他們加緊奪取政權，因此在這以後的兩年多的時間裏，在國共之間展開了一幕又一幕驚心動魄的血腥的爭奪。

最重要來自國民黨自身。孫先生的身後，沒有任何一個人在主義、學問、人格和領袖氣質方面能夠和孫先生相比，沒有任何人能夠以領袖名義來凝聚國民黨。由於中共加入國民黨造成的問題重重，使得各種紛爭難以基本統一。謝持在一九三六年回顧當時的困難情況時說：「十四年中山先生逝世，黨人因共產黨關係，有來商品陳列所集議者。余計共產黨易治，而黨人意見分歧爲最難也，遂赴喪所爲哲生、海濱、精衛言之。精衛以組織黨人幹部可以相調劑答，余所注意者各省之同志也，初不虞胡、汪、鄒、廖之如彼，更不虞區區不肖亦見棄於同志如是也，嗟乎。」②謝持這段回憶顯示，在具體的政策上，代理元帥胡漢民、孫先生最後時期的秘書長汪兆銘、負責青年工作的中央常務委員鄒魯、改組以後最活躍的中心人物廖仲愷等各個主要的領導人之間完全不一致。當時之代元帥胡漢民，並沒有一套能夠團結各方的意見。

雖然胡漢民的品格正派，但是他書生氣重，人緣不好。居正在《梅川譜偈》中記載(民國十一年)：「總統任余繼任內務總長，以論克服地帶關係於內政事宜，觸怒胡漢民文官長，總理調息其間，余甚慚

愧。」顯示他們的關係並不好；又因爲許崇智在打敗仗時，胡漢民常在孫先生面前說許崇智的怪話，而使許崇智嫉恨在心；陳公博在《哭笑錄》中批評他「詞鋒尖酸刻薄」，「自負聰明」；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有類似的評論；蔣介石曾經給孫先生的信中也說過胡漢民的短處。他的個性的缺點，使他在孫先生去世以後，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需要大團結的關鍵時期，處於核心地位的他，不能以寬容大度的胸懷去建立起新的領導集體，不能以長遠的政治家眼光抓住現實中的根本問題，不能和國民黨的核心成員保持肝膽相照的和睦友好關係。尤其是他根本沒有想到可能出現野心家，用非常的手段來謀去個人的權力問題。這使得國民革命出現更多的波瀾，付出更多的血的代價。

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孫先生不止一次表示這是把國民黨交給全黨。孫先生去世，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成爲了當然的權力的繼承者。在中央委員會內部，所謂中派與所謂右派，在孫先生北上以後，已經開始聯合起來，「中派」大多變成了「右派」：鮑羅廷和中共都曾經寄予希望的戴傳賢，發表了强有力的反對中共的理論文章，遭受中共圍攻的戴傳賢，迅速在行動上站在了反對共產黨的行列。胡漢民集合在廣州的若干中央執監委員，一再就結束中共黨員和鮑羅廷佔據國民黨的要害部門的問題進行磋商，而且胡漢民還在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重要軍事行動上，根本無視不可一世的鮑羅廷的意見，所以中共早已經把胡漢民視之爲「右派」；而鄒魯任校長的廣東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使中共的勢力無論如何鑽不進去，被中共稱爲「反革命的大本營」，鄒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就教育經費與鮑羅廷爭辯時，逼得鮑以辭職相威脅。一九七八年中國大陸的有關鄒魯的傳記中，這樣記述鄒魯在這一時期的活動：「在國民黨『一大』閉幕後，他卻對孫中山確立的三大政策陰持反對態度，認爲『聯俄容共實爲一大問題』，並着手進行破壞。當時在廣東學生中，中國共產黨組織了一個『新學生社』，團結革命青年，工作非常活躍。鄒魯密令各校員生組織『女權運動會』、『民權社』、『民社』等反動團體，與

『新學生社』對抗。鄒魯還派人打入共產黨，偵察黨的活動。」③許崇智則在粵軍中一再拒絕蘇俄軍事顧問在軍中實行政治工作的建議，並發表公開談話，稱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

而原來就一直反對蘇俄—中共陰謀的張繼、居正、謝持等在這時，也與在粵的當權者進行磋商，以促進這代表國民黨正統力量的團結一致。

國民黨內的迅速整合，使得他們一致地決心清除鮑羅廷—共產黨對於國民黨的權力的把持。他們毫不懷疑，只要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修改有利於中共的選舉法，再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很輕易地就會把中共黨員清除出國民黨，一切也就會在中央執行委員的領導下，爭取國民革命的勝利。

這一段歷史過程，居正在《清黨實錄・編輯大意》中有提綱挈領地敘述。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廣州召開的中央執監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了有利於共產黨的選舉法以後，「滬寧同志特電中央，主張修改選舉法。北京同志所見相同，然爲共產黨及麻醉於共產黨之有力同志(按：此指汪兆銘)所扼。於是在滬之中央監察委員謝持、中央執行委員覃振、戴傳賢、邵元沖，與在粵之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林森、鄒魯展轉商榷，第一步將原定十月十五日開會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延期；第二步在粵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以解決共產黨在本黨之關係，修正第二次全國代表選舉法，此第二次清黨運動也。第二次之清黨運動，其精神完全繫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業由中央決定召集於十五日開會矣。決定之次日(八月十一日)，鮑羅廷在政治會議席上惶然詰問胡委員漢民曰：『昨日中央黨部決定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一案，關係重大，鄙人未曾與聞，深爲抱歉。』越數日，廖案作，鮑羅廷藉端興大獄，中央執行委員胡漢民失自由，中央監察委員謝持、中央執行委員林森、鄒魯暨候補中央監察委員許崇智均被迫離粵至滬，而諸同志在粵開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計劃至是根本破壞矣。」④居正在

這裏說得很清楚，即在廣州續開的三中全會通過了有利於中共的選舉法以後，在上海的執監委員與廣州的執監委員「展轉商量」，八月十日決定將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延期，並且先召開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修改有利於中共的選舉法以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新的組織和政治路線。

鄒魯也有記述：「自十四年三月總理逝世以後，共產黨利用黨團作用，欲消滅本黨。其時黨中同志多知之。而取譬最妙者，則莫如汪精衛同志『孫行者入牛魔王腹中打觔斗』之說。中央執行各委員，多謀開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以解決之。在粵中委及同志如胡漢民、鄧澤如、伍朝樞、孫科、鄒魯、林直勉等，曾疊在胡漢民、伍朝樞宅密商辦法。適在滬執監派劉蘆隱爲代表來粵，陳述辦法，所見與粵同。八月十日中央委員會遂決定於十月十五日開中央第四次全體執行委員會。其次日(八月十一日)鮑羅廷在政治會議突然問曰：『昨日中央黨部決議重要案件，未曾預聞，實爲抱憾。』蓋思推翻之而未能也。」⑤這顯示國民黨正統力量的大團結，使得鮑羅廷束手無策。

鮑羅廷—中共在做甚麼？

在孫先生去世後的第二個月，鮑羅廷向莫斯科報告，認爲國民黨的分裂不可避免，分裂對蘇俄—中共有利，所以應當加速國民黨的分裂，並且提出中共的七點任務：「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如下：把國民黨各地組織完完全全控制在我們手裏，右派無所事事固然不可容忍，但這種狀況對我們不會造成很大困難。第二、在北方建立兩所培養黨務工作者的學校。第三、通過必要程序，準備召開國民黨非常代表大會。第四、通過對胡景翼、孫岳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積極工作，並在我們給予大力援助的情況下，把他們爭取到左派隊伍中來。第五、開展一場運動，反對打着孫中山的旗號玩弄反革命伎倆篡改三民主義的行爲。第六、同時加强華南和華北的農民工作。對工人中間的工作也一樣。第七、反對聯治派，這些人實際屬於右派陣營。」⑥

鮑羅廷的上司魏金斯基給加拉罕的信中，不完全同意鮑的分析，認爲國民黨右派在集結力量，鮑太樂觀。魏說：「我以爲，我們應當得出以下結論：現在右派無論在國民黨內還是國民黨外，都更加堅決地反對我們，必須在國民黨內，在國內政治生活的各個領域，加强我們的工作，極其堅決地揭露國民黨右派，只提出開除個別國民黨員而不提分裂國民黨的問題。共產黨應打出國民黨左派的旗幟，站在運動的前列。」⑦

對照居正、鄒魯對於這一時期的國民黨忠貞領袖們的活動情況，魏金斯基的分析合乎當時的國民黨情況。鮑羅廷雖然在具體的運作和耍陰謀方面是個天才，但是他的長篇報告中，對於忠貞國民黨人的活動幾乎一點都不知情，他只看見了同志俱樂部的活動，以爲這就是「右派」活動的一切。但是魏金斯基根據李大釗提供的情況判斷：「右派在集結力量」。

因爲胡漢民和戴傳賢等「中派」人物都逐步站到「右派」的一邊，這正統力量的結合，足以恢復中央委員會的職能，足以解僱鮑羅廷，足以請中共退出國民黨，足以造成國民黨的大團結，而將國民革命領向勝利，那將是完全不同的局面。這根本就不是國民黨的分裂，而是和蘇俄—中共的和平的分道揚鑣。只是因爲「廖案」突然發生，使得已經定下日期召開的一屆四中全會化爲泡影，打亂了這已經快要完成的力量集結。

中共中央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做出很詳盡的各種決議案。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係議決案》中，認爲原來的「中派」已經分化成左右兩派，原來的「中派」戴傳賢、鄒魯、邵元沖已經是真正的「右派」，國民黨已經沒有「中派」。當前的任務就是「竭力贊助」左派，「努力反對右派」，「竭力贊助左派和右派的鬥爭」。「實行這種策略的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到處擴大鞏固我們的黨，尤其在國民黨勢力的所在地。」⑧

在「廖案」發生以前，蘇俄—中共的工作重點，已經轉到了軍隊：在北方，加緊軍事援助和在政治上改造馮玉祥部，建立宣傳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兩所學校；在華南的軍隊，則是以許崇智爲總司令的粵軍，但是鮑羅廷看重的是許崇智的參謀長蔣介石。

在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的奠基者，從來都是軍人。唐太宗取得天下以後，在他起兵祭天的山西晉祠題字道：「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這是成功的帝王的歷史經驗。中華民國建立後的第一任大總統雖然是文人孫中山先生，但是馬上就被武人代替，北洋軍閥憑藉武力驕橫多年。而有民主思想的中國國民黨的正統力量的委員們，似乎以爲這是一個孫先生所開創的新時代，他們是中央委員會的絕大多數，他們並沒有注意到軍隊在未來政治發展中的決定作用，並且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沒有政治野心。關於軍隊對政治發展的影響，他們既沒有預謀，也沒有防範。(只是有野心的汪兆銘關注軍隊，在國民黨內沒有基礎的他能夠馬上崛起，全靠軍隊支持，不過他後來的失敗也在於沒有軍隊。)作爲暴力起家的蘇聯共產黨的領袖們，並不是由於他們通曉中國歷史，而是他們的經驗與中國政治發展的機制不謀而合，所以蘇俄這時的作爲，深深地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走向。

原來的北洋軍閥總有日本或英國的背景，從現在開始，國民黨的軍隊，也就有了蘇俄的背景，這不僅僅指武器和戰術，更指在黃埔軍校和「黨軍」中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教育和影響。這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遠遠超過了北洋軍閥時代。

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瓦西里耶夫，在一九二五年七月致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最明確地體現了蘇共中央的這一策略轉變：「要求中國共產黨，特別關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武裝力量的組織，並爲此進行不懈的工作。……中國共產黨要特別注意農民軍事組織問題。中國革命的命運，歸根結底取決於中國農民，取決於在未來的武裝搏鬥中，他們站在哪一邊。……通過各地農會組織武裝來建立農民軍。組建這樣的

軍隊，是當前中國共產黨在組建革命武裝力量方面的重要任務。……每一支隊伍的人數和內部組織，都應和槍支數量相吻合，並要細心考慮保密要求。每一支隊伍都應盡可能是一個完整的戰鬥單位(有精幹的輜重和醫療單位)。」(引自《聯共、共產國際和中國》，本章的出於此書者，將不再表明出處。)過去中共吹噓毛澤東開創重視農民武裝，其實根據這最早的文獻記載，應當來自蘇共中央。

現在公佈的檔案，記載了蘇共中央如何通過中共，以驚人數量的武器和金錢，直接在中國武裝他們的代理人。這赤裸裸的武裝侵略行爲，卻被「援助中國革命」的動人口號所長期掩蓋。正在以鮮血和生命來驅逐帝國主義的中國人，不知不覺地又從背後遭受了新的侵略，而洞燭光機的國民黨領袖們，反而被執政的國民黨人命爲反革命「右派」。

本世紀中國的長期悲劇，在這裏拉開了序幕。

由斯大林主持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第六十二次會議在五月七日決定：「(1)必須在廣州建立可靠的新軍。責成伏龍芝同志爲此目的派遣一個二百人的教官團赴廣州。(2)責成伏龍芝同志和索科利尼科夫同志最後決定補充款項(約五十萬盧布)，以撥出建軍所需基金。(3)爲此，撥二萬支步槍和一百挺帶配套子彈的機槍，一定數量的迫擊炮和手榴彈。……」

蘇共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在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會議，其記錄透露，已經用完了二百萬盧布；另將給黃埔軍校四十五萬盧布；撥出三萬美元用於情報偵察工作，每月六千美元；「撥給廣州九千支步槍連同子彈，一百挺機槍，一萬發手榴彈、迫擊炮，六架飛機和無煙炸藥。撥馮玉祥、岳維峻：五萬支步槍，三千挺機槍連同子彈和子彈帶，二百門炮連同炮彈，製造槍彈的機床，大功率電台，飛機、坦克、化學戰裝備，並由我方出資爲馮玉祥建立騎兵——以上全部無償。」「截止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總開支四百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九十四盧布二十戈比和二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二美元，折合成蘇聯貨幣四百六

十一萬零一百三十四盧布七十四戈比。」(蘇共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通過的具體數目是四百六十一萬零一百三十四盧布七十四戈比，即是將前面的數字相加。)尤其重要的是，伏龍芝提議，在蒙古組建國際支隊，以支援馮玉祥。這支裝備極好的騎兵團由蘇聯紅軍的「志願者」組成，開支不超過一百五十萬盧布，組建好以後交由馮玉祥指揮。實際上這是蘇俄武裝侵略佔領外蒙古以後，直接企圖用軍隊侵佔中國本土的又一次軍事行動，將外蒙古作爲進一步侵略中國的跳板。最危險之處在於，這侵略是在中國人不知不覺中進行的。

實際的數字高於這。根據後來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當事人給斯大林的報告，「撥給馮玉祥的國民軍一軍總額爲三百四十八萬六千五百九十六盧布的武器，用以擴充軍隊至十萬人，擴充騎兵三千人，並補充炮兵器材」；「建議撥給國民軍和廣州總額爲一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一百四十七盧布的炮兵器材和飛機。」

由斯大林主持的蘇共中央政治局第六十八次會議，並由他簽署的記錄顯示，蘇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意圖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其中的有關重要條文如下：「(3)下大力氣煽起反張作霖的活動，全力分化瓦解他的軍隊並使其革命化，切記張作霖是帝國主義手中的主要工具。(4)設法使中國現政府對運動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果這樣做不能奏效，就分裂這屆政府並使其癱瘓，讓帝國主義者無法打着中國政府的旗號進行反對革命的勾當。(5)如果上一項措施不能奏效，就驅散現政府，另組吸收國民黨參加依靠馮玉祥軍隊和國民黨軍隊的新政府。(6)再次提醒必須全面鞏固組織，建立基層組織和據點。……(8)建議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和其他負責同志，在其講話和文章中切勿宣揚共產國際、蘇聯和俄共在中國革命中所起的作用。(9)駐華使館人員和俄國工作人員的行動務必極其謹慎。」在一個國家的最高會議上，竟然決定要分化瓦解另一個國家的軍隊，並且使其聽自己的話，即「革命化」；要不然就「保持中立」，做

不到就讓其「癱瘓」；再不奏效的話，就「驅逐現政府」，另立聽話的新政府。這是不下於日本、英國的帝國主義行徑。最後「保密」、「謹慎」的兩點，則是蘇俄隱藏其侵略意圖的狡猾的證明。事實上，在十月革命前的沙皇時代，俄國從中國奪取了遠遠超過其它西方列强的土地，但是正面的戰爭很少，大多數是乘其它帝國主義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時候，乘中國之危，利用中國政府的腐敗，威逼、欺騙、利誘而成，沙皇俄國狡猾萬般。但是，聲稱「革命」的蘇俄政府，假惺惺地宣佈廢除過去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人喪失了警惕性，然後培養自己的代理人，再利用中國不穩定的形勢，以金錢、武器和軍事顧問「援助」，支持一方，反對一方，不聽話者則加以「分裂」、「癱瘓」、「驅逐」。這是英國、日本、沙皇都望塵莫及的。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鮑羅廷在參加孫先生去世的各種活動以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去到了設在張家口的馮玉祥的總部，從思想上去直接影響馮，馮後來回憶道：「鮑羅廷和加拉罕也先後由人介紹相識，常來找我談話，每次都由陳有仁先生擔任翻譯。我們所談的，主要是關於革命、宗教，以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一類問題。我和他們說，中國的目的只是爭取自由平等，誰能贊助我們達到這個目標，誰就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接觸，越來越密，越談越接近，於是我的思想和許多政治方面的見解也慢慢起了變化。」⑨蘇俄代表總是順着中國人的民族情緒接近人，再不知不覺地對人予以影響，馮的回憶說明這點。在鑒定馮可靠以後，鮑一離開，一個三十多人的蘇俄軍事代表團就去到了馮玉祥部隊，政工人員、武器和金錢也源源不斷地湧去。

這是飽受欺凌的中國人的新的極大不幸！

在孫先生生命垂危的時候，廣州根據地就不得不應付陳炯明發動的攻勢。陳軍在一月二十六日佔領虎門後，威脅廣州，於是，以許崇智爲總司令、以蔣介石爲參謀長的粵軍，開始了第一次東征。滇軍雖

然任左翼，桂軍任中路，粵軍任右翼，實際進行時，滇、桂軍都按兵不動，只是由許崇智指揮的粵軍進行戰鬥。粵軍第二師由張明達爲主力，加上第七旅和第一次參加戰鬥的黃埔兩個教導團。二月十五日，戰略要地淡水被攻下；二十七日，攻下陳炯明的大本營海豐城，洪兆麟部被逐；三月七日佔領汕頭；三月二十二日佔領梅縣，陳部主力林虎被擊潰。第一次東征遂告一段落。

由於北伐以後一直是蔣介石的天下，現在的歷史一提起「東征」，幾乎一致地把功勞歸之於蔣介石。蔣介石自己也大言不慚。甚至他晚年在台灣寫的《蘇俄在中國》中，也從來不提到許崇智和粵軍的戰功。最近台灣出版的《許崇智與民國政局》寫道：「世之研究國民革命者，每將兩次東征之功全歸諸黃埔校軍，衡諸史實雖非無因，然許崇智麾下粵軍在初次東征中實仍居主要地位。以戰役論之，初期之淡水、平山之役，無役無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之參與。後期之棉湖、興寧之捷，除粵軍第七旅外尚有粵軍第一旅及警衛軍之助戰。倘無粵軍，僅憑二千五百人之校軍兩教導團，吾人實難想像其結果。只以進軍之快速而言，初期討伐洪兆麟部，始終由粵軍第二師及第七旅爲前鋒，行軍之神速，連蔣氏亦不禁讚嘆。故粵軍在初次東征中所立的戰功，實應給予應有的地位。」⑩

東征雖然勝利，留守廣州的滇軍和桂軍卻與唐繼堯和陳炯明勾結起來，廣州處在危急之中。一九二五年六月粵軍在蔣介石指揮下回師廣東，在其它部隊配合下，一舉蕩平叛亂。廣州革命根據地重新得到穩定。其中的回師功臣蔣介石由此升任廣州衛戍司令，許崇智則達到他的政治生活的頂峰。

在東征勝利的凱歌聲中，從北京返粵的汪兆銘先到汕頭的許氏司令部拜訪，廖仲愷、朱培德、蘇俄顧問加侖將軍也去拜訪。歷史研究者們一致推測擁護汪兆銘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的方案應當在這時定下。「國民政府成立後，許氏在政府中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常務委員、軍事部長兼廣東省務會議主席、軍事廳長。在黨中則任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一時權勢顯赫，儼然與汪、廖成爲國民政府的三巨頭。」⑪處

於這政治上的核心地位，但是許崇智沒有政治上的抱負，也沒有擔此重任的必要的政治敏感和遠見；雖然他在東征過程中表示不能贊成共產主義，但是他沒有警覺到汪兆銘上台的鮑羅廷背景；他的書卷氣息，也使得這位軍人在複雜的政治生活中，不能高瞻遠矚，只能扮演被人利用的角色。當他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爲的時候，已經是在蔣介石和鮑羅廷聯合剝奪了他的軍權，他去到上海，爲時晚矣。

在鮑羅廷和汪兆銘的操作之下，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推定汪兆銘、胡漢民、張人傑、譚延闓、許崇智、于右任、張繼、林森、徐謙、廖仲愷、戴傳賢等十六人爲國民政府委員，汪兆銘、胡漢民、譚延闓、許崇智、林森五人爲常務委員，並選舉汪兆銘爲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在一九三〇年在立法院的報告中，曾經兩次說道，汪兆銘是被蘇俄的加拉罕和鮑羅廷所選中的。選舉的過程，不是由最高的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的，而是由其下屬機關政治委員會決定，然後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形式上加以追認而已。李雲漢敘述道：「此次國民政府的成立，從組織原則的制訂到國府人選的產生，完全是先由政治委員會決定，然後請最高機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追認。鮑羅廷以政治委員會顧問身份出席會議，試圖操縱政治委員會的決議，汪之所以居首席，即是鮑羅廷謀略運用上的傑作。」⑫鮑、汪聯手將實權人物胡漢民拉下來，也不讓反共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鄒魯任國民政府委員，僅僅讓他擔任懲吏委員；鄧澤如也是懲吏委員，掛名而已；對於從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時期是孫先生的左右助手的居正，甚麼政府職務都沒有，居正置之不理，以他的人格和資望，先後活動於河南的國民軍第三軍和最爲孫先生賞識的革命軍人樊鍾秀部，又到西安聯絡楊虎成，似乎居正對於軍隊在今後的國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已經有所認識；謝持被委任爲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還有林祖涵、黃昌穀、甘乃光、陳秋霖，按照檢察院組織法，五人之中將推舉一人爲監察院長。原來在國民黨第一屆監察委員中，因爲全部反共，而有一九二四年夏天的「彈劾共產黨案」；如今在謝持後面安上中共的重要人

物林祖涵，就是當上監察院長也會無所作爲，顯然是別有用心。謝持在八月十五日提出辭呈，不願受鮑羅廷—汪兆銘的擺佈。

既然鮑羅廷可以左右國民政府的人選，爲甚麼中共領導人沒有進入呢？是聰明的鮑羅廷麻痺國民黨人的陰謀。現在公佈的有關檔案中，沒有直接的證據，卻有間接的證據同樣說明問題。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三日(第一四九號文件)蘇俄駐上海副總領事維里傑致魏金斯基的信中說：「國民黨代表大會的日程已定，新的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名單大體擬出……關於共產黨人在新一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席位已經發生過爭論。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七人，我反對，爲的是不驚動中派，也不激怒右派。一致同意最少四人，其餘視代表大會期間中國的形勢再定。」國民黨即將召開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的名單，竟然由蘇俄事先定了關於中共黨員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的數量多少，完全以蘇俄—中國的需要而定。這可以證明蘇俄控制國民黨之嚴重，也可以間接證明中共黨員不參加國民政府是出於策略考慮。《陳獨秀年譜》記載，中共中央曾經接到共產國際不參加國民政府的指示。次年譚平山對此加以檢討，所以變更初衷，在武漢公開出面建立左翼政府。

這權力的分配，是根本無視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鮑—汪聯合操縱政治委員會的結果，以便於蘇俄的進一步控制。檔案雖然在大半個世紀以後的現在才被公諸於世，但是對抗蘇俄—中共的忠貞國民黨人早就看穿了蘇俄—共產黨操縱的事實。鄒魯後來在《共產黨破壞國民黨及國家真相》的長文中揭露道：「關於『黨權不在最高黨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而集到政治委員會』的問題。此問題別的不說，姑就現在『國民政府組織法』就可以證明。該文第一句就是說『接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當時在廣州《民國日報》正式發表。我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之一個，且是常務委員，日日在委員會裏辦事的。在會中並沒有此事的影子，何從決議起來？廣州《民國日報》是黨報，今忽發表此決

議，我實疑怪萬分。我正在詫異的時候，子超(林森)突然向我質問，因子超亦是中央執行委員之一個，卻不是常務委員。他亦知道會中並沒有決議此事，以爲是常務委員私自決定的。原來連我這個做常務委員的都不知道。及至開執行委員會，我提出質問，精衛才說係政治委員會決定的。當時我便發議，謂改組國民政府，何等重大的事，又非緊急事情，何得政治委員會決議就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此事除當時質問外，並有議事錄可查。嗣監察委員鄧澤如提出彈劾案，政治委員會竟列名叫其將彈劾案撤回，此亦有函可按。政治委員會蔑視中央執行委員會如此，干涉監察委員行使職權如彼，黨權尚復在黨部嗎？其次則農民部部長出缺，去年(按：即一九二五年)八月下旬某日開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事日程中有政治委員會函以陳公博補農民部部長一件，慧生(謝持)提出質問：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部長，何得由政治委員會議決補任？至次期(九月四日)再議此事，精衛辯爲係政治委員會推薦。慧生索原函閱，乃係經政治委員會議決，請中央黨部查照辦理，並非推薦。以上兩端，皆重大之事，而委任最高黨部的農民部長，且完全屬於黨務，不涉政治範圍。彼政治委員會尚且目無中央執行委員會，其於平常普通之事，更任由政治委員會議決發表，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存案掛號，中央執行委員會簡直是政治委員會的收發罷了。」在一九二五年十月由鄒魯執筆，以張繼、謝持、覃振、石英、茅祖權、傅汝霖聯名致函給汪兆銘、譚延闓、蔣介石、鄧澤如等的信中，還以許多事實，揭露了鮑羅廷的權位，已經到了連汪兆銘都要俯首貼耳的地步：「蓋鮑羅廷、加侖二氏，名爲顧問，實則軍政最高之命令者：觀於鮑氏因梯雲(按：即伍朝樞)對英記者談話，有『俄人之供職係僱傭』一語，遂對之不滿，而去其外交部長之職位；廣三鐵路之罷工，以握有最高政權、黨權之精衛，反囑局長陳耀祖向鮑氏疏通；黨中所定教育經費獨立，無論何人不可動搖者，因鮑氏謂『教育經費獨立，其於軍隊盤踞財政』，遂不恤藉統一財政之名以取消；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九月十五日開全體執行委員會，以鮑氏『未曾先事預聞爲憾』之言，即不惜另議延

期以打消之。此種事實，皆兄等親歷、親行，固無庸縷舉。此外，如外交部顧問、參謀團主任、航空局局長、交通總監、兵工廠顧問、各軍訓練，莫非俄人。袁世凱借二萬五千大款，予人以鹽務稽核，吾黨猶謚之爲賣國，設有人以賣國責吾黨，吾黨何辭以對？」⑬

作爲汪兆銘對蘇俄—中共支持的酬勞，十天以後，讓最關心在軍隊發展的中共黨員，擔任軍隊高級職務：七月十日，周恩來擔任黨軍第一師黨代表，包惠僧爲黨軍第一師第三團黨代表，邵力子爲陸軍軍官學校秘書長。周恩來在後來談到中共這時候對黃埔軍校和軍隊的部份控制：「特別是當時在黃埔軍校內部，青年軍人聯合會的發展大大超過孫文主義學會，軍隊中三個師的黨代表，我們黨佔兩個，九個團的黨代表，我們佔了七個，在連、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們黨的組織；各軍又成立了政治部。」⑭這政治部仍然被中共所控制。

光有鮑羅廷一人，縱然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操控大權到如此地步。爲何能夠如此呢？在廣州召開的三中全會做出決定，將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確立爲不能動搖的地位，這在理論上完全同馬克思主義區別開來，並且對馬克思主義多所批判，對於國民黨的發展有極爲重要的意義。但是在孫先生逝世前不久的日子，用鮑羅廷的書面報告的話說「越來越左轉」(前面已經引用過的第一四五號文件)在政策上的表現就是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並盤踞各部門、各級要津；給以鮑羅廷的崇高地位，讓他參與決策，和常常用政治委員會做出決定，再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追認等政策。如今在肯定孫先生的主義的同時，卻將應該隨具體情況而變動的政策混淆起來了。因此，聯俄容共政策也隨同三民主義一樣被神聖化，何人敢公開違反？違反者就會有馮自由、馬素的被開除出黨的下場，三中全會重申了紀律。這就是鮑羅廷、汪兆銘手中所揮舞的「尚方寶劍」。

誰需要「尚方寶劍」呢？需要奪取權力的人。這就是汪兆銘，和那時並不太引人注目的蔣介石。

汪兆銘對蘇俄的企圖並非不知，改組開始的時候，他就反對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猶如孫行者入牛魔王腹內打觔斗一樣」，現在蘇俄破壞國民革命已經昭然若揭，汪爲何視而不見呢？在國民黨內沒有根基、沒有擁護者的汪，需要鮑的支持奪取權力；鮑則需要馴服工具來爲蘇俄謀利。

鮑羅廷能夠將政治委員會凌駕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之上，全都得到了汪兆銘的共謀；爲了討好中共，汪兆銘將在湖南搞農民暴力運動的能手毛澤東代替他的宣傳部長的重任；鮑羅廷—中共爲了分裂國民黨而製造左右派，國民黨自己從來不承認，在三中全會上有防止的訓令，但是汪兆銘卻主張「革命的向左去」；爲了與中共共謀，竟然縱容江蘇省國民黨黨部通令閱讀陳獨秀、瞿秋白的文章，而抵制戴傳賢的反共著作；因爲鄒魯爲校長的廣東大學一直抵制共產黨，汪竟與鮑羅廷串通同氣，先卡教育經費，然後更易校長，等等⑮。

鮑羅廷與汪兆銘狼狽爲奸，已經奪取了相當的權力：汪兆銘不僅僅成了國民政府主席，而且是凌駕於粵軍總司令之上的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但是，那時的最高機關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是鮑—汪難以逾越的奪權障礙。

猶有甚者，在國民黨中央裏，汪兆銘唯一的「左派」戰友廖仲愷已經開始轉變。

胡漢民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有一封致林直勉的信，林直勉爲廖案冤枉坐牢兩年多。因爲這信在數年以後寫，又有旁證，敘述廖仲愷的轉變是可信的：「一日吳鐵成宴諸人於外交部私邸，飯後談及孫文主義學會事，吳又言仲愷過袒彼黨，殆受其欺。哲生慨然曰：『我當忠告之，不能聽，則當諷其辭職。』後此結果如何，未見哲生報告。唯仲愷遇刺之前數日，先邀君佩深談，謂將辭去當部農工兩部，而請弟代之。君佩以告弟，未遽可否。翌日，實爲國府會議，飯後，他委員皆去，仲愷乃與弟詳言不能繼續任職之故，蓋已知共黨之爲患，而於總部實力盤結太深，不易救正，渠一手辦去，尤爲苦難，故唯

有易長之一法。何以不推他人？仲愷云他人易受劫持，且無理論，唯兄最爲鮑羅廷所畏重。弟覺其詞意甚誠，唯以其事出之太驟，個人生平做事，亦未有不經考慮準備而冒昧爲之者，因力辭；……次日仲愷復來，先泛論國際形勢甚久，既又談部長易人事，余仍持前議，仲愷亦唯別去。……吾深信仲愷最後已知親共之非，惜不能及身矯正而死，且疑共產黨人亦未嘗不知之，而利其死也。」⑯胡漢民的叙述是在八年以後，而且信中涉及的人物和細節，已經足以證明廖仲愷的反共的覺悟。他如果一站出來，對於大大加强國民黨的正統力量，對鮑羅廷—中共將會有巨大的打擊。但是他竟然在這最重要的時候被人暗殺了。

註釋：

①《陳獨秀年譜》第八六八頁。

②《天風海濤館六十自述》謝持著，《近代中國》雙月刊第七十一期第一二九頁，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③《民國人物傳・鄒魯》第一卷第三七九頁，中華書局出版，一九七八年，北京。

④《清黨實錄・編輯大意》第二頁，居正編輯並文。

⑤《鄒魯文存・黨統問題》，鄒魯著，北華印刷局，民國十九年，北平。

⑥《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四九三頁。

⑦《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四八九頁。

⑧《許崇智與民國政局》第一一四頁，關玲玲著，大安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月，台北。

⑨《我的生活》下第四二一頁，馮玉祥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⑩《許崇智與民國政局》。
⑪《許崇智與民國政局》。
⑫《從容共到清黨》第三七四至三七五頁。
⑬《鄒魯文存・告孚木》第三集第八至九頁。
⑭《周恩來選集》上卷第一一八頁，周恩來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北京。
⑮《清黨實錄》第八頁。
⑯《胡漢民先生文集・爲廖案覆林直勉書》第七二九至七三〇頁。

十三、「廖案」引發的政變

廖仲愷被刺引發了政變，造成整個國民革命的大轉變。大概由於在政變中得利者的忌諱，從來不用「政變」一詞，以便減少人們對得利者的注意。但是，最早把這稱爲「政變」者，是邵元沖的日記（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是居正在《梅川譜偈》中（乙丑，中華民國十四年，稱爲「廣州政變」）。可見這是當時對此事件的普遍看法。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已經決定召開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平地清除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要害部門的控制的時候，解僱已經成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太上皇的蘇俄顧問鮑羅廷的時候；在蘇共政治局直接的指揮下，蘇俄軍事顧問和政工人員已經開始控制南方軍隊，並且進一步欲控制北方馮玉祥部的時候；在汪兆銘攀附鮑羅廷，已經身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但是毫無辦法控制最高權力機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時候；蔣介石領導的黃埔學生軍在東征中剛剛開始嶄露頭角，但是不僅不能得到機會指揮整個粵軍，因爲汪兆銘擔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軍權反而縮小，蔣介石已經提出辭呈的時候，廖仲愷被刺了。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上午，廖仲愷與監察委員陳秋霖一道，剛剛走進中央黨部的大門，突然遇刺身亡。

「廖案」的發生，改變了孫先生去世的時候所留下的整個權力格局，改變了中國國民革命的發展方向：由昔日孫先生的左右助手們所形成的中國國民黨正統力量，剛剛凝聚在一起的時候，從此就先後全

部被趕出了政治權力中心；代之而起的是，鮑羅廷—中共聯合汪兆銘、蔣介石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控制，他們的權力由政府、軍事擴大到最高權力的國民黨中央，他們不可逾越的中央執行委員會，被鮑—汪決定成立的三人特別委員會所代替；軍事强人蔣介石在鮑—汪的扶持下，迅速地撲滅了軍隊內部可能的一切反抗勢力而崛起。

這一結果，是由非常的暴力手段造成的，邵元沖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的日記中把這稱爲「政變」。

由廖仲愷被刺而興起的力量：蔣介石、汪兆銘、中國共產黨三方面，從此主宰了大半個世紀的中國政治舞台。「廖案」所改變的，是整個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

兇手是誰？這是永遠的歷史懸案。由於政治的需要，汪兆銘、蔣介石和中共都說廖仲愷是被「反共產」的人所殺死的。但是最初，包括廖夫人在內，都不是這樣說的。

一種說法是：不滿意廖仲愷欲統一廣東財政的舊軍人。廖仲愷夫人在九月二十二日的追悼大會上演說時，懷疑是阻礙財政統一的舊軍人所爲，她說：「廖先生自打倒劉楊以後，就要統一軍政財政，因廣東人民連年受種種苛捐雜稅痛苦，都是軍政財政不統一的緣故。廖先生既主張實行軍財兩政統一，軍閥和無聊政客污吏奸官，見失了他們利益，所以設法來暗殺廖先生。我們要知廖先生遭暗殺，雖然是一般兇手反動派，還有帝國主義在後面指揮。」①這一看法是根據廣州的具體情況分析而發。但是後來多數是從政治需要而亂猜，同樣是廖夫人，在中共當政時代，卻不止一次說是國民黨「右派」所殺，但是沒有提出任何一點根據。在二十二日廖仲愷的追悼大會上，戴傳賢的演說很悲戚，他泛泛說，兇手是在政治上反對廖的人，是和帝國主義有勾結者。

一種說法是：是反共的國民黨人士所爲。汪兆銘在次年一月和中共一起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

在政治報告中則說得很肯定，點了反共的林直勉、胡毅生、林樹巍等國民黨的文職人員，和魏邦平、梁鴻楷、張國楨、梁士鋒等武人的名，而且武人們在那時多已被處決。據國民黨「二大」《會議史料》記載，汪的心腹陳公博也在「二大」上說是三種人所殺：「失意軍人」、「無聊政客」、「敗類同志」，也點了這幾個人的名。蔣介石在八月三十一日黃埔軍校舉行的追悼大會上說：「黨代表的死，是一般反革命派用反共產的口號打死的……是被帝國主義者用『反共產』的口號來打死的，以後我們應當與『反共產派』的人爲敵。……現在我們第一要反對『反共產派』，其次代廖代表復仇。」②中共的說法與汪兆銘、蔣介石一致。中共機關刊物《嚮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的第一百三十期登載中共中央委員羅亦龍的文章說：「國民政府成立之後，許多右派的官僚政客，得不到做官的慾望，並且還有許多被裁撤，如胡毅生、林直勉等都是賦閒，且胡毅生失去了胡漢民執政時代賣官鬻爵的大買賣，哪有不惹動他們的無名火積極地煽動起來……。參加這次大暗殺的人實在太多，假若國民政府負責辦案的人沒有決心，不將他們根本肅清，國民政府的前途還免不了危險。」並且說胡漢民「有參加暗殺的危險」。老黨人們大多在改組開始以後離開了權力中心，胡漢民是僅存的碩果。

第三種說法則認定出於鮑羅廷——中共。胡漢民懷疑是蘇俄——中共的陰謀，並且指出了廖仲愷最後數天裏和他接觸和轉變的情況，除了他在(前引用)給林直勉的信中提到廖仲愷開始轉變以外，在廖仲愷被刺四週年胡漢民的演講辭中，以事實對廖的轉變做了更詳細的說明，並且說黨部的警衛工作是由擔任組織部長的譚平山負責，他完全撤去了原來胡漢民所派去的憲兵：「吾深信仲愷最後已知親共之非，惜不能及身矯正而死，且疑共黨同亦未嘗不知之，而利其死也。……俄國黨部，警衛森嚴，爲世界所未有，爾時在國民黨內部負責皆鮑羅廷之徒，譚平山等輩也。兇手伏於黨部內，槍聲起於階前，僅以幼稚疏虞爲解，而未有人稍微責問者。」③證明廖仲愷已經開始轉變的，還有汪的大將陳公博，他的說法可

以旁證胡漢民講的廖已經開始轉變：「廖先生拿着農工廳徵求我的同意。我爲履行我的主張，堅決不就。廖先生說：你不幹，只有CP來幹，我實不願交CP。」④胡漢民指出，廖仲愷是因爲不滿意中共對國民黨的控制，而交出農工兩部的部長位置(秘書都是中共黨員)，所以找到被中共開除出黨的陳。陳證明了廖的轉變的可信。可以想像，廖的轉變，對於鮑羅廷——中共會有多大的打擊。除掉這種轉變的人，將是非常重要。

但是，廖案的發展，只是偏重於一面進行，即針對反共者，當時的重點嫌疑人物有三個：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實際上針對的是胡漢民、謝持等中央執監委員，針對的是即將召開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事實證明朝這方向辦案一無所獲，兇手不是他們。關鍵在於所有的掌權的辦案者並不在於誰是兇手，而在於怎樣乘此奪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奪取中華民國的國家的權柄。而當時的中央執行委員的多數都是反共者。

在大半個世紀過去以後的今天，已經不可能將「廖案」的真相研究得水落石出，也沒有多大實際的意義。但是「廖案」所引發的政變卻是應當弄清楚的，因爲政變的得利者汪兆銘、蔣介石、鮑羅廷——中共三方，都是站在「左派」位置上，向「右派」開刀，都是以「非常」爲名，以抓兇手爲名，實際上廢除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從此以後大半個世紀的中國，都由這三方面先後統治。

政變分爲三個步驟進行。

第一是成立特別委員會，將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全部解除。胡漢民叙述道：當時他和汪兆銘都在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家，汪「力主邀鮑羅廷來，他說：『必須請鮑先生來大家共同研究。』鮑羅廷來了，便說：『應該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辦理此事，於是開臨時會議，由鮑羅廷提出汪兆銘、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爲特別委員會委員，將當時的黨部、政治會議、國民政府各機關職權，一律交特別委員會統制。這

個委員會有黨政軍一切大權，汪許二人並推鮑羅廷爲最高顧問。那時共黨猖獗，譚平山等盤踞黨部，我做外交部長，已不甚聞黨政，這幾個人如此地一唱百和，更令人無從置喙。」張國燾的回憶錄也引用這段話，說明特別委員會的主意出自鮑羅廷。《許崇智與民國政局》一書作者關玲玲，直接引用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臨時聯合會的記錄，說明特別委員會出自鮑羅廷的提議。

這段話中反映一個問題，一個疑問。

一個問題是：胡漢民述及自從國民政府主席由汪兆銘擔任以來，黨政的事情他已經很少過問，黨部由中共黨員譚平山盤踞，國民政府由汪主政，這兩個人都是看鮑的臉色行事的人，即實際黨政權力由俄國人掌握。在處理廖案時，汪「力主」請鮑來，鮑立即提出成立「特別委員會」，這就是鮑的權力的證明。汪服從鮑，而許崇智和胡漢民的關係則長期不好，據毛思誠所撰寫的《蔣介石年譜初稿》，在事變前的幾天，胡漢民和許崇智的關係，已經惡化到不能相容的地步；非常孤立的胡漢民，顯然無法反抗鮑的決定。

一個疑問是：鮑提的三人特別委員會的名單中，令人矚目的是有蔣介石，蔣介石第一次晉陞權力中心，爲甚麼鮑會看上他呢？汪靠鮑當上國民政府主席，故對鮑唯命是從，當然在人選之列；許崇智雖然在東征中反對蘇俄顧問進一步插手軍隊，表現得不贊成共產主義，但這不是政治上的全面反對，特別因爲實權軍人許崇智與胡漢民不和，利用許就可以進一步排擠胡漢民。並且許是粵軍總司令，剛剛在東征中打了大勝仗。作爲軍人的許崇智，既沒有野心，又對鮑—中共沒有防範的政治頭腦，當然可用。

爲甚麼提名蔣介石呢？這提名改變了中國的近代歷史。

按照幾十年以來蔣介石的御用歷史學家的編造，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是堅決反共的；絕大部份蔣介石

的傳記，都把蔣介石訪問蘇俄回來給廖仲愷的一封信件，作爲蔣介石早就洞悉蘇俄陰謀的證明。如果是這樣，蔣介石在這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到此時的激烈國共衝突之中，就不會袖手旁觀，鮑羅廷也不會提出這樣一個反共人士來作爲權位最高的三人執政之一。

問題並沒有這樣簡單。對蔣介石真實的政治態度，必須搞清楚。

在蔣介石去蘇俄訪問以前，不僅在黨政方面全無地位，又是一個沒有一兵一卒的軍人；國民黨的「一大」舉行，他不是代表，更不可能是中央委員，那時的二十四個中央委員中的軍人有李烈鈞、譚延闓、熊克武、柏文蔚、石清陽、楊希閔，候補委員有李宗黃，候補監察委員有許崇智、劉震寰、樊鍾秀，地位顯然都在蔣之上。爲甚麼引起了鮑羅廷如此的好感呢？他在蘇俄的言行和他在黃埔軍校的表現，是兩個重要的關鍵問題。

現在公佈的蘇共中央檔案，記載了蔣介石在蘇俄的言論。

蔣介石等在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到達莫斯科，在九月七日受到蘇共中央書記魯祖塔克的接見，蘇共總書記表示「國民黨就其本質而言，與俄國共產黨非常相近」；蔣介石表示「國民黨一向認爲蘇聯共產黨是其胞兄」，這超過了蘇共中央書記關於兩黨關係的評價（《聯共、共產國際與中國》第二三二頁，第八二號文件）。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遠東司司長在關於國民黨代表團的情況報告中，是這樣介紹蔣介石：「蔣介石。大本營參謀長，日本留學。國民黨左派，爲老資格黨員。孫中山頗爲信任，親蘇，現已脫離華南的軍事工作。支持我們的華北作戰計劃。在中國以文化教養最高之輩著稱。對我國紅軍的政治工作和技術裝備，很爲關注。」（第八七號文件）

在九月十七日參觀一四四步兵團時，蔣介石曾發表演講說：「在貴國你們已經戰勝了帝國主義和資

本主義，但你們沒有消滅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要準備投入這場全殲它們的戰鬥，因爲你們能夠在其他民族的幫助下成就這一事業。請記住，死於疆場是每一個戰士的天職……。我們是革命者，我們是國民黨員，我們是軍人，我們是戰士。我們也要爲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而捐軀。」「蔣介石的講話不時停頓，爲經久不息的掌聲，爲樂隊高奏的《國際歌》打斷。最後，全體與會者歡呼『烏拉』。蔣介石將軍情緒昂揚，激動不已，顯然他自己深深爲自己說的話所打動。結束講話時，他的聲音非常高，幾乎像在喊叫，雙手顫抖着。」然後被紅軍戰士們抬起來，一直抬到汽車旁。蔣介石的演說中，不僅僅要如像孫先生和國民黨通常的口號那樣，要打倒帝國主義，他還跟在蘇共的後面，打倒資本主義，要「全殲它們」，這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聯繫起來，是三民主義中所沒有的，是列寧主義的一部份。（第八五號文件）

十一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參加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在會上蔣介石稱呼其他的共產主義的領袖爲同志，發表了贊成共產主義的一些提法。一開始蔣介石就把莫斯科稱爲「世界革命的中心」，他接着說：「今天，國民黨承擔着在中國進行革命工作的責任，此項工作是進行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國革命政黨國民黨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份。共產國際代表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還擔負着領導革命運動的任務，特別是要領導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革命運動的任務。中國深受外國列强即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榨，所以共產國際應當特別關注中國革命，並爲中國國民黨提出十分坦誠的建議。」蔣介石把中國的國民革命納入了世界共產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因此請求共產國際對中國「特別關注」。然後蔣介石把孫先生的民生主義解釋成爲共產主義的第一步，第二步才是共產主義。孫先生在講解他的民生主義時，特別批判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指出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相同在理想上，在實現的方法上根本不同：國民黨是用階級協調，共產黨是用階級鬥爭；國民黨代表全民，共產黨代表一個階級。

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是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才是共產主義。蔣介石卻把民生主義說成是第一步，共產主義是第二步，從而將民生主義在理論上直接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連接起來，這種說法在孫先生的學說中沒有，蔣介石說：「第三個主義即是民生主義，就是走向共產主義的第一步。我們想，現在對於中國革命事業來說作爲第一步，最好的政策就是使用下列政治口號：『爭取中國獨立』、『人民政府』、『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到第二步，我們才能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有所作爲。」蔣介石還說明了目前不願用共產主義的口號，完全是一個策略問題，「只要我們第一階段取得成功，我們就有可能公開宣傳共產主義的原則」。採取這三個策略的原因是：「大部份中國人很理解三民主義」，「中國軍閥沒有特別注意我們的宣傳工作」，「小土地所有者和小資產階級不會反對我們的革命運動」。蔣介石「創造性」地把三民主義納入了共產主義理論體系，簡直是「中國式的共產主義」了。在談到國際方面，也不同於孫先生的理論。孫先生聯合各國的主張，完全是爲了就事論事，包括大亞細亞主義和聯絡德國等，一九二五年秋天關於成立國際聯絡部的主張，甚至是爲了對付蘇俄，但是蔣介石的國際主義，完全是作爲中國革命是共產主義革命的一部份出發的，他說：「我們認爲，世界革命的基地在俄國。俄國本身當然有許多敵人，但是，俄國革命幾年來已經取得成功。而在俄國西線，還有一些受資本主義控制的國家，如德國和波蘭。……俄國的東線是中國，一個仍然處在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影響下的國家。……國民黨設想，由俄國、德國(當然是在德國革命成功以後)和中國(中國革命成功之後)共建三大國同盟，以抗衡世界資本主義勢力。依靠德國人民的科學知識、中國革命的成功，以及俄國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國農產品，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取得世界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可能推翻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制度。」蔣介石甚至比第三國際的領袖們還樂觀，認爲共產主義革命在中國不久就能夠取得勝利：「可是，外國同志認爲，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是十分困難的，但是，如果我們真正根據三民主義的口號進行

革命工作，中國革命的勝利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認爲，待過上中國國民革命第一階段結束，我們就會凱歌高奏。只要一勝利，我們就開始第二階段，開始宣傳共產主義口號。我們認爲，到那時，中國人民勢將順利實行共產主義。」不用再引用下去，這完全是一位共產主義者的豪言壯語。(第九六號文件)

十一月二十七日托洛茨基會見了蔣介石等，蔣介石等向托洛茨基表示了請教的意願以後，托洛茨基做了指示，蔣介石表示贊成托洛茨基所說的一切：「黨將盡力把俄國同志的意見付諸實施。他希望不久後，解放了的中國將成爲俄羅斯和德國社會主義共和國中的一員。」(第九七號文件)蔣介石是真正的信仰？是一時的糊塗？是爲了權力的欺騙？不過，這些是真實的歷史記錄。

蔣介石歸國以後，鮑羅廷根據廖仲愷的報告，這樣告訴瞿秋白：「我同廖仲愷談過話，從他口中我得出印象是，將軍欣喜而歸，對我們非常友好，滿腔熱情。」(第一〇二號文件)

但是有三點使得蔣介石對蘇俄很不滿意：第一點是蘇共中央怠慢了蔣介石，在蘇俄最初的一個多月了，大都是參觀，根本沒有會見蘇共的重要人物，蔣介石因此大發雷霆，認爲遭到「藐視」。並且當時蘇俄在與北洋政府談判外交承認問題，使孫先生方面的人「大爲不安」，所以蘇俄外長要蘇共領導要對蔣介石「多加安撫」。(第九〇號文件)

第二、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參加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時，雖然蔣介石發表了那篇國民革命將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的講話，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卻當面提醒他，要注意中國共產黨的存在和作用，指出雖然「中國共產黨暫時還不是有力因素，但是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已是一股强勁的力量。」並且提醒將來要「避免誤解和摩擦」。這使得蔣介石注意到中國共產黨才是共產國際的真正代表者。

再有，就是蘇俄在外蒙古的做法，引起了蔣介石的警惕。孫先生一直有一個計劃，就是離開難以站住腳的廣東根據地，經過四川到外蒙古，建立根據地，然後從外蒙古出擊北洋政權，但是蘇俄一直對這

計劃表示冷淡。因爲蘇俄已經派兵佔領外蒙古，扶植的外蒙古的傀儡集團正在搞獨立活動。但是，孫先生和包括北洋政府的人，仍然把外蒙古視作中國領土，從那裏出擊是正常的。托洛茨基在接見蔣介石時指出(第九七號文件)，在條件具備以後，「國民黨就可以開始軍事行動，但不是像代表團提交給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備忘錄中所說，由蒙古出擊，而是在中國本土出擊。」托洛茨基在這裏，已經不把外蒙古看作中國的領土，引起了有民族主義思想的蔣介石的不滿。但是，在經過蘇共解釋以後，蔣介石已經滿意，爲此他在十二月二十三日致函蘇俄外長，對「給予的物質援助和就中蒙關係問題做出的解釋表示感謝」(第九九號文件)。在蔣介石回去以後，鮑羅廷—中共已經掌握了蔣介石在蘇俄的言行，鮑和瞿秋白的討論(第一〇二號文件)透露，蔣介石在總體上滿意，只是在外蒙古問題上不滿，瞿說：「托洛茨基認爲蒙古害怕中國，可蔣介石不愛聽，說蒙古不應該害怕中國，因爲中國是主人。還有，他們總覺得不踏實，因爲紅軍駐紮在那裏。」

蔣介石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返抵上海，這正是國民黨「一大」開幕以前，改組緊鑼密鼓進行的時候。但是蔣介石當天從上海返回老家奉化。這一行動難以解釋。可能是因爲沒有當上代表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不滿意孫先生對他的怠慢。非常有心計的蔣介石，在他的筆記中沒有透露。記錄的總是冠冕堂皇的這一點，就說明蔣介石的深謀遠慮和筆記的不可全相信。

這改組的重要時刻，國民黨要人紛紛寫信要他回廣東去，信中也側面透露蘇俄顧問鮑羅廷對蔣介石的殷切期盼，盼他回去開辦蘇俄式的軍事學校。廖仲愷、汪兆銘、胡漢民三人寫信給他說：「鮑先生及弟等待商之事甚多，萬不能以此一事遂耽擱來滬之期也。鮑先生事尤關重要，彼每見弟等，必問兄來未。」(十二月二十二日)四天以後，這三人又寫信催促他回來，一開頭就提到鮑的期望：「今愷待歸，鮑先生日盼兄有如望歲，兄若不來，必致失望。」這是盼望蔣介石去辦黃埔軍校，此事在蘇俄已經決

定⑤。如果蔣介石是一個反共者，鮑不僅不會如「望歲」般的盼望，還會堅決反對。鮑若不支持蔣，蔣介石就不可能升起，中華民國的歷史就要改寫。

蔣介石對他早期的親共言行從來是諱莫如深的。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說，正因爲他訪問蘇俄，把蘇俄的陰謀看穿了，還把他的看法報告了孫先生，散發給中央常務委員，於是他和聽命於他的人，根據這一段話大肆編造歷史。所以這個問題要搞清楚。

蔣介石的民族主義警惕性，使得他對蘇俄有看法，將「事實與主義」區別開來(致廖仲愷的信中語)，就是說雖然主義方面不錯，具體的事實有問題。事實方面，就是幾十年來反覆加以引用的他洞悉蘇俄陰謀的致廖仲愷的有名信件。主義方面，就是長期被隱瞞的他對共產主義的稱頌，這稱頌一直持續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上海清黨之前。蔣介石的這個認識上的矛盾，並沒有破壞鮑羅廷對他的總體上的滿意，蘇共檔案中記載，鮑對瞿秋白說，蔣介石的不滿是受到他的翻譯的反共思想的影響，認爲馬林根本不應該派這位翻譯去。瞿秋白則小看了這位後來殺他的人，瞿告訴鮑羅廷說：「蔣介石純粹是一個武人，沒有甚麼學問。」

蔣介石說他最早洞悉蘇俄有兩個根據，即從蘇俄回來以後，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向孫先生上交的訪問蘇俄報告書，和他在三月份給廖仲愷的信件。

蔣介石的這份報告書至今沒有發表。根據起碼常識斷定：如果這報告書的基本精神是反對聯俄容共，在蔣介石北伐掌權以後，這報告書一定早就發表，並且大肆宣傳，以樹立蔣介石的反共先驅的地位。可是至今被國民黨長期封藏，不敢問世。

在台灣的時候，蔣介石爲了總結反共失敗的教訓，在一九五六年撰寫了《蘇俄在中國》一書。其中寫到了這份報告書和給廖的信件：「我在報告書裏，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國父面陳我對於國

共合作的意見。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愷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遊俄報告的意見。」(緊接着是十行的蔣介石致廖仲愷書)並且在書中還說，他在報告書中的洞見，被孫先生批評爲「顧慮過甚」，並且「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分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黨的迷惘心理」，於是「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離粵歸鄉」。他在這裏所塑造的反共形象，高於孫先生；他辭去軍校校長的原因，也與事實不合。

蔣介石死後，繼承者授意日本人寫的《蔣總統秘聞錄》中，也在表現蔣介石洞悉蘇俄陰謀的信件上大作文章。有兩點引人注目：第一，說蔣介石寫這封信給廖仲愷，是因爲：「當時，有一些相信蘇聯是真正友好的中國國民黨黨員對於訪俄報告書有所批判，廖仲愷也曾來信表示出同樣的意見。於是，蔣總統乃在公式報告中所未能盡情披露的本意，毫無保留地寫在答覆廖仲愷的手書中。」第二，是蔣給廖的信件，作爲「訪俄報告的補充文件，故而抄送中國國民黨常務委員會各委員」。

蔣介石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返抵上海，當天起程返鄉；一九二五年元月十六日由滬回粵；二十四日被委任爲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長；二月三日被委任爲國民黨本部軍事委員；二月二十四日突然離開廣州返鄉。離開的原因是：據鄧演達自三月五日致廖仲愷、汪兆銘的電報(鄧在二月二十五日奉孫先生命令到奉化去勸蔣介石返粵，他以下直接根據蔣介石的意見說明蔣介石離開廣州的原因)：「赴甬促介返，介謂彼去實因保持與先生之感情，現非有改革決心，國黨皆陷絕望。若能公開整理財政，革除市儈壟斷財政(指楊西岩扣發軍校開辦費)，並促展、汝回，則彼可回其意。」蔣介石在奉化正好兩個月期間的來往的多封函電，都可以證明這點。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的《孫中山年譜長編》中敘述得更詳盡。總之，《蘇俄在中國》中所敘述的因爲反對聯俄容共而離粵的理由，顯然是編造的。

蔣介石在粵期間應當向孫先生匯報蘇俄之行，並交出遊俄報告書，但經過蔣介石一再校閱的《年譜》卻一字不提此事。《年譜》第一次提到遊俄報告書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從大連到上海的輪船上：「屬遊俄報告書稿」，「屬」是撰寫之意。早就完成了，既沒有記載完成的日期，也沒有說何時呈交給孫先生，從此這份報告書的原文從歷史記載中銷聲匿跡。蔣介石在《蘇俄在中國》中提到的時候，說這報告書的內容和給廖仲愷的信一致，即都是反對蘇俄—中共，只要稍加研究，就知道這也是編造的。

毛思誠一九三七年三月出版的《蔣介石年譜初稿》，是根據蔣的筆記而成，又經過蔣介石親筆修改，大陸出版的這本《年譜》，原件上有蔣介石親自改動的筆跡。一九二四年一、二月，正是蔣上台擔任軍校校長的最重要時刻，但是這段時間的《年譜》的有關蔣介石的思想活動的記載，卻非常少，更沒有關於遊俄報告書的痕跡。顯然是經過有意的刪節。以一九三七年前的背景分析，刪節的內容不外是親蘇俄—中共者。

關鍵是給廖仲愷的信件。非常幸運的是，《年譜》中保存了該信件的全文。

蔣介石給廖的信件是在一九二五年的三月十四日撰寫。《蔣介石年譜》中的全部信件共有二千九百四十八字，《蘇俄在中國》中引用的共有四百九十一字，佔全文總數的約六分之一，即在此內容以外的文字共有二千四百五十七字。引用的文字之前的大約一千五百字，談的是廣東財政等問題，還牽涉的廣東的人事是非問題，不滿意蘇俄只是信件的很次要問題。《蘇俄在中國》中說，因爲遊俄報告書中的反共言論，引起親共國民黨員的不滿，廖仲愷也附和這親共意見，所以才寫此信回答。但是以文字比例研究，這根本不是一封回答這問題的信件；還有，其它的信件(廖仲愷的三月十日、三月十七日、三月二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都收羅入《蔣介石年譜》中，爲甚麼恰恰不收入所謂廖仲愷指責他反共的三月

上旬的信件呢？既然是反對聯俄容共的根本方針問題，爲甚麼不專門上書談透，而只是順便提及呢？當事的中央常務委員，沒有一個人提到過他們曾收到過這封(經抄寫或印行)給廖的私人長信件；公開散發反共信件，是一次重要的政治行動，以筆記而成的《年譜》沒有記錄，更沒有記載入任何黨史中。因此，蔣介石所謂爲了反對聯俄容共而散發信件的故事不能成立。

但是令人吃驚的是，在該信最後的數百字中，對於蔣所謂的完全是反蘇俄—中共的遊俄報告書竟然持否定態度：「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此弟當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不皇也。然弟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爲人誹謗之處，亦無失卻黨體之點。因强入共產黨問題，而弟以須請命孫先生一語，即以弟個人忠臣相譏刺。……」⑥這裏可能是唯一透露出報告書的如此糟糕情況。既然是反蘇俄—中共，怎麼自己也認爲「毫無省察價值」呢？怎麼會因此造成的「信用全失」使他羞愧呢？怎麼反蘇俄—中共會造成他的「人格掃地」，使他「引咎不皇」呢？這顯然不是報告書的文采問題，而是內容問題。以下透露的是他仍然認爲他「在俄行動，自覺無可爲人誹謗處」，即他在俄國的大量親共言行，還是爲聯俄容共的國民黨爭了光。人家笑他在加入第三國際問題上要請示孫先生，是封建時代的「忠臣」時，他則加以辯解。很可能是因爲他的親俄的報告書被人譏笑，剛愎自用的他在這裏反過來，向廖仲愷批評蘇俄在「事實上」的民族主義野心問題。

不然，無論如何也不能夠解釋蔣介石在訪俄中如此親蘇共，在之後的黃埔軍校的創辦過程和北伐前期都一貫是左派，怎麼會突然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冒出懷疑蘇俄誠意的一段話。

以下看看蔣介石的行爲。

黃埔軍校的成立，就是蔣介石訪問蘇俄的主要成果，於是在蘇俄的金錢、人員和武器支持下開辦。

最早幫助蔣介石辦理軍校的是蘇俄顧問巴甫洛夫和他的助手，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巴甫洛夫在軍事委員會上提出六項建議，第一條就是在軍隊中設立黨的機關，黨代表制隨之建立。蔣介石率領的由黃埔學生爲主的教導團，按照蘇聯紅軍的原則，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底就提出設立黨代表制，黨代表從團、營、連全部設置；加侖將軍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到達廣州以後，一個龐大的蘇俄軍事顧問團，立即被派到各個部門，一九二五年八月改稱國民革命軍以後，第一軍(軍長蔣介石)的顧問是斯切潘諾夫，第二軍(軍長譚延闓)顧問是傑普羅斯基，第三軍(軍長朱培德)顧問是馬赤力克……。

學生的政治教育工作，從來都操縱在中共手中，由鮑羅廷直接插手。表面上戴傳賢和邵元沖先後被委任爲政治部主任，其實都未上任，五月十四日，任命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包惠僧爲代理政治部主任；五月二十五日，中共黨員邵力子被任命爲軍校秘書處處長(七月二十日正式爲秘書長)，周恩來爲軍法處長(後來周恩來被委任爲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前方政治部主任)；軍校的教材，據黃埔的學生回憶，大多數是階級鬥爭氣息很濃厚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

蔣介石的言行都表示，他是非常親近鮑羅廷—中共的，他後來引用的所謂反對蘇俄—中共的給廖仲愷的信中的一段話，只是私人信件中的、從未公佈的孤立的見解，與這段時期的相反的言論相比，是江河水中的一滴；而且蔣介石所謂的散發信件的行動，不可信，與他的相反的行動也不足相比。

所以，鮑羅廷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任命蔣介石爲執掌大權的特別委員會委員，是蘇俄利益的需要。

鮑羅廷倡導的特別委員會成立，就標誌着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被代替，沒有任何文件條文的依據，這是政變的第一步。胡漢民和謝持(從上海專門來)籌備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立即成爲不可能。但是胡漢民和謝持仍然在廣州，以他們在國民黨內的資歷、威望和關係，仍然對特別委員會的權力是威脅，因爲第四次全體會議已經定下了時間，只要會議一召開，「清黨」就會成爲現實，

特別委員會的成員之一的許崇智本身持反共立場。所以，鮑羅廷導演的政變在這裏只是吹響了號角，軍事的行動在後面，幾乎由鮑、汪通過蔣介石加以實行。

第二步是，趕走反共的中央執監委員，在廣州最有根基的胡漢民首當其衝。胡漢民回憶道：「二十五日早上五點鐘……突然房門外槍聲大作，打門聲、呼喝聲一時並起。我想，難道是强盜嗎？沒想完，一大伙人已經衝到我房中來了，爲首的人擎着槍，很兇狠地對我說……」剛剛才卸下代帥的胡漢民，面對的竟然是一場兵變！主使者是誰呢？胡漢民話中有話地繼續回憶道：「我移住黃埔後，何應欽知道我家遭劫，便把爲首衝進我家裏的人，查明槍決了。介石表示，那天搜捕我，原是王懋功的事，與他無關。王懋功當時是衛戍司令部的參謀長，衛戍司令是介石。」搜捕胡漢民如此重要的人物，參謀長能夠不請示司令嗎？但是當事人已經被處決，只能到此爲止。胡漢民緊接着說：「約莫過了一個星期，介石來看我，他說：『鮑先生的意思，希望胡先生到俄國去一趟，休息休息。到俄以後，胡先生的生命安全，鮑先生是絕對擔保的。大概鮑先生還要親自來看看先生。鮑先生來過之後，先生就可以動身了。』我想，出去走走，總比幽禁在黃埔好。……」於是胡漢民被逼出國。當事人之一的王懋功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致函張靜江，表述他對於蔣介石的忠心時，透露發動政變之初，曾經和蔣介石密商：「許老總之倒，凡明了本黨及黃埔內情者，莫不額首稱慶。發動之初，校長曾一度見商，功比時力勸慎重，並須得政治同情，以防後來糾紛。至如何決定，係政府諸公之謀劃，校長實堅決主張者也。」⑧這證明王懋功派兵包圍胡漢民公館，驅逐許崇智，都是按照蔣介石的命令行事，蔣介石是整個政變的最「堅決主張者也」。

謝持被涉嫌的遭遇，在一九三五年寫的《天風海濤館六十自述》中簡要記載：「秋八月赴粵，爲商共產黨事，而各異主張，廖案突作，大波以起。不肖方悲傷，乃已涉嫌，在必除之列。設非許汝爲、蔣

介石兩同志愛護，恐已不可言矣。被迫還滬，清黨之計，如同大夢。」被迫離粵以後，在謝持的日記中記述道：「訪汝爲，乃具知俄人鮑羅廷果欲藉仲愷之死而捕殺我。其誣我運動軍官學生已爲其次之計劃。」這是許崇智被解除兵權到達上海以後，告訴謝持的內情⑨。這也透露，謝持在廣州期間，除了與胡漢民籌備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之外，還在反共的軍官中組織力量，那時，黃埔中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和中共黨員組成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之間，對立非常嚴重。

不僅如此，蘇俄顧問的打擊面還更大，鄒魯記載道：「廖仲愷先生被刺案發生，……鮑羅廷認爲這是陷害我和其他忠實同志的絕好機會。廖先生被刺的第二天，他開了一張名單，叫特別委員會拿辦我和胡漢民、鄧澤如、謝持諸先生。事前有一次，我和鄧澤如先生在胡漢民省長公署談話，我說：『據我看歷史，蘇聯對於皇黨可以放鬆，但對於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絕對不肯放鬆，恐怕現在共產黨對於我們也要同樣處置。』這天鄧澤如先生對我說：『你以前所說的話，現在都成爲事實了。』特別委員會看了這張名單，就對鮑羅廷說：『毫無證據，怎樣拿辦？』他竟說：『政治上只問政見同不同，不問證據有沒有。』幸蔣先生和許先生竭力反對，我和胡、鄧、謝先生才能免遭虎口。」⑩林森、鄒魯爲甚麼會被排斥呢？那時候，最高的權力機關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共有五名委員，即汪兆銘、丁維汾、廖仲愷、鄒魯、于樹德，只有鄒魯一人是堅決反共者。丁、于不在廣州，廖仲愷死後，其位置由林森遞補，故在廣州的三人常委中，只有汪一個人支持中共，林森、鄒魯都是反共者，所以鮑與汪勾結起來，必須加以排斥。邵元沖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三日的日記記載：「今日報載粵擬派展堂、哲生、子超、海濱、季龍、友仁爲外交委員北上。此六人中除哲生、季龍、友仁皆已離粵者外，餘皆精衛所欲排者，其剪伐異己之心益彰矣。」這些元老們既沒有奪取政權的野心，也沒有防範發起政變者的措施，都是書生型的文人革命家，都是從事民主的君子政治，以爲從事革命工作，都是爲了國民革命，哪裏能夠以個人的權力來排除

異己呢？以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要一召開，就把蘇俄—中共的奪取權力的陰謀粉碎了。殊不知鮑利用國民黨內部的不和，利用國民黨內的貪圖權力者，製造一場政變，還企圖殺害他們，憑藉軍隊輕而易舉就把元老們趕走了。

文人革命家雖然被趕走，三人特別委員會中的許崇智，既是反共的革命元老，又是轉戰南北的總司令，立即成爲了鮑羅廷、汪兆銘、蔣介石的下一個目標。

鮑羅廷除去許崇智，是蘇俄—中共政治上的需要；汪兆銘本身不需要除去許崇智，許曾經幫助他上台和把胡漢民拉下代理元帥位置，但是汪在國民黨內沒有力量，只有依靠鮑，以鮑的意願爲是，他出賣了許崇智；蔣介石這個軍人，是國民黨全部陣營中，與汪兆銘一樣最有政治野心、最有心術、最有爲目的不擇手段的鐵石心腸的人。國民黨的這一群元老都是政治舞台上的書生君子，沒想到身邊有一個玩流氓政治的高手，大家都把他給忽略了。如今只要稍稍研究蔣介石在獲得權力以前的信件，研究他給孫先生的許多表白，研究他爲甚麼十四次隨意脫離孫先生所安置的職務，研究他的待人接物之道，一個大野心家的形象立刻會歷歷在目。一九二三年春，孫先生一再要許崇智就任粵軍總司令時，許同意復職，但提出的五個條件之二就是讓蔣介石任他的參謀長。等於是許崇智給他以權柄，把他提拔到了參謀長的位置(見《許崇智與民國政局》)；而且軍校校長最初也是許崇智，許方便了他任校長(見劉峙撰寫的《我的回憶》)。但是，蔣介石純粹爲了自己的政治慾望，聯合鮑、汪，把許崇智趕下了台。

據胡漢民的回憶，在廖案發生以前，鮑就聯合廖、蔣、汪，要把許崇智趕下台：「有一天，鮑羅廷和廖仲愷來找我，主張組織一個類似憲兵司令部的東西，越乎軍隊之上。這個組織，權力大於一切，隨時可以拿辦任何軍人的。據說介石也贊成，精衛也同意。這時候，共產黨正想壟斷一切，盡量與國民黨爭領導權，分化離間，無所不用其極。我本來主張軍隊應該受黨的統制，但必須反對共產黨統治。我爲

這個組織，意有所指，尤其集矢於汝爲，便堅決表示不贊同。這個組織，也終於沒有成立。」⑪廖案發生的第二天，鮑提出要拿辦胡漢民、鄧澤如、謝持、鄒魯，許崇智竟然問有無證據，並且保護他們安全離開，許崇智的政治立場與鮑不一樣，當然要被趕走，許崇智卻毫無警惕。

廖案發生以後，廖的財政大權歸許掌握，以軍事部長身份兼任財政監督，而且還是國民政府的常務委員，當然成了蘇俄—中共擴張的障礙，尤其成爲蔣介石要取得權力的障礙。蔣介石在廖案發生的前八天才因爲只任軍校校長(汪兆銘爲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其它甚麼權力也沒有而提出辭呈。如今雖然成爲特別委員會的一員，但是多年以來壓在頭上的許崇智若不除掉，則會失去千載難逢的獲得軍隊國家最高權力的時機。於是，鮑、汪、蔣結成一體。據《蔣介石年譜初稿》，在九月九日「十時，抵省城，往晤汪兆銘，因言：『許崇智不顧大局，把持財政，心欲限制本軍的發展，可勝慨然。』」其中的「許崇智不顧大局」六個字在蔣介石審閱時删去，現在出版打上括號恢復原樣。這可見蔣介石作虧心事情的心虛，這是蔣介石主動去掉許崇智，而爭取汪支持的證明。聯合中共驅逐許崇智的準備工作在取得汪的支持後加緊進行：

蔣在九月十三日，任命中共黨員邵力子爲軍校校史編纂會主席兼軍校黨部委員；

十四日，汪被任命爲黨、軍和軍校黨代表；

十八日，以汪爲主席的軍事委員會命令，將處理廣州局勢的全權交給以蔣介石爲司令的廣州衛戍司令部，這是剝奪許崇智的前奏；

十九日，全面迅速解決許崇智統帥的武裝力量，迫令許離開廣州，當天任命周恩來爲第一軍(軍長蔣介石)的政治部主任。

二十日，據《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二大隊在虎門、太平，第四、五團在東莞，包圍鄭潤琦(粵

軍第三師師長、前魏邦平旅長)部，十時零，繳其械。粵軍陸(海泉)、譚(曙卿)、魏(麗黃)，迫石龍莫雄(粵軍第三旅旅長)部，該部略抵抗，晚九時，遂已繳械。呈請譚曙卿代理第三師師長，該師暫歸第一軍軍長指揮。政治委員會議決，軍政部長兼粵軍總司令，並財政監督許崇智卸職赴滬。午後三時，公(按：蔣介石)派旅長銘樞護送下輪。軍事委員會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辦理該部改(編)事宜。政府褫奪廣州財政廳長李鴻基、軍需局長關道職，逮送(黃)埔校，因李、關侵蝕國幣，接濟反革命軍也。中央任命宋子文爲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這是參謀長指揮政變的全面軍事行動，趕走總司令的記載；宋子文則突然躍起接掌財權。

二十八日，「公受軍事委員會命，任東征總指揮。……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周恩來爲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賀衷寒爲第一團黨代表，金佛莊爲第二團黨代表，包惠僧爲第三團黨代表，……」其中的多數黨代表都是公開的中共黨員。

到了一九三一年，因爲胡漢民被蔣介石幽禁在湯山事件發生了，鄧澤如才談到蔣介石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處決廖案政變中被捕的高級軍官的情況：「八月二十五日，乃召集軍事會議，當時粵軍將領俱出席，在會上即扣留粵軍參議長張國楨、第一軍長梁鴻楷、第八旅長楊錦龍、第一警備司令梁士鋒、警務處長招桂章，均謂關於廖案嫌疑，假以有害政府的莫須有罪名。翌日，即將張國楨、楊錦龍、梁士鋒槍斃，絕無罪狀宣佈。不過藉廖案削奪許崇智軍權。」⑫轉戰南北的粵軍高級將領十幾個人，就這樣莫名其妙成爲了廖案的槍下鬼。

在這次政變中，關於鄧澤如被奪取財政大權和宋子文上台的事，胡漢民後來說：「民國十四年以前，本黨賬目和財政，常常在鄧先生經理之中。這個時期，一切賬目，是隨時可以公開審閱的。民國十四年以後，共產黨竊篡本黨，首先便攘奪財政權，廖仲愷先生被刺，鄧先生也從此被排，鮑羅廷之徒，

便援引了一個宋子文出來。那時我還沒有被迫赴俄，但知道宋子文辦理財政後，有兩個空白摺子，一個給汪精衛先生，還有一個不知給誰，可以隨時向中央銀行支款的。汪先生的空白摺子我曾看見過。從此以後，中國財政便沒有公開過，更談不上所謂包銷了。鄧先生之被排和宋子文之繼任，是本黨財政史上劃時代的轉變。」⑬

從此，蔣介石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升起了。

但是，當時政壇上下對於蔣介石的一切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以爲他只是一個簡單的執行者，是被鮑羅廷和汪兆銘所利用。因爲常人一目了然的是，汪兆銘乘此除掉了他的最大政敵胡漢民，這反映在邵元沖的日記之中：「午前季陶來，出示致粵中各人通電一，歷述從友道信義上立論，不應苛遇展堂，促諸人之注意，要余聯名發去；又駁鄧孟碩污蔑總理遺囑爲僞作之言，根據當時情況而加以糾正。午至季陶寓，適劉蘆隱從粵歸，爲言此次之大獄，實精衛欲掊擊展堂，故欲羅織種種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陰賊險狠，振古所稀，季陶痛人心之狡刻，爲之大慟，同座相對，俱爲唏噓……。」（九月八日）甚至連許崇智被逼到上海的當天，他自己也認爲蔣介石是受人利用，而只怨恨汪兆銘：「汝爲出示介石致彼之掊擊函件，歷數其用人不當，財政不清，撓師出發等罪名，促其從速離粵，同時有精衛一函，亦表示贊同蔣介石之主張，而促汝爲速行者；……汝爲並言，介石有時或受人挑撥，盛氣難回，然精衛不爲之諒解，反而投井下石，殊非對朋友之道，言時慨然。」⑭連許崇智也僅僅是「慨然」，這時大家都不知道蔣介石奪取軍權的意義，沒有想到這是他有計劃地奪取國家神器的最重要的一步。

那時候，蔣介石不過是一個軍人，他好像僅僅是排擠許崇智而已，誰知道蔣介石會依靠奪取的軍權，進而有奪取整個國家權力的野心呢？所以大家的矛頭都僅僅對着執掌大權的汪兆銘，汪當然是排擠胡漢民的罪魁禍首，他利用了蔣介石的野心。

《邵元沖日記》還記載：「十時後至謝慧生處談粵中情況，謂廣州方面對謝持也有排擠之傾向，並勸告其離粵云云。」（九月十七日）謝持自改組以後，早已經在權力中心之外，並且書面提出辭掉唯一的國民政府監察委員職務，爲甚麼對他也要排擠呢？在於他一貫的反蘇俄—中共立場，在他以在國民黨內的資深地位，與胡漢民籌備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這個會議只要一召開，蘇俄—中共勾結汪霸佔中央權力的局面就可以馬上改變。胡漢民雖然被趕走，謝持仍然是鮑、汪的眼中釘。把謝持、鄒魯、林森和鄧澤如等全部趕走，就不可能開第四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就一統了廣州。

鮑、汪、蔣雖然發動了政變，在上海的有的國民黨人對之後政局的演變，卻毫無認識；蔣介石在這時立即消滅了熊克武所率領的、剛剛到達廣州的武裝力量。邵元沖日記記載，經過千辛萬苦到達廣州的熊克武通過其他人，問訊如何看待這場政變，上海的國民黨人僅僅認爲，從此以後蔣介石應當與其他三人共同負責軍事而已：「趙鐵橋來談，謂熊錦帆初至粵中，適至政變，甚欲得一真相。余告以此間同人之意，對於軍事則盼介石、錦帆、組奄、益之共同負責，對於黨事及政事，則此間同人當商定一妥善辦法後共同進行云云。少談即去。」這四個人都長期統兵，其中的熊克武、譚延闓還是中央委員，地位在蔣介石之上，所以上海的國民黨同人希望他們共同掌兵，哪裏知道蔣介石志在奪取國家神器，怎能與他人共掌兵權？怎能容許剛剛趕走了許崇智，又來一個熊克武呢？蔣介石很快就製造藉口，把熊克武逮捕，把兩萬多川軍全部遣散。就是在北京的謝持知道了蔣介石逮捕熊克武以後，也沒有料到蔣介石會有政治野心，他在十月九日的日記上也僅僅記載：「錦帆被扣留，隨行衛隊被繳械之傳聞，多疑爲事實，吾頗着急。介石遇事不細察，此舉儻亦中敵之間歟，可痛哭已。」逮捕熊克武的唯一根據就是繳獲了陳炯明給熊的信，但是從來沒有獲得過熊勾結陳的任何證據。汪兆銘在國民黨廣州「二大」上的報告中，也沒有提到有熊如何勾結陳的證據，這顯然的藉口奪取軍權，排斥異己而已。但是，那時追隨孫先生革

命的第一代國民黨人，多數是以主義出發，沒有想到乘此奪取權力者的心機，所以謝持也僅僅認爲蔣介石是「不細察」，「中敵之間歟」；邵元沖日記中也反映上海的黨人看法，認爲今後蔣介石應當與其他三人共同負責軍事。甚至可以推斷，這時候與蔣介石共謀的汪兆銘，也毫不瞭解蔣介石，因爲在每一個清除許崇智、熊克武的關鍵時刻，只要他的最有份量的支持不要放在蔣介石一邊，或者不忙表態，結果就會不一樣。汪自己利慾薰心，不知道被他利用的人同樣的利慾薰心，正在更高明地利用他呢?!

在很短的時間裏，蔣介石就趕走了許崇智，逮捕了熊克武，黃埔系從此升起。蔣介石依靠黃埔系的軍人打下了江山，建立了蔣氏政權。但是在許崇智、熊克武事件發生的時候，大概只有蔣介石自己一個人明白這些事件的意義。

廣州雖然沒有了國民黨的多數中央執監委員(只有汪和譚延闓)，卻有名義上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機關，有廣東的稅收，有好幾萬蔣介石剛剛奪得指揮大權的軍隊。於是，鮑羅廷、汪兆銘、蔣介石聯手，以軍權和財權，創造出黨權和政權，再拉攏對權力和利益的追求者，製造出種種依據。

居正後來在《清黨實錄》中感嘆道：「黨而至於清，黨之至不幸，亦事之至不祥者也。……總理逝世，而即有清黨案發生。或曰，此由廖案而來也。鮑爾丁等共黨，包藏禍心，藉廖案以興大獄，誅鋤異己，直取國民黨中心而代之。至此國民黨亡矣。其亡，繫於苞桑，清黨之舉，其能已乎。」居正寫這段話的時候，蔣介石、汪兆銘都已經清黨，所以沒有指出他們的名字。居正等開國元老心目中，只有黨事，只有國民革命的成敗是非，但是從此不得不面臨汪、蔣等的權力爭奪。

這次政變，是孫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黨的黨統的中斷，而升起了新時代的「天子」，天子自然有他的新的「一朝臣」；也是爲三民主義理想而奮鬥的辛亥革命精神的終結，因爲這次政變是以從內部奪取權力爲中心的，在這以後的以蔣介石、汪兆銘爲首的國民黨政權，就非常緊密地與權力的分配爭奪連接

在一起。在中共取得大陸的政權以後不久，中華民國歷史學家崔書琴試圖尋找這歷史變革的原因，著了《三十年動亂中國》一書，關於西山會議的成因說道：「自從中山去世之後，不過半年時間，由於共產黨人分化運動之積極奏效，與蘇俄顧問鮑羅廷在國民黨內具有控制支配的無限權威，而國民黨又不能放棄聯俄政策，致失外援。同時，汪兆銘一流人物爲爭取個人的政權，不惜挾外力以自重，藉以排斥異己。如是，所有在國民黨有歷史勞績與號召能力的老同志，皆因黨性太强，不肯附從共黨主張之故，或被迫，或自動，相率離開了革命根據地，四散活動。到民國十四年十月間，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中，真正對黨有歷史勞績，對社會有號召能力的老黨人，可說很少能在廣州立足的了。汪兆銘雖有歷史，卻無勞績和資望，譚延闓有些聲望，卻無歷史；于右任始終在陝西治軍未出來。其餘三數老同志，只能依違於國共兩面之間，形同伴食，不敢有所主張。國民黨已有數十年的歷史，這些幹部人物，皆從革命生涯中鍛煉出來的，他們當然不敢默爾而息，即從此銷聲匿跡，不問黨事。所謂救黨運動之聲，到處可聞，而以『西山會議』首先發難者，目的是在反共。」⑮

由此，開展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場面。

註釋：

① 《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二冊第二五二頁，彭明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北京。

② 《蔣介石之革命工作》第五五頁，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民國十五年。

③ 《胡漢民先生文集》第七二九至七三〇頁。

④ 《從容共到清黨》第三八〇頁，李雲漢著。

⑤《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一四四頁，毛思誠著，中國第二檔案館編，檔案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北京。
⑥《蔣介石年譜初稿》第一六七至一六八頁。
⑦《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一九二五年七至十二月，第二五九至二六〇頁。
⑧《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第三六二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
⑨《謝慧生先生事蹟紀傳》第二一三至二一五頁。
⑩《回顧錄》上冊第一七四頁，鄒魯著。
⑪《中華民國史實紀要》(一九二五年七至十二月)第二五九頁。
⑫《討蔣言論初集》初編第七八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編印，民國二十年，廣州。
⑬《胡漢民先生政論選編》第二集，先導出版社，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廣州。
⑭《邵元沖日記》(九月二十五日)。
⑮《三十年動亂中國》第二九頁，崔書琴著，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中華民國四十四年，香港。

十四、反共思潮興起

西山會議的出現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反對蘇俄帝國主義和第三國際支部中國共產黨的思潮作爲其社會基礎。這就是中國青年黨的成立發展及其國家主義學說，和孫文主義學會反對中共的針鋒相對活動。居正在《清黨實錄・編輯大意》中就國民黨員所組織的孫文主義學會與西山會議的關係說道：「是時夙昔主張清黨之純粹同志，有北京、南京、上海等處代表，集議孫文主義學會組織大綱，孫科亦擔任籌費；先於各地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並組織國民委員會指導之。此兩種組織，與中央執監委員互通聲氣。」除了國民黨的普通黨員普遍的反共情緒以外，還有中國青年黨與中共的針鋒相對的理論與實踐活動。

衆所週知，從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其基本出發點是救中國，是民族主義；同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出現了少年中國學會，其本旨也是救國，然後分道揚鑣，分成了共產主義和其對立的國家主義。但是，以中國青年黨爲代表的國家主義，其歷史作用由於國民黨的壓制而受到限制，這歷史性的錯誤使得中華民國付出了代價，其歷史意義也到了不公正的被忽略的地步。

一九一八年六月三十日，曾琦、李大釗、王光忻等七人，在北京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一九一九年七月正式成立。其章程的第一條是：「本科學精神，爲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爲宗旨。」這是一個非政治性質的文化組織，即提倡科學精神來創造一個新的中國。但既然要創造一個中國，就不可能與政治沒有關係，其成員間就難免不發生根本的分歧。其成員包括王光忻，以及後來成爲著名共產黨員的李大

釗、張聞天、毛澤東、惲代英、鄧中夏、周佛海、劉仁靜等人，以及成爲青年黨成員的曾琦、李璜、余家菊、張夢九、何魯之，以及後來加入的陳啓天、左舜生等人。

最早的分歧發生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的中國青年之中。作爲當事人的李璜在數十年以後回顧這一時期說：「國民黨元老李石曾與吳稚暉，雖然號稱三民主義信徒，其信仰乃基於無政府主義……。且李、吳留法勤工儉學，大量唆使二三千學生赴法，漫無計劃，不明戰後法國工商凋敝，工業多未恢復，以致中國學生到法後，無工可做，更因無錢，無學可求，於是留法勤工儉學學生，不耐吃苦，乃逐次有人爲俄共所派來巴黎、柏林之特務出錢收買……。而在德在法之中國共產黨徒乃大量出籠，慕韓大爲憂急，痛心諸元老遺誤青年，必釀大禍之餘，乃不斷在巴黎《先聲週報》爲文，歷數自清初以來，俄人侵我領土，從尼布楚條約算起，不下數千萬平方英里，實爲帝國主義之尤；且自十月革命以後，彼尚在虐待我旅俄同胞，殺戮之視爲異類，而我豈能親俄，竟稱爲革命之祖國！慕韓反俄之義，數稱俄爲虎狼之秦，在《先聲週報》中，與日寇相比擬，認爲親俄與親日，必均令我滿蒙不保……。而民國十三年，廣州方面聯俄容共之謬誤政策，竟而實現！慕韓認爲從此國家大患必然發生，乃積極組織中國青年黨於巴黎，於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正式成立。即約同我與張孟覺兄回國，創辦《醒獅週報》，大聲疾呼，反對中共之假革命，而實行篡奪國民黨。」①曾琦以及青年黨的諸發起人，在那時對蘇俄的清醒認識，實在是先知先覺。青年黨成立時期，也正好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前夕。歷史一般僅僅記錄了國民黨的老黨人這時候對孫先生聯俄容共政策的疑慮，同樣具有銳敏眼光的，還應該包括曾琦等青年黨人。曾琦在法國發現中共陰謀奪取中國國民黨的領導權的文件以後，曾經請曹四勿帶回國，交給謝持，這文件成爲了一九二四年夏天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彈劾共產黨的主要依據之一，而在歷史上發揮了作用。曾琦自訂年譜記載，雖然孫先生沒有接受他的反對聯俄容共的意見，在下來以後，和謝持「乃約定內外夾

攻」。

爲了鼓吹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創辦《醒獅週報》。在曾琦寫的宣言中，通篇是憂國憂民的中國人的激憤之語，一開頭就說：「本社同人，感於外患之紛乘，內爭之彌烈，民生之益悴，國命之將傾……。」基於曾紀澤過去比喻中國像一頭「睡獅」之說，而以喚醒「睡獅」爲己任(所以青年黨人又被稱爲「醒獅派」)。曾琦提出了兩點辦刊宗旨：「特標『醒獅』之義，欲以無偏無黨之言，喚起國人自信自强之念，此本報發起理由一也。」「……凡此皆『睡獅』漸醒之徵，實中國復興之兆，足以使人樂觀者，特其覺悟猶未普遍，信仰亦未樹立，有待於吾人努力宣傳耳，此本報出版之理由二也。」②在宣言中提出了「內除國賊，外抗强權」的著名口號，這國賊就是中共，强權就是蘇俄。

青年黨諸人與中共的初期黨員在少年中國學會的救國方針上是一致的，爲甚麼後來的主張會如此形同水火呢？根本在於對於中國歷史文化瞭解程度的深淺不同。中共黨人都是一批急功近利者，都是只看見中國傳統文化的弊病而極力全盤否定者，他們以爲中國文化就只有纏小腳之類；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之後，又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知識界對西方文化大大失望；而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正好投合了這些急功近利的知識分子的胃口。他們只要一踏上蘇俄的船，就大多數隨船而行進，但是航向是按照蘇俄的規定，航行是在蘇俄顧問指導之下，中共黨員只是出力的水手。

而青年黨人恰恰普遍有較深的歷史文化修養，曾琦在中年以後從師於國學大師梁啓超和章太炎。他認爲中國雖然危急，但是文化根基深厚，只要伸張禮義廉恥四維，勵精圖治，就可以像睡獅一樣猛醒。這樣的見解也存在於青年黨的其他幾位領袖李璜、陳啓天和左舜生的有關文集中。這樣的民族精神的內涵，使得他們不僅僅對英、日帝國主義有警惕，對於長期侵略中國的蘇俄也毫不鬆懈，他們是中國文化

精神在二十世紀前期的政壇的一種代表。他們於是成了中國反對共產主義的先知先覺。尤其作爲一個政黨來說，他們對於蘇俄帝國主義的洞悉認識，遠遠超過國民黨的當政者。因爲國民黨自改組以後，對蘇俄有警惕性的重要的老黨人，全部都被趕出了權力中心。孫先生所重用的，是貪圖權力的汪兆銘，和生長在國外，對中國歷史文化沒有根基的廖仲愷；在孫先生最後的日子，胡漢民也即將要從核心地位被排除出去；反對孫先生聯俄容共政策的最激烈的馮自由等人，又被孫先生開除出了國民黨。

國家主義青年團(青年黨未公開時候的外圍組織，實際的領導者和辦事人員都是同一批人)，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十日的宣言中，對共產主義進行了批判，這是第一次以政黨名義進行的批判。宣言的第二條說：「我們很覺得中國現狀既如上所說是對外不能獨立，對內是不能統一的局面，便須主張內求統一和外求獨立的國家主義，而反對不合國情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者對外則主張擁護蘇俄爲盟主，企圖世界經濟革命。幸而能成功，是不僅將中國變爲一個屬邦，賜號『蘇華』，事事受蘇俄的指揮，無所謂獨立國；……共產主義對內主張階級爭鬥，圖謀勞農專政，在中國新式產業尚未發展，勞資階級不甚懸殊的時期，階級爭鬥更足以摧殘生機，助長混亂，將使中國永無統一之時……。且所謂勞農專政不過少數不逞之徒，假藉擁護勞農利益的招牌，號召純樸的勞工去擁護他們，以便攫取政權，殘殺異黨。蘇俄先例，足以證明。我們爲人道計，爲自由計，已不能不反對共產主義。況且共產主義者以過重唯物主義的緣故，否認一切文化道德，不惜處處以陰險毒辣和殘忍的手段待人，尤爲人類所難堪。」這是在西山會議以前，以政黨之名義，對共產主義最猛烈的批判。

宣言還以「某黨」爲名，對國民黨進行了批評。「某黨除了宗旨大體與我們相同外，其餘主張多未完備，分子亦太複雜。且以共產黨跨入某黨後，假某黨的招牌，做赤化的工作，已將某黨的主張換了一種彩色，使人辨識不清，難表充分的同情。而某黨黨務又完全爲所謂左派所把持，右派以無嚴密的組

織，一時難以爭勝。今後愛國青年如果加入某黨不但有左右做人難之苦，而且有時只做了共產黨利用的工具，完全無補於中國的獨立與統一。我們對某黨原有的主張固表示相當同情，但自共產黨壟斷暗中宣傳赤化以來，實使信仰國家主義的愛國青年無加入的可能。」③這也是以一個政黨的名義，對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的最嚴厲的批評。孫先生去世以前不久路過上海北上的時候，曾琦曾經由謝持介紹引見，因此就聯俄容共問題和孫先生進行了較長時間的辯論，可惜孫先生已經聽不進忠告了。

青年黨的重要領袖之一的陳啓天，歸結青年黨初期的貢獻有數點：「除擴大宣傳，普及全國教育界外，尚有數大貢獻如下：㈠建立國家主義的理論體系。……㈡確立國家主義青年團與中國青年黨的組織與訓練。㈢展開反抗共產與反對一黨專政的全國性運動。㈣揭露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及中國的陰謀。」青年黨的國家主義方針，導致和中共的尖銳對立，中共的青年領袖惲代英因此發表兩篇文章專門攻擊國家主義。爲了雙方停止攻擊，一九二五年冬在上海民厚里，由當年中國少年學會的會員代表雙方進行談判，結果難以調和雙方的歧見，在告別時說：「與諸君相見於戰場。」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以後，果然對中國青年黨員大加殺戮，其酷烈程度不下於屠殺國民黨員。

從此以後，中國青年黨即一方面加强通過《醒獅週報》宣傳反對共產主義的道理，還在北京舉辦訓練班講解國家主義；另一方面，也用國家主義青年團，在知識青年中進行發展組織的工作，以至在各個省份獲得發展：計北京有國魂社，河南有光華學會，四川有惕社，湖南有固中學會，湖北有國鐸社，江蘇有國光社，浙江有愛國青年社，廣東有獨一社……等等。有的地方組織還辦了雜誌，上下一起反對共產主義，醒獅的名氣傳遍全國。

李璜的回憶錄記載，在北大教書的他，也積極進行活動：「我在北大教書的這一年中（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在學校外面，知識分子對政治的運動已經相當積極地展開了。一方面是國民黨的左右兩派

與尚不爲普通人所注意的青年黨人合起來對付北洋軍閥，而目標指向段祺瑞政府；一方面又是國民黨的右派暗中聯絡青年黨人以對付國民黨的左派(中共)。……共產黨既立意包辦把持，當然更不能容忍一向反共的國家主義派在北京學生界中活動，因此北大共產黨學生竟與國魂社學生在教室內鬥口，在寢室裏打了起來。」④

中國青年黨黨員常燕生教授在北京《晨報》副刊第一三〇六號上發表文章，題爲《我反對蘇俄的一個最大理由》，其中指出的共產主義制度的弊病，對人類的危害和青年們盲從的危險性，在大半個世紀過去以後的今天來看，並不過時，甚至有一點點像對今天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惡果的總結一樣。所以略加摘錄，以顯示我們前輩知識分子的高瞻遠矚：「現今蘇俄之政治不但非出於全體國民之公意，抑且非出於全體勞動階級之同意，不過少數共產黨專斷之政治耳。即此一點而論……，蘇俄共產主義者假共產之名行專制之實，與中古教皇假宗教之名行專制之實，其爲害相同，人之迷信不以爲非也相同。……假使此主義而行於宗教信仰極薄、專制毒素極深、官僚政治色彩極重之國家如我中國者，我敢言其所生之弊惡尤百十倍於他國。蓋有此主義之後，在上之秦始皇、明太祖輩即可假之以維持其獨斷政體；在中之王治馨、陸建章輩又可假之以實行其官僚政治，可憐之農工固已爲人所假而不知，少數有爲之青年又惑於主義而不生反抗之心……所以我說蘇俄之最可怕者，即在以其專制之榜樣暗示於青年，使青年有爲之士不從坦蕩蕩的民治大道走，而迷信使武力萬能排斥異己之黨化政治，不得不爲專制主義之敵，反變成專制主義之擁護者，其結果則促進民族之滅亡而已。」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所建立的獨裁統治已經證明了以上論斷的正確，而且至今仍然有不少中中共毒素的青年，繼續做專制制度的擁護者，這更說明了常教授見解的價值。

在西山會議舉行期間，曾琦曾經發表專文，提出以三民主義測驗國民黨員的真僞，即是否主張蒙古

獨立；是否主張工農商學四民平等，而不是一個階級專政；是否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而非共產。並且還著文給國民黨出主意，不用「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而用「外抗强權」代替，以免被共產黨利用；不要去繼續聯絡軍閥；不要蘇俄的援助。(見《曾慕韓先生遺著》第三〇至三三頁)

共產黨因爲理屈，對於青年黨人的揭露難以應付的時候，居然向青年黨人一再發出了和解合作的呼聲。爲此，青年黨人在《醒獅週刊》第六十二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上，極爲鮮明地提出了如下條件，即：㈠停止攻擊國家主義。㈡停止宣傳共產主義。㈢停止捧軍閥。㈣停止藉外力長內亂。㈤拒絕接受俄國賄賂。㈥驅逐鮑羅廷及加侖。這等於要共產黨的命，中共當然拒絕。於是，青年黨人繼續與共產黨爲敵。這些活動和文章，大義凜然，在中國青年中深有影響。

但是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中國國民黨在北伐統一全中國以後，青年黨竟然被取締。這是因爲蔣介石不是一個政治家，而是一個英雄，一個迷信武力的軍人。他憑藉武力，在鮑羅廷—中共的支持下，趕走了反共的昔日孫先生的左右助手，趕走了他的上司許崇智，然後又在上海清除了幫助過他的中共，他以爲憑藉武力可以高枕無憂。他哪裏知道奪取政權雖然要依靠强力，但是鞏固政權就要靠思想信念，靠正確的是非觀；他哪裏知道中共不僅僅在國民黨內搞陰謀詭計，尤其有一套思想宣傳體系。對於思想，武力往往不起作用，甚至適得其反。蔣介石不僅僅在武力統一以後繼續壓迫反共的老國民黨人，還摧殘國家主義派，迫使青年黨轉入地下活動。短暫幫助蔣介石的胡漢民，竟然也主張「黨外無黨」，扼殺了青年黨人的活動空間。北伐成功以後的國民黨雖然一再宣傳反共，但是因爲執政者總有着某些權力和利益因素在內，宣傳的效果就受到限制，而壓抑青年黨，完全是簡單的軍人頭腦中的獨裁思想作怪，是獨裁者的短視的需要，忽視了來自下層的民間自發的反共宣傳力量的重要性。一黨專政不僅僅坑害了青年黨，也害了國民黨自身。青年黨受到限制，就造成了在民間的知識界下層的思想空虛，使得在思想領域

失去平衡，爲共產主義的傳播開了方便之門，使得民間的左翼知識分子很快的壯大。所以在一九三〇年代有諺語曰：「國民黨的槍桿子，共產黨的筆桿子」，而共產黨終於利用民間的筆桿子造成了思想運動，贏得了人心，使得中國乾坤倒轉。中國青年黨人的高瞻遠矚和堅定反共，可惜只在西山會議召開的前後發揮了歷史作用，而不能夠在之後的歷史上有進一步的貢獻，這其中的經驗教訓是深刻的。

另外一方面是反對聯俄容共而被壓抑的青年國民黨人的孫文主義學會的活動。

早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聯俄容共政策開始實行的時候，孫先生就對反共的國民黨員進行壓制，居正在《梅川譜偈》中記錄道：「開會以後，同志對共產黨有訾議，總理爲堅持信念與鎮壓反動計，在大本營(士敏土廠)召開重申紀律會，幾有吳宮教戰，斬二姬以徇之概。幸而總理素性仁慈，反動也無切實指證，只以譴責了事。但在場同志，對於馮自由、劉成禺二人，莫不爲之驚嚇。」這是指前面提到過的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孫先生當着鮑羅廷的面，對反共國民黨員劉成禺、馮自由、徐清和、謝英伯發出警告，但是又以寬容的方式處理之的事情。作爲改組以前的孫先生左右助手之一的居正，因爲反共而從這件事感到了壓力，才在之後到楊行務農，不問政事；也才在晚年以「吳宮教戰」比喻之。

在一九二四年的三位監察委員提出彈劾共產黨案的時候，各地不滿中共的國民黨員，也從各地紛紛提出許多彈劾文件。但是上層的彈劾都難以進行，下層的不滿也只好壓抑起來。到了孫先生去世以後，共產黨徒進一步猖獗，執掌大權的汪兆銘與鮑羅廷狼狽爲奸，公開號召「革命的向左去」，於是國民黨的忠貞黨員更受到壓抑。後來，戴傳賢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等兩本小册子中，指出只有孫文主義繼承了中國文化的正統，只有國民黨能夠領導國民革命走向勝利，因而國民黨的廣大黨員覺得也應該舉起孫文主義的旗幟以對抗共產主義。可是國民黨的最高階層又被蘇俄—中共和汪兆銘控制，這種形勢迫

使國民黨員在基層組織了以反共爲己任的孫文主義學會。

孫文主義學會主要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活動，在上海、北京的孫文主義學會主要配合了西山會議的召開，和參加在上海的國民黨反共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活動，在黃埔軍校的孫文主義學會則以和中共黨員組成的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正面衝突而聞名。

在改組以前，上海是國民黨的本部所在地，是孫先生每次失敗以後所最後退居之地，也是老國民黨人聚居的地方，所以這裏向來是國民黨人反共的基地。孫文主義學會也最早在這裏開展活動。據李雲漢研究，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正式成立；在西山會議召開以後，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絕大多數成員參加了上海中央的組織，並構成了上海中央反共行動的主力。「上海中央於設原各部外，另設立幹事處與黨務討論委員會兩個新的機構。幹事處係以上海孫文主義學會各領導幹部爲基礎，隔日會議一次，對中央部務會議負責。」⑤上海孫文主義學會的活動在黎東方教授的回憶錄《平凡的我》中記載甚詳。但是因爲種種原因，在《國史館館刊》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上下專集《平凡的我》一書中，第三八節《孫文主義學會》和第三九節《西山會議》兩節(共十七頁)，已經全部刪除。現在按照一九六三年台北文星出版社出版的《平凡的我》的版本予以摘錄。這段回憶是社會基層一個高中學生的活動和思想的記錄，比較珍貴，而且今後已經不可多見，可以反映時代的真正風貌：

「我在加入孫文主義學會以前，常常爲了『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異同』這樣一個問題與本趨奉部(上海第九區黨部第三區分部)的若干年長同志，爭論不休。在這些年長同志當中，有一位無錫人顧君，和繆斌是好朋友，也是繆斌介紹我認識的。顧君的班次比我高，學問見解當然比我好，講話有條有理，性情不急躁。我向他請教過，他說：『共產主義的道理很深，你可以找幾本書看看。』不久，他就替我找到幾本小冊子，其中一本叫《資本論入門》，又有一本叫做《唯物史觀淺說》。我看了又看，看不進

去。顧君說：『以後你就懂了。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你：好比乘火車，從上海北火車站上車，三民主義就是到了無錫常州就下火車，共產主義是到了南京才下火車。』

「我問他：『那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是怎樣的呢？顧君說：『國民黨所做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所做的是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我說：『如果這樣，我們國民黨不是做了資產階級的工具了麼？還談甚麼革命呢？』顧君笑了笑說：『你慢慢地再研究吧。』我有點生氣，向他老實不客氣地說：『在民生主義第二講裏，總理已經說得很清楚，唯物史觀把社會的病態看成常態，把結果看成原因，倒果爲因。而且，總理說，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已經被亨利福特(●)推翻了。福特不減低成本，不提高貨價，不叫工人多做工，而且減少了工人的工作時間，提高了工人工資，結果沒有賠本，而是大賺其錢。』

「顧君不等我說完，拂袖而去。一向有學問而性情溫和的他，突然變成了一個冷冰冰、成見極深的人。我追上他一步，再追問一句：『你是不是共產黨？』顧君說：『你問這個，沒有意思。』

「從此，我在區分部之中便失掉了以前的許多朋友。開會的時候，我一講就有人駁。說東，碰釘子；說西，也碰釘子。我當時莫名其妙，並沒有覺察到這是由於共產分子暗中已經決定了給我打擊。

「有一天，在民國十四年的秋季，一向不會有多少來往的大學部同志湖南長沙人，李君來我的房間找我，邀我到操場上走走，他開頭就說：『共產黨太可惡了。他們恨你，也恨我。』我說：『爲甚麼？』李君說：『他們掛了羊頭賣狗肉，當然討厭我們。我們如果聽他們的，依他們的，把國民黨變成了共產黨的傀儡，他們不但不打擊我們，還會捧我們呢。』我說：『他們口口聲聲說蘇聯不是帝國主義，爲甚麼老是霸佔了我們的外蒙古，不肯交還。』李君說：『他們的祖國不是中國，是蘇聯，你還不知道？』我說：『怎麼不知道？他們簡直是漢奸。……』

「建時，李君和我，常常三個人在一起，研究如何防止跨黨分子把我們的黨篡了去。葛君之所以堅決反共，據他自己說，是親眼看見他們在全國學生聯合會的大會上，企圖操縱大會，排斥忠實同志，把國民黨分成兩個，利用國民革命的口號吸收群衆，作第三國際與蘇聯的工具。……

「有一天，李君拿了一份《國民報導》給我看。這是一種週刊，裏面的文字篇篇是罵跨黨分子的。我對李君說：『既然有了這樣一個刊物，大概上海的忠實同志已經有組織了。』李君笑着說：『對，組織是有了，你也在裏邊。這個禮拜天下午開成立大會，在大夏大學。你和我一道去。』我說：『哦。他們的組織，叫甚麼名字？』他說：『孫文主義學會。』」⑥

中國國民黨在北京的活動則有着深厚的基礎。自從袁世凱稱帝，國民黨在北京就設有黨務。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孫先生指示在北京的黨務部長謝持：「北方黨務，極須注意，切望設法推廣黨務，俾固基礎。」（《國父全集》第三册）於是，謝持與在北京一起擔任國會議員的鄒魯，在北京各個大學發展了一批國民黨員。鄒魯著《回顧錄》記載：「在這個時期，除了出席國會外，又和謝持先生做擴展黨務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聯絡北京各大學的青年學生，向他們宣傳本黨主義，並介紹他們入黨，……我們幫助他們秘密組織一個「中社」，取擁護和實行中山主義的意思。這是那時北方青年團體的核心。爲秘密起見，最初沒有社址。……這幫青年學生入黨之後，便想普遍宣傳黨義；於是活動範圍逐漸擴大，組織讀書會，開辦平民學校、補習學校，更創立北京大中公學，繼改稱大中中學，即大中山主義的意思。這是在華北掩護同志秘密工作的機關。旋即組織民治主義同志會，大量吸收青年入黨，以後演爲孫文主義學會。所有民治主義同志會、《民生週刊》、大中公學，都接受本黨的補助。自二次革命失敗後，本黨在北方的勢力，被袁世凱摧殘殆盡，從這時起，本黨在北京又建立了相當堅固的基礎。其後北方革命運動的蓬勃興起，可說和當時的這種活動是很有關係的。」⑦

在張繼、謝持等人一九二五年夏天提出「彈劾共產黨案」的時候，民治主義同志會辦的《民生週刊》就發表過《中山主義實踐社宣言》、《民治主義同志會宣言》和《孫中山主義者對黨內黑暗勢力宣言》。由於該刊物從出版到現在七十多年以來，從來不曾再版過，現在讀當年在北京大學出版的原版時，仍然能夠感受到當年的義正辭嚴的氣氛。例如第九七期、第九八期、第九九期、第一〇〇期的合刊上，《民治主義同志會宣言》對共產黨嚴厲批評道：「挽救中國，只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一條可走，只有真實純潔的國民黨員才可靠。甚麼中國共產黨(C.P.)？社會主義青年團(S.P.)，都是騙錢吃飯，共人之產，胡行妄爲罷了！所以我們反對C.P.和S.P.的假革命黨，尤其反對盜竊國民黨的共產分子之無人格無黨德的假國民黨。……因爲反對破壞國民黨之假革命黨的，和因爲反對反民治的階級鬥爭和工人專政，而被人誣爲『反革命派』和『右派』，均不值得一笑！爲中國人民造福的是誰？犧牲他人以圖自利而危害中國的是不是共產黨？應當請國人明眼觀察，免受欺騙。爲國際間當鷹犬，如親日英美派；爲外國人當走狗，如共產黨。無論是任何外國的偵探，假使不知有中國，只知有外國，都可以呼之爲賣國賊。」這在那時候，對共產黨的認識是何等清楚，言辭是何等的尖銳鋒利！在《孫中山主義者對於黨內黑暗勢力宣言》中，以主要篇幅論述孫中山主義和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問題，最後以揭露的方式說道：「因爲共產黨在中國不能立足，不得不托庇於國民黨的旗幟下，遂其詐騙某國之津貼的陰謀。換言之，共產分子之加入國民黨，是來革國民黨的命的，是來破壞國民黨，推倒國民黨，利用國民黨以求擴張他們自己的勢力的。」後來證明中共的確是依靠外國來革國民黨的命的，破壞和推倒國民黨的，而且終於得手。

一九二五年七月和八月《民生週刊》上發表的若干文字，屬於中國最早的反對共產主義文件之一，而又不曾再版或介紹過，故以下將第一〇一和一〇二期轉載的其它刊物的文件再作一簡短摘錄，以再現

那時在青年知識分子中的反共思潮。《國民導報》發刊宣言說道：「乃有既入其黨，又別具懷抱而不中心悅服其民生主義，反欲以馬克思階級鬥爭之方法，實行共產制度於中國者，其亦不可以已矣乎？然其誤即在昧於中國國情，錯解社會進化之真理，囫圇吞棗，遺患將無已也。是非特國民黨之虛僞同志，而亦救中國之大障礙也。」一九四九年中共掌政以後，在中國農村推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搞得民不聊生，對照七十幾年前的批評共產主義不合中國的國情，將要「遺患無窮」，幾乎是一針見血地鮮明和見解正確。《三民旬刊》的發刊宣言，則表現了青年人捍衛三民主義的真摯熱情：「中山先生，既已棄其未盡之責而去，這個任重道遠的千斤擔兒，除了我們這些真實純潔的國民黨員，三民主義的信徒，還有誰來繼承這個天職呢？所以我們不惜勞苦，不憚犧牲，不怕一切帝國主義者，不懼外國的鷹犬，國內的反革命派，和黨內的詐僞陰狠的假國民黨員，毅然決然將這一個千斤重擔拿來放在我們的肩頭……。」⑧這擔負「千斤重擔」的精神，就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任重道遠的社會責任感。

一方面是正統的國民黨人在知識界、在青年中佔大多數；另一方面，中共黨員在北京就勢力單薄，雖然有李大釗、于樹德這些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共產黨人，和親共的國民黨人丁維汾、顧孟餘、徐謙與之相配合，反共的國民黨人仍然佔據優勢。張作霖在一九二七年搜查蘇俄駐北京大使館時，所得到的中共內部材料顯示這點：「幾個月來在北方國民黨中反動的空氣非常濃厚，而且這種反動的勢力有日漸集中的趨勢，這種現象我們可以從下列的事實中看得出來：㈠普遍的反共產和反蘇俄宣傳。㈡鄒魯與林森北上及其反對廣東革命政府的態度。㈢謝持等强佔北京執行部的舉動。……北方尤其是北京的政治環境，既是全國反動中心，又沒有堅强有組織的廣大無產階級的群衆，所以一般的小資產階級完全受反動空氣所包圍，政治觀念極爲模糊，自然很容易受戴季陶主義的影響，因此在北京國民黨中除了極少數幾個老黨員外，實在沒有真正的左派。」⑨勢力强大的北京孫文主義學會於是在十二月十二日正式成立，

其主要成員有傅汝霖、王崑崙、鄒德高、曾擴情等。他們既有許多大學中學生參加，又有刊物《民生週刊》宣傳主義，很有聲色。

當時的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近年回憶，國共兩方處於很對立的狀況，與中共對着幹的就是孫文主義學會前身的民治主義同志會：「在學生運動中，有鄒德高爲首的民治主義同志會，與國民黨右派鄒魯有聯繫，是露骨的反共組織，在學生運動與社會團體活動中，他們專門與共產黨作對。記得在北京國民黨執行部中，共產黨的青年朱務善佔了一個職位，那麼民治主義同志會的鄒德高也非要一個職位不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學生會中，共產黨員朱務善當選爲到廣東請孫中山興師北伐的代表，民治主義同志會也要求派遣他們的會員李某同去。」⑩可見針鋒相對的激烈程度。

國民黨在北方的負責人丁維汾，在後來的各種文件中證明與中共的關係十分地緊密，他在中共主導的廣州國民黨「二大」的關於北方的黨務報告中，主要都是對民治主義同志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控訴：「內部的意見不一致，真使我們的工作感受無比的痛苦。在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恨民治主義同志會那個反革命團體。……到了去年六月，又發生共產和反共產一個問題。共產和反共產，在別處確不成一個甚麼問題。單在北京有他們那般民治主義同志會的造謠，便像煞有介事的，生出許多問題，作爲反宣傳的材料。十四年春間，馮自由、馬素、鄧加彥輩在北京組織同志俱樂部，首先加入者，便是民治主義同志會。後來因爲北京同志許多退出同志俱樂部，他們表面上也宣告脫離，但我們每次被人搗亂時，都是民治同志會的分子暗中在內面活動。……他們還想把民治主義同志會推廣到各省區，這不是一個國民黨的預備會嗎？當時我在上海，謝慧生便把這件事告訴我，我當時便不贊成。……現在北京許多青年，已經明白他們的真相，都不願意加入。他們又改頭換面，用孫文主義學會來號召。一般青年不察，以爲孫文主義這個名義是好的，便有許多加入。不過他們實仍舊做破壞我們黨務的活動。」⑪國民黨的丁維汾和

共產黨的李大釗在北京執行部是配合得很好的，但是他們在反對共產主義的青年之中，仍然很孤立，丁維汾的這個黨務報告反映了他們的痛苦。

這積累下來的忠於孫文主義的傳統，造成了西山會議在北京舉行的群衆基礎。

在廣東的情況則很不一樣。因爲廣東在孫先生去世以後，已經被汪兆銘、鮑羅廷—中共所霸佔，連國民黨反共的高層領導都難以在這裏立足。但是，反對蘇俄—中共的教授和學生在廣州大學進行着活動，廣州學生聯合會就是堅決反對中共的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則在陸軍學校中和中共進行着艱苦的抗爭。

因爲鄒魯爲校長的廣東大學一直拒絕鮑羅廷—中共插手，在鄒魯被排斥離開廣州以後，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廣州國民政府宣佈免去鄒魯校長的職務，汪兆銘接着先後委派陳公博、顧孟餘爲廣東大學的校長(這二人後來都是改組派的中堅人物)，這就引起了主持正義的許多教授和學生的抗議，在幾天以後宣佈離校的學生有六百餘人，馮友蘭等三十八位教授在十二月一日發表宣言指責鮑羅廷、汪兆銘等人的陰謀，該宣言說：「中山先生因爲大學是一個研究學術的機關，不是一個宣傳主義的場所。所以不以廣大爲黨立學校，而以之爲國立學校。關於教育方針，則取感化主義，而不取黨化主義，這卻是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的俄人的一個大忌諱。中山先生在日，他們還不敢明目張膽破壞廣大，不幸中山先生逝世，他們遂向廣大猛烈進攻了。他們之所以急於佔據廣大，因爲廣大學生之中，百分之九十九不信仰共產主義，教職員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我們辭職原因在反對赤化教育，維持教授人格。……」⑫這件事影響很大，顯示了鮑、汪勾結不得人心，顯示了甚至在蘇俄—中共佔優勢，並且有汪兆銘附和的廣州，稍稍正直的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的深惡痛絕。而在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和中共黨員組成的青年軍人聯合會之間的摩擦，就更尖銳激烈得多。

黃埔軍校一成立，中共就插手，在一九二四年冬天組織了火星社，成員有一百多人。由此爲基礎，在一九二五年成立了青年軍人聯合會，包括已經畢業的同學也加入。中共黨員的組織起來，促使學生中的國民黨的忠貞分子也在一九二五年的夏天組織起來，最初叫中山主義學會，其章程的捍衛孫文主義的宗旨非常明確：「究竟爲甚麼要發起這個學會呢？其意見如下：『㈠我們既爲中國國民黨黨員，當然要明瞭國民黨的主義，國民黨的主張就是中山主義……㈢中山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且它還有許多地方是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本黨同志對於馬克思主義研究甚力的很多，但致力於中山主義的研究的則很不多見，所以非組織中山主義學會，不足以喚起同志切實的研究……㈩我們鑒於近來本黨同志往往若忘其所以，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來批評本黨或攻擊本黨，甚而有將非本黨主義大爲宣傳，殊屬有違紀律，我們認爲這是危及中山主義和自己的不忠實的道德的。』」⑬這些青年軍人在共產黨極爲囂張的時候，如此主張研究、宣傳、實行孫文主義，把所信仰的孫文主義來指導各種政治行爲，完全是爲了對抗共產主義，其意義非常重大。更何況在黃埔軍校之中，有周恩來、惲代英、熊雄等那樣多的共產黨員教官，軍校的教材又多是宣揚階級鬥爭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假若沒有孫文主義的理論來凝聚，沒有組織來團結，是不可能和共產主義對抗的。《邵元沖日記》也記載這時候孫文主義學會的情況：「午前八時頃，潘佑强(劍一，湘人，黃埔第一期第三隊學生)來訪，言新自粵歸，軍校同學盼余甚殷，又有校中教職員及學生千餘人，組織孫文主義學會，團結純粹黨員，並攜來該學會一公函，請余任指導，辭甚懇摯，余允於數星期後啓行。十時頃去。」這潘佑强就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分子，中共的有關回憶就說：「一九二五年底，廣州孫文主義學會正式成立，就更加公開地對共產黨員及進步學生進行攻擊。他們經常在宿舍、飯堂、教室污蔑共產黨，攻擊蘇聯，歪曲孫中山的革命政策，因而引起了進步學生的回擊，形成規模頗大的辯論和爭議，每每由這些爭議而動手打人，形成打架。自後，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公開挑動打

架，在校內校外衝突的事情就時有發生，楊引之、潘佑强等都成爲全校聞名、甚至廣州聞名的打手。」這回憶中當然少不了不實之辭，但這可以從側面看見當時的激烈對立情況。

一九八二年的《廣東文史資料》等三七輯，是《黃埔軍校回憶錄專輯》，其中的大多數文章，都談到青年軍人學會與孫文主義學會的激烈爭鬥情況。當時，從蘇俄學得嚴密組織的中共，在軍校中也照樣嚴密組織起來。當時中共在軍校的五人領導者之一回憶道：「中共軍校黨的核心組織——『黨團』，是由區委指定惲代英、熊雄、聶榮臻、陳賡和我五人組成，由惲代英負責主持。熊雄是黨在軍校政治部的領導人(按：還是國民黨軍校分部的監委)，負責全校政治教育和宣傳工作，制訂全校政治教育計劃，安排政治課程。政治主任教官惲代英協助。政治部行政事物和辦公廳日常工作由聶榮臻協助。陳賡負責團結軍校青年軍人工作，參加青年軍人聯合會、黃埔同學會等社會團體有關活動。我則負責把軍校各部門和團隊的中共黨員分別組成各基層小組，由小組長直接和我聯繫，溝通他們與區委軍委黨的組織關係，接受黨的教育，遵照上級指示從事各項革命活動。」事實上先有中共的組織和對軍校各方面的控制，才有忠貞國民黨員自下而上的反抗。和當時國民黨的整個大局一樣，反抗是被動的，因爲國民黨的上層機關已經被中共控制；而中共的各級領導機關卻由純粹的中共黨員組成，只接受蘇俄的指揮和控制，國民黨員從來未去插手。稍稍研究現在公佈的這些浩大的文字，可以發現孫文主義學會是被逼出來的。

現在再從這期《廣東文史資料》摘錄兩節孫文主義學會和中共衝突的實例：中共在軍校一貫有自己的一套組織系統，但是在校政治部的一位中共黨員機要秘書，不慎丟失了一份第一師政治部寫給「君偉」(軍委)的黨內報告，報告中對全師官兵的思想動態做了分析，提到師長何應欽時，加以「非同志」的稱謂，並把他列爲中派。這份報告給孫文主義分子拾得，於是他們將此件大量影印，散發給校內師生

員工及在東江前線部隊，並郵寄到上海的報紙發表，在軍校外造成了很大影響。根據居正編輯的經典文獻《清黨實錄》第四二五頁，這份文件的有關內容是：「我已隨第一師到達石灘三日，尚未填具報告者，以四圍都非同志，而又同居一室(師長參謀長等)。政治部雖自成一處，亦以雜有外人，遂使我無有機會填具報告，只好暫作信函寫上。僅乞諒。……軍官方面，如何師長對政治工作，頗能認識其必要與價值，故我們工作向無妨礙，可暗中暢行，及藉機會宣揚我們的主義。俠公，十月四日午後二時」這個事例也說明搞陰謀的總是處於奪權進攻的中共方面，孫文主義學會進行反抗是被動的。

另外的事例是，在潮州的黃埔分校，孫文主義學會已經很强大，足以抵制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活動，甚至周恩來推薦緊緊附和中共的鄧演達去任分校政治部主任，因爲孫文主義學會的反對，而不能夠上任；他們還迫走第一師的中共黨員政治部主任李公俠，等等。

黃埔軍校孫文主義的重頭人物王柏齡回憶道：在中共積極進取的時候，如何是好呢？「大家想辦法，居然被我們想到了，就是以研究孫文主義爲目的，來組織一個學會，既不是反對共產黨，而又是研究我們的孫文主義，難道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會來加入嗎？如此我們就可以與他劃上一道鴻溝，爾爲爾，我爲我，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斷不會被他們買空賣空，偷天換日的了。我們有了這基礎，才說得上合乎環境，以求自存，並不妨礙黨的策略。……武的呢，以黃埔軍校爲目的；文的呢，以中山大學爲目的，尤其對廣州香港的工人，遠而至於上海北平的青年，均徵求他們入會。……校中官生，大多數加入了，中山大學的學生，更不消說，並澎湃到上海等地，但都在背地裏進行。這個時期，可以說是和共產黨暗鬥的時期，他們要拉人，要費很多的力氣，我們宣傳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同時凡經過我們運動的組織，共產黨再沒法賣弄了。」⑭

任何社會的大衆文化思潮的走向，總是受到精英文化的影響。在西山會議召開的前夕，在北京、上

海、廣州等地的大學裏，在國民黨內外，佔壓倒的多數仍然是反對蘇俄—中共的新型的民族主義思潮。這正是西山會議召開的社會基礎。

註釋：

① 《曾慕韓先生逝世三十週年紀念特刊》第五頁，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出版，民國七十年，台北。
② 《醒獅週報》第一號，出版宣言，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上海。
③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第三二五至三二六頁，中華民國十四年。
④ 《學純室回憶錄》第一二四至一二五頁，李璜著。
⑤ 《從容共到清黨》，李雲漢著。
⑥ 《平凡的我》第一五五至一五六頁，黎東方著，文星出版社，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台北。
⑦ 《回顧錄》，鄒魯著。
⑧ 《民生週刊》第九七期至一〇二期，北京大學《民生週刊》社發行，中華民國十四年。
⑨ 《蘇聯陰謀文證匯編》，京師警察廳編譯館編，一九二七年北京出版。
⑩ 《國共合作在北京》第四一七頁。
⑪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四輯(上)第三二五至三二六頁，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南京。
⑫ 《中華民國史實紀要》第八九五頁。
⑬ 《傳記文學》卷十七，第一期第九三頁。
⑭ 《革命文獻》第十四輯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印，台北。

一個國民黨共產黨都刻意隱瞞和歪曲的史實；

七十五年前一個能匡扶國運的會議，

被淹沒在偽造的史籍中。

共產黨怎樣開始？

國民黨如何分裂？

蔣介石如何上台？

七十五年後真相展示在世人面前，

本書絕非天馬行空、胡亂編造，

全書內容均以蘇聯、國民黨、共產黨的檔案資料為根據，

首次披露，不可錯過。

封面人物：（從上至下）林森、居正、謝持、張繼、鄒魯

ISBN 962-86043-1-7

9 789628 604319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上下兩冊 港元 150 美元 20